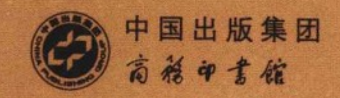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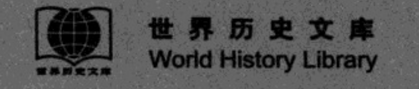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史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 著 董小川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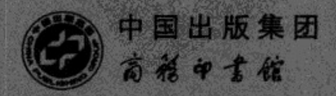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史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 著　董小川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塞俄比亚史／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6899 – 4

Ⅰ.①埃… Ⅱ.①阿…②董… Ⅲ.①埃塞俄比亚–历史 Ⅳ.K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589 号

责任编辑 李 悦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 – 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言与致谢

在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当中，现代性的历史叙述通常是最具典型性的，因为其他各种叙述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具有排他性，因而带有霸权性。但非洲大陆却是在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一员之后才完全具备了进入现代世界政治意识领域的条件。尽管埃塞俄比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繁盛的文明超过3000年，但在20世纪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像埃塞俄比亚历史那样完全地限定在现代和权威流行媒体所报导的那样狭窄的范围内。新闻短片所昭示的193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情景早已经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广为流传。埃塞俄比亚的形象也早已经被作为西方现代性圣坛上殖民争夺记述和文字标准的代表性范例。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从埃塞俄比亚发回的流行报道之所以得到称赞，就是因为那些报道无所顾忌、洞察敏锐、引人入胜，因此，人们也就不再挑剔其文字图画中同样具有的某种偏见和留给我们的那些呆板形象了。沃以那样“幼稚”的眼光看待埃塞俄比亚，导致人们感觉他赞赏法西斯主义现代性，因为他把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之间的战争描绘成野蛮与文明间的冲突。他对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论著被那些还没有认真考察其历史的人们一再出版，其中的错误也没有得到纠正，那些著作经常被作为对当代非洲政治经济的一个敏锐预言来引用。综观埃塞俄比亚和整体世界，冷战政治的文化锋芒早

已经造成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左派的进步呼声被人们置之度外了，例如，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乔尔·T. 罗杰斯（Joel T. Rogers）、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和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Bois）等，尽管人数不多。二战以后的学术作品基本上能够对所罗门和后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埃塞俄比亚政治体制的细微性和复杂性进行评价。

埃塞俄比亚还受到内部某些人的出卖。埃塞俄比亚许多政治领导人被认为曾经在人际和社会关系方面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在欧洲殖民主义侵略非洲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不平等的君主制社会还被认为具有新的意义。因此，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国家政策中心的人来说，并不是都得到了最高的生活质量，结果导致某些人在自由帝国主义、冷战政治、人权干涉和全球神权政治那具有诱惑力的特殊主题之下以国际活动家和社会专家的面孔一再出现。不论埃塞俄比亚在人类文明中的定位和贡献如何，它进入现代社会的轨迹只有一条，那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它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所表明的，在地缘空间概念上它是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sub – Sahara Africa），它的主要病态表现在饥荒、战争、贫穷和政治动乱。

但是，对于判断性地理解现代全球关系和范式来说，例如国际游说团概念的演化、战后重建、边界争端和国际社会主义以及自由化改革等，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现代非洲大离散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出现：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欧洲法庭的影响黯然失色，其自治也被欧洲政治和经济强制所瓦解，但跨国黑人标准还是与种族与经济帝国主义的广泛批评密切相关。黑人民族主义从宗教与世俗人文主义两个视角颂扬了埃塞俄比亚文明和独立，其中包含着本质主义和内部关联结构的思想，也是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模式的体现。但是，不论是殖民主义的歪曲叙述，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编撰学，都无法反映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工程的复杂性。二战后对埃塞俄比亚历史的许多描述都强调那些缺陷，甚至还在各种冷战分析模式负担压力之下的时候，他们对非洲主观主义的批评性估价和当地与全球正义两个概念之间的相

互关联问题上就赞同结构主义的分析、强权和认同政治。

这本《埃塞俄比亚史》集中在3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上：政治、经济与文化。这3种力量自19世纪晚期以来就构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主体。我探索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埃塞俄比亚与全球国家间的基本结构变迁及其所涉及的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地区相互关联的问题。依据这一背景，本书评价了埃塞俄比亚在神圣基督教思想束缚之下的现代主义工程是多么不稳定的行动。我在书中评价了埃塞俄比亚政权是怎样在对涉及资源管理、规划和优先权的世俗现实社会实行管理的，同时又是怎样对国际、国内和地区政治问题进行安排的。此外，本书还对埃塞俄比亚在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国际经济改革面前如何努力从事独立事业问题进行了分析。我还考察了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时期，埃塞俄比亚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实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有意义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外艺术、戏剧、正统科普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古代种族身份的复兴。本书为那些试图了解21世纪以前全球关系复杂历史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读者奉献了一幅生动的、不断变化的、有说服力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画面。最后，本书提供了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重要人物的生平简介和阅读文献。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弗兰克·W. 撒克里教授（Frank W. Thackeray）和约翰·E. 芬德林教授（John E. Findling），格林武德现代国家史系列丛书的诸位编者，凯文·奥何（Kevin Ohe）、史蒂文·维查诺（Steven Vetrano）、萨拉·科尔韦尔（Sarah Colwell）以及格林武德公司的其他人员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在我旅居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期间，荣幸地结识了托因·法罗拉博士（Toyin Falola）、克里斯托弗·阿德朱莫博士（Christopher Adejumo）、约翰·兰菲尔博士（John Lamphear）、博恩德斯·林德佛斯博士（Berndth Lindfors）、凯文·K. 盖恩斯博士（Kevin K. Gaines）、彭尼·冯埃森（Penny Von Eschen）、希拉·沃克尔博士（Sheila Walker）、贝蒂·农莱（Betty Nunley）和珍尼·琼斯（Jenni Jones）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我还得到了梅尔

巴·乔伊斯·博伊德博士（Melba Joyce Boyd）、贝斯·贝茨（Beth Bates）、奥利·约翰逊（Ollie Johnson）、埃博埃·赫琴富尔（Eboe Hutchful）、佩里·马尔斯（Perry Mars）的无私帮助。我还得到马拉姆·奥鲁费米·泰武（Malam Olufemi Taiwo）、贾森（Jason）、伊丽莎白·希克斯－沃斯（Elizabeth Sikes－Wirth）、华莱士·洛赫（Wallace Loh）以及西雅图大学历史系和全球非洲人研究中心（the Global African Studies Program）全体人员的热情支持。我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包括我的妻子艾丽·阿德朱莫比（Alea Adejumobi）、我的孩子艾德尼克（Adenike）和艾德雷米（Aderemi），都给予我无法估价的帮助和支持。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奥莫拉拉（Omolara）和兄弟姐妹们，包括（阿比奥邓 Abiodun）、阿德龙克（Aderonke）、阿德达波（Adedapo）和阿德索拉（Adesola）。此外，我还得到了奎塔尔德·泰勒（Quitard Taylor）、奇蒂·恩沃巴尼（Chidi Nwaubani）、奥内武·奥格波莫（Onaiwu Ogbomo）、杰里·迪布阿（Jerry Dibua）、哈基姆·蒂贾尼（Hakeem Tijani）、凯文·华盛顿（Kevin Washington）、西蒙·奥鲁费米·艾仑（Simon Olufemi Allen）、拉菲尤·拉瓦尔（Rafiu Lawal）、沃尔·阿坎德（Wole Akande）、埃伊杰·艾尔（Ehije Aire）、基德·约翰逊（Jide Johnson）、马克·雷德马切尔（Mark Radermacher）、托因·阿拉德（Toyin Alade）、奥古斯丁·阿格武埃尔（Augustine Agwuele）、马戈·拉姆辛（Margo Ramsing）的祝愿，这些祝愿是对我完成该书的重要鼓励。我还想向佩佩（Pepes）、简·帕尔默（Jane Palmer）、杰夫·德沃斯特（Jeff Dewhirst）、布洛赫（Blochs）、梅尔劳（Merlos）、艾伦（Allens）、伯基（Berkeys）、德斯坎特（Descants）、考米斯基（Comiskeys）、奥武塞昆（Owosekuns）、伊奇里亚（Igerias）、刘易斯（Lewises）、科克尔（Cokers）、奥比塔德（Obitades）、埃布伦（Eblens）和桑亚（Sanyas）表示谢意。最后，我要感谢奥斯丁的艾利米先生和西雅图的赛拉先生在生活上对我的关照。我很高兴在埃塞俄比亚西北和其他离散者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祝愿埃塞俄比亚民族、非洲之角以及非洲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和平、进步、繁荣和在新千年里健康成长

的地区。

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卡奇姆·阿德哥本罗·阿德朱莫比（Kazeem Adegbenro Adejumobi），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就去世了。尽管在密歇根期间他与我和我的家庭在一起的那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本书出版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对于我进一步理解非洲文化中那固有的全球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很有益处的。尽管被病魔所困扰，他还是自己独特的全球化分析和非洲背景下的草根“思想库团体”方式鼓舞我们。他留下的最难以忘怀的故事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曾经在家乡的一所清真寺赞助了一位祈祷者，他说他的这一行动是代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表达他忍受白宫总统生涯结束前的那些痛苦。我也曾经本能地请求我父亲列举美国在非洲的特殊政策，这一慈善行动是否是纠正那些政策的最好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问他这一捐款的款项是否是我邮寄给他治病的钱。我怀疑他很可能是受雇于一个跨国机构来以此行动医治后殖民地时代的创伤。但他解释说，他的行动表示他坚信，克林顿这个被困扰的总统也是一个得到不公正困扰的好心人。他最后说，总之，克林顿是他儿子所在国家的领导人，当时的在任总统。不论其行动是否有价值，作为一个退休的新闻工作者，我父亲既不是考虑信仰的差别，也不是在刻意追求全球现代化条件下一个非洲人的自我。恰恰相反，他所代表的是当前的一代人，这代人强烈呼吁将积极思想的权力与各种程序结合起来，承认全球福利是联系在一起的，并坚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同样期望这本《埃塞俄比亚史》能够使我们为了世界而从中接受一些教训：评价那些导致地方和全球不平等反复出现的势力、权力及其由权力决定的自由的重要，强烈要求澄清人类和征服非洲所带来的罪恶，特别是在全球化那一幕幕演出中，历史与文化忠诚的相对性被应用到我们最初就应该考虑到的现代性全球描述中。

萨义德·A. 阿德朱莫比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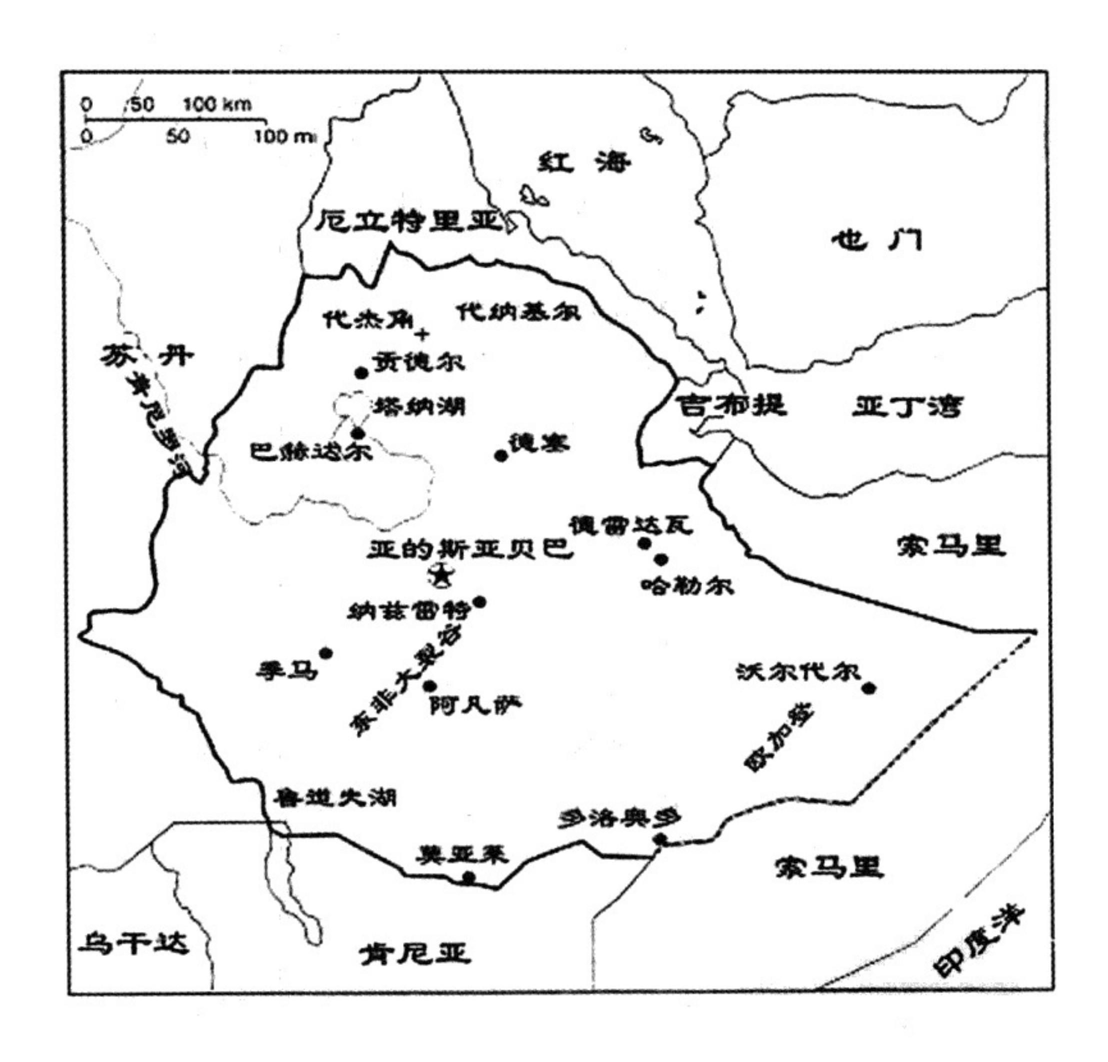
公元2世纪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建立阿克苏姆王国。
公元4世纪	科普特基督教经由埃及传入该地区。
1530—1531	穆斯林领导人艾哈迈德·格兰入侵埃塞俄比亚并掌控那里的大部分领土。
1818—1868	利杰·卡萨入侵阿姆哈拉、戈贾姆、提格雷和绍阿。
1855	利杰·卡萨被重新命名为特沃德罗斯二世。
1868	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被英国远征军击败后自杀身亡。
1872	提格雷酋长成为约翰尼斯四世。
1889	约翰尼斯四世在与马赫迪军队的战斗中被杀。绍阿皇帝继位，后成为皇帝孟尼利克二世。
1889	孟尼利克二世在乌查里与意大利签署双边友好条约。意大利现在认为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1889	亚的斯亚贝巴成为埃塞俄比亚首都。

189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896	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打败意大利军队，双方签订乌西阿利条约，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但仍然控制埃塞俄比亚。
1913	孟尼利克二世去世，皇位由其孙子里吉·伊亚苏继承。
1916	里吉·伊亚苏被废黜，皇位由孟尼利克的女儿扎乌迪图夺取，她作为拉斯·塔法里·马康南的摄政王实行统治。
1930	扎乌迪图去世，拉斯·塔法里·马康南成为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
193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936	意大利占领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逃亡，意大利皇帝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厄立特里亚、意大利所属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合并，成为东非意大利。
1941	在埃塞俄比亚抵抗势力的帮助下，英国和盟军打败意大利，海尔·塞拉西恢复皇位。
1952	联合国将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联合成为联邦。
1962	海尔·塞拉西吞并厄立特里亚，并宣布其领土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
1963	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一次会议。
1973—1974	在瓦鲁省饥荒中大约20万人丧生。
1974	海尔·塞拉西在特菲里·本蒂领导的政变中被废黜。
1975	海尔·塞拉西在被羁押环境中神秘死去。
1977	特菲里·本蒂被暗杀并被门格斯图·海尔·

	马里亚姆所取代。
1977—1979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下令杀害数千名反政府者。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反政府战争并获得地区自治。
1977	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遭到索马里入侵。苏联和古巴为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并帮助击败了索马里军队。
1985	西方国家向埃塞俄比亚发送食品援助以解救其长达10年之久的最为严重的饥荒。
1987	埃塞俄比亚按照新宪法选举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为总统。
1988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签署和平协议。
1991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逮捕阿迪斯·阿贝贝，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逃离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待独立，并建立了一个省级政府。
1992	海尔·塞拉西遗体被人在宫殿的地下室发现。
1993	埃塞俄比亚取得独立。
1994	埃塞俄比亚新宪法规定，该国家按不同种族分成不同地区。
1995	塔姆拉特·莱内被任命为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成为总统。
1998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发生边界纠纷并导致暴力冲突，1999年双方宣战。
2000年4月	3年干旱导致至少800万以上的埃塞俄比亚人面临饥饿。
2000年5月	埃塞俄比亚占领厄立特里亚城市巴伦图。
2000年6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签署停火协议。联合国监督埃塞俄比亚从厄立特里亚撤军。

2000 年 11 月	海尔·塞拉西遗体被重新安葬在亚的斯亚贝巴三位一体大教堂的官方公墓。
2000 年 12 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阿尔及利亚签订和平协议，两年的冲突结束。该协议建立了双方共同组织的专门代表团勘定有争议的边界。战俘和残疾人员被允许返回家园。
2001 年 2 月 24 日	埃塞俄比亚按照联合国规定官方宣布完成从厄立特里亚撤军。
2001 年 3 月	梅莱斯·泽纳维宣布他粉碎了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一伙持不同政见者发动的政变阴谋。
2001 年 4 月	反对政府野蛮政策和支持政治与学术自由的呼声的示威游行在亚的斯亚贝巴发生，数千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2001 年 5 月 12 日	总统梅莱斯·泽纳维的铁杆同党、思想与安全部门头目金费·格布里梅德欣在亚的斯亚贝巴武装部队军官俱乐部门口被暗杀。
2001 年 5 月 21 日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同意一个联合国独立代表团视察有争议的边界。
2002 年 4 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冲突将近一年以后接受新的共同边界。但双方还都宣称对巴德姆城拥有主权。
2003 年 4 月	独立边界代表团宣布巴德姆城属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拒绝接受这一裁定。
2004 年 1—2 月	在甘贝拉西部偏僻地区发生种族冲突，结果导致近 200 人死亡，10 万人逃难。
2004 年 3 月	一项定居规划颁布，决定将 200 多万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处于干旱境况的人迁移。
2004 年 11 月	埃塞俄比亚说它“原则上”接受独立代表团

	所划定的它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
2005 年 3 月	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组织“人权观察”指责埃塞俄比亚军队对甘贝拉阿努阿克人实行野蛮的屠杀、强奸和酷刑。埃塞俄比亚军队未予理睬。
2005 年 4 月	意大利在 1937 年作为战利品夺走的第一部分阿克苏姆石碑从罗马运回埃塞俄比亚。
2005 年 5—6 月	第三轮多党选举举行，最初结果显示，执政党及其联盟已经赢得了议会多数。
2005 年 6 月	抗议者批评执政党在选举中作弊，在首都与警察的冲突中有 36 人被打死。
2005 年 8—12 月	选举作弊的抱怨导致议会 30 多个议席重新选举，选举当局说最后将给予执政党足够的议会席位，使其组成政府。
2005 年 11 月	在 5 月份以来国家安全部队与反对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中有 46 个抗议者被打死，包括反对党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在内的数千人被拘留。有内部报告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矛盾加剧，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恢复 2000 年的和平计划，否则将面临制裁。
2005 年 12 月	一支以海牙为基地的国际代表团宣布，厄立特里亚在 1998 年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违反了国际法，该代表团说并不像厄立特里亚自己说的那样是自卫。
	包括新闻记者和许多反对党领导人在内的 80 多人出席了关于政府在 11 月可怕的街头冲突中实行种族屠杀和叛国罪的法庭指控。
2006 年 5 月	6 个政党和武装组织联合组成反对派联盟“自由与民主联盟”，并在荷兰召开会议。


0 50 100 km
0 50 100 mi
红 海
厄立特里亚
也 门
苏 丹
代杰角
代纳基尔
贡德尔
塔纳湖
巴赫达尔
德塞
吉布提
亚丁湾
德雷达瓦
亚的斯亚贝巴
哈勒尔
索马里
纳兹雷特
季马
东非大裂谷
阿凡萨
沃尔代尔
欧加登
鲁道夫湖
多洛奥多
莫亚莱
索马里
乌干达
肯尼亚
印度洋

Contents

第一章　埃塞俄比亚：思想和文化背景

引言：洞察埃塞俄比亚

在21世纪，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史和古代非洲文明历史上所发生的主要事件都与全球社会密切关联，其强烈的文化、政治与宗教势力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国家的演进，但同样重要的问题又是与现代这个时代不可分割的。在现代读者心目中，埃塞俄比亚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又一个战争和自然灾害（包括近来的大饥荒）的故事。事实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圣经》和古代希腊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埃塞俄比亚的身影。在1855—1974年间，该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这个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与海地和利比亚一样，埃塞俄比亚保持着自己曾经是历史上3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之一的地位，期间只有5年被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所占领，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反对欧洲殖民化过程中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向读者提供了全非洲文化、思想和政治历史中的一线灵光。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发展都可以向人们展现出卓越的特征，因此，不管热心于古代非洲还是现代非洲问题的研究，埃塞俄比亚都是人们了解非洲的肥沃土壤。

2

对于黑人离散者来说，作为世界上离散黑人的故土之一，埃塞俄比亚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洲独立国家，这个国家为全世界黑人国家独立的梦想提供了理想的启迪。实际上，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在西方历史叙述中是作为整个黑皮肤人种世界的种族概念出现的，包括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内都是如此。一些曾经强调埃塞俄比亚人的特质就是西方强加在非洲基督徒神圣的活生生的代表。新大陆的非洲奴隶被作为宗教与文化认同的标志，因为欧洲人用埃塞俄比亚来描绘黑非洲。同样，这个概念被以葡萄牙语引入非洲人词汇当中也是与埃塞俄比亚直接相关的。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埃塞俄比亚在圣经预言中怎样成为上帝拯救的对象普遍成为欧洲传教运动中努力皈依非洲黑人成为基督徒的一杆旗帜。作为一个结果，非洲基督徒真的要感谢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认同的标志，非洲的宗教民族主义和草根行动主义以埃塞俄比亚方式为中心而展开。由于这个原因，正是埃塞俄比亚的文化遗产构成了黑人自由和黑人民族国家独立概念，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即将看到的，埃塞俄比亚的文化遗产对非洲这个新世界杰出黑人知识分子的影响延续了好几代人。

埃塞俄比亚方式和它对非洲离散者的影响

在20世纪以前，由于相对来说与世隔绝和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一些观察家曾经将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隐蔽帝国”（the Hidden Empire）来描绘。还有一些人将埃塞俄比亚国家作为非洲独立和自我统治的神话来说明，因为该国曾经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中打败了意大利侵略军。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Bois）在1935年曾经表达了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情节，他说：“与殖民地非洲的其他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思想比较自由，保持着政治自治，开始重新实行自己的古代政策，在很多方面成为那些

现代开发和种族歧视可能发生的地方的人们的榜样。”① 杜波伊斯再现的不仅是一个古代国家历史背景和非洲向现代性转变的反衬，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方式（Ethiopianism）的反映，埃塞俄比亚方式是作为一个“非洲—大西洋文字”的宗教传统而出现的，这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具有共同政治和宗教经历的讲英语的国家来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埃塞俄比亚方式还以奴隶故事的方式、揭露黑奴掳掠者的方式以及旧时代奴隶、新时期农民的歌曲和民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特征。作为一个文字传统，它后来成为世故城市精英人物说教和政治宣传的组成部分。埃塞俄比亚方式的践行者们从《圣经》的字里行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圣经·诗篇》中有这样的字句：“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埃塞俄比亚）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诗篇：68：31）这段诗歌被一些人看成是现代性与西方传统相互关联的预言，是非洲“不久”将被基督教从“异教”中拯救出来的预言，是引人注目的政治、工业和经济复兴的先决条件。但是，对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圣经》预言的是黑人将在某一天统治整个世界。“埃塞俄比亚人的”传统常常宣称非洲人是具有天赋的，但他们强调，那些对生活的渴望由于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依附而被窒息了。他们总结说，悲惨的种族经历带来了宝贵的历史教训，这一历史教训赋予非洲人可以想象的道德优势。

此外，当意大利侵略者在黑人最后一座堡垒面前陷入困境的时候，现代黑人国际主义的兴起使世界上一些国家举棋不定，因为这种国际主义将思想和政治抗议与游说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埃塞俄比亚成为现代黑人政治传统的一个发动机，它将政治行动与贸易联盟联系起来，将反殖民主义与早期公民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东北地区以“非洲之角”（Horn）而著称，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① W. E. B. 杜波伊斯：《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种族内部关联，一个黑人的看法》，载《外交事务》（4）1935年10月第一期，第85—86页。

地位①。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被称为非洲之角，因为那里是非洲大陆的角状顶端，将红海与印度洋隔开，那里也成为现代非洲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埃塞俄比亚西部是苏丹，东边是吉布提，北边和西北是厄立特里亚，东南边是索马里，南部与肯尼亚接壤。埃塞俄比亚人口估计在7600万以上，在尼日利亚和埃及之后，是非洲第三大人口国。其现代的族裔构成是：奥罗莫人（Oromo）占总人口40%；阿姆哈拉人（Amhara）和提格雷人（Tigre）占32%；西达莫人（Sidamo）占9%；山科拉人（Shankella）占6%；索马里人占6%；阿法尔人（Afar）占4%；古拉格人（Gurage）占2%；还有1%是其他人种。

现代埃塞俄比亚鲜为人知的定居历史可以从两个重要现象中得到解答。该国经历过一系列的历史变迁，从古代到中世纪都是一个强大国家，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其社会和政治开始衰落。从当时其国内情况看，由于接连不断的权力篡位争夺和永无休止的皇室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冲突，埃塞俄比亚长期蒙受政权更迭的灾难。结果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被一些反对中央集权的省级自治的统治者所取代，在这些人中间，许多人本来就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往来关系，但他们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埃塞俄比亚现代对外关系很独特，但由于非洲大陆被纳入世界权力格局当中，埃塞俄比亚也具有现代非洲政治和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红海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不断上升，使红海所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意义。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冲击对非洲东北地区的领土争端和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整个非洲大陆殖民主义政权被推翻以后，非洲民

① 非洲之角，有时按照其地理位置又称东北非洲，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东非的一个半岛，在亚丁湾南岸，向东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公里。它是非洲大陆最东的地区，非洲大陆最东端的哈丰角也位于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概念，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非洲之角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20万［埃塞俄比亚7500万，索马里1000万，厄立特里亚450万，吉布提70万］。本书作者将埃塞俄比亚称为非洲之角似乎不妥。——译者注

族主义表达了自己人民要求经济、政治与文化复兴的渴望，因此建立了一个非洲独立国家运动组织，叫做“非洲统一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该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在现代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其他相关问题还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包括教育、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以及宪法条文的修改。上述这些变化表明非洲已经进入现代时期。遗憾的是，埃塞俄比亚文化与思想进步并没有经济发展相伴随，或者说农民阶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重要提升，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将分析埃塞俄比亚直接针对自然灾害、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一些努力，其中包括政府建立的相关机构和非政府部门的建设。我们也将讨论埃塞俄比亚复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政治知识分子和埃塞俄比亚传统社会以及离散在外者回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激发而成的。古代埃塞俄比亚手稿的文字复兴，例如，具有千年历史之久的“柯布拉—纳加斯特”[①] 是一本被某些人描绘成已经失传的《拉斯特法里遗孀圣经》（the lost Bible of Rastafarian wisdom），这本被锁在欧洲博物馆的古代手稿是埃塞俄比亚许多人都渴望看到的重要古代文献，不仅成为殖民主义共同经历的见证，也是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值得参考的古代繁荣方式的证据。伴随着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重新发展，同时这个国家全部人口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整体，上述文字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理、文化和政治背景

按照古代编年史家的描绘，埃塞俄比亚是一片令人畏惧的山地，一片孤立的高原和一些险峻的河谷地区。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人的说法，他们主要是用埃塞俄比亚来说明居住在埃及南边的那

---

① 原文为*Kebra Negast*，意为“皇帝们的光荣”，根据书的基本内容，可译为“列王传奇”或“列王圣录”。——译者注

些黑人。如同其人民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也拥有悠久而又动人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它是非洲大陆特有且多变的天然屏障。现代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地区被大量数千英尺深的峡谷和沟壑分割开来，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壮观的河谷叫阿布贝河谷（the valley of Abbai）。此外，一些火山熔岩堆形成了巨大的山脉，在这些山脉之间是平顶高原，埃塞俄比亚语将其叫做阿姆巴斯（ambas）。这些高原大都不相连接，只有巨大的悬崖之间最狭窄的瓶颈地带连在一起。

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这种分散的特征在该国政治与文化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些孤立的高原山丘成功地阻止了某些政治领导人统一国家的企图，也成功地阻挡了外来势力的侵略，还成功地阻断了那些试图开发此地经济资源者的梦想，成为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从地理上看，埃塞俄比亚分为 3 个主要地区：达加地区（daga）、韦纳达加地区（wayna daga）和库拉地区（qolla）。前者是凉爽的高地地区，那里年平均气温大约摄氏 16 度左右；中间者为比较适合居住的地区，那里居住着该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后者是炽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区，那里位于东非大裂谷（the Rift Valley）的东北角，沙漠条件下的气候只能靠大裂谷来调节。埃塞俄比亚的这种气候特征长期以来对其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生存手段和社会特性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埃塞俄比亚有 4 个主要河流水系。第一个水系是由塔克卡斯河（Takkaze，也称为阿特巴拉河 the Atbara）、阿布贝河（Abbay，也称为青尼罗河 Blue Nile）和巴罗河（Baro，也称为索巴特河 Sobat，起源于苏丹，向西流入尼罗河）组成，其中，阿布贝河最为著名，该河起源于塔纳湖（Lake Tana）；第二个水系是加纳尔河（Nanale，也叫朱巴河，Juba）与瓦比沙巴尔河（theWabe Shabale），这两条河流都流入印度洋；第三个水系是吉比河（Gibe，由于水流低也被叫做奥莫河 Omo），该河流经高原地区西南部与图尔拉纳湖（Turkana，也叫做鲁道夫湖 Lake Rudolph，该湖位于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交界处）；第四个水系是阿瓦什河（Awash），该河流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部高原，流经东非大裂谷，在其东北部消失。东非大裂谷对埃塞

俄比亚的主要湖泊群发生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北部的兹韦湖（Lakes Zway）、郎贾诺·阿布雅塔湖（Langano Abyata）、沙拉湖（Shala）、和阿瓦萨湖（Awasa），中部的阿布巴亚湖（Abbaya）和查莫湖（Chamo），南部顶端的鲁道夫湖。在达布拉·扎乌特城（Dabra Zayt）周围由火山坑形成了一个湖泊群，过去曾经叫做比绍夫图（Beshoftu），位于亚的斯亚贝巴南方大约31英里处。

埃塞俄比亚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期为6至9月份，这个时期为“大雨季”，当地语言叫做“科拉姆特”（keramt）。3至5月份叫做“小雨季”，当地语言叫做“巴尔格”（balg）。这种气候是由来自印度洋的季风进入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Arabia）低压地区所导致。温和的气候条件使北部和中部高原地区成为丰富的农产品产地。那里最重要的是一种叫做“苔麸粉”（tef，Eragrostis tef）的当地谷物产品，这是埃塞俄比亚所特有的产品，用它可以制作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面包，即用苔麸粉烤制的传统大饼①。这种食品是埃塞俄比亚绝大多数人口的主要膳食用品。在该国南方，则主要食用一种根茎蔬菜作物，叫做“因塞特”（ensat）。　6

埃塞俄比亚孤立的地理位置在其很多生活方式独特地区形成了相对特有的精神，即使中央政府对这种延续数百年不变的精神的影响也很有限。达纳基勒沙漠（Danakil Deserts）中的游牧者，希瓦、戈贾姆和提格雷凉爽山区中的农民，厄立特里亚海岸地区的渔民，季马（Jimma）咖啡林中的咖啡采集者，以及西南远处潮湿热带雨林中的狩猎者等等，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居住条件各有所异、独树一帜。但尤以居住在东非大裂谷峭壁角落上的生活最为独特。在其东北部，大裂谷宽阔得就像一个大漏斗直入红海，作为该地区的一部分，达纳基勒洼地（Danakil Depression）则处于海平面以下。达纳基勒沙漠，或者叫阿法尔沙漠，将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沙漠和山地分离开来，但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说明的那样，这里与伊斯兰世界的早期文化

---

① 本书原文中用的是enjara，但索引中用的却是Injera，从上下文看，这个词应该是指埃塞俄比亚的一种面包类的食品，但不知道作者所用的哪个词为对。——译者注

联系并没有被隔断。

埃塞俄比亚对世界宗教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早期基督教传统演进中就已经存在了。在4世纪，在中东基督教学术团体影响下（the great Middle-Eastern academies），基督教会曾经以基督色彩创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将神性与人性结合在一起，进而融合成为基督本身，而许多叙利亚和埃及教会的代表人物只选择相信其中的某个基督的唯一神性。他们的观点被描绘为基督一性论、詹姆斯一世式的、或者叫科普特教会。古代埃塞俄比亚曾经在亚历山大埃及（Alexandrian Egyptian）的领导之下，这种统治下埃塞俄比亚一直信仰科普特教。科普特教教会强调，所有信仰基督的信徒都要将自己全身心献于主。7 项圣礼（秘密）：浸礼、确认礼、悔过礼、圣餐礼、涂油礼、结婚礼和圣灵礼，在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的教诲中非常重要。圣礼是信徒在实行肉体签署后得到的无形恩典的神圣规范条款。在每次圣礼进行过程中，神圣君主[①]都将亲临现场。教会还讲授另外5项秘密信条：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浸礼、圣体和死后复生。教会将这些神秘说教看成是所有信仰者的基本知识，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知道这些神秘内容。所有 7 岁接受洗礼的信徒都必须严格遵守教会斋戒（fasting）的规矩。在封斋期，进餐和做饭都要停止。《圣经》旧约和新约早在615 年就都被翻译成吉兹语（Ge'ez），强调埃塞俄比亚与人类诞生的圣经故事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埃塞俄比亚绝大多数地方都普及了基督教，但该国穆斯林人口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人民

7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民讲多种语言。他们所讲的语言可以分为4 种：前3 种语言可以追溯到他们叫做“原非洲语”（proto-Afroasiatic）的共同祖先语言。其中以库希特语（Cushitic）最为著

① the Divine Majesty 这种神圣君主在许多宗教中都受到崇拜，通常用拉丁语中的 numen 来说明，即守护神的意思。——译者注

名，这种语言中还包括阿加武语（Agaw）、贝加语（Beja）、索马里语、阿法尔语、撒赫语（Saho）、哈蒂亚语（Hadiya）、卡姆巴塔语（the Kambata）、杰德奥语（the Gedeo）和奥罗莫语（the Oromo），现在，这些语言在埃塞俄比亚都是最大的法定语言。另一种语言是欧摩提克语（Omotic），这种语言的名称来源于当地的奥莫河和多泽（Dorze）、简加罗（Janjaro）、卡法（Kafa）、瓦莱塔（Walayta）、迪兹（the Dizi）、吉米拉（Gimira）和马吉（Maji）等地名。同时，库希特语和欧摩提克语在埃塞俄比亚地区都是最古老的语言，这种闪米特语系中的语言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都曾经具有重要的统治地位。闪米特语言中最古老的是吉兹语，现在仅限于传教士使用。其他闪米特语言，包括阿姆哈拉语、提格雷语、古拉格语（Gurage）和哈拉里语（Harari）。尼罗—撒哈拉语系语言群体是一个在埃塞俄比亚西部边缘地带发现的独立语种，其中包括库纳马语（Kunama）、古姆兹语（Gumuz）、马塔卡尔语（Matakkal）、戈贾姆语（Gojjam）、曼简基尔语（Manjangir）、阿努阿克语（the Anuak）和努埃尔语（the Nuer）。

除了上述语言证据以外，考古和研究还表明，埃塞俄比亚历史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埃塞俄比亚全境发现的大量石器和其他各种用具以及手工制品都是那里最早有人居住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亚的斯亚贝巴附近埃塞俄比亚大湖区的一个巨大火山瓦查查（Wachacha）的一些侧翼，早期人类曾经在那些火山坑边缘定居，位置就在首都南边不远的地方，人们用被称为黑火山玻璃的“黑曜岩”制作像剃须刀一样锋利的工具。在埃塞俄比亚西南角，在发现石器的同时也已经发现了装饰陶瓷和金属工具。考古工作者还在非洲之角地区的金恩峰（Djebel Djinn）发现了其他一些石器时代的证据。1974 年，在阿法尔沙漠的哈达尔（Hadar）发现了一个最早的灵长类动物，外国人称之为“露西”（Lucy），埃塞俄比亚人称之为“登切纳什”（Denqenash），考古学家认定，这个人类种族的女性祖先在 350 万年前于此居住。

在新石器时代，埃塞俄比亚乡村农业社会已经有所发展。在公元前 4000 年，世界上很可能已经有几个地方出现了孤立的农业社会，可

能从苏丹西部蔓延到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已经成为这种文化从埃及扩展到非洲东北部地区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人们来到该地区的西部，进入现在的沃莱加（Wellega），然后来到高原，他们同时带来了农业技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的石器时代文化并不是单一的。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沃塔人（Watta）与东北和西部非洲的狩猎人群有关，阿加乌（Agau）是当今所发现的阿比西尼亚高原（Abyssinian highland plateau）北部和中心地区早期人类的一个例证。阿加乌被认为是该地区发展各种新植物种植、饲养驴和繁殖骡子的开拓者。

高原人分为3个主要族群，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这3个族群分别是中阿加乌、西库希特和东库希特。到公元前2000年结束时，在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次人口大爆炸，结果导致新技术的引进以克服人增加带来的生活环境变化的许多问题。因此，居住在南部边缘地带的库希特人开始向乌干达、肯尼亚、坦干伊喀及其以远地区迁徙。此后讲班图语的移民也使埃塞俄比亚及其以南非洲其他社会的人口发生重大变化。学者们曾经强调，库希特人是在南部埃塞俄比亚和东北及东部非洲海岸地区之间发现的生殖器崇拜石头的设计者。这些情况证明，在埃塞俄比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建立国家的基本条件。

奥罗莫

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居住在巴里高原地区（Bali），这个地区很可能在现今的索马里共和国境内。奥罗莫人的口头传说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西南的波拉纳地区（the Borana），其中许多人为朝圣而长途跋涉来到“阿巴埃穆达地”（Land of the Abba Muda），那里是他们精神领袖的家。奥罗莫传说还证明，当时埃塞俄比亚南部人口居住地的变迁。因此，人们确信，阿泽布奥罗莫（Azebu）和拉埃阿奥罗莫（Raia）是从亚丁湾（the Gulf of Aden）海岸地区向西迁移到现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到了14—15世纪，强大的阿比西尼亚王朝迫使奥罗莫人向西和西南地区迁移并进入到相对荒凉的盐碱地带和火山熔

岩地带，并继续向西来到鲁道夫湖附近那更加荒凉、黄沙滚滚的沙漠地区。另外一群奥罗莫人向南迁移，他们留下的后人沿现代肯尼亚塔纳河（Tana River）居住下来。但是，有些奥罗莫人群确实发展成为强大的王权国家，这些奥罗莫人以其骑兵而著名，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和政治故事中，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都很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奥罗莫人（或者叫盖拉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人强调指出，尽管具有大量的相同之处，瓦利加盖拉人（the Wallegga Galla），“阿鲁什伊图盖拉人”（the Ittu Galla of Arusi）之间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别，而哈拉尔的“科图盖拉人”（Cottu Galla）基本上是一些完全不同人种的大杂烩。很多盖拉人群体要么独立存在，要么与埃塞俄比亚的地方贵族结成联盟，这些贵族通常是为某一不幸皇帝服务的臣民，因此其地方主义和内部争斗的趋势不断增强。中央威权的欠缺导致那些社会很容易受到侵略势力的攻击，最后终于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离散。1766 年，内战爆发，导致了一直拖延到 1855 年才结束的“王子纷争时代”[①] 的开始。在此期间，该国分裂成一个个省。这些省转而又卷入无休止的最高权力之争，其最终结果却未能如愿。此后是大批省级王朝的崛起，并为争夺国家优势而展开激烈竞争，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期。在此期间，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皇帝，人民要向自己省的皇帝表示效忠，而不是向埃塞俄比亚国家的皇帝效忠。

贡德尔王朝[②]的衰落以其城市的建立为标志，这代表着埃塞俄比亚城市文化开始了新的篇章，特别是在城堡和教堂建筑方面，也导致了其在盖拉的影响和统治。后来贡德尔成为最大的城市和宗教与艺术中心，遂成为大约从 1635 年到 1867 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为了巩固自己与某些盖拉群体的联盟，王室家庭实行政治联姻。已经被早期皇帝们的宗教背叛所削弱的贡德尔王朝的合法性被王朝与盖拉和伊斯兰

① Age of the Princes，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通常称为 the Zemene Mesafint，译者在各种词典中没有找到该说法的中文词汇。——译者注

② the Gondar monarchy，《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 1993 年版翻译为冈达尔。——译者注

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腐蚀掉了。有些占据基督教所罗门王朝地位的埃塞俄比亚贵族不情愿与盖拉联合，因为后者越来越成为占主要地位的穆斯林。当该王权已经成为盖拉政权的工具的时候，王权地位基本上无法自保了。该王朝的最后一个毫无权力可言的皇帝是伊尤阿斯(Iyoas，1755—1769)，他是一个与盖拉人的混血儿，已经完全依靠盖拉的支持而存在了。

绍阿

绍阿是此期间远离内部战争的一个省，因此，从政治角度看，它能够形成一个王朝，最后宣称为所罗门王朝。绍阿（Shoa）也拼为希瓦（Shewa），是埃塞俄比亚最南边的省份，同时也是古代埃塞俄比亚各个省份中最异类的地方，那里有好几个不同的种族和宗教信仰群体，勉强维持着不稳定的政治平衡。该省的统一是在基督教王朝统治下实现的，该王朝直到18世纪末都控制着战争。在撒哈尔·塞拉西[①]在位期间，绍阿向东、西、南3个方向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其统治者自誉为“绍阿和盖拉的皇帝”，寻求将统治阻力限定在最小程度的绍阿基督教统治者们废除了惩罚性远行的政策，代之以利诱的谋略以劝说地方首领皈依基督教。如果谁皈依了基督教，那么他就将得到许多赠品，他们在当地的地位也将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在那些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地方，当地穆斯林首领被允许保留他们自己的地位，条件是他们必须成为绍阿基督教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在19世纪中期，绍阿“王子纷争时代”走向结束。新皇帝特沃德罗斯（Tewodros）通过恢复所罗门王朝对各省级王朝的统治担负起结束内战的重任，并开始成为埃塞俄比亚无可匹敌的统治者。特沃德罗斯成功地打破了埃塞俄比亚传统的地区分配，将其分成由他自己选择的官员进行管理的更小的行政区。他还把由地方贵族控制的军队整

① Sahle Selassie，1813—1847，《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1993年版翻译为萨海尔。——译者注

编成埃塞俄比亚国家军队。这些军队的士兵来自不同省份，由皇帝亲自任命，并从国库领取薪金。尽管特沃德罗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经常与强大的极为保守的势力发生摩擦，包括埃塞俄比亚教会及其牧师。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队，特沃德罗斯必须通过高压手段获取资金，因此他废除了教会租税豁免权。他还面对盖拉的一系列新挑战，这些人经常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实行劫掠。经过不长时间的省级竞争，所罗门王朝被提格雷省的统治者宣布据为己有，该统治者在1872年以约翰尼斯四世（Yohannes IV）的头衔宣称自己是王国中的皇帝，这样，约翰尼斯这个皇帝中的皇帝开始统治绍阿和戈贾姆两个省。

根据一些人的描述，埃塞俄比亚的这个"黑暗时代"（the Ethiopian Dark Ages）延续了大约960年。此后，一个非基督教徒女诸侯约迪特（Yodit，又称古迪特 Gudit）篡夺了埃塞俄比亚王权并统治该王国长达40年之久，然后她将王权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在此后的100年间，约迪特的最后一个继承者被马拉·塔克拉·海曼欧特（Mara Takla Haymanot）所推翻，他是一个阿加乌领主，然后他建立了扎格维王朝（Zagwe dynasty），并与一个阿克苏姆王朝（Axumite monarchs）的一个女性后代结婚，成为前统治者的女婿。该王朝统治的高峰期是格布雷·梅斯奎尔·拉里贝拉（Gebre Mesqel Lalibela）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著名的拉里贝拉石制教堂得以凿建[①]。扎格维王朝的首都在罗哈（Roha），同时，为纪念该城市最著名的君主和圣徒而叫做拉里贝拉。由于该城市在宗教和建筑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拉里贝拉至今在埃塞俄比亚仍具有重要地位。拉里贝拉的那些教堂是用巨大的石头凿刻而成的，其周围由深沟环绕。那里的11座教堂是在大约1250年前后建造的，分成3个不同的区域群，每座教堂大小不一，用不同颜色的石头凿刻而成，而且建筑式样也各有千秋，直到现代，人们仍旧可以通过地下通道、地面桥梁和隧道到达那些教堂。埃塞俄比亚人确信，

---

① the stone churches of Lalibela，拉里贝拉被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徒奉为先知，他首创的用一块巨石凿成的教堂成为埃塞俄比亚所独有的教堂。——译者注

这些教堂凿刻得如此艰难而又复杂说明，这很可能是在神圣天使的帮助下完成的。

考古发现证明，那些墓碑上简短铭文是公元前 5 世纪或前 6 世纪时留下来的，它表明埃塞俄比亚北部早就存在着一些文明，甚至在著名的阿克苏姆文明（Aksumite civilization）崛起以前，那些文明就已经存在了。位于提格雷北部的耶哈（Yeha）和马塔拉（Matara）就是几处重要的遗址的典型例证，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墓碑、铭文、陶器和铜器。如同阿克苏姆的手工作品和其他古代埃塞俄比亚历史文化特征一样，例如新石器时代拉里贝拉的那些教堂和贡德尔王朝时代的那些城堡，耶哈的手工作品都是当地手工艺人的杰作。

11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影响

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传统、铭文和语言还曾经受到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移民和入侵者的影响。当然，这与同样来自南部的班图族移民相比还是次要的。阿拉伯半岛人口迁移自公元前 1000 年就开始了。在那些移民之前，古沙巴（Sabaen）商人和农民跨越红海进入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移民潮流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从文化意义上看，那些古老的城镇和贸易商路至今仍然散布在整个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北部地区。

伴随着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兴起，散布在红海沿岸和低地地区的穆斯林政权迫使阿克苏姆人退居到山区边缘地带生活。由于伊斯兰教向北进入埃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帝国在政治上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并与外界发生隔绝，尽管在文化和商业上不是这样。对埃塞俄比亚的跨文化冲击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在耶哈发现的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影响。古代希腊和埃及文学把埃塞俄比亚地区作为东非洲之角附近的一个黄金和富有之地，叫做“邦特兰”①。中东各国的这种文学、“艺

---

① the land of Punt，或者叫 Pwenet，古埃及语为 Pwene，意思是黄金宝地，那里即现在的非洲之角，以出口黄金而著名。——译者注

术品”（objet d'art）和铭文排除了任何对埃塞俄比亚在其临近地区重要意义的怀疑。当代的一些论著也证明，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半岛和上尼罗河（the Upper Nile）各王国之间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往来。

有关示巴女王（the Queen of Sheba）的传说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埃塞俄比亚，示巴被尊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女王，她叫马克达（Makeda）。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地区，人们普遍相信著名的示巴女王实际上就是古代阿拉伯女王，名叫贝尔基斯（Belkis），希米亚人（Himyar）建立的也门王国（Yemenite Kingdom）是她的祖先所统治的国家。但是，所有证据表明，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传说、考古学家的发掘和各种历史遗迹等，毫无疑问，埃塞俄比亚事实上是示巴女王的祖国，示巴女王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她所统治的时代也无疑是当时埃塞俄比亚统治王朝的起源。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有关示巴女王的传说将得到进一步考证，因为她十分重要，即便是在现代埃塞俄比亚，怎么强调她的历史价值也不过分。

《列王传奇》(*Book of the Glory of Kings* ，即前文解释的*Kebra Negast* ）描绘了约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是如何被带到埃塞俄比亚的，所罗门又是怎样诱奸了示巴，按照有关阿姆拉克（Amlak）母亲的故事，示巴就是马克达女王，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称王了。感觉到自己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示巴女王前往耶路撒冷参观并学习所罗门王的聪明才智和有效统治。由于两个王朝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关系，结果生出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孟尼利克一世（Menelik I）。孟尼利克一世曾经两次去耶路撒冷，在他成年后，所罗门指定他为埃塞俄比亚皇帝。也正是由于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埃塞俄比亚才变成了“被选择的人”（the chosen people），由于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才得到了这种荣誉。作为所罗门和示巴的后代，孟尼利克一世成为阿克苏姆文明的创建者。1270年，耶库诺皇帝（Yekuno）宣布自己是孟尼利克一世的直系子孙，所罗门王和马克达（示巴女王或者说是撒巴女王）的后代，所罗门王朝复辟。此后，所有的埃塞俄比亚统治者都确认自己拥有耶

12

库诺·阿姆拉克子嗣的全权和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所罗门王和马克达女王的后代。在所罗门王朝复辟的高峰期，对该王国境内的基督教及其周围地区制订了严格的法规。经过一系列军事征服活动，该王朝成功地占领了一些穆斯林省份，因此该王朝有势力控制了红海贸易商路。该王朝的政治和经济成就一直继续到现代。必须说明的是，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任皇帝海尔·塞拉西也认为自己是孟尼利克一世的直系子孙。

基督教和古代阿克苏姆的冲击

埃塞俄比亚传统国家的核心地带最初在古代阿克苏姆城市国家，即现今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省。大约在公元1—3世纪，一个希腊水手写了一本具有全球意义的著作，该书共66章，名为“红海航海记”[1]。该书的作者是居住在埃及的罗马公民。这本书为人们了解非洲富饶的商业传统提供了宝贵资料，当时的非洲就是著名的阿扎尼亚（Azania）。该书内容包括他的船只的航行日志、贸易记录和其他一些对阿克苏姆港口阿杜利斯（Adulis）的生动描述，这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引证了大量进口物品，包括柔软的铜版纸张、小斧头、意大利生产的葡萄酒、皇帝使用的金银器皿、军用斗篷、印度人制造的铁器、钢器和布匹衣服等等。该书还描绘了作为仪式保护物的狮子图腾，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阿克苏姆城市国家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提格雷北部的各个侯国，在公元3世纪末期，阿拉伯半岛西部的3个地区也进入到阿克苏姆城市国家统辖范围之内。该帝国还控制红海船运行业，特别是在王国西边的梅罗耶王国（Meroe）在战争中被毁灭，这个曾经先于阿克苏姆繁荣起来的古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

[1]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n Sea*，国内有人在文章中翻译为“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本书译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误解，因为Erythraen Sea并不是指厄立特里亚，而是指的红海。按照维基百科全书英文版网上资料，这本书中所用的Erythraen一词也有误，应该为Erythraean，作者未留下姓名，但该书所描写的不仅仅是红海，还包括印度洋和波斯湾等海域。——译者注

阿克苏姆在皇帝厄扎纳（Ezana，公元320—356）统治时期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统治的末期，阿克苏姆皇帝皈依基督教，因此而成为强调基督教信仰并使基督教成为该王国统治地区的官方宗教的第一个非洲皇帝。这段历史的根基是厄扎纳的父亲，埃尔拉·阿米达皇帝[①]所奠定的，是他在古梅罗耶王国的首都以坚硬的黑色玄武岩竖立了图腾象征。阿克苏姆历代皇帝都以铜、银和金造币。前期皇帝的王冠都保存在锡安圣玛丽教堂（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Mary of Zion）。约翰尼斯皇帝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亲临该教堂。该教堂曾经在16世纪的时候被穆斯林劫掠者所捣毁，直到17—18世纪才得以重新修建。其他有关阿克苏姆文明的描述还包括巨大的梅伊—梳姆灌溉水库（the irrigation reservoir of Mai-Shum），当地人叫它为示巴女王水池（the Queen of Sheba's pool）。阿克苏姆文明还留下了一些坟墓，其中有一座位于阿克苏姆王国的西部，那就是传说中的孟尼利克一世皇帝的坟墓。

13

阿克苏姆王国最终走向衰落，但基督教教堂却在它的废墟上幸存下来。由于当地早期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贸易商路进行的，而那些商路一直以来就是当地生存发展之路，因此，没有思想自由交流的那些民族开始停滞而不再发展了。随着波斯人扩张的影响跨越了红海，那里的贸易市场也走向衰落。伊斯兰国家的崛起和他们的吉哈德（the jihad，圣战），或者说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神圣祖先，建立在贸易和征服基础之上的阿克苏姆王国在基督教时代的1—3世纪开始兴起，公元前的6个世纪成为当地发展的中心，公元1—8世纪繁荣起来，最后在公元970年被敌对的临近族群所毁坏。正是在阿克苏姆时代期间，该国家的居民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阿比西尼亚人，他们的杰出领袖就是各个王国的国王或者皇帝。阿克苏姆人是由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库希特居民和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跨越红海并在该地区定居的闪米特殖民

① Ella Amida，在本书索引中，将Amida写成Emida，经过译者查证，应该是Amida为对。——译者注

者混合而成的。阿比西尼亚人与罗马帝国保持着相对紧密的贸易往来，这很可能是4世纪中期那里将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原因。从这个时期开始，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与吉兹语作为一种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吉兹语成为教会语言，也成为阿比西尼亚文化向南部地区以及在阿克苏姆人和库希特人口集居的高原中心地带还有一些讲阿加武语的那些被征服者扩散的工具。这个社会总体上是作为一个阿比西尼亚社会而出现的，吉兹语，作为埃塞俄比亚3种主要闪米特语言中的前辈和教会的礼拜用语，但普通民众却早已经很少使用该语言了。吉兹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和现代佛兰卡语（the modern lingua franca）之间的关系与拉丁语和罗马语之间的关系很类似。

从970年开始崩溃到1135年，阿克苏姆这个基督教帝国历经坎坷。它所面临的有来自北部穆斯林阿拉伯的新威胁，来自南部和东南部穆斯林索马里的威胁，在其周边的其他一些文明也构成了对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国家传统上帝崇拜的威胁。到1135年，最初的国家已经被迫向南部和西部发展，但其本身也在重新建设，尽管这种建设还很虚弱。从14世纪早期到15世纪，该国家再一次强大起来，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有能力进行扩张。从这一点看，在阿姆哈拉各皇帝下，阿姆哈拉—基督教文化扩散到该国家的所有地区，这些被征服的地区被强行阿姆哈拉化了，那里原有的泛灵论信仰也被废除，并被强行皈依到科普特基督教（Coptic-Christianity）当中。阿姆哈拉语至今仍然是埃塞俄比亚第一官方语言（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埃塞俄比亚国家和非洲东北部地区是非洲大陆所保留下来的唯一土著人将基督教信仰作为真正信条的地区。当然，欧洲传教士也将基督教传播到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

14

有关阿比西尼亚社会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从13世纪末那里当地的教会人员的著作了解一二。当时，阿加武已经形成统一社会，并发展到足以建立阿加武政治王朝的程度。该王朝被称作“扎格维王朝”（Zagwe），从大约11世纪中期开始统治高原王国，一直持续到1270年。在阿姆哈拉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个王朝宣称自己是所罗门的

后代，试图控制阿克苏姆地区。1270 年，扎格维王朝被推翻，所罗门王朝在那里的统治从此开始。在这几百年间，埃塞俄比亚的势力足以抵御任何外来侵略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久而久之，所罗门王朝对南部和东南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埃塞俄比亚绘图文化：插图与文学、艺术和音乐

直到最近，除了该国境内，对外部世界来说，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传统艺术还鲜为人知。所知埃塞俄比亚最早的插图艺术是在该国北部一些地方发现的动物石刻艺术，包括戈贝德拉①和科哈伊托②。埃塞俄比亚艺术家创造了独特而又巨大的教堂壁画，还有一些书法、小型绘画和木版画。埃塞俄比亚人用肖像来代表各种各样的神圣偶像，这些神圣偶像所要表达的虔信目标有两种驱邪物，这两种驱邪物的作用有两个：一是要驱除邪恶，即消除邪恶和厄运；二是还愿，以表示对特殊神灵或圣玛利亚的坚定信仰。那些用纺织品或皮革制作的可以折叠的版画和折叠双连画是挂在脖颈以保护人免受邪恶侵犯的。从 17 世纪开始，在肖像前进行宣誓变得很普遍。在 17 和 18 世纪双面折叠画或者雕刻折叠画同时挂的情况也出现了。

15

从 4 世纪基督教进入该国开始，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拥有对教堂的装饰权力，那些被授权的画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神职人员。早在 7 世纪，壁画和和圣人传记故事折叠双连画，通常是圣母玛利亚故事和圣徒故事画，被作为权力的象征，描绘了他们之间的见面、会话和行动，表示消除罪恶和保护弱者。在成功地击溃了外来势力试图长期征服埃塞俄比亚之后，埃塞俄比亚人的创造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他们只采取非洲人自

---

① Gobedra，戈贝德拉母狮是一个石刻，大约 3 米长，雕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最初是 1913 年由一些德国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市发现的。——译者注

② Kohaito，厄立特里亚境内的一个小镇，那里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拥有一些石刻艺术品。——译者注

已的方式表达教徒情感而反对所有的其他做法。

埃塞俄比亚艺术既展现了西方世界的艺术特征，也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其中包括拜占廷、希腊、科普特、努比亚和亚美尼亚文化。同时，埃塞俄比亚艺术还具有印度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因素特征。虽然从大约14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书法描述，但15—20世纪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其中包括耶稣会的到来和新航路的开辟，都使埃塞俄比亚艺术更多的受到西欧文化和插图的影响。在埃塞俄比亚的那些肖像中，有些本身就具有圣画和基督教信仰特征。挫败穆斯林的侵犯也导致许多被毁坏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得以重建，那些色彩浓厚的画作和书法作品都焕发了新的活力，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一些大教堂和修道院还有珍贵的圣冠、巨大的十字架、以复杂图案装饰的带扶手的祈祷架、装饰漂亮的香炉、圣伞、叉铃和铅字印刷的圣经。

埃塞俄比亚艺术是一种教育性的艺术，这种教育性是要告知信仰者所信仰的绝对真理的故事和情节，告诉他们所敬仰人物的行为，这些故事是一代又一代画家用画作传下来的，并通过当地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强调和发展的。正是这种连续性和变化性的相互关联带来了那里文化的复兴，或者说是埃塞俄比亚化。到15世纪中期，这些以圣徒和受人尊敬的科普特教会教长的名义所进行的说教都被翻译过来，所搜集的奇迹错误地被圣徒和几个扎格维皇帝的传记联系在一起，全部对埃塞俄比亚文学的繁荣产生重大影响。那些书法还与一些颜色漂亮的画作同时存在。在传统的埃塞俄比亚艺术发展中，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通常被认为是最后时期，被看成是装饰书法和羊皮纸插图经文繁荣发展时期，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埃塞俄比亚书法艺术在14—18世纪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不论是从书法角度还是绘图说明角度说都是这样。那些用羊皮纸制作的作品都是当时最好的动物皮制品。

16

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当时其他各种最初的表达方式都是由传教士控制，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形成的，因为国家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艺术家的创作。赞美诗是以基督、圣母、圣徒和天使的名义写的。当时还有很多世俗诗歌和歌曲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口头传统文学艺术作品，但是，由于基督教对文学写作具有统治权，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得到相关评论。在这个范围里，赞美歌曲和诗歌，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作品，都是以帝国统治者的名义或者是以各种形式的社会评论而存在的，因此都是劝诫性和赞美性的。虽然基督教并不是拜占廷和埃塞俄比亚艺术唯一来源，但这种基督教特征不仅使那里的艺术具有基督教特点，同时也显示了基督教的任务和目标。当地流行的音乐形式，例如代格瓦教会音乐（the deggwa church music）或赞美诗和詹霍伊（或王室）赞美诗（the janhoy or royal chants）赞美诗表明，埃塞俄比亚音乐还要表现宗教崇拜目的。埃塞俄比亚的乐器，包括 6 弦或 10 弦的“里拉琴”，叫做科拉尔（the Kerar“Lyre”）。埃塞俄比亚还有一种只有一根弦的琴，叫做马散科（masanko），也叫卡巴罗（the Kabaro），或者叫坦布拉琴，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播最广泛的乐器。在埃塞俄比亚的音乐表演场地都有一种特殊的木棒，叫做祈祷棒，如果没有这种祈祷棒，当地叫做马克瓦米亚（Makwamiya），音乐场合就是有缺陷的，这种祈祷棒是参加音乐活动的人们在鼓掌的时候专门用来与音乐节拍同步的进行表示赞赏的用具。

直到 20 世纪初期，埃塞俄比亚的正规教育还是在宗教教育的体制当中进行的，这种教育体制是由埃塞俄比亚正教会从事和组织进行的。该国的学校也主要是培养牧师和其他一些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在阿姆哈拉和提格雷等中心区，学校也是为了对贵族子女和那些与社会名流家庭有亲属关系的农民男孩的宗教教育而开设的。但是，伊斯兰教的学校是只为穆斯林成员开设的。在 19 世纪末期，还开设了几所传教士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既为教会内成员也为其他宗教成员开设。

文字

直到 19 世纪，用阿姆哈拉语写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才开始出现印刷出版，“文字”这个概念在此前仅仅是指吉兹语文字。作为埃塞俄比

亚语和古希腊语之间相互连接的纽带，红海曾经在拜占廷语影响埃塞俄比亚文字中发挥重要作用。基督教传入埃塞俄比亚的事实证明，宗教是该国所有文字表达方式的中心，基督教也成为新旧思想得以存在或者被广泛接受的过滤器。文字的埃塞俄比亚化包括翻译、适应和基[17]督教化了的阿比西尼亚精神与气氛转化。《皇帝立法》（*the Fetha Nagast*）是那些文件中必须服从的文本之一，具有极大限制作用，即使在当今的埃塞俄比亚，这些文本也还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那些立法的形式在一些地区是建立在传统法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往的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民法和刑法颁布。直到 1931 年，埃塞俄比亚的皇帝立法还保持着官方最高法律的地位，当时，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颁布了现代模式的宪法，才结束了传统王国立法的时代。

尽管用阿姆哈拉语写的作品在 17 世纪就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这种文字只是在 19 世纪西奥多雷皇帝（King Theodore）对该文字进行的最重要推动并鼓励这种文字作品的生产之后，才达到其最充分的发展。作为该帝国统一总体规划的根基，这种文字发展也曾长期影响政府政策。伴随着阿姆哈拉语的影响不断扩大，吉兹语逐渐下降了其文字影响范围。到亚的斯亚贝巴建立了一个主要出版社的时候，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已经为随后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和阿斯马拉（Asmara）等主要城市建立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打开了大门。这些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小册子、期刊和报纸等。

现代早期的埃塞俄比亚著名作者，包括阿托・基比德・米卡耶尔（Ato Kebbede Mikael）和阿托・曼杰斯图・莱姆马（Ato Magestu Lemma）在内，写的主要是有关教育、卫生和其他一些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论著；阿莱卡・塔乌耶（Aleka Tayye）撰写了当时广为人知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史》（*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Ethiopia*）；艾菲沃尔克（Afewark）写了《孟尼利克二世生平》（*Life of Menelik II*）；莱比・瓦拉德・塔里克（Lebb Walad Tarik）用阿姆哈拉语写了一本具有开山之作意义的小说；赫鲁伊・瓦尔达・塞拉西（Heruy Walda Sellasie）开创了约翰四世皇帝夫妇统治研究，以短篇传记的

形式反映了埃塞俄比亚著名人物的政治生活；布拉塔·马尔斯耶·哈赞（Blatta Mars'e Hazan）出版了有关阿姆哈拉语法的系列著作；阿托·巴耶姆纳尔·杰布雷—阿姆拉克（Ato Ba'emnal Gebre-Amlak）写了阿姆哈拉语的起源和发展方面的著作。另外，拉斯·比特沃德·马科恩内恩·恩达尔卡特切乌（Ras Bitwodded Makonnen Endalkatchew），埃塞俄比亚前总理，也曾经对该领域做出贡献。杰尔马特切乌·特卡拉—哈瓦尔亚特（Germatchew Tekla-Hawaryat）和基比德·米卡耶尔都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当中。阿托·曼杰斯图·莱姆纳（Ato Magestu Lemna）则对埃塞俄比亚诗歌创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埃塞俄比亚人还比较严谨地接受了欧洲文学中的佳品和思想传统。例如，当时流行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和约翰·歌德（Johann Goethe）的作品以及《伊索寓言》（*Aesop' Fables*）、《一千零一夜》（*The Arabian Nights*）和《天路历程》（*Pilgrim' Progress*），都被翻译为阿姆哈拉语，使之可用于教育目的。埃塞俄比亚的其他流行出版物还有一些，包括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等世界风云人物的文学作品等。现代埃塞俄比亚出版行业的流行作品主要集中在一些诸如国际问题、种族问题、个性问题、权力关系问题、人权问题、外交史以及埃塞俄比亚在现代非洲全球经历中的历史地位问题等等。阿姆哈拉语报纸和期刊也得到出版，包括《爱慕报》（*Aimero*）、《光明与真理周刊》（*Berhanenna Salam*）、《讷格莱报》（*Negarit Gazeta*）、《亚的斯亚贝巴日报》（*Addis Zaman*）、《埃塞俄比亚报》（*Ya-Ityopya Dems*）。

18

埃塞俄比亚还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著称，该国建筑中的石碑是土著艺术中最高的。高层石塔建筑早在基督教传入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的高层石塔建筑主要是石碑和纪念碑。这些经过精细雕刻、装修华丽的建筑物的制作、搬运和竖立都需要高超的技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方尖石碑矗立在阿克苏姆，高度将近70英尺；后来发现了有110英尺高的石碑，因此，埃塞俄比亚这个石碑曾经是世界上树立的最高的纪

念碑。有一个24米高的阿克苏姆方尖石碑在1937年被意大利人搬运到罗马，树立在卡皮纳门广场（Piazzadi Porta capena）。意大利法西斯头目贝尼托·墨索里尼将阿克苏姆历史上著名的最高的方尖石碑搬运到意大利并放置在意大利非洲领地部门前，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这个方尖石碑是埃塞俄比亚宝贵的财富，但至今仍然是欧洲博物馆、图书馆和艺术收藏的物品。广大市民、学者和埃塞俄比亚的朋友们在现代曾经组成游说团要求将这个埃塞俄比亚文明起源的遗产和代表归还给埃塞俄比亚人民。直到2005年，这个方尖石碑在意大利存放了70多年后才归还给埃塞俄比亚人民。

阿克苏姆石刻制品和教堂中的精美建筑并不包括传教士和王室特权阶级的建筑。在埃塞俄比亚，普通社会成员居住在比较狭小的住宅里，例如农村的一些茅草屋，那些茅草屋一般呈圆形并有尖形屋顶，叫做图库尔或者阿格多（tukul or agdo）。比较富裕的家庭住在图库尔里，这种建筑是精致的圆形木制房屋，通常也用石头加固。村庄首脑和政治名流喜欢居住在地势较高的精致房屋里。在主要城镇里，政府官员、教会神职人员和著名人士通常投资建筑埃塞俄比亚式的现代结构的建筑里。

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服饰是很类似礼服的白色纱马（shamma），通常还要配一个大约3英尺宽的矩形披肩，这种服饰都是用棉线手工制作的。不论男女，埃塞俄比亚人都穿纱马，但男女式样有别。男人穿的通常是白色马裤，这种马裤从膝盖到脚踝都很紧。妇女则不同，她们穿的是很像睡衣的非常长的裙子，一直到脚踝。不论男女，他们的衣服通常都色彩鲜艳。每到节日，尽管外表装束看上去没有变化，但在衣服的下摆上却多了一条宽大的红带，当地叫做加诺（jano）。在纱马里面，男人穿的是丝绸制作的套衫，叫做卡米斯（kamis），并有不同风格的刺绣在上面。不论男女，埃塞俄比亚人都可以缠裹一种头巾，叫做巴尔诺斯（barnos），这种头巾下垂到肩部以下，特别是在比较寒冷的天气，许多人都穿戴这种头巾。

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饮食是饮杰拉（injera），一种当地的面包，和

一种用牛肉、羊肉或鸡肉做成的咖喱炖菜，叫做瓦特则杰尼（wat ot zegeni），有时还加一些半生不熟的蛋类在里边，随着季节的不同，还加一些红辣椒或者柏柏尔（berbere）来调味。在埃塞俄比亚人的饮食中，偶尔也有一种甜味的发酵饮料，叫做特德基（tedj）或塔尔（tall），这就是埃塞俄比亚流行的一种啤酒。

19

按照埃塞俄比亚的传统习惯，起名和命名仪式十分重要。在讲提格雷语的地区，儿童一般在洗礼时起名，而阿姆哈拉地区则将其父名放在自己名字之后。另外，埃塞俄比亚人还有不同的世俗名字和教会洗礼名字。如果曾经有一个小孩死了，或者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某个家庭，新生的婴儿将被叫做卡萨（Kassa），意思是得到了补偿。男性比较普遍的世俗名字是哈戈斯（意思是高兴）、德斯塔（意思是愉快）、麦布拉赫图（意思是光明）、还有特斯法耶（表示我的希望）。女性比较受欢迎的名字有阿巴巴（意思是花）、特鲁奈什（意思为你是纯洁的）、哈戈萨（意思是高兴）、扎乌迪图（意思是王冠）、还有贝莱奈什（意思是说你是优秀者）。典型的基督教名字多与杰布雷（仆人）、瓦尔达（后代）、阿米特（女仆）、瓦拉塔（女儿）、特法（希望）、特卡拉姆（植物）、海勒（权力）以及哈布特（礼物）有关，这类比较流行的名字有杰布雷—耶稣（耶稣的仆人）、阿米特—玛丽（玛丽的女仆）、瓦拉塔—西昂（天国的女儿）、哈布特—米迦勒（米迦勒的礼物），还有瓦尔达—阿布松（高贵之子）。

第二章　19世纪晚期以前的全球化与现代化

21

从7世纪中期开始，伊斯兰国家的崛起和随后红海贸易的中断开启了阿克苏姆国家的衰落。伊斯兰穆斯林各个公国在其东南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威胁线路，这些公国自9世纪起就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基督教埃塞俄比亚与这些伊斯兰势力之间的不断军事冲突成为15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到了15世纪末，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已经成为其敌人奢望的主要目标。大约在同一时间，国际商业探险活动中对这个基督教王国具有无尽财宝的传说使人们确信，这种来自欧洲的威胁已经与亚洲伊斯兰公国的威胁对埃塞俄比亚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祭祀王约翰（King Prester John）的传奇故事使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形象在国际角斗场上令人瞩目，因而形成了各种势力之间争相到来，反对伊斯兰国家影响和扩张的基督教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宣称，埃塞俄比亚这个鲜为人知的王国拥有巨额财富。这种国际干涉活动导致了欧洲的几个观察家在该时期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通过外交和宗教交往以及埃塞俄比亚与欧洲之间互派使者参与到埃塞俄比亚事务中来。此外，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王朝一统的特点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加强，那种挥之不去的认同感使该国继续为维护埃塞俄比亚独立而不懈奋斗。因此，除了从1936—1940年间埃

22

塞俄比亚遭到意大利的侵略和占领而外，该国在非洲被殖民主义侵略的时代始终保持独立。

在 14—15 世纪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商人旅游者当中，威尼斯人更容易得到东北非的地理信息。1457 年流行的地理文献，如《毛罗地图》（the Fra Mauro's map）和古典时代的一些著作，都认为埃塞俄比亚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均不足挂齿。教皇曾经通过埃塞俄比亚在耶路撒冷的修道士与埃塞俄比亚建立联系。西班牙的一个皇帝曾经写到埃塞俄比亚皇帝扎拉·雅科布（1434—1468，Zara Yakob），他把该皇帝描绘成为一个狂热的基督徒，认为他不但鼓励著书立说，建立教堂，通过教育训导公众，而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宗教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雅科布是一个多产作家，撰写了大量神学和哲学论著，他还重组了政府，镇压了地方叛乱，组成了一支用来侦破那些潜在的反对自己统治的间谍的军队。他的影响远及古代埃塞俄比亚最边远的地区，埃塞俄比亚南部和东部各地的酋长和皇帝都服从他的统治。

葡萄牙人和耶稣会

祭祀王约翰的传说使葡萄牙的历代皇帝对埃塞俄比亚产生了巨大兴趣，这一历史从航海者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时期开始，葡萄牙很快就与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外交关系。葡萄牙大使佩罗斯·达·科维尔哈（Peros da Covilha）在 1493 年到达希瓦，1509 年，埃塞俄比亚女王海伦娜（Helena）派遣一个叫做马修（Matthew）的亚美尼亚人作为埃塞俄比亚驻葡萄牙大使。但是，这种联合反对伊斯兰国家的愿望由于里斯本和罗马的一些误解而未能实现，他们错误地认为埃塞俄比亚教会不愿意接受教皇的裁决。结果导致埃塞俄比亚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悲剧性的一幕，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人与外国人之间缺乏信任的传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相互间不信任的问题在 19 世纪造成的最明显的事件就是欧洲国家对非洲的争夺，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入侵和英国在非洲的短期军事干预直接导致了意大利在非洲的失败。

1529—1632年间，对埃塞俄比亚所罗门国家来说是极其混乱的时代。1557年，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厄立特里亚海港马萨瓦（Massawa），并渗透到提格雷高地的边缘地区。土耳其人还向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提供武器，使他们从东部对阿比西尼亚形成压力。东部库希特奥罗莫也渗透到绍阿北部以远地区，进入到伯根德（Begemder）和戈贾姆（Gojjam）地区。在莱布纳·登格尔（Lebna Dengel，1508—1540）皇帝统治期间，埃塞俄比亚人首次使用火器，这种武器对埃塞俄比亚人在16世纪反对外来势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索马里穆斯林运动领袖艾哈迈德·伊布恩·戈哈兹，通常以艾哈迈德·格兰或者艾哈迈德·古雷耶，即穆罕默德的左手而著名（Ahmad Ibn Ghazi，Ahmad Gran or Gurey，“Ahmed the left-handed” 1506—1543），在16世纪上半期不断袭扰埃塞俄比亚，他宣布对埃塞俄比亚的吉哈德（圣战）。因此，埃塞俄比亚向葡萄牙政府寻求援助以抵抗伊斯兰势力的入侵，但葡萄牙统治集团却借机寻求强行向埃塞俄比亚传播天主教。结果，由克里斯托弗·达·伽马（开辟从非洲南部海岸进入印度洋航线的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的儿子，Christopher da Gama，Vasco da Gama）率领的400名葡萄牙军人在1541年到达埃塞俄比亚并成功击溃了艾哈迈德·格兰的进攻。与此同时，耶稣会传教团也进入埃塞俄比亚并受到感激不尽的埃塞俄比亚当局的热情接待。耶稣会来埃塞俄比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利用阿克苏姆与葡萄牙之间的友好关系实现其传播宗教的目标，但结果却卷入到1606—1632年间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和政治争斗当中。扎·登戈尔皇帝（Za Dengel，阿斯纳夫·萨加德二世 Asnaf Sagad II，1602—1604）和苏珊尤斯皇帝（Susenyos，1607—1632）都秘密地皈依了天主教，但在法西拉达斯皇帝（Fasiladas，1632—1667）统治时期，耶稣会失宠并被驱逐出埃塞俄比亚。虽然埃塞俄比亚后来臣服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可以认定，1500—1633年这个耶稣会时期还是对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耶稣会传教士佩德罗·帕耶斯（Pedro Páez，1564—1622）以其天主教传统观念对埃塞俄比亚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产生了精神上和思

想上的巨大影响，他曾经被描绘成为一个“有礼貌、爱学习、善思考”的人。他所设计的一些天主教堂至今仍然矗立在埃塞俄比亚，并对该国的建筑业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在 1624 年 1 月来到埃塞俄比亚替代佩德罗·帕耶斯的阿方索·门德斯（Alfonso Mendez）则对埃塞俄比亚传统地方宗教不那么宽容，他到来后不久就宣布罗马天主教是第一信仰，同时谴责了那些地方宗教信仰。

在 17 世纪到 18 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内，埃塞俄比亚各个地区在天主教违背埃塞俄比亚正教传统和基督特征等重要信条问题上发生许多矛盾和论争。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到埃塞俄比亚的两个传统，包括声称耶稣在经过涂油礼后成为完美之人、圣灵在约旦河涂油后成为完美的上帝，而不是道成肉身，涂油在当地语言中为切巴特（Qebat）。另一方面，基督曾经 3 次诞生：第一次是作为上帝之子的诞生，此为初生；第二次为圣母玛利亚之生，此为再生；第三次为经过洗礼的诞生。按照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这种信条叫做特塞格加（Tsegga），意思是恩典之子（son of grace）。上述矛盾和论争直到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统治时期方才结束，该皇帝试图颁布一项法规，禁止宗教信条危及政治，并由此解决埃塞俄比亚宗教信仰一致的问题。但是，神学论争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在约翰尼斯四世皇帝统治时期（1872—1889）。根据所有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共有的信念，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说教是主耶稣基督作为世界的创建者和拯救者的使徒经历所建立的。

尽管埃塞俄比亚最终镇压了 1843 年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但这仅仅表明，大量的盖拉移民，名义上要么信仰基督教，要么信仰伊斯兰教，对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压力持续了好几十年。在埃塞俄比亚帝国，盖拉人散居在各地，包括阿姆哈拉人最初居住的地区、所罗门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地区在内，都有盖拉人居住。法西拉达斯（1632—1667）统治时期，曾经发生了埃塞俄比亚皇室从传统居住地区迁移的重大事件，由埃塞俄比亚历代皇帝领导，放弃了类似游牧模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由皇室法庭确定，决定将帝国安定在一个地方，

24

那就是贡德尔城。进入18世纪早期，该国家从表面上看以其首都贡德尔为中心繁荣起来，但事实上，从1706年到18世纪60年代正是该国衰落并最后走向崩溃的时期。在接近19世纪的时候，亚的斯亚贝巴建立之前，法西拉达斯也曾经开始试图将贡德尔建设成为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城市。法西拉达斯的统治拉开了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的序幕。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Bahru Zewde）曾经认为，正是发生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社会，并导致了欧洲与非洲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从这一点看，他进一步认为，欧洲在埃塞俄比亚利益主要集中在4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商业利益、官方政府利益、宗教利益和科学利益。伴随着19世纪帝国主义的出现，欧洲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殖民主义辩护的道理。最后，欧洲国家在整个非洲所投入的军事和科学力量并不平均，这对于不同种族、商业社会和国际外交关系的结构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民族国家自持的理论，要在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立足，就必须依靠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和"物竞天择"的路径考虑人类问题，而埃塞俄比亚的技术资源使该国成为一种畸形社会，成为一个仅限于非洲和非洲人在强大的欧洲列强攻击之下的世界。

1769—1855年间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王子纷争时代"，当地语言叫做"Zemene Mesafint"，那是一个由政治危机和地方自治思想所统治的时代。反对中央集权的势力认为，权力发生了决定性的从皇室向封建的、地区性的地方军阀和传统贵族握有最高权力的方向逆转。一些学者曾经将19世纪中期埃塞俄比亚皇帝的作用描绘为一种傀儡形象。政治权力由贵族之间相互瓜分，在伯根德人、戈贾姆人和西米恩人的统治者带领下，他们寻求扩大自己的领土管辖范围。当时各地区的权力斗争也在加剧，因为帝国的解体不仅仅意味着王朝统治的结束，还表明基督教会在那些貌似独立封臣之间联盟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文化、政治和军事变化的结果使埃塞俄比亚进入19世纪的时候政治体制完全分裂，面临着反对传统阿比西尼亚价值观和建立独特的政治—宗教结构的挑战。虽然埃塞俄比亚正教在统治阶级中具有

优势，拥有众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首领，当地语言叫做伊贝德古多（ibede gudo），他们是最高精神领袖，在信徒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盖拉移民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影响也在这些地区扩展开来。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还是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出现的埃及和西欧国家扩张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西部和北部边界地区的影响相当巨大。在 1830—1900 年间，基督新教和随后的天主教传教团也在埃塞俄比亚与欧洲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

25

到 18 世纪 70 年代，埃塞俄比亚国家的主要部门已经解体，这些部门所拥有的古典时代特色与基督教时代早期的阿克苏姆帝国还密切相关。但这种出现在 13 世纪晚期所罗门王朝时代的联系在公元 1000 年和 2000 年初期并不清晰。所罗门王朝的皇帝们掌控着那个庞大而又繁荣的帝国进入 16 世纪，对埃塞俄比亚国家和教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855 年，耶马鲁奇米斯（Ye-Maru-Qimis）的统治者击败了绍阿首领阿里（Ras Ali of Shoa），这标志着进行了长达将近 100 年的阿比西尼亚核心地区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开始结束。卡萨（Kasa）全身心地投入到提格雷与绍阿各个皇帝之间的冲突当中。1855 年他控制了提格雷，紧接着他自己以传统方式戴上了“王中王”① 的桂冠。他接过了西奥多雷皇帝（Emperor Theodore）的头衔，宣布自己是菲克可雷—伊耶苏斯（Fikkere Iyesus），这一称呼是按照埃塞俄比亚神话传说和习俗中的宗教文献的一个规定来做的，菲克可雷—伊耶苏斯的意思是“耶稣的解释”。这样，卡萨就成为正确的、正义的和受欢迎的皇帝，这样一个皇帝将在对阿比西尼亚的罪恶实行神圣的惩罚之后走上王位，被称为西奥多雷皇帝，此后 40 年，该地区一直在他统治之下，此期间他恢复了阿比西尼亚的团结和伟大。这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开端，西奥多雷，也就是特沃德罗斯（Tewodros），开始了帝国重建，这一过

① King of Kings，《非洲通史近代卷》翻译为“万王之王”。——译者注

程一直进行到1878年。

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

特沃德罗斯二世通过在古代埃塞俄比亚核心地区自己的统治开始了该国的重新团结和发展。他还与基督教会建立了友好关系，因为教会是王朝安全控制的最终目标，直接关系到行政管理和民族健康问题。但事实证明，特沃德罗斯政权与教会的关系紧张，这是由于双方在土地贡赋的支出问题上存在矛盾，后来这一矛盾发展到对皇家政权的规模和特点这个根本问题的总体论争。

这位皇帝制订两项措施以加强皇权统治：第一，他打破了传统上划区而治的制度，因而剥夺了许多地方王子和皇帝对地方控制的权利，为了重建统一国家，他还从他军队中的忠实军官和皇室成员中选拔心腹作为地方长官；第二，特沃德罗斯创建了一支装备有现代化枪支和火炮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国家军队，这也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支领有规定薪水、穿常备军军装和装备常规武器的军队。他经常雇佣来自欧洲和土耳其的军事技术人员来训练他的士兵。特沃德罗斯成功的统治包括以下里程碑式的成就：引进了新的行政制度和对封建贵族的有效管理、修建了公路，在外交事务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尝试提前占有后来成为英国势力范围的非洲之角，最重要的是打破了埃及对于红海上阿克苏姆时代的港口、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马萨瓦的控制。

26

特沃德罗斯积极发展与欧洲国家，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外交关系，以将欧洲的技术引进他的国家。他利用埃塞俄比亚教会悠久的历史来吸引基督教欧洲向其派遣新教传教士。另一方面，由于担心天主教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影响会对他的政权产生威胁，特沃德罗斯排斥并赶走了天主教教派，这些教派主要来自法国天主教。尽管他与新教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他雇佣他们在军工厂工作，并严格限制他们在非基督教的法拉沙斯地区的传教活动。一些传教士基于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偏见或者反感而不喜欢该皇帝。鉴于无法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同时他

的政治前途暗淡，受欢迎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特沃德罗斯下令扣留了在马格达拉（Magdala）的英国传教士与外交人员，表现了他的极大不满。结果，英国派出了由纳皮尔将军（Napler）率领的 32000 人组成的远征军来到埃塞俄比亚，与由德加斯马特特克将军（德加斯马特克）率领的特沃德罗斯的军队交战。尽管埃塞俄比亚军队人数将近 3000 人，且装备有火枪，又是在地势有利的阿姆巴马格达拉进行抵抗，但他们还是无法与装备有火炮和来复枪的英军相匹敌。英军还取得了提格雷卡萨·梅尔查（Kasa Mercha，即后来的约翰尼斯四世）的有力支持，卡萨·梅尔查为英国远征军提供补给和运输。英军取得前线胜利后，从马格达拉掠夺走了大量的金冠、宝剑、祭祀物品和 400 多部手稿，然后将此城付之一炬，运走这些宝物用了 200 头骡子和 15 头大象。但是，英国军队试图活捉特沃德罗斯，但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英军的目的没有达到。有些学者认为，特沃德罗斯并非败于纳皮尔将军，而是被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广阔而不驯服的政府官员和所控制的省份所打败。纳皮尔将军发动的战役和英军在阿姆巴马格达拉胜利的最重要政治后果是开启了欧洲殖民者在东北部非洲扩张的新时代，面对这些侵略，埃塞俄比亚自身的分裂和广阔的疆域如何保卫的问题成为这个民族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27

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政权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先驱，该政权还有意识地加强军队中的火器装备。这位皇帝通过在自己的国家生产武器来补充提格雷的军械库。埃塞俄比亚军队于 1868 年 4 月 17 日败于英军之手后，埃塞俄比亚军械库遭到破坏并最终导致了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东北部的扩张。1868 年特沃德罗斯被击败以后，首领卡萨于 1872 年加冕，成为约翰尼斯四世皇帝。约翰尼斯四世的最重要将军是首领阿鲁拉（首领 Alula），他成为哈马西恩省的总督（Hamasien）和厄立特里亚王子。由于帮助瓦解了伊斯兰马赫迪军队的潜在威胁，他也成为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有关他在埃塞俄比亚成功阻止欧洲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将在下文进一步讲述。总之，特沃德罗斯争取欧洲国家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努力没有成功，当

时，欧洲国家已经在以非洲之角著称的非洲东北部开始扩张。

约翰尼斯四世

特沃德罗斯的继任者约翰尼斯四世继续执行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约翰尼斯四世（1872—1889）统治期间通过向公开或私人的欧洲代理商购买武器使埃塞俄比亚的武器和弹药物资大量增加。据说，由于这位皇帝与一些欧洲国家签订了中立和友好的条约，欧洲国家则送给他许多装备作为礼物予以回报，其中包括 6 门迫击炮，6 门榴弹炮连同与之匹配的 400 枚炮弹，854 支步枪和刺刀，4 万发子弹和 28 桶炸药。军事实力的增强使约翰尼斯在许多军事冲突中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所做的大部分努力都是为了扩大疆土，他将自己统治范围的界线从提格雷地区的首都一直向西推进。约翰尼斯曾于 1875 年 11 月的贡德特战役（Gundet）和 1876 年 3 月的古拉战役（Gura）中击败埃及一支有名的军队。另一次战役中，一支装备有来复枪的 65000 人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击溃了一支在英国支持下装备精良的 15000 人的军队。埃塞俄比亚皇帝缴获了约 2 万支叫做“雷明顿”（Remingtons）的当时最先进的来复枪和数量相当可观的火炮、马匹、骡子、骆驼和食品物资，尽管约翰尼斯利用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可以将自己的霸权强加到王国的大部分地区，但他最显著的成绩却是外交领域。他最终与埃及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并与在这一地区殖民实力具有统治地位的英国签订贸易协定。19 世纪欧洲列强争夺非洲大陆时，约翰尼斯因其阻止欧洲势力进入埃塞俄比亚而成为欧洲列强在非洲之角必须考虑的一支重要力量。

28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对红海沿岸的控制权成为运河区当地政权与外国势力之间相互争夺的一个重要问题。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埃及人、英国人、最后还有意大利人，都对埃塞俄比亚的部分领土提出了要求。尽管外部势力入侵非洲东北部，埃塞俄比亚国内王室各派和各省的斗争仍然在无休止地继续着。当约翰尼斯皇帝和他的将军首领阿鲁拉（Ras Alula）与伊斯兰教徒、欧洲人及其他侵略势力作

战时，希瓦省的孟尼利克尽管曾经与意大利人签订友好条约并换得了大量来复枪，但现在也在等待良机。王国抵抗马赫迪军事入侵的军费支出十分巨大，而且仍在增加，1889 年，约翰尼斯皇帝受伤，并在其后的一次军事冲突中死于狙击者之手。约翰尼斯皇帝死前下令，将皇位传给实力最强的地方统治者，绍阿省的孟尼利克二世。

约翰尼斯四世统治期间曾尝试建立起全面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但却没有成功。约翰尼斯从其位于提格雷省的根据地向红海沿岸扩张以进口武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区域也已经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在 19 世纪下半期欧洲帝国主义势力出现在非洲以后。

绍阿的孟尼利克二世

孟尼利克统治时期（1889—1914）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时期，不仅欧洲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而且欧洲列强通过在柏林会议上达成了瓜分非洲的协议来征服非洲，奇怪的是，这一时期也是埃塞俄比亚国家疆域空前广阔统一的时期。1872—1896 年间，孟尼利克通过在东北部地区的征服而使他统治下的领土扩大了一倍，所征服的面积与欧洲国家所占领的非洲领土面积差不多。他通过军事和外交策略相结合的手段夺取了加兰地区、苏丹的哈拉尔地区（Harar）、沃莱加（Wellega）的一些地区、威拉莫（Wellamo）、吉姆纳（Jimma）、卡法（Kaffa）和贡姆纳（Gomma）地区，这些地区或者被合并，或者被以政治联盟的形式成为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

绍阿的孟尼利克过去曾经以萨哈尔·马里亚纳（Sahle Mariana）王子而著称，是皇帝最有实力也是最难被驾驭的属臣。他统治时期以组建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军队而著名，这支军队的组建主要通过他统治时期的许多武器代理商来实现的，孟尼利克正是通过他们得到了军队的装备。早在作为绍阿统治者的时候，孟尼利克就开始从意大利进口武器，19 世纪 80 年代，这种军火贸易达到惊人的数量。后来，他又从法国购买武器。然后，他开始征服与绍阿东、西、南三面接壤的加

拉地区。考虑到军火贸易会增加埃塞俄比亚皇帝在非洲东北部的野心，英国最后又开始反对欧洲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军火贸易。欧洲各国势力也就遏制武器政策和索马里海岸奴隶贸易问题争论不休。意大利是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并希望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实现其野心的前哨。尽管意大利与绍阿皇帝孟尼利克在1883—1887年间已签订几个单独的"友好和贸易"条约，但在对条约含义的理解上双方仍有分歧。意大利将这些条约视为支持阿比西尼亚的一方力量反对另一方力量的手段[①]，而孟尼利克则将这些条约视为获得大量所需武器和弹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1889年，孟尼利克与意大利签订《乌查里条约》（the Treaty of Wichale)，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官方正式承认孟尼利克为阿比西尼亚皇帝，并保证他的国家的任何通过马萨瓦港口（Massawa）货物免税的特权，并承诺不但给予埃塞俄比亚一笔数目可观的贷款，而且将来还要向其供应武器和军事物资；鉴于意大利给埃塞俄比亚贷款和增加军事援助，埃塞俄比亚则将其一些地区，包括波贡斯（Bogos)、哈马森（Hamasen)、阿卡雷古斯德（AkaleGuzai）和提格雷的部分地区，相应地对意大利开放。

尽管《乌查里条约》对双方都有利，但是意大利却从它在厄立特里亚的基地向阿比西尼亚境内渗透。后来，孟尼利克发现他签订的这个条约中有关处理两国外交关系的条款在意大利文本和阿姆哈拉文本中有所不同。按照阿姆哈拉文本，如果愿意，阿比西尼亚可以在其外交关系中以意大利为自己的代言人；而意大利文本则宣称，阿比西尼亚的外交关系必须交由意大利处理。按照意大利文本的含义，埃塞俄比亚就变成了意大利的保护国。

1893年2月27日，孟尼利克通知欧洲各国，他决定拒绝接受意大利人的这种说法。他宣布："埃塞俄比亚不需要任何人，埃塞俄比亚只将自己的双手伸向上帝。"当与意大利的战争即将爆发时，孟尼利克发表动员宣言，以使埃塞俄比亚社会和教会在意大利侵略面前更加坚定信心。他说：

① 阿比西尼亚为欧洲国家对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 现在，敌人要来摧毁我们这个国家，要来改变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敌人已经像鼹鼠一样通过挖洞进入我国的事务中，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不会把自己的祖国拱手让给他们……今天，你们当中的强者请给我以力量，你们当中的弱者请给我以祈祷。[①]

在孟尼利克的号召下，埃塞俄比亚的每一个家庭[②]和即便是遥远山谷里的每一个村庄都派出了自己的战士。1895年12月，双方发生了第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在1896年3月1日的阿杜瓦战役中，埃塞俄比亚人在战场上至少集结了7万名火枪兵和42门大炮。那是一场被描绘成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之一的战役。在那场战役中，25000人的意大利军队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当时，参加战役的埃塞俄比亚军队超过10万人，这些人良莠不齐，但团结紧密。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的胜利为孟尼利克赢得了国内和国际的威望，并为埃塞俄比亚国家赢得了新的盟友和支持者。这次胜利使整个欧洲受到震动，并致使意大利政府倒台。这个事件还使埃塞俄比亚在19世纪席卷整个非洲的殖民战争过程中幸免于难，孟尼利克同法国结成同盟，这一外交举措之后就是法国作为礼物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大量武器。到了19世纪末，不仅常备军，而且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农民也装备有现代化枪械、充足的弹药并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

30

因此，人们认为埃塞俄比亚在这个时期发展到最鼎盛和最稳定的时期。它不仅通过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形成一个帝国，并且使埃塞俄比亚人扎根于《圣经》和其他古代传说的传统名誉得到发扬。此外，从长远角度看，埃塞俄比亚也成为非洲实力最强的土著国家，它拥有可以打破该地区势力均衡的潜在力量，任何一个欧洲宗主国政府都难以

---

① H. G. 马尔库斯：《转向白人的黑人：欧洲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看法，1850—1900》，《东方档案》，1971年第39期，第160页。

② 原文用的是阿姆哈拉语tukul，英文hut，根据英文，为茅草屋的意思，根据上下文，译者译为家庭。——译者注

承受征讨这个远在非洲的强大土著国家所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有人认为，对于孟尼利克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外交政策的理解，最好说那是一种侵略政策，或者说那是一个在埃塞俄比亚西部边界地区与帝国主义领土扩张需求没有什么两样的政策。他们还引证了1889年的《乌西亚里条约》（Treaty of Ucciali，即《乌查里条约》）中孟尼利克不仅接受意大利对于厄立特里亚殖民侵略，而且加入由英、法、意三个大国领土扩张的队伍当中。在这方面，孟尼利克的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贡德尔和绍阿地区，发展到包括欧加登在内的许多地方。另有一些人认为，孟尼利克的意图有两点：一方面，他要保护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自信心，埃塞俄比亚的自我储备力量；另一方面是取得欧洲国家的外交支持。但是，孟尼利克放弃了对于尼罗河河谷地区的领土要求，以求获得与伊斯兰哈里发国家①的友好关系，这一举动挫败了欧洲人在尼罗河及其周边地区殖民扩张的计划。埃塞俄比亚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玩平衡的另一个应对之策还表明，科普特教会是一个跨国性的基督教教会，埃塞俄比亚政府对该教会拥有绝对支配权，科普特教会从来没有用武力向本国领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推行基督教。从更加实用的角度看，非洲大陆的东北部地区是古代非洲、伊斯兰和基督教这三个宗教与文化文明交汇的地方，这种情况使得那里的领土和政治冲突与妥协都不断发生。当然，要从这些等式中抽象出一个“帝国主义”的基本定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种简单的总结对于“民族的”目的这个问题的研究概念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是，人们在理解该地区的政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还是有些值得分析的例证被放在“帝国主义”这个课题之下，其中包括贯穿整个1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对国家行政管理事务中社会经济的破坏。当时，埃塞俄比亚国家军队和雇佣兵都掠夺成性，他们对周边的许多社区进行了抢劫并强占了大量土地和财产，不论是忠于国家的还是反叛的地区，无一幸免。军队经常以强制手段无偿征收补给，当地语言叫做迪尔戈（dirgo）。一些乡村农民对不合理的

① Khalifa，指的是当时苏丹马赫迪起义建立的国家。——译者注

税收和以法令形式强征军事补给的政策表示不满。西米恩地区（Simien）的山民和贡德尔地区德姆布亚（Dembya）的农民也对军队的不端行为进行了抵抗。把这些行为与欧洲殖民国家的建立和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目标联系起来看，正是这些行为为现代领土收复主义者运动和内部冲突奠定了基础，并给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非洲之角的国家关系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在签订了《亚的斯亚贝巴和平条约》（the Peace Treaty of Addis Ababa）以后，宣布放弃《乌查里条约》，并承认埃塞俄比亚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尽管取得了两次军事胜利和一系列外交成果，经常表示希望从厄立特里亚获得出海口的孟尼利克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迫使意大利撤出厄立特里亚。《亚的斯亚贝巴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法国和英国都派出了外交代表与孟尼利克签订了友好条约。孟尼利克还与奥斯曼帝国苏丹、马赫迪苏丹和俄国沙皇签订外交条约。因此，一时间亚的斯亚贝巴成为一个外交中心，几个重要的国家都在这里派驻了政府代表团。埃塞俄比亚获得的军事和政治成功还使欧洲各国增加了他们派驻在该国的使馆人员数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怀着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独立国家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上任就职的。埃塞俄比亚历史是“雅利安化”（Aryanized）的历史，因此可以将埃塞俄比亚与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有人认为，埃塞俄比亚帝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埃塞俄比亚人种优越于其他非洲人种，即使他们没有欧洲人种那么优越。一些埃塞俄比亚官员同样持这种埃塞俄比亚例外论，但他们却是从宗教角度而不是从人种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 19 世纪晚期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是少数有志向的年轻人可以通向成功的职业，使许多出身低微的年轻人成为重要的政治领袖。军事生涯为进入特权阶级和获得权力提供一条新的途径。但是普通士兵的生活却非常艰苦，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患病，而且在非洲东北部危险的战争中缺乏应有的保护措施。随着不同种族被统一于民族国家的保护伞下，加之埃塞俄比亚宗教的继承，军队也帮助现代埃塞俄比亚实现

32

了民族主义的地缘政治和心理建筑。埃塞俄比亚皇帝们奉行的“现实政治”为一个充满问题的埃塞俄比亚政治未来埋下隐患，其中的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在这种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奥罗莫文化群体成为与暴乱贵族对抗的辅助力量。对于其他较小种族，除了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很少有机会进入国家的基督教军队。军事行动也导致现代埃塞俄比亚种族的变化。军事贵族和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通常被授予土地使用权和对地方臣民的军事统治权，他们一般被称为“阿姆哈拉”或“西达马”（Sidama），这些称号带有基督徒或外国人的含义。但是，这些称号既不是指同一种族的人，也没有把征服某一地区的侵入者区别开来。因此这些称号应该是一种误用。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新占领地区的人强制同化到某一社会群体当中，例如将奥罗莫移民“阿姆哈拉化”到当地的阿姆哈拉人中间。1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宗教在由殖民地资本主义逐渐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影响下所出现的政治合法化和经济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埃塞俄比亚是欧洲征服和瓜分非洲过程中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帮助埃塞俄比亚维持独立的因素包括：枪支和弹药的储备、拥有一支正规军、古代强大宗教和政治机构的存在等。因此，自19世纪以来广泛遭到殖民化和边缘化的非洲人一般都认为埃塞俄比亚是一个解放者、一个典范，活生生的非洲政治自由的倡导者和信仰者。

孟尼利克同时还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行政体系以防止外国侵略。他指派自己最信任的将军们作为各省总督，省级行政区域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行政区。总督以下是由皇帝任命的地区长官。地方长官又任命最低一级的称为“舒姆”（Shum）的长官，这些人主要负责治理地方上某一个较大的村落或一群小村落。在新占领的区域，尤其是奥罗莫和索马里地区，加里森（Garrison），或者叫科特马阿（Ketemaa），也成为重要的统治中心。皇室代表绝大多数是阿姆哈拉—提格雷人的后裔，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埃塞俄比亚民族的认同，有时使用强制手段将外族人融入扩大了的政治体制和科普特教会之中。孟尼利克还是第一位实行税收上交到各级皇家税收机关的税收制度的君主。

现代化方案

阿杜瓦战役之后，欧洲国家逐渐认可孟尼利克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势力，在孟尼利克政权的最后几十年里，他充分利用这一良好政治氛围着手进行现代化改革。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早该进行的改革被拖延下来了，其中包括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争。阿杜瓦战役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这样一个时期使埃塞俄比亚加强了对外交往。越来越多的外国工匠来到埃塞俄比亚，这就为该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营造了全新的氛围。同时，一个全新的行政管理中心，亚的斯亚贝巴，在 1886 年建立起来，5 年后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新首都。这座城市是埃塞俄比亚国家许多重大改革的发源地，由于人口众多，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专业化了，而这种专业化劳动在埃塞俄比亚其他地方几乎无人知晓。在亚的斯亚贝巴、阿瓦什（Awash）和戈贾姆（Gojjam）都架设起现代化的桥梁。革新性教育的发展也是这个时代的特色。第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孟尼利克二世学校，于 1908 年建立，紧接着在哈拉和迪雷达瓦（Dire Dawa）又建立了多所大学。在学校中，学生们学习阿姆哈拉语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并有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及其他科目的课程。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秩序，孟尼利克鼓励发展浸透了西方价值观和进步观的新式精英教育。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些年轻的阿比西尼亚人就被派到一些国家去学习，其中有西欧、俄国和苏丹等。这些国外留学与埃塞俄比亚国内毕业的学生一起成为该国新一代的精英，这些人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国家机构、外交部门和经济发展的运转主要应归功于埃塞俄比亚人教育的现代化和行政机构开始出现的世俗化。

由于与教会反对西方新观念相矛盾，孟尼利克将孟尼利克二世学校以及在哈拉、安康巴尔（Ankobar）和达斯（Dase）省的其他三所学校交给来自埃及的科普特教会的教师和牧师管理。19 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其他改革措施还有：电话和电报系统、供水管线、现代化医院的

建设，并引进新的疫苗以解决人口快速膨胀所带来的健康问题。1892年，意大利人连续不断的威胁致使孟尼利克不得不改革税收体制，并于两年后第一次发行全国流通货币。这种货币与奥地利旧的玛利亚特里萨元（the old Austrian Maria Theresa dollar）等值、等重，都是建立在银币基础之上的。那种奥地利特里萨元早就在埃塞俄比亚流通，并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就在中东许多国家流通。

1894年，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枚邮票在巴黎印刷成功并举行了庆祝仪式，同时，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铁路建设也得到批准，该铁路将把亚的斯亚贝巴与法国在吉布提的索马里兰的港口连接在一起。孟尼利克想要通过铁路降低商品运输的成本，如咖啡、兽皮、蜂蜡等，这些都是埃塞俄比亚的大宗出口商品。虽然这项工程面临技术、财政和政治上的困难，但是铁路的兴建标志着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已经取得了最伟大的技术成就。在法国的资金支持下，铁路工程使亚的斯亚贝巴变成一座主要城市。这些发展与其他一些现代化道路建设和新的运输航线建设一起，推动了埃塞俄比亚进出口贸易的持续性增长。1905年，阿比西尼亚银行（the Bank of Abyssinia）建立，两年后，第一个政府饭店得以建立。旅店、餐馆、裁缝业也纷纷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标志。

34

外国顾问、大使、使者和探险家们蜂拥而入，这给埃塞俄比亚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问题。孟尼利克试图使国家现代化，因此听取外国人的建议。但是，每个外国顾问总是寻求加强其本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的影响和优势。还有许多人给埃塞俄比亚提出了各种建议，除了经济方面的之外，还有军事和商业规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金融家们也在尝试着通过利用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方案来控制埃塞俄比亚。欧洲人的投资目的使孟尼利克很恼怒，他指责许多欧洲国家都想通过经济手段威胁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尽管现代化的规划和工程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发展既缓慢又有限，根本无法改变埃塞俄比亚传统的社会模式。当地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包括皇后塔伊图和首领马康南，都积极反对铁路建设计划。

在 1897 年和 1908 年间，尽管在邻国索马里兰殖民地的意大利和在上尼罗河占领区的英国都对埃塞俄比亚怀有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使埃塞俄比亚从来没有安全感，但孟尼利克获得了国际认可，这使他可以维护自己的边界不受侵犯。由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难以在埃塞俄比亚所在的东北部非洲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这三个国家争相在非洲之角和厄立特里亚加强自己的影响。

欧洲各国要求埃塞俄比亚遵守 1906 年条约中有关保护欧洲人安全的条款，孟尼利克在答复这一要求时强调，这种要求的目的就在于增加他们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影响范围。在一次有关埃塞俄比亚领土问题的谈话中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安排，我们感谢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并希望保持和维持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但是，这一安排不能限制我们独立自主的权力，这一点必须明确。"①

孟尼利克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除了厄立特里亚之外，他已经设法保持并扩大了早期埃塞俄比亚的疆域，他已经恢复秩序、镇压了持不同政见的封建贵族，同时，他还为埃塞俄比亚的未来发展和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基础。1908 年，孟尼利克中风病复发，几乎使他完全瘫痪，但他还是坚强地活到 1913 年。在他去世之后，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封建贵族们最后达成的协议导致一场权力之争，参与那场权力之争的主要有扎乌迪图女皇（Zauditu）、摄政王和王位的继承人和首领塔法里（Ras Tafari），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塞拉西统治时期是埃塞俄比亚重大历史事件频频发生的时期，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将埃塞俄比亚带进了 20 世纪的一系列对抗当中，包括法西斯主义、殖民战争、以及国内外自由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①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一部新政治史》，纽约：弗雷德里克·A. 普拉耶格尔出版社，1965，第 126—128 页。

第三章 现代非洲的渴望：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全球范围的政治扩张与社会改革（1884—1935）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诗篇》68：31

到19世纪中期，非洲历史上的现代化工程获得了新的发展势头。尽管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因其社区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当地社会精英着手改革政治经济管理部门和追求自我与民族定位的新方式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社会群体的认同问题也在向前发展。对人类学家唐纳德·L．多哈姆（Donald l. Donham）来说，“现代性的后设叙述”[①] 也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的扩展，即国家获得现代性地位与财富和知识的获取是休戚相关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不论是国内的还是跨国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关系对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

① metanarrative of modernity，后设叙述是个极为特殊和少见的词汇，源自于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兰西斯·利奥塔德。他认为，“现代”这个术语是任何通过后设论述将自身合法化的科学，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就是其背后的权力组织有一套“后设的”大理论和大叙述来支撑他，成为该组织活动的依据，并通过后设的理论对外宣布其合理性。——译者注

从15世纪中期以来，非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划分以及非洲内部的差别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代技术和制度不同的影响。国际市场、现代武器的设计和生产、国际交往和教育方式的不均等导致了霸权主义的重新布局和按照个人财富的多寡与社会等级的高低办事的现状，同时，种族、国家和现代性的概念也卷入其中。由于埃塞俄比亚国内局势动荡，反对现代化的地方行政长官们进行具有政治目的的阻挠，使得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该王国的行政结构与合法性问题；另一个是欧洲人的开发和殖民活动的问题。埃塞俄比亚国家经历着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重性的考验，这地方和地区认同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中都有体现。本章考察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些思想和文化变化，这些变化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埃塞俄比亚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成是有帮助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始于1884年，当时欧洲列强开始瓜分非洲；结束于1935年，当时埃塞俄比亚遭到由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国家机器操纵的意大利的侵略。 38

19世纪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诸如横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的废除，“合法”贸易的发展以及欧洲国家在非洲大陆寻求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将非洲大陆拖入了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之中。在国际资本和政治扩张相互依存关系之外出现的多种移民的历史不但推动了非洲人大离散的步伐，而且牢固地树立了一个全球性的“肤色界限”，这种界限是不平等的，是现代化的虚伪“礼物”。这个时代也赋予埃塞俄比亚的现代主义明确而又十分独特的特点：第一，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精英入侵到埃塞俄比亚的战略利益领域，埃塞俄比亚帝国开始更加关注于巩固正在逐步完善中的现代国家的边界，尤其更加关注自己认为应该进行的政府机构的巩固和扩大；第二，外国的专业人才和顾问在埃塞俄比亚是受欢迎的，只要他们不打算对埃塞俄比亚国内事务施加影响。要抵制国外欧洲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地位，要终止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势力平衡，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令人胆怯而复杂的

任务。

在1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甚至在19世纪之前，充满活力的帝国政治经济不断推动着当地多神宗教崇拜者向埃塞俄比亚正教身份的缓慢转变。按照马里纳·奥塔维（Marina Ottaway）的说法，另外一种“现代性的后设叙述”是经由阿姆哈拉控制的政治中心地区进入了埃塞俄比亚，进步观念被刻画在种族差别之上。要成为现代，“时代的现代”（zemanawi），“文化的现代”（siltane），以及“教育的现代”（yetamare），从某种角度考虑，就必须接受埃塞俄比亚正教的习俗。现代化也越来越成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机构权力集中的代名词，这种政府需要有文化的人来执掌。事实表明，越来越多地、嘲弄性地、强迫性地给非阿姆哈拉人贴上“异教徒”的标签，还有人回到“瓦拉科里”的方式当中，即使他们逐渐接受政治征服或宗教皈依[①]。

39 在上述等式的基础之上，要理解19世纪晚期的埃塞俄比亚历史需要我们以打破常规的阅读方式来阅读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经济记叙作品。一方面，埃塞俄比亚的正教会有助于种族等级的巩固，也有利于统治矛盾的解决。这也再次肯定，埃塞俄比亚人将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度中；另一方面，并且同样重要的是，现代理论的出现和形成就是使种族和区域等级制度合法化，这种情况使得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历史更为错综复杂。

在非洲血统的人民中，非洲现代性已经被描述为一种现代性和现代主观性的特殊理解，因为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相对自治的现代性区域，这种区域与西欧和北美的现代性是有区别的。依据政治学家迈克尔·汉查德（Michael Hanchard）的看法，非洲现代性是与一系列世界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国际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相结合对非洲血统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有一种占有优势的看法，那就是把非洲看成是一个神秘的“黑暗大陆”，把非洲人看成是反对西方现代性和

① “瓦拉科里”在原文中用的是阿姆哈拉语hwalakeri，如何翻译无法查证，译者根据上下文做了上面的翻译。——译者注

现代主观性理论的反对者，结果使得现代派工程对非洲人来说更具有强迫的味道。因此，在它那最具变数的环境中，非洲现代性工程在非洲之角由有选择的科技公司、各种各样的讨论和掺杂有源于非洲人民文化和政治实践的各种现代西方机构所组成。在非洲现代性的建设和发展中，埃塞俄比亚（即阿比西尼亚）的文化和政治史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欧洲理想和经济利益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成为关键的推动力量，各种记述的影响便有所增加，对于欧洲价值观和利益永远处于绝对优势的理想简直就是虚构或者自相矛盾。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反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非洲人来说，埃塞俄比亚的那些历史性记述，不论是口头传说还是文字记载，都已经成为一种古老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把本地和埃塞俄比亚正教会遗产结合在一起，而且也是一种对现代全球事件进行评价的重要工具。埃塞俄比亚史自行成为一种种族先进的现代认识论的核心成分，抑或至少在非洲和非洲血统人民中是一种反对霸权的叙事。欧洲官员和官方政治家们不是把埃塞俄比亚描述成为畸形的国家，就是对非洲历史进行隐晦的语言歪曲。许多欧洲资料为使埃塞俄比亚人有别于其他非洲人而把埃塞俄比亚人描写为“黑色高加索人”或者说是与其他非洲人不同的基督教地区的闪米特种族。虽然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但它却拥有丰富的叙述资料，这些资料断言，西方霸权理论为其在埃塞俄比亚的殖民资本渗透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尤为重要。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之角这个战略要地，它是国际事务和资源的交通要道，因此也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埃塞俄比亚开始面对不断增加的反对意见，即人们常说的反现代化思潮，特别是国内的劳役问题。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是，埃塞俄比亚国家站在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欧洲列强的对立面，某些欧洲国家甚至已经开始对埃塞俄比亚这个所罗门王朝实行武器限制乃至禁运。尽管存在这种限制，但埃塞俄比亚帝国有一支由成熟农民组成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来保卫，这支军队不但装备精良，而且由一些能力非凡、雄心勃勃、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来统领。虽然埃塞俄比亚地方社会精英

40

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和矛盾，但埃塞俄比亚正教传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带来“民族”团结，这种团结有助于军队的大量动员。

“埃塞俄比亚方式”这个概念也早已在移民到其他地区的非洲人中间出现了，这个概念如同一种末世论，把基督教和世俗民族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并在缺少现代国家保护的情况下起到了加强非洲人认同和最早公民身份的工具作用。在1884—1885年期间，作为非洲大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塞俄比亚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埃塞俄比亚被看成是非洲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唯一典范。同样重要的，埃塞俄比亚国家本身也开始从事一系列的现代化工程，为此这个国家还经常捏造说她是国际上基督教大家庭中的成员，同时她还宣称自己处于敌对势力的威胁之下。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这种现象的作用已经不大，到了二战前夕，全球霸权势力又一次共同来瓦解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埃塞俄比亚的非洲现代性又一次得到证实，这种证实是以全球人权、黑人民族主义和各种模式的集体认同的代表性来进行的。

到20世纪初期，埃塞俄比亚与欧洲保持关系的历史经历了将近500年的时间。这一历史中的某些历程是以多种思想和文化交流为特征的，在埃塞俄比亚方面来看，她的欠发达经济需要现代技术的帮助。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们对欧洲资本、物资和奢侈品毫无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为自己的政治集权、控制经济产品的扩张以及在东北非占有更多的土地而争取军事援助。但是，在这变化多端的时代，埃塞俄比亚国家还存在缺乏民族整体性、少有世俗政府的管理体制和城市发展滞后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家现代性初期工程的最大障碍。这一事实由于1769—1855年所发生的一切而雪上加霜，该国一些省级高官的地方偏见已经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随着政治权力逐渐分散，这个国家退化到封建、地区分裂和地方军阀以及传统贵族争相追逐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地步。

41 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套极为复杂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在北部提格雷的阿姆哈拉省，土地使用权是以帝国权威为基础的，土地拥有权是以

亲属关系进行授予的。农民的土地拥有权受到“里斯特”（rist）制度的保护，在里斯特制度下，国民要缴纳贡赋。另外，帝国将土地授予贵族，这叫“古尔特”①，再加上永远授予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的教会土地，统统都从农民缴纳的贡赋、产品、租金和劳役中榨取剩余。这种制度曾被称为“一种古老封建的贵族、牧师和农民三位一体”。在南方省份，19世纪最后25年间就已经形成了初始政治中心，那是孟尼利克皇帝军事征讨的结果，其特点是外来雇主征税，这叫做“内弗塔格纳”（neftdgna）。帝国当局将古尔特权力分配给阿姆哈拉人和其他北方贵族，或者说在很多其他情况下将当地的酋长（balabbat）转变成地主身份。阿姆哈拉人在南部文化区域征收赋税的特权意味着与前者的文化认同已经变成了一个融入埃塞俄比亚现代国家及其组织的手段。除了强迫和法律以外，宗教也成为这些条件再产生的重要政治和思想机构。

上述这些发展的一个结果预示着某种社会变革即将到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为现代知识和科技的获得而必须进行的下一个努力就是如何努力维护国家的权威和保持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的神学政治传统。因此，在非洲其他国家正经历殖民统治不断扩大和传统统治者们的基本权力逐渐丧失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领导者们充分利用所罗门传统思想意识的内在关联性来加强对帝国境内其他非所罗门信仰社区的重要影响。埃塞俄比亚正教会也认可国家对西方国家物质优越的可信度和西方国家来非洲是传播文明而不是侵略的说法提出挑战。

伴随着埃塞俄比亚社会的发展，其社会精英们也开始对他们自己社会的变迁发生了兴趣，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高级神甫，他们对现代

---

① gult，古尔特是埃塞俄比亚的一种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古尔特占有权的拥有者必须得到君主或总督这些有权力授予土地的人的批准。古尔特拥有者向农民收取贡赋，直到1966年，还有许多埃塞俄比亚农民向地主服劳役，作为古尔特占有权的一种支付方式。1966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原则上废止了古尔特土地占有制。一直到20世纪，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实行工薪制以前，其官员也都以古尔特的方式领取报酬。——译者注

化工程里出现的矛盾如何解决又感到无能为力。与此同时，国家也无法解决既接受现代世俗政治统治机制又不打破埃塞俄比亚民族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本质这个相互矛盾的问题。埃塞俄比亚保守派社会精英历来反对再现埃塞俄比亚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者们试图维护自己较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变革。他们也寻求实行政治改革，认为这样对推动商品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埃塞俄比亚传统社会的进步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传统和文明使非洲的知识分子们把他们自己从肩负欧洲文明传播使命和现代化道路上"小种族"引领者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将全非洲人的历史与埃塞俄比亚历史等同起来的种族政治传统还有另一个普遍特征，那就是乐于用文字来强调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是未来神圣世界的归宿。《圣经》短语中有这样的话："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这句话成为埃塞俄比亚个人和社会在接受考验时一个常用的话语。这句话的含义是想说，埃塞俄比亚人是上帝的使者，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而正义的事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42

伴随着历史上世代相传的政治势力、公民权利和领土统治权问题要么销声匿迹，要么重新组合，殖民地时代的非洲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也开始着手解决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一向强调的外国人问题。埃塞俄比亚丰富而又复杂的历史还向人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观点，那就是非洲并非生来就是落后的和低下的。同样，在非洲基督教徒中兴起的不断发展的分离主义运动也强调，在非洲其他国家还遭受欧洲殖民者侵略的同时，埃塞俄比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色基督教民族却已经打败了意大利人，从而捍卫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他们强调，非洲的福音化应该由非洲人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让欧洲人来赐予。

在1884—1935年期间，埃塞俄比亚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其触角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只与欧洲传统强国交往的局限，为了争取更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援助，埃塞俄比亚已经开始与东欧国家乃至一些亚洲国家进行交往。因此，埃塞俄比亚历史已经成为国际现代史舞台上重要的一幕，它预示着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将是充满政治阴谋的国度，

同时，该国家还将是一个国际理论从未探讨、政治经济自由主义实践中前所未有的例证。埃塞俄比亚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矛盾，再加上外国资本的不断渗透和古老文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最终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公民的大量外流，其中许多人走上了西方现代性的轨道，包括现代非洲大离散政治研究中的那些沦落在异国他乡的非洲人。

神圣信念与世俗地缘政治：埃塞俄比亚迟来的现代性转变

进入现代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充满了文化自豪感和历史积淀下来的深厚的对外来势力的防备心理因素。作为现代埃塞俄比亚的渊源，阿克苏姆帝国（The Aksumite Emprie）从上古时代以来就是全世界公认的成功者之家。公元前 90—前 21 年之间生活在西西里岛屿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鲁斯·西丘鲁斯（Diodorus Siculus）曾经认为：

> 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古老的国家，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们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成长，太阳光辉的温暖可以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早地成熟起来。他们认为自己是崇拜的开创者，节日的建立者，庄严牺牲精神的执行者和宗教信仰的实践者。[①]

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还是接待了威尼斯人，正是这些威尼斯人把埃塞俄比亚这块土地介绍给欧洲的使臣、知识分子和商人。后来，葡萄牙皇帝阿方索五世（Alphonso V）授权出版的《毛罗地图》也已经证明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存在，该地图还证实了祭祀王约翰的传奇故事，这个在伊斯兰人侵威胁之下的非洲（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皇帝曾经得到葡萄牙人的大量援助。在 16 世纪，埃塞俄比亚在葡萄牙的帮助

43

① 贝尔纳德·马克豪斯兹维·马古巴纳：《埃塞俄比亚在非洲裔美国人意识中的价值》，见《藕断丝连：非洲的非洲裔美国人意识》，马古巴纳主编，非洲直接出版有限公司，1987 年版，第 163 页。

下挫败了索马里艾哈迈德·格兰的侵略，随后又拒绝了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团试图将埃塞俄比亚皈依天主教的图谋。从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人的教训在特沃德罗斯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验证。正是这个皇帝开始向往埃塞俄比亚在独立的情况下走向现代化。他曾经把四分五裂的阿比西尼亚重新团结起来，恢复中世纪帝国的权力和圣威。他也曾寻求欧洲国家的帮助，特别是英国来帮助他实施现代化工程，但是最终遭到了英国皇室拒绝。他通过使用武力来实施现代化的企图最终遭到了一些人的反抗，并与军事实力明显占优的大英帝国发生严重冲突。

通过引进新式先进的现代化工程，孟尼利克二世（1899—1913）在埃塞俄比亚皇室血统政治集权和民族大厦的基础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统治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巧妙地利用埃塞俄比亚的欧洲盟友在非洲地区各自不同利益的政策作为维护本国独立的屏障，当时的政治环境正处在现代化承诺中掺杂着欧洲资本在非洲肆意扩张的问题。在埃塞俄比亚，与西方的商业往来所得到的收益要比有条件地让步和在其他一些相互都能接受的条款约束下来满足自己对现代设备和军事武器的需求所带来的风险要小得多。因此，在欧洲列强对非洲大陆进行侵扰和分割期间，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国家没有屈服于欧洲势力，也没有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致命打击。在孟尼利克执政期间，埃塞俄比亚发展了现代官僚统治机构，进行了有限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引进新的医疗和教育设施。正如早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他统治期间，引进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现代化设施还有电话、电报、电力、主要城市地区的现代医疗服务、亚的斯亚贝巴银行的建立和一个合作项目——法国至埃塞俄比亚铁路工程的建设。但是，孟尼利克改革是要保持埃塞俄比亚传统的封建政治和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与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贡赋不可分割的。

孟尼利克二世与埃塞俄比亚现代性政治

44

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逐渐加强，包括

非洲东北地区，当时，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正在巩固自己的领土边界，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在1884—1885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政治统治格局得以确立。尽管在欧洲国家瓜分非洲的地图上埃塞俄比亚还是一块有争议的领土，但意大利在邻近的厄立特里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后来，索马里兰又成为未来各方相互敌视的要地，该地区正好处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之间。从18世纪晚期意大利开始在厄立特里亚建立殖民统治的时代开始，现代厄立特里亚的边境才得以建立起来。最初，意大利的一家名为鲁巴提诺船运公司（Rubatinno Shipping）从当地统治者手中购买了阿萨布港口（the port of Assab），随后，意大利政府在1882年获得了该港口码头的控制权，并希望利用厄立特里亚作为他在该区域推行殖民计划的据点。意大利人正式出现在非洲之角，则是在1889年签署了有争议的《乌查里条约》。条约签订的时候，孟尼利克还是绍阿皇帝，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意大利方面参加签署条约的则是皮耶罗·安托内里伯爵（Count Pietro Antonelli）。按照该条约的阿姆哈拉语版本，如果阿比西尼亚愿意，它可以将意大利作为自己处理对外关系的代表；然而，该条约的意大利版本则宣称，阿比西尼亚必须经由意大利来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这样一来，埃塞俄比亚就变成了意大利的保护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尽管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双方的外交关系断断续续地保持和睦，但意大利也多次制造了双方关系紧张局面的出现，因为意大利总是想将其在厄立特里亚的殖民地扩大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

与此同时，英国在东非地区的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苏丹和埃及扩张到索马里兰，并侵入到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地带。法国则控制了吉布提，它所占领的一个重要的吉布提港口还切断了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这就导致埃塞俄比亚一些古老经济和政治地区的衰落，如马萨瓦和阿萨布。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签订的《亚的斯亚贝巴条约》（The treaty of Addis Ababa）废除了《乌查里条约》中的许多不恰当条款，这表明意大利已经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完全独立。因此，通过阻止殖民主义的潮流涌到本国领土，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

军事胜利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成为非洲抵抗殖民统治的典范；即便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法（因为其他非洲国家并没有像埃塞俄比亚那样保持或者取得独立）。

埃塞俄比亚的领土扩张和为维护自己的权威而进行的巩固政治统治的行动已经在生活在非洲大裂谷两侧的广大小族裔中间引起了不满，他们说这是埃塞俄比亚帝国主义或者叫阿姆哈拉帝国主义。但是，埃塞俄比亚在该地区的中央集权统治使它避免了非洲政治权威的丧失，也挫败了殖民势力将非洲边缘化的图谋。埃塞俄比亚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吞并了索马里的部分领土，即过去叫做欧加登（Ogaden）的地区。但是，埃塞俄比亚有历史传统的临海省份马拉布梅拉什省（Marab Mellash）则被意大利夺取，这个地方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厄立特里亚。这种地缘政治重组的重要性对二战后非洲之角历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埃塞俄比亚来说，政治独立并不能弥补其铺设道路的短缺、现代网络交流的不足和没有出海口的问题。埃塞俄比亚东接吉布提和索马里，南至肯尼亚，西邻苏丹，北抵厄立特里亚，历史上有争议的事件不断发生，导致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迁。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既有致力于改良的现代改革派、保守派、反动派，也有一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20世纪初期，埃塞俄比亚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注定了统治阶级的基本特征，该统治阶级通过贡赋、土地税、租金以及剩余劳动力来巩固其政治经济特权。同样，皇帝也要求并从省级政府官员收取固定年贡。在政治专制统治和教会扩张的双重压迫下，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继承权，统治阶级控制了这些劳动力。权力精英们享受着什一税以及下层社会的供给，社会下层的许多人已近乎奴隶身份。边界扩张、贸易路线控制以及海关税收导致国内新的权力关系中种族集团和身份认同问题的出现，这预示着未来对政治控制以及资源争夺的冲突再所难免。

在1855—1889年间，埃塞俄比亚通过卓有成效的行政机构改革，成为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各种改革过程中也实行了某些对教会的限

制。但是，那些认为埃塞俄比亚应该对世界开放的改革者也遭遇了保守派的阻挠，那些保守派坚持埃塞俄比亚正教传统。在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与欧洲民族主义者在非洲经济、资源、市场控制方面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问题。欧洲列强介入非洲事务并已经形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包围之势，这也阻碍了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决定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前途这一点能够确保埃塞俄比亚在争夺非洲的角逐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特别是随着奴隶贸易的兴起，非洲经历了几次政治动荡和政治经济联盟的变更。殖民势力的介入改变或者取代了传统的宗族血统势力，新的政治集团势力也开始出现。外部势力的威胁也减轻了国内推陈出新式的改革者进行彻底变革要求自治的愿望。这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梦想与欧洲帝国野心的第一次较量。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红海地区的地理和商业战略位置更加突出，列强之间在那里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欧洲列强对红海沿岸提出了领土要求，埃及的英国总督科迪武·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统治时期又出现经济衰退，再加上该国家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崛起，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英国在 1882 年正式占领埃及。英国所采取的这一步骤成为欧洲列强侵入非洲大陆的开端。此后，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展开了争夺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斗争。最后，英国占领了白尼罗河地区，并将意大利控制的青尼罗河地区作为与法国争夺埃塞俄比亚资源的缓冲地带。

46

欧洲列强、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历史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相互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比较复杂而又不平等，但这种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 1884—1885 年间欧洲国家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欧洲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所形成的新型摩尼教关系（a new Manichean relationship）对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平衡造成了威胁，再加上欧洲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这些情况都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构成了威胁。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政策着眼于开辟出海口，寻求用于自卫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巩固自己的政权，同

时加强与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自从欧洲国家开始扩大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及维护其政治影响力开始，使埃塞俄比亚的这些愿望变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另外，新的殖民公司也开始扩大其大都市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和目标，使商业阶级和企业集团拥有某种特权，这样，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实质上被纳入了欧洲主导的外交政策之中。

历史视角下埃塞俄比亚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文化与知识交汇

尽管现代欧洲知识界普遍认为非洲是一块没有历史、缺乏文化和文明的大陆，但这种根源于推崇殖民主义扩张的现象还是成为欧洲与非洲学者的早期合作中讨论的主题。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前 10 年，埃塞俄比亚世俗界和基督教领域已经领教了全球文化事业的变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 1516 年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又于 1517 年占领埃及。因此，埃塞俄比亚在 16 世纪上半期受到伊斯兰圣战斗士的威胁。这些因素导致了埃塞俄比亚与欧洲的关系发生变化。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众多埃塞俄比亚僧侣逃到了耶路撒冷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其中许多人皈依了天主教，接受了新的信仰和精神传统。这些僧侣中有些人成为了精通埃塞俄比亚语、历史、文化、神学以及哲学的知名学者。许多僧侣能够在方济会（Franciscans）和本笃会（Benedictines）等天主教组织中继续从事他们的宗教文化活动。也有一些埃塞俄比亚传教人员移居南欧、奥地利、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并与当地学者合作。在这一时期，梵蒂冈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还成立了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团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是研究埃塞俄比亚历史和语言的“埃塞俄比亚圣斯特法诺教堂”[①]。一些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如安托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An-

47

① San Stefano degli Abissini，这教堂为教皇列奥三世［Leo III 795—816］建立，以圣斯特法诺命名。1479 年，教皇西斯图斯四世［Sixtus IV］把此教堂委托给科普特教会的修士。在教皇格来蒙十一世［Clemnent XI 1700—1721］期间，这教堂被彻底重建。教堂大门装饰有羔羊和十字架，颇具盛名。——译者注

drade)，在这里发表了几部重要著作。

另一位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天主教神甫阿布巴·戈尔戈里奥斯（Abba Gorgoryos）于1652年从阿姆哈拉的梅卡内西拉塞（Mekane Sillasé）来到德国的埃尔富特（Erfurt），并与德国著名学者海奥布·鲁道夫（Hiob Ludolf）进行合作研究。在戈尔戈里奥斯的帮助下，海奥布·鲁道夫成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埃塞俄比亚专家。正是他们两人的这种关系带来了现代民族志研究以及阿姆哈拉和吉兹语文学作品的产生。鲁道夫1661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语法》（*Grammatica Aethiopica* ）和1681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史》（*Historia Aethiopica* ）后来都被译成英语、法语和荷兰语。他在1691年出版的《历史评论》（*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和1698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拉丁语词典》（*Lexicon Aethiopico-Latinum* ）还成为欧洲许多大学和研究中心从事埃塞俄比亚问题教学和研究的权威教材。在19世纪，另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达布特拉·科弗拉·吉尤尔吉斯（Debtera Kefla Giyorgis）当时是意大利著名教授伊格纳奇奥·古伊迪（Ignazio Guidi）的老师，后者被誉为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研究之父”，他对这位意大利人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开始正式在非洲进行扩张，埃塞俄比亚的思想和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变得越来越糟糕。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殖民扩张的初期，来自罗马的使者们不仅收集和出版了埃塞俄比亚的科学、民族、历史和经济数据论著，他们中间还有许多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服务于意大利政府的帝国主义侵略计划。

到了1884年，非洲的殖民版图已经划定，欧洲的文化、学术、经济扩张已形成了世界性的规模，简而言之，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当时，地方社会的认同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落后社会组织已经让位于强大的世界性的工业文明。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在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加强了政治集权，因此才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在非洲历史上向世人展现了高度本土化的现代性一幕。

在20世纪初期的曙光照耀大地的时候，世界列强之间的关系变幻

莫测，人们对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思想传统和现代化追求的认识也出现了诸多争议。当时的《基督教欧洲年鉴》（*the annals of Christian Europe*）对埃塞俄比亚的描述还包含了罗曼蒂克式的幻想，把埃塞俄比亚作为祭祀王约翰的领地进行描写。随着非洲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愿望逐渐被纳入欧洲轨道，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因此而成为非洲社会渴望获得独立和尊严的光辉典范。埃塞俄比亚于1896年在阿杜瓦战役中打败了入侵的意大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现代非洲与欧洲的关系。鉴于美国和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白人优等"（white authority）的理念，此次胜利成为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非白人击败白人的战争，不但确保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也为世界上黑人保留了希望，特别是在那些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地方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在当时那些反抗的暴力斗争中，非洲和有非洲血统的种族主义者带领非洲和美籍非洲文化精英在20世纪初期树立了积极的黑人形象。主张提高黑人种族地位的国际思想家认为，非洲人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将有助于减少种族偏见。具有名望的一些黑人学者和作家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抗争史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非洲人格"。在他们努力展现非洲的奴隶和殖民主义历史的过程中，非洲大离散（Afro-Diaspora）或者泛非主义者（pan-Africanist）著作将他们对当时非洲历史历程的评价与《圣经》故事的赞誉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论（nationalist discourse）。

48

到了20世纪初期，埃塞俄比亚成为欧洲旅行作家、记者、探险者和殖民主义者的重要目的地。在那个殖民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埃塞俄比亚追求文明、国民经济独立和现代化理想总是被歪曲。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总结了埃塞俄比亚殖民化的问题，他指出：

> 阿比西尼亚不能既要求成为一个平等条件下的文明国家，同时又还保持自己原始封闭的状态。她必须将其自然资源交由世界来处理，因为很明显，靠她自己的力量该国家并不能得到发展，

因此，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她必须依靠一个更发达的国家。[①]

但是，埃塞俄比亚继续寻求欧洲的科技和物资援助（而不是去依靠某个发达国家），尽管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外交努力更多地被看成是"花招"（Tricking），而不是政治家所为。

另一个展现埃塞俄比亚与世界关系的例证便是这块陆地被称为"原始的"异国风情或者是怪事多发地。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便是于1927年首次出版的《原始的阿比西尼亚》（*Savage Abyssinia*）。作者詹姆斯·E. 鲍姆（James E. Baum）率领一支野外博物馆探险队赴埃塞俄比亚考察，同时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全球通讯媒体公司的全程报道。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the Chicago Daily News*）的赞助下，鲍姆获得了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的首领塔法里的保护和引导，这位首领对此次访问中的"现代化工具"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现代印刷技术、照相技术、图解技术、绘画技术、剥制技术（taxidermy）和电影技术。这位未来皇帝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这次以先进工具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探险的活动向全世界展示埃塞俄比亚和他自己。他还认为，此次积极的宣传不仅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前兆，而且可以防止殖民侵略。除了重点描述非洲的奇异性（otherness）和澄清埃塞俄比亚怀疑科技的说法之外，该书还描写了作者亲眼目睹的海尔·塞拉西加冕礼，那是一种"华丽的原始景观"，但仅仅是一种维护国家自由的策略而已。尽管鲍姆的著作还真实地再现了埃塞俄比亚的各种政治阴谋和当地社会的现实，但是在描述埃塞俄比亚时，他认为这片土地的遭遇是因为内在的心理因素而不是种族冲突造成的统治结构的软弱。由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反对，《原始的阿比西尼亚》一书在1935年再版时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未知的埃塞俄比亚：最黑暗时代阿比西尼亚的曙光》（*Unknown Ethiopia: New Light on Darkest Abyssinia*）。

49

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当非洲需要一个展现现代社会、政治、经

---

① 伊夫林·沃：《沃在国外：旅行著作选/伊夫林·沃》，纽约：人人图书馆，2003年。

济需要的先驱平台时，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现代性故事的支柱。这些著作不仅强调了非洲是现代世界中的一员，而且对非洲新的投机贸易中的不平等性进行了抨击。他们还呼吁非洲国家发展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加纳学者 J. E. 卡塞里 · 海弗尔德（J. E. Casely Hayford）于 1911 年出版了《无拘束的埃塞俄比亚：种族解放研究》(*Ethiopia Unbound :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一书。美国著名学者 W. E. B. 杜波伊斯写了一篇名为《埃塞俄比亚之星》(*The Star of Ethiopia*）的历史剧本，该剧于 1913 年 10 月在纽约公演，向世人展示了在黑人文化中发现的神话般的现代文明，给世界带来了 7 种重要的礼物：刚强、信念、谦逊、悲伤、自由、笑声和希望。在每一个例子中，每个非洲人都充当了中心角色，同时将“种族”置于一个积极的推动文化繁荣的地位。同样，杜波伊斯还在其另一本著作《世界与非洲：探寻世界历史中非洲的位置》(*The World and African :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中，将埃塞俄比亚历史作为民权和发展的例子加以叙述。

尽管非洲已经觉醒，但是欧洲列强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所签订的一些条约还是有新的不平等内容。1905 年，德国与埃塞俄比亚缔结《友好通商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根据该条约，德国在亚的斯亚贝巴派驻一个永久性公使馆，弗里德里希 · 罗森(Friedrich Rosen）率领的外交使团来到埃塞俄比亚。1906 年，英国、法国、意大利在没有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孟尼利克二世商议的情况下签订三方协约，试图将埃塞俄比亚瓜分成三个属于他们三个国家的经济势力范围。1907 年 2 月，英国驻亚的斯亚贝巴代表约翰 · 哈林顿(John Harrington）秘密要求埃塞俄比亚外交部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同伙通过协议保持“白人对黑人”(whites against black) 的利益。

50

根据欧洲列强态度的转变，埃塞俄比亚被迫作出了许多让步，以保持其独立性和现代化的愿望。这些对欧洲经济和贸易的妥协同样损害了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尊严，无益于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愿望。例如，尽管孟尼利克皇帝对三方协约甚为不满，但他却在 1908 年 1 月 10 日

与法国签订了另一个《友好通商条约》。尽管这个条约的第五条保证埃塞俄比亚拥有从吉布提和法国索马里兰保护地进口武器的权利，但与此同时，法国要求并获得了在埃塞俄比亚的治外法权（simultaneous extraterritorial privileges）。条约第七条规定，在埃塞俄比亚的法国公民在涉嫌法律案件的时候必须按法国法律处理，如果要被拘留，必须在法国领事的监管之下。同样，1908 年签订的《科罗布科武斯基条约》（The Klobukowski Treaty）给在埃塞俄比亚定居的欧洲人以同样的治外法权和财产特权。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转向激烈的利益纠纷还有一个例子，那便是欧洲拒绝了埃塞俄比亚在一战末期提出的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申请。在欧洲的代表看来，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并未掩盖它缺乏作为自由国家应该拥有的"文明"这一事实。埃塞俄比亚还存在 1906 年签订的英法意三方协约规定的那样被瓜分的危险。但是，首领塔法里极力倡导统一的埃塞俄比亚，成功地避免了瓜分埃塞俄比亚的阴谋。不久之后，他正式宣布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并带领埃塞俄比亚于 1923 年加入国际联盟。

欧洲帝国主义联盟还破坏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进程。1924 年，塔法里对欧洲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国事访问，这是埃塞俄比亚首脑的第一次出访。在出访过程中，有人提议塔法里承认 1902 年签订的埃塞俄比亚—苏丹边界协定和 1906 年举行的三方会议，那次会议宣布"埃塞俄比亚政府应该保证授权不列颠政府修建塔纳湖大坝"。该大坝最初的设计只是有利于英国在苏丹和埃及的殖民统治，几乎没有考虑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这项工程可以控制出水量以符合下游殖民主义者的能源需求，但对埃塞俄比亚现代化工程的战略能源需求却毫无考虑。批准这个条约就意味着认可了不列颠在这一区域的特权，因此，塔法里宣布埃塞俄比亚将自主修建塔纳湖大坝，然后将"租赁该水库的水"给英属埃及苏丹政府。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个计划。在得知塔法里反对英国修建塔纳湖大坝的决定后，意大利提出了他们此前提出过的针对埃塞俄比亚的英意合作计划。欧洲列强"要求"英国

51 “协助”意大利建设一条从厄立特里亚边界开始，贯穿埃塞俄比亚中部，最后到达意大利索马里兰的铁路。这项计划引发了新的关于意大利和英国要在埃塞俄比亚划分势力范围的讨论。尽管出现这些外部的挑战，即将成为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首领塔法里仍在设法利用这一机会，来进一步推进由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开启但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计划。与此同时，他还必须辛苦应付着埃塞俄比亚国内时常发生的动乱和由于权力失衡所引起的各种危机。

现代化中的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时代

随着1913年孟尼利克皇帝去世，埃塞俄比亚政治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宗教派系集团和政治阴谋团伙。在与帝国之外势力的合作过程中，孟尼利克皇帝征服并占领了一些别国领土，其间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军事抵抗。作为征服的结果，统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现权力集中的问题上，这与一个现代主义者在现实或想象中要实现的抱负大相径庭。反对国家统治至高无上和中央控制经济生活的做法遭到了以阿鲁西（Arussi）、吉贝（Gibe）、塞达莫（Sidamo）、贝里（Bale）、欧加登、卡法（Kaffa）、武拉莫（Wolamo）和波拉纳（Borana）为中心的许多地区的强烈抵制。而孟尼利克作为一个现代化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也被其在这些地区施行的具有负面影响的军事活动所破坏。吞并塞达莫和阿鲁西被认为是极端残忍的兽行和种族灭绝的行为。那些被征服的领土由其他一些人来定居，这些人必须拥有阿姆哈拉授权（Amharist-sanctioned rights），并拥有自己在当地的土地和资源。上述活动也就是后来领土收复主义者和学者们说的所谓“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的前身。

已故皇帝选择的继承人是他那基本上没什么作为的外孙里吉·伊亚苏[1]，伊亚苏最终于1916年9月被一群保守的贵族废黜。这些贵族

[1] Lij Yasu，在本书的“埃塞俄比亚名人录”中，里吉·伊亚苏一原文用的是 Lij Iyasu，而且多次重复使用，而在原文第51页则用的是 Lij Yasu，而且也是两次使用，因此，译者难以确定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只好一律翻译为伊亚苏。——译者注

们对小皇帝与伊斯兰世界交好及其不与旧军官和贵族妥协的态度感到不满。尽管孟尼利克的女儿，也是伊亚苏的姨妈，随后被宣布为扎乌迪图（Zauditu）女皇。但是，在此前政治变故中曾经受到威胁的埃塞俄比亚教会拒绝支持新女皇，并试图通过巩固教会思想作为帝国存在基础的方式进行改革。保守派则打着鲜明的复兴埃塞俄比亚教会和传统的旗号，如芬塔乌拉里·哈普特·吉奥尔吉斯·德纳格德（Fitawrari Hapte Giorgis Denagde），都表示支持塔法里首领继承皇位。这场娴熟的政治行动不仅达到了维护旧秩序的目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贵族们越来越要求变化的进步特征。但是，教会只对如何调整其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影响感兴趣。所以，一方面，教会不赞成在坚持正统和土著传统上进行革命性改革；另一方面，也不支持政治精英们为加强理性化的政府官僚改革而进行的任何努力。这样，首领塔法里不论是在做摄政王时期还是在后来成为海尔·塞拉西皇帝时期，也不论他做多少努力，上述那些问题最终还是导致了帝国现代化的希望付诸东流。 52

塔法里·马康南（Tafari Makonnen），即后来众所周知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于1892年6月23日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的埃杰尔萨古罗村（Ejersa Goro）。他的父亲是首领马康南·武尔德米卡耶尔·古德萨（Makonnen Woldemikael Gudessa），哈拉尔省总督，他的母亲则叫做乌耶塞罗·耶什梅贝特·阿里·阿巴吉法尔（Woyzero Yeshimebet Ali Abajifar）。塔法里的帝国血统和皇族系谱主要是从他的祖母，即孟尼利克二世的姑姑那里继承而来。同时，他的家族还声称是马科达、示巴女王和古以色列所罗门王的直系后裔。塔法里早年从师于著名神甫阿巴·瓦尔达·基丹（Aba Walda Kidan），同时他也接受了埃塞尔比亚贵族式的教育，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正教神甫通过语言课程教他用吉兹语掌握埃塞尔比亚正教赞美诗。当时，许多宗教界学者聚集在哈拉尔的圣米迦勒教堂（St. Michael），塔法里的父亲马康南首领就从哈拉尔聘请法国天主教方济会的修道士来给他的孩子们讲授各种各样的课程，其中包括法国地理学、哲学、

拉丁语和世界历史。塔法里不仅学习如何讲埃塞尔比亚语中的阿姆哈拉语、提格雷语和奥罗米格纳语，同时也学习英语和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1904 年，马康南被任命为家乡哈拉尔省的总督，这时，这个未来的皇帝已经取得了埃塞俄比亚两个最高贵族头衔之一的“首领”称号，这一称号意味着他不仅可以作为省的总督，而且具有了继承王位的资格。作为贵族阶层的一员，他很早就开始了政治技艺的训练，甚至曾经代表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出席了 1902 年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那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随着摄政王伊亚苏被迫退出竞争，塔法里继任并成为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在国内，塔法里继续推行孟尼利克二世时期开始并且必须要完成的现代化计划。而在对外政策上，曾经做过 14 年大使的塔法里已经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其中包括最终使埃塞俄比亚于 1923 年加入国际联盟。他确信，在加入国际联盟以后，埃塞俄比亚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国家不再被其他国家的全球殖民野心所威胁，从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成为这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对于埃塞俄比亚这个该组织中唯一的非洲或者说非洲裔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外交意义。美国学者杜波伊斯对此事赞赏有加，他认为，埃塞俄比亚加入国际联盟不单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成就，它也是世界“有色人种争取自由”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

53

1924 年，塔法里开展了大规模的外事访问，他出访了巴勒斯坦、埃及、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希腊。在这场外交旅行中，自称为现代主义皇帝的他通过参观医院、工厂、学校和教堂中的那些新的发明和创造看到了埃塞俄比亚光明的前途。他每到一处都给自己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象，从而在国内建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在国外则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一个非洲领导人，在那个代表非欧洲人为慈善事业讲几句寥寥无几的话，特别是对那些居住在非洲的人来说，这已经是罕见的功绩了。在访问的最后，塔法里宣称这次旅行使他更加确信了埃塞俄比亚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发展和创新。据说他还十分希望从国外进口各种机器和设备。

1926年，塔法里趁着两位主要保守派人物，即旧军阀哈布塔·吉奥尔吉斯（Habta Giorgis）和大主教马特西奥斯（Mattheos）双双去世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同时，他还孤立了那些反对他的政治影响力和现代化举措的那些首领们，其中包括塞达莫总督兼将军德加斯马特克·巴尔查（Dejazmatch Balcha），该总督拒绝使奴役制度非法化，并反对将他的那个省改革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建设的一部分。一些保守人士和极端保守的贵族意识到了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试图劝说扎乌迪图女皇除掉塔法里，但女皇并没有这样做。与只受过很少现代教育的女皇不同，塔法里通过这一阶段的广泛学习，对国内外政治的微妙之处已理解得更为成熟老练。且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军队将领和皇室卫队的支持，这支皇室卫队多数成员曾经在英国的肯尼亚殖民地服役，或者曾经在意大利的利比亚殖民地服役，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能力和素质。1928年，他强迫贵族为之举行了皇帝加冕仪式。皇帝称号的确认意味着向公众宣告了塔法里作为新皇帝拥有对公共事务的完全控制权。

但是，其他保守主义者反对塔法里皇帝的行动仍在进行，例如阿杜瓦将军德加斯马特克·巴尔查·萨佛（Dejazmatch Balcha Saffo）和戈贾姆（Gojjam）的王子海鲁·特克里·海马诺特（Hailu Tekle Haimanot），他们二人声称代表扎乌迪图女皇举行反叛。女皇的丈夫，贡德尔总督古格萨·维里（Gugsa Wele）也参加了这场叛乱；他在从基地向亚的斯亚贝巴进军的过程中战败并最终于1930年3月在安切耶姆战役（Anchiem）中死去。同年，他的妻子扎乌迪图也去世。消息传来，皇帝首领塔法里的地位无比尊荣，他已经成为帝国的主人、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犹太部落的征服者狮子、上帝的选择、埃塞俄比亚的王中之王。来自各地的埃塞俄比亚首领和大臣都对塔法里表示了敬意。1930年11月2日，塔法里举行了正式加冕仪式，成为海尔·塞拉西皇帝。

来自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荷兰、比利时、德国、波兰、希腊、土耳其、埃及、美国和日本的外国代表出席了皇帝的加冕仪

式。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皇帝加冕仪式的使者中包括亨利王子、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儿子格罗西斯特公爵（Gloucester）、法国元帅弗郎切特·德·埃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还有来自意大利乌迪内的王子。美国特遣大使赫尔曼·默里·雅各比（Herman Murray Jacoby）带来了丰富的贺礼，据说礼物中有一台电冰箱、一台印有皇家盾形纹章的红色打印机、一台无线电留声机、100 张“独具特色的美国音乐”唱片、500 朵玫瑰花，在这些玫瑰花中有十几朵被称为“胡佛总统”的品种的玫瑰，还有美国农业部开发出的新品种石蒜菌株、一套装订精美的《国家地理》杂志、同样装订精美的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对阿比西尼亚的调查报告以及三套电影胶片：《宾虚》(*Ben Hur*)，《王中王》和《与伯德在南极》（*With Byrd at the South Pole* ）。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国际媒体人士，他们对新皇帝和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都进行了报道。世界各地的宣传报道给加冕仪式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国际影响。在这个大众媒体时代，埃塞俄比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名，尤其是在非洲和非洲移民社群中。许多国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全球帝国主义海洋中的一个独立且保持了古老光荣传统的岛屿。加冕仪式的见证人还包括来自各国的记者和作家。但有些人则对这个仪式和埃塞俄比亚所罗门遗产的再现进行了讽刺，他们认为，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宣称自己是现代全球政治的潜在参与者没有任何意义。

54

1930—1935 这几年是埃塞俄比亚帝国巩固政治权力和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塞拉西利用他的绝对统治地位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计划。他引进了宪法，以便把该帝国从原本分散在地区领导人中间的权力转移到中央，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体制的官僚帝国。1931 年 7 月 16 日，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成文宪法正式出台。一些人称该宪法为“人民的宪法”，但该宪法实际上有助于新皇帝实现其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和政府机构的职权来剥夺封建领主权力的愿望。他还成立了议会，议会的职能是讨论皇帝面对的各种问题。在改革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结构方面，1931 年宪法中还规定了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

构，与贵族无关的议题第一次纳入到政府官方政策当中。但这个议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贵族阶级人士，他们基本都是帝国的各部部长、法官或高级军官。塞拉西对中央权力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只有他能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命部长，并拥有充分的权力在没有召开议会的情况下颁布法令。同时他还为所有的行政部门制定了相应的组织和规章制度。

据说，塞拉西的改革是在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欧洲的各种现代宪法，并以欧洲宪法为模式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全新的官僚文化、行政法规和立法程序。有人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不仅阐述当地改革的明确需要，而且还试图为埃塞俄比亚对外关系设置模式的人。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之一是“日本派”（Japanizers），之所以称之为日本派，是因为他们曾经专门研究过日本明治宪法。这些学者对日本在 19 世纪末由一个类似于埃塞俄比亚的封建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大国这一事实印象深刻。在该派的学者中，赫鲁伊·瓦尔达·塞拉西（Heruy Welde Selassie）、巴杰尔隆德·塔克里—哈瓦尔亚特·塔克拉—马尔亚姆（Bajerond Takle-Hawaryat Takla-Maryam）和阿拉亚·阿贝巴（Araya Abeba）都认为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和埃塞俄比亚的扎马纳马萨芬特时期（Zamana Masafent）非常类似，后者是一段被称为王子纷争时代的短暂且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从 1769 年一直持续到 1855 年。而他们之所以崇拜日本的行政改革是因为这是解决不发达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用工具。

55

尽管新宪法如同日本宪法一样建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但它们的成立仅仅是成为强有力的皇帝政府的基础，而并非公众代表机构。埃塞俄比亚皇帝控制着部长会议、头衔的授予、个人财产的获得以及对外条约的制定，同时，他还有权力赦免或减轻刑罚、对外宣战和缔结和平条约，贵族和地方舒姆的任命或降级则由皇帝提名的代表委员会成员来决定。宪法还宣称，从其祖先开始，海尔·塞拉西皇帝就拥有了埃塞俄比亚唯一的裁定一切的特权。根据这个新宪法，塞拉西和他

的父辈们是“不间断的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和埃塞俄比亚女王即所谓的示巴女王的儿子孟尼利克一世”的后裔。同时，皇帝的地位被认为是神圣的，他的尊严不可侵犯，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新宪法中对皇帝性质及皇位继承顺序进行了规定，其意义在于这些措施能有效地取消教会的合法性功能，并将这种功能转移到皇帝手中，而正是皇帝颁布了这个宪法。但是，教会还是以保守的姿态存在着，宪法将教会与国家权力职能分开的规定并作为现代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的意图对教会权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教会以侵害公民利益的手段发财致富，结果导致国家政府资源枯竭，农民阶级的利益则受到更大的损害。

海尔·塞拉西皇帝允许埃及科普特教会任命埃塞俄比亚的新主教，这说明他还忠实于埃及科普特教会。另外，他还任命了5名埃塞俄比亚人作为新主教，人们认为，这些精神使者的上任预示着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会成为功能齐全的国家机构。1931年宪法并没有对进一步的现代化改革进行规定。尽管它成立了一个议会，但该议会没有任何法律或行政功能来实施现代化计划。至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问题，宪法 56 中也没有任何司法性解释，他们的命运和财产是由国家支配和控制的。尽管有着上述那么多缺点，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埃塞俄比亚仍然继续以一种虚假的自给自足的状态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

然而，海尔·塞拉西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他通过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贵族的地位依赖于法律和理性而不再是过去的宗教和传统地位，进而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他的改革措施还包括，禁止士兵征用或抢劫农民的财物，如被确认犯有谋杀罪则不论其政治或经济职位高低均应受到惩罚。绝大多数以土地为生的封建领主不从国家政府领取报酬，这是一种历史传统，这种做法是用来保证权力的平衡，并把贡赋转交给中央财政。皇帝则试图采取措施使省级地方行政管理部门与他的国家公务员工资管理模式接轨，以对中央政府负责。虽然新兴的政治结构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者模式的，但这主要是政府的统治机构、司法部门和国家预算体制更加职业化了，实际上经济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身份决定而不是依所取得的成就多少来决定。尽管

国内禁止了奴隶制度和建立了新的国家银行，埃塞俄比亚的庇护传统还是保证政治权力和经济交往私有化，而且不论是政府权力和经济特权依旧掌握在新老贵族手中。不论政府就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做出了怎样的声明保证，经济欠发展还是阻碍了客观、公正而又具有广泛基础的标准化管理模式的引进，但只有这种模式才有助于专业化和提高社会生产的动力。

海尔·塞拉西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投资设立了由国家赞助的教育项目，建立了旨在鼓励下一代的奖学金，他预料这将有助埃塞俄比亚向现代化政府过渡。教育改革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在1930年，政府将各种完全不同的教育行政单位合并成一个部。1935年，由政府补贴新建的10所小学在各省建立起来。虽然海尔·塞拉西政府扩大了原有的孟尼利克二世学校，当然，埃塞俄比亚的这个第一所现代学校还是为专门培养贵族后代而建立的，但同时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校，即1925年建立的塔法里·马康南学校。后一所学校的建立使人们在先前的科普特统治学校和后建立的学校之间有了选择的余地。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Bahru Zewde）认为，塔法里皇帝决心超越他的前任，于是将现代化进程进行得更快更深入，从而超过了当初孟尼利克的设想。在1931年的一个妇女学校建立仪式上，塔法里皇帝和他的妻子梅南皇后（Menen）鼓励其他埃塞俄比亚人多向基金会捐款来帮助建立新学校。

教育有助于弥补性别、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各种差别，来自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群体也开始随着城市化的增长生活在共同的社会当中。到1936年，大约有200名接受过国外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在国内外参与国家事务。由于进口的私人汽车和公共汽车数量的增加，全国交通也得到发展。在亚的斯亚贝巴，电报的引进，无线电通信的增加以及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建立，同样有助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培养。由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精英控制的示范省得以建立起来，这些省的行政直接对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内务部负责。同时，埃塞俄比亚还引进了现代税收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薪水由地方负责，剩

57

余部分则上缴给亚的斯亚贝巴。在封建管理模式地区，传统税收通常主要是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形式，为了控制税收现在被废除了。

尽管现代教育有助于根除一些传统和官方的主张，但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强调和应用新的管理模式通常并没有改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性别失衡和事实上的职业等级化意味着，受过教育的人口数量在帝国中依很有限。另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主要来自贵族或乡绅家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学成之后基本上都参加了政府主办的项目或者进入政府部门供职。更为重要的是，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在这一阶层中的代表人数不成比例。此外，如同其前任孟尼利克一样，塔法里对于那些视传统、价值、实践和职责不屑一顾的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感到不安。众所周知，这位皇帝也同样喜欢那些公开证明自己忠诚及顺从他的知识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在这种情况下，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动力不强，成果不多，勇于进行个人奋斗的人也很少见。

虽然有以上缺陷，海尔·塞拉西皇帝所领导的改革还是帮助埃塞俄比亚从一个封建的纳贡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货币经济结构和参与到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当中的国家。土地持有和出售改革、新的土地测量方式的采用以及土地占有制度的改革，都有助于埃塞俄比亚国家的一部分公众参与到经济作物生产当中，特别是咖啡的生产。但是，由于废除土著土地占有制度没有成功，这种制度仍然牢固地以教会和国家支配为原则，这位皇帝的现代主义政治改革也就难免缓和下来。因此，人们的社会地位仍然以土地多少论高低，这就为等级构造和社会阶层形成提供了基础。由皇帝或者他指定代理人授予的古尔特权利制度，既作为对统治阶级成员服务的奖赏，又作为对埃塞俄比亚正教会或修道院的捐赠，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通常并不总是政府官员的古尔特特权拥有者拥有征收土地贡赋和征召劳动力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往往超出他们的管辖范围。有一些征收来的贡赋被他们截留下来，余下部分则送给贵族和皇帝。同时，还有一些垦殖军人或者老资格的省级官员在“征服的领土”上控制土地开发和劳动力。在商品、服务和奖赏的分配上，一个人的族系和地位仍然是至关

58

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皇帝当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下面则是贵族和地主占据着社会和政治特权的最高阶层，然后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管理着租金不多的小块土地，最后是成千上万的租地耕种的无地农民。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建立在贵族武士阶级的脆弱基础之上的国家，那些贵族武士既要保家又要卫国，这种双重责任使他们难堪重负。到20世纪，大多数南部地主阶级多由北方迁移去的基督徒定居者组成。在另一方面，佃户多为非基督徒和当地土著居民。这种发展显示出，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种族和文化差异逐渐在发生变化。埃塞俄比亚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在这些未来关系的确立问题上个人与社会都存在争议。虽然存在上述种种限制，埃塞俄比亚国家还是以加强中央对海关税收控制的方式将国内市场统一起来。在警察组织和公共卫生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一些埃塞俄比亚头面贵族人士依靠在军队中勇敢征战而飞黄腾达，不但通过征战获得了金钱，还通过经济作物生产取得收益。但是，对于年轻一代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现代教育和军事机构的出现仅仅是一条重要的出路而已。

保卫埃塞俄比亚主权：军队和学术部门的作用

海尔·塞拉西在1919年摄政时就开始了军事改革。他任命一些埃塞俄比亚人和俄国人为军队官员，其中有许多人曾经在英国人领导的皇家非洲火枪兵部队中服役，有过训练经历。然后，他又实行一项重要的计划，通过新兵招募、武器装备的采购以及大量地雇佣来自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不同国家背景的人做军事顾问等措施继续自己的军事改革。但是，来自瑞典的军事代表却热心于埃塞俄比亚帝国卫队的培训，这支帝国卫队不但在首都维护皇帝的权威，还在地方发生叛乱时保护他的安全。例如，贡德尔和伯根德（Begemder）总督首领古格萨（Gugsa）就曾发起过一次叛乱，他最终在1930年的一次冲突中被彻底的击败。在1934年，在比利时教官的指挥下，一所军事学院在霍拉塔（Holeta）成立，该军事学院的学员们得到承诺，他们将被送到位于圣基尔（St. Cyr）的法国军事学校进一步接受培训。塞拉西统治下的埃　59

塞俄比亚还购买了飞机，这些飞机最初由来自法国的飞行员驾驶，这些飞行员中有很多人还帮助埃塞俄比亚建立通信设施和从事军事侦察活动。作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政府还进口了一批新飞机，有的用于国家航空，有的用于军事，埃塞俄比亚空军也于 1929 年建立。到 1935 年，将近 20—30 万埃塞俄比亚人得到军事动员，其中大约 7000 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到 1933 年，埃塞俄比亚大约有 100—150 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愿意为这个非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服务。当时，埃塞俄比亚空军有 3 架飞机，其中的两架由非洲裔美国人驾驶，这两名驾驶员分别是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和休伯特·朱利安（Hubert Julian）。朱利安曾于 1930 年飞抵埃塞俄比亚，他的勇敢行为给皇帝海尔·塞拉西留下了深刻印象，皇帝赐予他阿比西尼亚荣誉市民称号及上校军衔。

从 19 世纪末至二战爆发，埃塞俄比亚一代又一代人在全世界各地各类学校的众多领域接受世俗教育。在他们旅居国外期间，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祖国的科技落后，并开始积极推动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在那数量众多、广泛流传的著作中他们期望，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会推动传统统治者能够少些仇外情绪，接受更重要的变革。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把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第一代知识分子是皇帝孟尼利克二世（1889—1913）时代在国内外接受的教育。在皇室家族、外国捐赠者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的帮助下，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加布拉—海瓦特·巴耶克丹（Gabra-Heywat Baykedan）、瓦尔切纳·埃沙特（Warqenah Eshate）、加布鲁·达斯塔（Gabru Dasta）、阿法瓦尔克·加布拉—伊耶亚苏斯（Afawarq Gabra-Iyyasus）、塔克里—哈瓦尔亚特·塔克拉—马尔亚姆（Takle-Hawaryst Takla-Maryam）、阿特斯梅—吉奥尔吉斯·加布拉—马西哈（Atsme-Giorgis Gabra-Masih）、赫鲁耶·瓦尔达—塞拉西（Heruy Walda-Selassie）、加布拉—埃格奇亚布赫尔·吉拉—马尔亚姆（Gabra-Egziabher Gila-Maryam）和德雷萨·阿曼特（Deressa Amante）。这些知识分子在呼吁政治、文化、教育和行政改革的同时

还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以人种论、历史和政治经济等多种形式问世，内容涉及社会公平、性别、宗教压迫、奴隶制、饥荒和民族主义等许多问题。在这一代人中，最为著名的是加布拉—海瓦特和阿法瓦尔克，他们都谴责埃塞俄比亚国家为发展军队而对农民的大肆剥削，抨击埃塞俄比亚缺乏有效的政府行政秩序（当地语言叫做塞拉特 serat）和国民精神建设。按照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的看法，加布拉—海瓦特和阿法瓦尔克认为下面的陈述对于埃塞俄比亚无比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民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有效的政府人民就没有稳定的政权，政权的源泉又来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军队的数量。一个以法律治理的小镇要比一个没有有效的政府的大国好得多。"

第二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1934 年。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如中东、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特别是法国。他们同样得到埃塞俄比亚政府和皇室的资助，如同第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怀着说服政府进行改革的心情从事写作，尽管其作品质量不高。例如，阿基鲁·哈布塔·瓦尔德（Akilu Habta Wald）是在埃及和法国接受的教育，阿沙巴·加布拉—海瓦特（Ashaba Gabra-Heywat）是在瑞士接受的教育，法恰达—塞拉西（Faqada-Selassie）和西拉克·赫鲁耶（Sirak Heruy）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埃佛雷姆·塔瓦尔达—马德赫恩（Efrem Tawalda-Wadhan）、达维特·奥格巴扎吉（Dawit Ogbazgy）、杰塔胡恩·塔萨马（Getahun Tasamma）、因杰达·约翰尼斯（Engeda Yohannes）、马康南·海尔（Makonnen Hayle）和马康南·达斯塔（Makonnen Dasta）在乘船去美国之前都在黎巴嫩接受过现代教育。特德拉·海尔（Tedla Haile）去了比利时，法尔拉恰·瓦尔达—汉纳（Fallaqa Walda-Hanna）、海拉—马尔亚姆·塔克里（Hayla-Maryam Takle）、马库尔亚·瓦尔达—塞拉西（Makurya Walda-Selassie）和米卡耶尔·塔萨马（Mikael Tasamma）去了意大利。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有巴沙维拉德·哈布塔—瓦尔德（Bashahwerad Habta-Wald）、马拉库·贝扬（Malaku Bayyan）和瓦尔库·戈巴纳（Warqu Gobana），他们都进入了俄亥俄州中部的长老派学院，前两位后来留在

60

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工作。这些初露锋芒的精英们把他们的教育看成埃塞俄比亚国家独立和发展的延伸。然而，与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其他人不同，马拉库·贝扬只关心如何在埃塞俄比亚和比较大的非洲裔美国社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作为现代主义政治的一部分，该埃塞俄比亚学者曾经邀请许多非洲裔美国专家，包括著名的飞行员休伯特·朱利安来埃塞俄比亚。后来，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期，贝扬加强了他与广大黑人世界的联系。在与海尔·塞拉西皇帝一起流亡期间，通过一个由他帮助建立的组织，埃塞俄比亚世界联合会（the Ethiopian World Federation），来为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事业寻求支持，该组织的行动在本书其他部分将进一步介绍给读者。

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保守派集团反对他们认为激进的改革，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就是前孟尼利克二世时期的战争部长，即年长的菲特武拉里·哈布塔·吉奥尔吉斯（Fitwrary Habta Giorgis）。如同现代化社会中其他保守人物一样，菲特武拉里反对海尔·塞拉西热心于外来的特别是欧洲人的思想和革新。菲特武拉里领导着一个难以对付的贵族集团，这些人十分倾心于使他们反对改革的封建主义。埃塞俄比亚的封建主义在各个省是有区别的，但在加拉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其他地区的总督及其官员通常将其省份视为征讨得来的采邑。然而，他们仅仅想在一定时间内控制这些地方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而已，并不想永久占领。在帝国老臣和年轻领导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如何为改革而制订总体方案。用一位观察家者的话说：

> 显贵中的老者依然穿着宽松的白马裤，头上裹着丝巾，下巴上长着纷乱的胡须，不喜欢行政事务。年轻领导者则“自行其事，他们自有其打扮，留着小胡须，穿着欧洲式的衣服，在有地位的人面前卑躬屈膝”，假如这些傲慢的年轻人仍然穿谢马[1]，他们不得不把衣服系在胸上以示对年长者血系家族和官衔地位满不

61

① shemmas，埃塞俄比亚的一种传统布衣。——译者注

> 在乎。同时，老人们会忧郁地坐在他们的座位上，以其古老的聪慧进行交谈，用谚语来支持他们的政策，并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周围涉世未深的年轻人。①

一个名为“青年埃塞俄比亚运动”（Young Ethiopian Movement）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也反对接受外国的影响。该组织虽小，但很重要。这一组织由一位来自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的提格雷人基阿德·马里亚姆·阿贝拉（Kiade Mariam Aberra）领导，其成员有沃尔德·吉奥尔吉斯（Wolde Giorgis）、马康南·哈卜特·沃尔德（Makonnen Hapte Wolde）、阿耶拉·加布雷（Ayela Gabre）和巴沙瓦拉德·哈卜特·沃尔德（Bashawarad Hapte Wolde）。尽管他们在国外或者外国基督教传教团接受的教育，他们还是对于领着高额薪水的外国顾问的到来感到愤怒。由于大多来源于低等级甚至农民家庭，他们常常对有权势的政府职位总是被来自高等级家庭的人占据这一事实十分不满。他们特别注意和探讨工业化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样，他们对自己在国外遇到的种族歧视表示抗议。这一集团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施展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他们支持塞拉西皇帝招募更多的非洲裔美国技术人员和飞行员。他们认为，飞机只应该用来做运送物品和药品的运输工具。对于改革者的核心成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来自纽约哈勒姆医院（New York's Harlem Hospital）的非洲裔美国护士和医生，因为正是他们组成的医疗供应队为救助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们提供了支援。从事这项任务的医生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埃及、荷兰、芬兰、希腊、挪威、波兰、瑞典和瑞士等不同国家。

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者的愿望与皇帝坚持该国家是一个绝对皇帝专制国家的矛盾由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老对手意大利之间酝造的国际

---

①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纽约：弗雷德里克·A. 普拉埃格，1965 年，第 174—175 页。

冲突而进一步恶化。广袤的国土和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匮乏意味着，埃塞俄比亚为没有实现现代化付出的代价是在与意大利的角逐中失败了。

尽管埃塞俄比亚过去没有成为殖民地，但它仍逃不出当时那个殖民时代，因此，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仍然承受着殖民种族敌视和压迫的重负。但是，殖民主义对埃塞俄比亚的冲击极其复杂并充满矛盾。几个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通过遵守向西方提供产品和有选择的给予外国企业家及投资者特许权的形式来保持本国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埃塞俄比亚皇帝还着手开展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改革。事实上，上面谈到的现代化努力往往都是表面现象，仅仅是给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组织结构涂上了现代性的装饰画，实质上并没有用“现代性之以太”（ether 62 of modernity）彻底改变政府机构。造成上面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个人主义的观念、理性主义的中心和管理方式的陈旧。欧洲的新教改革通常为实现世俗现代主义改革愿望拓展空间，而埃塞俄比亚则恰恰相反，那里僵化的正教政治传统禁止任何人对埃塞俄比亚传统信仰进行激进改革。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外部势力所造成的威胁当然会产生思想观念壁垒以反对激进改革的呼声。埃塞俄比亚能够通过基督教正教意识形态壁垒和强大的军事传统维护自己的尊严，并以一支受人尊敬和强悍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主权。

到了 19 世纪末期，埃塞俄比亚已经着手有选择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始从一个纳贡的或封建的国家结构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尽管埃塞俄比亚在 20 世纪上半叶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所罗门王朝只能重新界定市民对于这个国家神圣的职责，而这种忠诚根本无法将平民置换成政治精英。由于拥有许多特权，这些社会精英们可以免受压力和限制，并表达了他们限定现代化过程和性质的决心，但其结果不是巩固皇帝专制，而是给埃塞俄比亚精英和民众的发动限定了机会。埃塞俄比亚的知识界同样发现，他们总是只有在皇室的庇护下才能在国际资本入侵的影响和当地公众政治战略格局之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当然，这中间也为那些试图指引国家走向改革之路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和那些想保护皇帝绝对权

力的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因此，现代政党的建立和社会运动发生之趋势都被进一步削弱了。

到了20世纪，建立在圣经启示历史故事来解释和预测国家事务基础之上的埃塞俄比亚正教逐渐发现，它必须更为成熟地评价世俗危机，以便重新进行这种精神建设。在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推动下，国家的各项法律条文和世俗备忘录的各项记载大量被补充进《圣经》（Holy Scriptures）内容当中，成为埃塞俄比亚民族希望的指路明灯。在国际社会及随之而来的各类组织进入埃塞俄比亚之前，埃塞俄比亚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给埃塞俄比亚带来的热情被一系列的贸易条款和保护集体安全的承诺所点燃。埃塞俄比亚所的期望就是现代制度能够保护它的主权，同时又能给它提供一个"好政府"。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提高选民的安全度，特别是首都的居民或者那些生活在帝国核心地带的人们，才是有效政府存在的表现。虽然拥有以上诸多因素，但埃塞俄比亚仍缺乏"工业革命"，按照历史学家特沙里·提贝布（Teshale Tibebu）的看法，没有必要去责备它的封建生产关系。他认为，恰恰相反，埃塞俄比亚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把它从其他被殖民地化了的非洲国家的经历中分离开来。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进行高额财政投入常常并不适合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希望重新设定一套可以使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从属地位中摆脱出来的重建方案。提贝布总结说，由于埃塞俄比亚现代国家与其他非洲殖民地国家一样，兴起的不是社会经济变迁的形象，而是一种获取资源和维持安全的模式和结构，那些国家刚刚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功原样复制到非洲来。然而，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不论从国内政治还是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该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都更加复杂了，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精英和广大农民来说，都面临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局势。

63

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统治体制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因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维护他继承的王权，而其王权的维护又主要依赖于外国顾问，那些外国顾问又引领埃塞俄

比亚进入到全球体系中。在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独裁者领导下，埃塞俄比亚国家谴责或监禁在这个现代独裁国家以外从事活动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指控为异教徒或叛教者，还有一些人被迫流亡或者在皇家卫队和安全机构的监视之下。尽管这些事件不断发生，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有时还是能够将其独特的专业技能与其优越的家庭出身联系在一起，在皇室行动时来展示他们改变现状的承诺。因此，在帝国的保护下，这些人在专业上能取得相对的成功，即使他们的改革愿望总是难以实现。但是，最大的损失是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在意大利人侵时期被送到了前线，成为反抗殖民入侵者的先锋队，其中有数百人被就地处决了。

虽然埃塞俄比亚被神话为非洲独立的典范，但是，这个国家还是蒙受了欧洲殖民的历程，尽管这个历程中充满了复杂性、模糊性和多样性。马里纳·奥塔维（Marina Ottaway）认为，埃塞俄比亚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经历过殖民主义，因此，现代埃塞俄比亚国家的观念与其他非洲国家反抗欧洲殖民势力的共同思想概念是有区别的。但是，外国资本的压力同样给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该国家具有与其他非洲殖民地一样的经历。按照埃德蒙·J. 凯勒（Edmund J. Keller）的看法，作为非洲之角殖民压力的产物，后一个因素在新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形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外，如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地区也形成了新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国际上的资本和资源利用被种族化了；另一方面在国内继承了种族等级的差别。

64 通过阿姆哈拉人控制的政治中心，现代性的后设叙述被输送进埃塞俄比亚，进步的观念被刻画在种族差异之中。因此，不说闪米特语的人被迫转变或重新组合他们的种族和宗教认同，以便成为现代的，他们还被迫接受阿姆哈拉人的习俗，以便获得现代化教育。因此，这是一个被迈克尔·汉查德描绘为“种族时代”（racial time）和“公众时代”（public time）之间相互联接的重要例证。例如：由种族差异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已经被强行用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关系当中。种族

时代的含义是阐明，由现代性所创造的诸多机会的享用上是不平等的，其中包括商品、社会服务、国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政治权力的掌控以及对当地认识论的文化统治权等等。现代不平等在非洲重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商品经济和现代教育这两个对现代性和种族等级差别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层面不断扩展。在这方面，"有知识的人"，通常是指贵族、军职人员和在政府供职的有志平民，总是一成不变地要么坚持旧观念，要么主张新思想，结果形成了各种不对应的相互关系。当埃塞俄比亚为保卫其领土完整抗击欧洲入侵时，军事地位优越的阿姆哈拉—提格雷人同时统治着处于边缘地带的属民。在对付他们自己属民方面，这个具有统治地位的集团在物品供应、社会服务、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权力分配等方面都实行不平等的政治原则。怀有激进现代主义愿望的埃塞俄比亚人一方面受困于正教徒强加的有关国家和阿姆哈拉封建沙文主义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困于外部（欧洲）军事和经济霸权的威胁。因此，无论是不是阿姆哈拉族，农民和知识分子都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对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满转化为一场可行的社会政治运动。假如现代主义的改革和进步可以被描绘成实现生产模式革命化、知识商品化、权力和资源控制发生移交，特别是税收和土地收入拨付发生转移，而且这种统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那么对于埃塞俄比亚而言，对进步改革的需要本不该那么迫切。事实恰恰相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精英们被描绘成反现代主义者，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权力和政治影响仍然控制在中央官僚机构手中，其中包括地方首领，当地语言叫做巴拉巴特（balabats）、地主和内弗特戈恩亚[①]。但是，如果他们反对超出阶级和地区界限的思想扩张，即便是权力最大的官员也要受到限制。

因此，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固有的一些矛盾和动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只是暂时地解决了。在非洲之角地区的欧洲殖民活动不断猖

65

① 原文 neftegnyas 无从查证，译者认为应该是有相当权力的当地士绅之类的人物。——译者注

獗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文化界定更加灵活。1935 年意大利人侵埃塞俄比亚以及二战爆发都对埃塞俄比亚“非洲型现代主义”产生了新的刺激。按照历史学家拉什·本—吉尔特（Ruth Ben-Ghiat）的说法，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意大利人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是打着把非洲从黑暗、奴隶制和混乱中解放出来的现代化任务的旗号进行的。她强调，法西斯的宣传把意大利人描绘成一支永不疲倦的利他主义军队，他们修建公路和桥梁，把沙漠变成花园，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但人们看到的埃塞俄比亚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那里成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场，另一方面是大量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埃塞俄比亚的文明和独立是重要的，这使该国在 20 世纪被看成是“黑人的最后城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使它免于欧洲殖民的侵略。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及其他矛盾（1935—1960）

直到欧洲对非洲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埃塞俄比亚与其占统治地位的阿姆拉哈政治统治阶级才开始把自己视为“黑人民族”的先驱，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和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才成为现代学说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研究非洲、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学者们来说，只是从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开始，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才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本章将探索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改革是怎样被打断的，历史学家拉什·本—吉尔特称这段历史是意大利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工程史的转折点。埃塞俄比亚那纷杂而又广泛的历史发展对其国内改革和国际外交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埃塞俄比亚不但取得了重要的民族成就，也经历了沉重的民族灾难，其中包括丧失了大量人口，这些人属于不同年龄段、不同阶级和不同性别。本章还着重强调了这些历史事件与非洲现代人权观念的诞生和非洲非殖民化工程之间的关联。这一章还评论性地分析了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和非洲人口大离散的新型政治出现时的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和政治历史。 67

在19世纪末期，全球范围内的种族和种族关系问题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学者戴维·戈德堡（David Goldberg）最清晰不过地将这一问题

 描述为“那是一场欧洲与非洲之间种族矛盾的景象，一场文明与想象中的原始状态之间较量的景象”。他还说，这个概念在后来世界事务的解释中不断流传，在所谓“欧洲空间”（European spaces）的国际舞台上反复展现。虽然埃塞俄比亚在19世纪幸免于正规的殖民地化，但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地理界定与欧洲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纠缠在一起造成了权力、文化和知识的母体发生改变，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也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之下。在殖民问题的讨论中，把埃塞俄比亚看成为黑人国家的这一思想不仅与欧洲军事和经济优越相关，还与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所谓“另类”（otherness）和文明的区分标志不可分割，这种标志反映了在思想、形式、印象和想象中的更加宽泛的政治结果。

威望这个概念在所有的殖民问题讨论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根据历史学家拉什·本—吉尔特的说法，这一概念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则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他们把位于“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看作脱离了从属的国际地位的国家。意大利资助一系列专业协会，同时这些专业协会又以其研究使意大利的国家行为合法化，比如意大利科学院（Italian Academy）、国家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earch），一些人种志学者和科学家早年曾经将意大利人刻画为“传统复兴”政治体制的人种之一，但现在这些人在那些专业协会中开始调查东非居民的情况。本—吉尔特最后概括地指出，意大利专业协会的人口统计学家编辑了一本厚厚的意大利东非“人种志学图表”（ethnographic atlas），殖民专家还把东非种族分类展示一些期刊当中，例如《埃塞俄比亚》（*Ethiopia* ）和《非洲意大利人》（*Africa Italiana* ）等，这些关于殖民知识的分类学主要研究了社会控制的技术和人口管理，这些研究都为意大利法西斯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官方蓝图。有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也为墨索里尼的政府对外侵略行动进行了祈祷，而另一个思想流派则认为，教皇要么举棋不定，要么没有能力制止意大利的对外侵略。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为意大利证实自己作为欧洲强国而在政治和公众领域里进行讨论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工具，但是，这个国际事件产生了令人预想不到的后果，历

史学家凯文·K. 盖恩斯（Kevin K. Gaines）将其描述为“非殖民地化运动中一个短暂的非洲时期”。按照盖恩斯的说法，反对意大利殖民侵略的那些行动是非洲现代化新潮流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变迁所推动、被大规模的劳力移民、世界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知识分子反对西方白人霸权的反抗、反种族意识的广泛传播以及黑人渴望文化和政治自由的文字和情感的作用下而发生的。到了20世纪后半期，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际地缘政治的交叉产生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它的政治和经济运气都不错，这就使它处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sub-Sahara Africa）这个新型自然化和合法化的地缘政治空间理论中的边缘化概念中，因此，对于埃塞俄比亚的“黑人性”（blackness）或者说“非洲化”（Africaness）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发生。

69

在现代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其强烈的种族情感和反帝国主义意识中，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孟尼利克二世皇帝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该皇帝在20世纪初期受到了黑人世界的赞颂。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孟尼利克二世曾与贝尼托·西尔万（Benito Sylvain）交好，这是一位海地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位泛非洲主义者，后来成了孟尼利克皇帝的助手。他不仅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黑人”，还参加了“从总体上改善黑人种族”这一计划。西尔万和非洲裔美国政治活动家威廉·H. 埃利斯（William H. Ellis）不但为了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美国黑人庇护地而一道努力，而且还制订了一个发展规划，同时，他们还希望埃塞俄比亚认可在那里建立一个“有色人种院外集团”。历史学家艾伯托·斯巴克伊（Alberto Sbacchi）认为，西尔万未能从埃塞俄比亚得到这个认可，但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奥利散武克·埃塞德贝（Olisanwuche Esedebe）则对此事描绘出了一幅更加美好的图画。后来，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和海地以及利比里亚的总统都成为随后不久成立的“泛非会议”（Pan-Africa congresses）的名誉主席，因为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时期都是几个仅存的独立黑人国家的代表。尽管发生了上述一些变化，孟尼利克二世皇帝还是有选择地保留了一些欧洲顾问和与一个欧洲国家的友好

关系。由于拥有相同的血统，他的继承人塞拉西继续采取了大规模的防御措施，这个继承人还开始实行一种生存主义的外交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塞拉西向取得胜利的欧洲和美国盟军派遣了外交使团，试图以祝贺他们军事胜利的方式与西方大国建立友谊关系。1923 年，他获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功，因为他的国家被接受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该皇帝的本意是希望他的国家取得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地位可以保证埃塞俄比亚一定时期内的和平，以免于受到其他一些西方大国殖民野心的威胁。

海尔·塞拉西政权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越来越认可种族、帝国主义及现代非洲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关联十分重要。由于这种重要性的存在，再加上西非那个孤立的民族国家利比里亚已经被殖民剥削所削弱，而海地同样被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制度的传统所破坏，那么到 20 世纪只有埃塞俄比亚才是历史上唯一独立的黑人国家。“非洲大离散运动”[①]和“拉斯塔法里运动”[②] 成为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另外一个非洲现代现象。拉斯塔法里运动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牙买加工人阶级和黑人农民中间，他们宣称海尔·塞拉西是哈利路亚[③]在人间的代表，拉斯塔法里就是为上帝而命名的。他们认为塞拉西的加冕典礼不亚于圣经预言的“上帝出自非洲”的实现。牙买加人认同他们自己与这个非洲独立国家的皇帝同宗同源，给予这位皇帝神威地位，并认为他是非洲的救世主。从本质上看，拉斯塔法里运动是与圣经预言的解释、黑人的社会和政治渴望以及鼓励一种新的先进的和反正统文化世界观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70

---

① African Diaspora movement，指非洲人及其后代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所从事的黑奴贸易使非洲黑人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主要是美洲，同时也包括后来非洲黑人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活动。——译者注

② The Rastafari movement，指推崇海尔·塞拉西为神的运动，Ras 一词在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中为首领、王子、伯爵等的意思，tafari 一词原本是海尔·塞拉西的名字，本书前文已经翻译为“塔法里”，将这两个词连接起来就成为拉斯塔法里运动，那场运动在 20 世纪初期首先在牙买加发生，后来波及到非洲，一般认为那是一场宗教运动。——译者注

③ Jah，Hallelujah 的缩写，即耶和华。——译者注

但是，埃塞俄比亚继续追求其对现代主义的渴望，虽然该国家向欧洲学习，但目前正在探索着亚洲的日本在20世纪前几十年所进行的具有亚洲现代主义特色的现代化运动。然而，欧洲不希望非洲和亚洲之间发生这种相互学习的关系，尤其是防备日本扩大其文化、经济和政治在非洲之角的影响。这个目标与新型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相一致，这一理论认为，对外扩张可以治疗国内的一些社会疾病，而且他们的文化在一些“比较低下的种族”（lesser races）之间的传播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最高尚的行为。上述这些特点在意大利对非洲殖民的行为中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意大利殖民部长阿雷桑德罗·雷索纳（Aleassandro Lessona）的说法，“把黑非洲大陆拉进日本发展的轨道会使欧洲丧失以非洲来防御她自身文明的可能性”。意大利对1919年一战后所签订的条约很不满意，因为此条约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在非洲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希望。在争夺非洲的角斗中，意大利是一个迟到者，意大利已经获得了厄尔特里亚的所谓保护权，这是一个天然沿海地区，位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丘陵地区的边缘，其首都是阿斯马拉。因此，很多意大利人认为，非洲殖民地是他们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又一个象征，是他们作为非洲殖民地统治者合法化的证据。

英国和意大利在1925年签署并发表了一项协议，该协议申明，双方不仅承认彼此在非洲之角地区的经济利益范围，还确认他们的这种利益可以扩张到埃塞俄比亚境内。在1926年，塞拉西已经能够利用埃塞俄比亚拥有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身份获得其他国家同意并保证其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他富有尊严地坚持，国际联盟的条约条款中应该含有他反对英国与意大利所签署协议的内容，这一举动被视为现代非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进攻性外交举措。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开始着手在非洲东北部发动新一轮的扩张活动，他寻求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能有效控制的边缘地区下手。因此，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采取多种手段进行侵略活动，其中包括不断地进

行骑兵突袭、移民以及制造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极度不稳定等，以此威胁埃塞俄比亚的自治。除了试图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封建社会结构之缺陷而外，意大利人在一些商业间谍、医学人士和传教士的帮助下窃取在埃塞俄比亚的外交人员相互通信与交流的内容。但是，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已经预感到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即将发生冲突，因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团结性和有效性在渐渐地削弱。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与孟尼利克有所不同，孟尼利克的政策是建立在“阿姆哈拉化”或者“埃塞俄比亚化”征服者首领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人的权力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71 他们现在不再与权利相关，而是与对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服务相连，而塞拉西的政治策略则是加强中央集权。塞拉西的这种策略对国家来说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这引起了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这种分离主义的趋势在埃塞俄比亚一直存在，并与国家、国民、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等棘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埃塞俄比亚统治者还有一个与孟尼利克时代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孟尼利克能够建立起一支60多万人的火枪兵部队和20多万人的正规军队，此外还有无以计数的全副武装的传统武士，他们擅长打游击战，可以作为国防的一部分力量。但在塞拉西时代，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日程导致了皇帝手中绝对权力的更加集中。另外，一个职业化的平民行政官员阶级的突然出现也把传统武士阶级推向了社会边缘。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按照20世纪的标准，埃塞俄比亚的正规部队的装备严重不足。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云集在非洲之角地区的主要欧洲殖民国家限制了埃塞俄比亚进口武器装备的数量，这使得埃塞俄比亚政府很难保卫自己国家的边界不受侵犯。埃塞俄比亚的主权一直依赖于其正教的向心力作用和皇帝的威望，到20世纪初期仍然没有改变，而且该国家的法律特征也是要在思想意识上使人们保持一致。意大利的侵略使埃塞俄比亚开始对自己的统一性进行最后的维持，对现代化的规划进行最后的尝试。

走向二战的背景：意大利侵略“黑人最后的堡垒”

根据它在索马里兰殖民基地的统治，意大利曾经认为非洲之角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还未开采的矿物财富，所以，它决定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国土发动侵略。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所控制的索马里兰之间有一段未做标记的边界，那里发生的瓦尔瓦尔事件（Wal Wal incident）为意大利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瓦尔瓦尔位于欧加登沙漠的前沿，该地区有油井，在欧洲人瓜分非洲之前，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一些索马里游牧民经常会去那儿，现在这个地区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占领。臭名昭著的所谓瓦尔瓦尔事件不仅是对埃塞俄比亚的蓄意挑衅，而且也是对非洲物质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种考验，对国际条约的实际效用、殖民地扩张权力的行使以及国家权利的一种挑战。

虽然舆论对意大利进行了抨击，但意大利还是继续巩固其在非洲之角的存在，并准备与1934年终以前在瓦尔瓦尔建立一个新的军事要塞。但是，由于英国与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①的干涉，这一行动被迫停止，但那里还是由于不平衡的利益关系而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态势。这个边界委员会本来对意大利提出了抗议，但是，当意大利飞机在英埃军事驻守基地低空盘旋的事情发生导致双方明显处于敌对状态后，该委员会便不再过问此事了。英国使团首脑克利福德中尉（Lieutenant Clifford）宣称，该委员会从此事件中撤出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外交事件”。接着，该委员会安派一个团的埃塞俄比亚军队驻守在瓦尔瓦尔，这支军队与意大利驻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两周以后，埃意两军在瓦尔瓦尔交火，由此引发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正式侵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同时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兆。 72

1935年1月，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了控诉，要求行使

① the Anglo-Ethiopian Boundary Commission，该委员会建立于1934年11月23日，瓦尔瓦尔事件发生在1934年12月5日，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双方都指责对方军人发动了袭击，由于双方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又由于英国也对埃塞俄比亚怀有野心，不希望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因此对意大利是一个重要的牵制。——译者注

和运用国际联盟宪章中关于集中安全条款的精神与文字。埃塞俄比亚对国际联盟不满的原因在于，该组织没有坚持尽最大可能行使自己的权力，即联盟中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意味着所有成员国都受到了攻击。英国政府对调解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努力，但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欧洲其他国家则根据“双边分割条约”考虑相互间的政治利益达成基本共识，他们把各自在非洲的势力范围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另外，他们还直接付诸武力控制非洲国家，其过程通常是漫长而又血腥的。此时期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以接受难民的方式有意避开参与其中，而法国唯恐意大利成为德国的盟友，为打乱国家间的平衡关系而禁止向埃塞俄比亚出口武器。作为一个特殊措施，法国还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更改领土现状。

1935 年，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和法国总理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联名发表了《霍尔—拉瓦尔协定》（The Hoare-Laval Pact of 1935），寻求以瓜分埃塞俄比亚的方式来结束意埃战争。他们所签署的这个协定备受争议，因为它满足了墨索里尼坚持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新殖民地的需要。在 1894 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曾经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由法国帮助埃塞俄比亚建造一条铁路。在 1917 年该铁路完工后，从吉布提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承担着埃塞俄比亚对外贸易额的 75%，在 1933 年，埃塞俄比亚以每吨运载量 200 法郎的利润回报给法国投资商，这些法国投资商后来拥有该铁路 34000 股份中的 20000 股。而皮埃尔·拉瓦尔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态度则更为明显地表示友好，包括将该铁路股份的 2500 股出售给意大利政府。《霍尔—拉瓦尔协定》还规定，埃塞俄比亚帝国南部山区保持独立，而富饶而又肥沃的北方领土则转交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已经做好了同意该协定的准备，但这个计划被泄露出去以后受到许多国际观察家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个协定出卖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在该协定上签了字。当国际联盟最后对埃塞俄比亚实行武器禁运后，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协定则能够确保枪支和弹药不能

从吉布提的铁路直接运送到埃塞俄比亚，所以只能通过卡车送到离英国索马里兰殖民地边界125英里的地方再转运到埃塞俄比亚。基于上述变故，很多观察家都对埃塞俄比亚被迫处于这样一种易受攻击的地位来接受武器援助表示愤慨。最响亮且又最一致的抗议之声来自于非洲离散人居住的那些地区。

非洲的一些协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例如，“尼日利亚拉各斯杰出女子协会”（the Nigerian Prominent Lagos Women's Sociaty）和“埃塞俄比亚恩努古救济基金委员会”（the Ethiopia Relief Fund Committee of Enugu）共同通过了一项抗议决议，尼日利亚拉各斯杰出女子协会还起草了一份递交给国际联盟的报告。非洲，在恩纳姆迪·阿兹基维（Nnamdi Azikiwe）指挥下的西非飞行员也代表埃塞俄比亚参加了战斗。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建立的阿比西尼亚救济基金会（Abyssinian Relief Fund）号召英国、美国、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各国的有色人种支持他们的斗争使命。一些黑人反抗组织也利用迅速成长起来的泛非媒体和马尔库斯（Marcus）的一些宣传机构以及著名非洲黑人记者和作家艾米·杰奎斯·加维（Amy Jacques Garvey）领导的“全球黑人改善联盟”（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等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类似组织，比如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埃塞俄比亚友协”（the Friends of Ethiopia）、“非洲—西印度群岛联盟”（the Afro-West Indian League）、“黑人福利社会与文化联盟”（the Negro Welfare Social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等也投入了那场斗争。反对意大利殖民主义者的情绪在英属圭亚那、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委内瑞拉的黑人中也表现出来。一个由马拉库·贝恩博士（Malaku Bayen）在美国创办的非洲离散者组织“埃塞俄比亚世界联合会”（the Ethiopian World Federation）出版了一个新刊物，名字为《埃塞俄比亚之音》（the Voice of Ethiopia，VOE），该刊物在全世界都可以订阅和发行。由于掀起了国际性的抗议运动，英国政府也宣布取消《霍尔—拉瓦尔协定》，那个臭名昭著的协定导致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和法国总理拉瓦尔双双辞职。但是，意埃危机仅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造

成了强烈反响，事实上并没有阻止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

1935年10月3日，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下令从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同时出兵，正式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在意大利侵略军面前，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曾经一度接到命令撤回到冲突线以内，目的是以此向全世界揭露意大利的侵略行经，并延长意大利人的补给线。1935年10月7日，国际联盟一致通过声明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但是随后它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欧洲大多数民众似乎都是站在埃塞俄比亚一边。海尔·塞拉西皇帝在国内和黑人世界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的化身，同时也成为战争期间自由人道主义的象征，以及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权利平衡这一扭曲性概念的世界性怀疑。不论如何，又一场全球性大国冲突的感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隐约再现，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上述这些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那些事件展示了欧洲的软弱性和国际联盟不愿意强烈反对逐步升级的法西斯威胁。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军队中的大小军官都有人叛逃，尤其是提格雷和奥罗莫等帝国边界地区更为严重。但是，就埃塞俄比亚全国而论，贵族和他们的属民们在塞拉西皇帝正式宣布战争之前就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民众必须起来保卫他们自己的祖国领土完整，保卫令他们自豪的古代文明。最后，当墨索里尼的军队突然袭击埃塞俄比亚领土时，埃塞俄比亚敲响了亚的斯亚贝巴皇宫的孟尼利克战鼓，发出了全民总动员的号令。

74

虽然埃塞俄比亚军队对意大利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意大利军队占有绝对优势，埃塞俄比亚还是战败了。就武器而言，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参战人员使用的是大刀、盾牌和一些过时的武器，这当然不能与拥有坦克，机枪和飞机的现代化装备起来的意大利军队相抗衡。另外，意大利军队还得到它的殖民地雇佣军阿斯卡瑞（Askaris）的强有力支援，这支殖民地军队中绝大多数人是招募的非洲人，尤其是从厄立特里亚招募而来。意大利侵略军在战争中还使用了毒气，不仅伤害了埃塞俄比亚军人，也殃及到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广大

平民。

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早期抵抗

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5年的占领时间是二战还没有宣战就开始了的标志。他们还强调指出，人们缺乏非洲对二战的军事和政治胜利贡献的认识。一些学者特别关心战争中对非洲爱国者实施的罪恶行经，那些爱国者中的许多人为了埃塞俄比亚和盟军的胜利而在经过顽强抵抗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他们的这种付出才使人们赢得了击败法西斯意识形态和军事侵略的最后胜利。作为努力恢复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抵抗殖民侵略的组成部分，埃塞俄比亚为使那些首领，即各地的统治者们顺服于政府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作为国民，很多管理者对政府愤愤不平，因此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依靠他们来保卫国家当然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属地的政治领袖，例如戈贾姆地区（Gojjam）的王子首领海鲁·特克里·海马诺特（Hailu Tekle Haimanot），曾经被塞拉西皇帝降低了身份并关进了监狱，还有一个名叫海马诺特的首领由于在意大利侵略面前宣布中立而被剥夺了权力而且受到限制，结果他在获得自由后站在了意大利侵略者一边。海尔·塞拉西皇帝囚禁的另一个罪犯，德阿加兹马特克·巴尔查（Deajazmatch Balcha）则经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尽管他过去曾经遭到皇帝给予的牢狱之灾，但他后来却成为埃塞俄比亚抵抗运动中的一员。这个奥罗莫贵族在与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斗争中采取了传统的游击战的作战方式，骚扰意大利占领军。埃塞俄比亚有一个民间传说记载了巴尔查如何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动人故事。在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以后，由于缺少补给，这个贵族武士向哈拉尔附近的的意大利指挥官表示愿意投降。他戴着传统的白色方形披肩坐在一棵树下，引诱意大利指挥官和他的卫兵过来，当他们走到近前的时候，他大声呼喊着“孟尼利克，我的主人”的神灵，然后掏出了一把枪连续射杀了所有的意大利高级军官，直到最后倒在了匆忙赶来的意大利人的枪口之下。在孟尼利克统治时期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斗争中，很多

75

埃塞俄比亚人经常用圣经话语表示他们是该国家反抗侵略者的成员，这句话就是“古实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这种精神上的追求早在1890年意埃第一次战争对侵略者的胜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不仅形成了那次埃塞俄比亚拒绝意大利“保护”的基础，而且还是这次埃塞俄比亚短暂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呐喊。

海尔·塞拉西皇帝非常积极的投入到保卫国家领土的这场战争中，他跟随部队亲临前线，甚至在梅切乌战役（Maichew）中亲自操作高射炮。他还宣布曾经多次到拉利贝拉古代教堂（Lalibella）去祈祷，而没有像往常那样前呼后拥，以皇家卫队和骑兵护驾。另一方面，他的外交代表也忙于争取国际上的外交支援以弥补军事供应的不足，他还为反对意大利侵略而调整了自己与国内敌对势力之间的关系。尽管埃塞俄比亚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他们还是被迫退回了北部的哈勒尔盖省。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人建议塞拉西皇帝及其家人逃亡到耶路撒冷。

到1936年3月，由于希特勒的军队到了莱茵兰地区，欧洲以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非洲，战争阴霾的威胁已经扩展到非洲之角以外的地区。1936年5月，就在亚的斯亚贝巴被占领几天之前，埃塞俄比亚皇帝家族逃离了首都来到耶路撒冷。在这里，埃塞俄比亚皇帝准备了一份将呈现给国际联盟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状况的陈述。1936年6月，塞拉西皇帝在瑞士的日内瓦发表了一次讲话，这次讲话被美国《时代杂志》评论为呈现给国际联盟的最庄严、最真实、无可辩驳、激动人心的演讲之一。尽管意大利的记者席中发出了延续10多分钟咆哮般的嘲笑与咒骂，但塞拉西皇帝那以“诉诸国际联盟”为题的演讲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独特舞台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声音，而且也是对集体安全和国际道德这种现代概念的社会诉讼。随后，因为他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偶像，塞拉西皇帝被《时代杂志》提名为当年的“年度先生”。事实上，塞拉西的那篇演讲是用阿姆哈拉语进行的，而没有使用传统的“外交语言”，这种做法也在现代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人的烙印。在塞

拉西演讲所提到的问题中预言，欧洲国家如果不制止法西斯必将会自食恶果。塞拉西皇帝最后说，“今天是我们（遭到法西斯的蹂躏），明天将是你们（面临法西斯的践踏）。”这句话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国际联盟最后的悼文。埃塞俄比亚的这种诉求主要是需要贷款来支付战争的花费，但是，世界列强在这种呼吁面前充耳不闻，他们在这次峰会上毫无反映，埃塞俄比亚只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以及跨国进步运动，尤其是一些非洲离散政治组织的支持。这次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为埃塞俄比亚、非洲、欧洲、加勒比海地区和美洲各国的国内以及国际政治重新组合提供了舞台。

76

在美国，成千上万的黑人以一种现代泛美主义的热情表达了要为埃塞尔比亚而参加战斗的愿望，但是，由于美国国务院拒绝签发那么多所需要的护照而未能实现。而在另一方面，包括纽约市长拉·瓜迪亚（La Guardia）在内的数百名美籍意大利人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代表意大利的志愿者军队，许多意大利后裔的美国人获得了批准，前往意大利并为之而战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也有为数不多的美籍意大利人站在埃塞俄比亚一边。一些政治领袖，比如哈里·A. 莫勒（Harry A. Maurer），带头分别向美国国务院和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递交了抗议法西斯统治政策的陈情书。有些学者还强调指出，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杜斯（Duce）并在1936年建立东非帝国以后，只过去两年时间就爆发了对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狂热，这使得美籍意大利人开始对法西斯统治产生反感，尤其是在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立法颁布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了。

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站在反埃塞俄比亚利益的立场上，他们是担心反法西斯和反种族运动联系在一起，如果这样就会威胁到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联邦调查局积极地监视着美国非洲裔社区招募的代表埃塞俄比亚的志愿者，但是这些做法根本无法阻止现代埃塞俄比亚主义者文化和政治计划大规模发展的趋势。非洲之角发生的危机也导致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支持埃塞俄比亚，例如“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等。在该组织出版的正式刊物《危机》上定期向大型的社区和普通民众公布有关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非洲殖民地国家发生的事件。还有一些非洲裔美国人的组织探讨在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下为埃塞俄比亚发行财政贷款的可能性，但是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在纽约，以哈勒姆（Harlem）地区为基地的一些组织，包括“全球黑人改善联盟”（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UNIA）、“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加利福尼亚埃尔克格罗维土著人组织”（the Elks）和“黑人权利斗争联盟”（the League of Struggle for Negro Rights）等在“保卫埃塞俄比亚临时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Ethiopia）的旗帜下联合行动。一些著名人士由于亲埃塞俄比亚的共同主张而走到一起，其中包括阿比西尼亚浸礼派教会牧师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知名记者乔尔·A. 罗杰斯（Joel A. Rogers）、历史学家威利斯·哈金斯（Willis Huggins）、全球黑人促进会的 A. L. 金（A. L. King）以及美国共产党的詹姆斯·W. 福特（James W. Ford）。1935年7月，“美国反战和反法西斯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和保卫埃塞俄比亚临时委员会派威利斯·哈金斯到日内瓦向国际联盟递交他们的陈情书。哈金斯还与两位埃塞俄比亚外交官举行了正式会晤，他们是圣詹姆斯法院的法官阿扎吉·沃尔克内·马丁（Azaj Workneh Martin）和埃塞俄比亚驻法国外交使节特克雷—哈瓦里阿特（Tecle-Hawariate），另外，他还与国际联盟的一个代表进行了会晤。在伦敦，“西非学生联合会”（the 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的领导人拉迪坡·索兰克（Ladipo Solanke）也帮助组织一些公众活动来反对侵略埃塞俄比亚。

77

非洲离散在外国的人员对意大利侵略非洲国家背景之下有关埃塞俄比亚历史和文明的主流看法公开表示不满，于是，他们鼓励一家主要的非洲裔美国人报纸《匹兹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派遣记者乔尔·A. 罗杰斯去报道这场战争。罗杰斯于1935年10月离开诺曼底（SS Normandie），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现代首批报道黑人战争的记者

之一。第二年，他出版了一个受欢迎的插图画册，名为《埃塞俄比亚事实真相》（*The Real Facts About Ethiopia* ）。1934 年，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威廉·里奥·汉斯贝里（William Leo Hansberry）帮助创办了“埃塞俄比亚研究理事会”（the Ethiopian Research Council），以推动美国人反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同时也传播了有关埃塞俄比亚历史的知识。出于同样的原因，在 1935 年建立了“埃塞俄比亚友协国际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Friends of Ethiopia），以争取“黑人的支持”。还有一个联盟组织叫做“布莱登协会”（the Blyden Society），该协会以 19 世纪黑人领袖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命名，其前身是“哈勒姆历史俱乐部”（the Harlem History Club），该组织在支持埃塞俄比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场支持埃塞俄比亚的运动中，一位叫做约翰·G. 杰克逊（John G. Jackson）的有才干的领导人在 193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埃塞俄比亚与文明的起源》（*Ethiopia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的著作。在美国，其他一些代表埃塞俄比亚的离散者活动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学生联合会”（the Ethiopian Students Association）、“全美黑人大会”（the National Negro Congress）以及由马科斯·耶甘博士（Max Yergan）领导的“非洲事务理事会”（the Council of African Affairs）。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期间，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国际主义和友谊成为国际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证明非洲离散者已经团结起来一致行动了，历史学家彭尼·冯·埃申（Penny Von Eschen）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历史和社会“激情认同”的熔炉。上述这些个人和团体发展成一个可以想象的小社会，这个社会包括所有非洲人的后裔。作为非洲离散者政治的设计师，他们创造性地重新塑造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语言和思想意识，同时也创建了非洲离散者政治。他们这么做也从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发展这些强大的思想交流中受益。这些人的目标都是反抗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

埃塞俄比亚人民对意大利占领的反抗

尽管国际社会对意大利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慨，但他们还是巩固了

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这一侵略过程是从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始的。1936年6月初，罗马颁布了一个宪法，宣布将埃塞俄比亚兼并到其以前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并组建成“非洲东方意大利”，或叫“AOL”。这个行政管理单位随后被分为6个省，其中包括：厄立特里亚省，大部分地区为提格雷，其中心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加拉—西达莫省（Galla-Sidamo），其中心在季马（Jimma）；哈拉尔省，其中心为哈拉尔城；还有索马利亚省（Somalia），它也在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这样一来，意大利人就将厄立特里亚扩大化了，使之包括了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省，欧加登地区则被合并到意大利所控制的索马里兰地区，确定新殖民领域的一部分。上述所有省份都直属亚的斯亚贝巴，那里是意大利总督的驻地。

1936年11月，意大利宣布整个埃塞俄比亚国家都已经平定并在殖民当局的有效控制之下。但事实上局势是相当复杂的。意大利人不是被限制在自己的要塞里，就是被限制在主要城镇中。除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地理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之外，他们还建立了殖民地行政机构来代替那些古老的皇室省份。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意大利的军队、军官和法西斯党成员经常使用残忍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当地社会的反抗。在亚的斯亚贝巴有5种不同的警察从事保卫工作，分别是军事警察（carabinieri）、殖民警察、军事警察、黑衫党和法西斯党秘密警察（the OVRA），这些警察对参与反抗运动的个人和团体实施残酷的惩罚或者就地处死。意大利殖民当局宣布，白人种族，尤其是意大利人，是在当地社会之上的优等民族，当地社会被确定为最低级的地位，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因此基本上是被隔离起来了。意大利还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实行国家控制，因为它窃取了埃塞俄比亚国家的黄金储备和生产。

尽管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在埃塞俄比亚的反抗斗争面前，意大利的人力和物力都面临着问题。此外，对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所实施的20世纪最残忍的剥夺方式所引发的国际上的愤慨也在逐步升级。

但是，意大利殖民当局还是开始着手在埃塞俄比亚从事一些经济建设，例如商品农业的发展、道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然而，上述这些建设项目和由意大利人定居社区所发起的发展项目并没有改变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根本目的，那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意大利人的“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一战略的更长远目标则是为将来的领土扩张和可利用自然资源的开发。除了对殖民地人口的统计工作花费大量钱财之外，意大利人在将各个殖民地联合在一起的问题上也遇到了困难和时间的延误。结果，大多数殖民地区处于孤立状态，因而使中心城市政府不得不承担额外的费用。另外，很多殖民地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大量的埃塞俄比亚人被迫迁移到意大利人认为是不健康和危险的地区居住。根据历史学教海尔·拉雷波（Haile Larebo）的说法，意大利的殖民地部（the Italian Ministry of Colonies）根本没有考虑到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找工作和居住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解决复员军人和希望在埃塞俄比亚扩大经营的强有力的商业集团的问题。

79

埃塞俄比亚人民不屈服的反抗在继续，1937 年 2 月，在试图刺杀意大利殖民总督格拉奇亚尼（Graziani）失败后，殖民军队对当地的一些社区实行了 3 天的恐怖统治，将近 3 万名埃塞俄比亚人被就地处决，其中将近一半的人是在国内外受过教育的年轻公民，他们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工程的主要承担者。后来得到证实，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在刚开始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就强调，必须消灭埃塞俄比亚那些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以消除那里有组织的反抗意大利思想和政治计划的隐患。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也遭到了法西斯的迫害，很多反抗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爱国修道士都被处以死刑，教堂被夷为平地，神甫、执事和一些主教，包括阿布内主教（Abune）、佩特罗斯（Petros）和阿布内·米卡耶尔（Abune Mikael）在内，都由于支持计划从侵略军手中重新夺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爱国者而被处死。意大利军队在德布雷里巴努斯（Debre Libanus）的希瓦修道院发现了为抵抗运动而准备的武器之后，杀死了该修道院的 350 个修士，

并把他们的尸体扔在附近的一个山谷里。意大利殖民当局接着又为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任命了一个新的大主教，因此打破了几百年来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科普特教会的神圣协调传统。

在值得称赞的埃塞俄比亚爱国者当中，有一位值得赞颂的来自厄立特里亚的21岁小伙子，名字叫塞拉伊（Zerai），他被意大利人作为其在埃塞俄比亚的战利品送到罗马，作为战利品送到罗马展示的还有一把剑，在那个展示会上露面的有法西斯头脑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皇帝等。没有亲临那个场合就无法体会被征服人民的代表行为是如何高尚，塞拉伊跪在地上进行祈祷，并且内疚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意大利人从亚的斯亚贝巴火车站掠夺而来的犹大金狮[1]，意大利警察上前试图不许他这样做，他转过身来杀死了5个意大利法西斯官员，意大利人马上开枪，他应声受伤倒地，最后因伤而死，但他永远活在埃塞俄比亚人民心中。战争结束以后，为了纪念他对埃塞俄比亚独立作出的贡献，埃塞俄比亚帝国海军的第一支舰队就是以这位反抗侵略的英雄命名的。

还有一个民间广泛流传的战争中对意大利侵略进行武装抵抗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希瓦，关于两位与意大利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的英雄：一位叫德加斯马特克 ·菲克雷·马里亚姆（Dejazmatch Fikre Mariam），另一位叫做季马·塞姆贝特（GimmaSembete）。虽然这二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但马里亚姆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这使得这个故事更加动人，由于担心会影响自己军队和伙伴士气，这位将军拖着严重受伤的身体爬进了一个山洞或山缝中，在临死前埋葬了自己。

80

埃塞俄比亚爱国战线中的女英雄也不少，其中有阿鲁斯（Arusi）的乌伊塞罗·巴拉内什（Woizero Balainesh）、拉科克·德米塞乌（Lakech Demissew）、乌伊塞罗·阿亚雷克（Woizero Ayalech）、康吉特·阿宾内特（Konjit Abinnet）、乌伊塞罗·利可雷什·贝亚恩（Woizero Likelesh Beyan）、乌伊塞罗·阿贝德克·切尔科塞（Woizero Abe-

---

① the gold Lion of Judah，犹大金狮为中东地区基督教信仰所崇拜的偶像，很多埃塞俄比亚人将海尔·塞拉西看成为这种偶像。——译者注

dech Cherkose）、理科克·耶尔雷什·布戴恩（Likk Yellesh Bdyen）、阿贝贝克·切尔科塞（Abebech Cherkose）、科雷梅沃尔克·提鲁耶（Kelemework Tirueh）和科贝德克·塞尤姆（Kebedech Seyoum）等。在爱国女英雄当中，贡献最大的可能要数莎瓦拉加德·格里（Shawaragad Gedle），在加入爱国者队伍之前，她就把自己的私人财产捐给了埃塞俄比亚的国际红十字会。由于她积极从事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斗争，侵略者多次在公众面前对她实行鞭打，并多次被抓捕入狱，在德布拉贝尔汉（Debra Berhan）地区的一些战役中，她还差点牺牲。莎瓦拉加德·格里在意大利军队的报复行动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后来，在意大利侵略军即将失败的时候，她在混乱中去世。

尽管意大利侵略军不断进行报复活动，但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正教教会精神鼓舞和团结一致的作用下仍然进行着反抗。意大利人企图建立一个与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相对抗的教会，于是他们开始对穆斯林社区打主意，因为穆斯林要求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意大利资助伊斯兰教，以便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替代埃塞俄比亚正教思想意识的理论基础，并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体制上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派别。这一政策在哈拉尔和季马地区的伊斯兰教高等学校中所建立的殖民统治机构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意大利在入侵和占领埃塞俄比亚期间暴行累累，罄竹难书，他们将被俘人员不经审判就执行枪决，对埃塞俄比亚正教的主教们和被称为“巫师医生”的非基督徒贵族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还有一些受到惩罚的人群被遣送到恩科贝尔（Ankober）等边远地区，被侵占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在试图刺杀格拉奇亚尼失败之后，法西斯黑衫党在亚的斯亚贝巴及其周围地区的城镇为所欲为，许多著名历史建筑被毁，其中包括孟尼利克二世时期建造的圣乔治大教堂。

有大约300名曾经受过教育并得到塞拉西宠爱的新一代埃塞俄比亚青年知识分子被处以死刑。有人认为，这消失的一代使现代埃塞俄比亚思想和政治历史中断了。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这消失的这一代还活着，他们一定能够解决埃塞俄比亚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二

战以后，埃塞俄比亚境内高傲自大的有一定影响的老一代人与反对意大利侵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革命性的新一代之间发生的冲突全面爆发。有人统计说，意大利侵略暴行所造成的埃塞俄比亚人死亡总数大约为25万左右，但是战后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制造的灾难所带来的死亡人数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工程

81 在占领埃塞俄比亚的5年期间，意大利人废除了埃塞俄比亚的许多政府机构，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当局认为更加现代化的机构。事实上，这种新的管理形式更加有利于意大利剥夺该国的财富以及利用尚未开发的经济潜力。墨索里尼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大量的意大利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定居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心地带，他认为，这些人可以在埃塞俄比亚从事矿物资源的冶炼工作，可以帮助他把该国农业部门变成意大利的“粮仓”。同时，意大利殖民当局还限制埃塞俄比亚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废除了束缚加布贝尔（*gabber*）农村劳动力的当地土地占有制，同时为埃塞俄比亚欠发达的经济注入大量资金，并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意大利做了最大努力，但到1937年11月为止，事实证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及安抚政策还是以失败告终。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殖民统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殖民统治当局官僚阶层的腐败。埃塞俄比亚战败以后，意大利从该国银行没收了170万玛利亚特里萨泰勒元（Maria Theresa thalers，埃塞俄比亚货币单位），意大利驻埃塞俄比亚军队总司令巴多格里奥将军（Badoglio）一个人就贪污了其中的将近一半。

正是由于以上及其他一些问题，意大利驻埃塞俄比亚总督格拉奇亚尼元帅（Marshall Graziani）被招回，殖民政府也颁布了新政策。很多关满了埃塞俄比亚犯人的集中营被关闭，同时又实行了一些新的安抚政策。作为新政策的组成部分，工业部、商务部和农业部都制订了新的经济发展规划。意大利政府希望定居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家庭

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以监管当地和移民劳动力并实现扩大经济作物产量用以出口的目的。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投资是意大利殖民地现代化规划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油厂、面粉厂、木材加工厂、纺织工厂和水泥生产厂。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现代殖民规划投资还有新铺的公路、从意大利进口的小汽车和卡车以及与该国现代交通的维护和服务相关的新技术。在有些地方，例如哈拉尔、吉林马、贡德尔和亚的斯亚贝巴，有些埃塞俄比亚民族式建筑也被打上意大利式的标记。意大利殖民地部帮助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城市及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修建了低成本的住房，同时在这些城市首次得以实现了规模化的城市供电。尽管在意大利的殖民人员与埃塞俄比亚居民之间发生了多种形式的职业性或私人性的联姻，但是种族隔离的政策还是迫使公共设施分开，这就给种族之间的联姻设置了障碍。事实证明，意大利的殖民计划是一个极具野心的计划。使意大利人到埃塞俄比亚定居的农业规划最终取得了有限的回报，殖民当局不得不依赖于谷物的进口。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和占领使意大利征兵将近 50 万人，结果在战争中有 15000 人阵亡，20 万人受伤。根据埃塞俄比亚官员的估计，到战争结束时，有近 76 万名埃塞俄比亚平民在这次侵略过程中失去了生命。

82

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许多土著政府卫兵对意大利控制帝国的中心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西达莫的拉斯塔·德斯塔·达姆特乌（Rasta Desta Damtew，阿鲁什的贝乔郎德·菲克雷·塞拉西（Bejorond Fikre Selassie）、和巴里的德加斯马特克·贝耶恩纳·梅里德实际上都长期控制着当地的统治。一些爱国者自动组成抵抗群体，例如加拉地区的巴拉姆巴拉斯·阿贝贝·阿雷加伊（Balambaras Abebe Aregai）和季马·塞姆贝特（Gimma Sembete），哈拉尔的菲特乌拉里·巴伊德（Fitwrary Baide），萨巴巴的布拉塔·塔克利（Blatta Takele）等。但是，反对意大利侵略运动中最具有组织性的知识分子爱国组织叫做“黑狮”（Black Lion），该组织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埃塞俄比亚社会精英人物，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仅对无法享用本国基本现代物质必需品不满，而且寻求变革埃塞俄比亚的军事防御基础设施。黑

狮组织的领导人有：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兽医阿拉马瓦尔克·巴伊亚纳博士（Alamawarq Bayyana）、亲英分子法恰达—塞拉斯·赫鲁伊（Faqada-Sellase Heruy）、本亚姆（Benyam）以及埃塞俄比亚驻伦敦公使的儿子尤塞夫·瓦尔切那纳（Yosef Warqenah）。该组织发表了10条宣言，号召进行全国抵抗意大利侵略并复兴埃塞俄比亚社会。黑狮组织的法规包括：政治需要高于军事命令；优待俘虏；不欺负农民；禁止实行流放制度；宁可自杀也不被敌人逮捕。该组织的成员向塞拉西皇帝时期饱受指责的首领伊姆鲁（Imru）提出，该组织及其领导人应该接受更加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概念，如果他接受他们的想法，就把该组织的领导权交给他。但是，伊姆鲁在1936年12月被迫向意大利投降，而且一直到死他也没有被释放。后来，科弗利·纳西布（Kefle Nasibu）和巴拉伊·海拉—阿布（Balay Hayla-Ab）担任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几个毕业于塔法里马康南学校的入伍军人后来成为霍拉塔军事学院（the Holata Military School）的教官。尽管他们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黑狮组织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建树不多。然而，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他们在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的斗争中都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这个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巴沙维拉德·哈布塔—瓦尔德（Bashahwerad Habta - Wald）、法恰达—塞拉西（Faqada-Selassie）、本亚姆（Benyam）、尤塞夫（Yosef）、科弗利（Kefle）和巴拉椅（Balay）等都被逮捕，并在刺杀意大利总督罗多尔佛·格拉奇亚尼元帅未果后被就地处决。

83

尽管祖国遭受了沉重的灾难，还是有一些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名流，帮助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侵略，例如阿法瓦尔克·加布拉—伊耶亚苏斯（Afawarq Gabra-Iyyasus），作为一个埃塞俄比亚驻罗马的外交代表和知识分子，自始至终热心地为意大利殖民当局卖命，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发展创新上，他们干得更加起劲。还有一些埃塞俄比亚著名人物，包括布拉·瓦尔达—吉尤尔吉斯（Blatta Walda-Giyorgis）和瓦尔达—尤汉内斯（Walda-Yohannes），也对意大利表现得忠心耿耿。另外，还有一些人为意大利殖民当局提供了服务，包括前埃塞俄比亚皇

帝秘书恰格纳兹马特克·塔克拉—马尔丘斯·瓦尔达—加布雷尔（Qagnazmatch Takla-Marqos Walda-Gabrel）、埃塞俄比亚前任外交官布拉特恩·杰塔·瓦尔达—马尔亚姆（Blatten Geta Walda-Maryam）和贝尔哈纳·马尔丘斯（Berhana Marqos），还有前国家高级官员布拉塔·艾亚拉·加布雷（Blatta Ayyala Gabre）和巴拉查乌·加马纳（Balachaw Jamanah）。有一个思想流派把这些背叛者描述成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的侵略是要在埃塞俄比亚完成文明使命，并以此来追求自我发展的目标。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被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进步外表误导了，一旦他们意识到殖民统治当局的真正使命，他们便成为悲剧性的人物并处于自我矛盾之中，他们极力追求进步和现代化改革，而这种进步和改革却是沿着错误和背叛的道路而进行的。

然而，绝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爱国者和忠于皇室的人一直坚持反对意大利永久占领的观点。由将近30万名爱国者所开展的游击战迫使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占领有点变成了意大利人疲于奔命地自我防护。埃塞俄比亚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也都在他们的战后作品中广泛描述了他们国家遭受法西斯蹂躏的经历。其中包括杰尔马切乌·特克拉—哈瓦尔亚特（Germachew Tekla-Hawaryat）、阿托·维尔德—吉尤尔吉斯·维尔德—尤汉内斯（Ato Welde-Giyorgis Welder-Yohannes）、塞内杜·杰布鲁（Senedu Gebru）和阿泽法·杰布雷马里亚姆（ASeffa Gebre-Mariam）等，其中还有一些作家为口头流行的传统歌曲和抗战歌曲提供了文字版本。埃塞俄比亚的首相比特沃德·马科恩内恩·恩达尔卡特切乌（Bitwodded Mekonnen Endalkatchew）还出版了一本小说，特别描述了在意大利侵略和占领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

尽管埃塞俄比亚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阶级没有在特姆比恩战役（Tembien）和梅切乌战役（Maichew）中获得巨大胜利，但是在战争末期还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该组织主要由低层土著行政管理人员组织，当地语言称他们为巴拉巴特（balabat），这些人都是从附近农村招来的。这个阶层还包括贵族家族的部分成员。另外还有一个社会精英人物组成的组织，他们的动机是废除和改革他们认为是埃塞俄比亚

政治体制中复兴古老制度的那些机构。在这个组织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新建立的霍拉塔军事学院和法国圣基尔的毕业生。对国内改革的渴望被一个新的定义所代替，那就是全国利益依赖于战后获得的救助和对埃塞俄比亚主权的承认。还有人强调说，全国范围的对意大利侵略的反抗最终使这次侵略成为埃塞俄比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

84 然而，这并没有减轻意大利的入侵给埃塞俄比亚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国家利益上看，那场战争都对埃塞俄比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和结构上的影响。

尽管意大利和欧洲的很多媒体对意大利在非洲东北部的暴行没有进行充分报道，但是依然有其他国际出版物对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极为关注。由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创办并编辑的《新时代与埃塞俄比亚新闻报》（*the New Times and Ethiopian New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潘克赫斯特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英国政体的批评家，她主张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在此后那余下的 40 多年的生涯中，她一直致力于埃塞俄比亚的事业和其他反法西斯斗争中。她一直支持埃塞俄比亚，也只有埃塞俄比亚能够成为非洲保持独立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还获得了欧洲自由媒体的支持，尤其是宗主国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莫登·罗伊登（Mauden Royden）、英国下议院议员维尔弗莱德·罗伯特（Wilfred Robert）。但站在斗争最前线的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除了 1935 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文化史》（*Ethiopia, A Cultural History*）之外，她在 1936 年又发行了周报《新时代与埃塞俄比亚新闻》，该报纸发行了近 20 年时间，发行量最多时一周销售了 4 万份，在西非和西印度群岛广泛流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和离散到世界各地的非洲人都真诚感谢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为恢复埃塞俄比亚独立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先是反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接着是反对战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图谋。美国学者 W. E. B. 杜波伊斯认为，正是潘克赫斯特引导黑色的埃塞俄比亚走上了白色英国的发展道路，也是她为流亡之中的埃塞俄

比亚皇帝提供了避难之所，还是她使英国人民意识到黑人也是人，而且是越来越被作为拥有男女平等权利的人来看待。①

在流亡英国期间，海尔·塞拉西皇帝一直坚持不懈地争取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他的事业，然而，直到1940年6月意大利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站在了德国一边，他才获得了有限的成功。随着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英国提出了一个新的军事计划，那就是盟国的军事力量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力量联合行动，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苏丹和南非的军队，还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士兵。军事行动的第一个使命主要是驱逐在埃塞俄比亚和英属索马里兰的意大利军队，英属索马里兰在1940年被意大利军队所占领。第二个使命是消除意大利对英国的另一殖民地苏丹的威胁。这两个军事任务由“英国—埃塞俄比亚军事使团”（the Anglo-Ethiopian military mission）领导人奥尔德·温盖特（Orde Wingate）上校指挥。作为军事平衡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爱国者也可以通过英国殖民地肯尼亚和苏丹进入埃塞俄比亚。

85

海尔·塞拉西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成为战斗中的皇帝，尽管那是一个变形的现代主义者形象。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治形象，在流亡期间，他充分利用广播和向埃塞俄比亚散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各种小册子、报纸、口头传播、传记、爱国歌曲和诗歌的宣传帮助下，埃塞俄比亚不仅代表新的事业为取得胜利打开了通行之门，复兴了历史，而且吹响了国家团结和发展之号角。

1941年1月20日，海尔·塞拉西回到埃塞俄比亚的戈贾姆，并立刻着手将当地各种不同的反抗组织纳入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到当年年末，埃塞俄比亚军队取得了与意大利军队争夺领土控制权的几个战役的胜利。但是，皇帝依然面对着来自国内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来自当地那些领土收复主义者所领导的土著人部队，当时，许多土著起义者乘乱重新结成政治联盟，试图实现重新称霸一方的野心。

① 玛丽·戴维斯：《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在激进政治中的生活》，伦敦：普鲁托出版公司，1999年版。

1941年5月，英国—埃塞俄比亚联军帮助海尔·塞拉西皇帝返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还寻求并取得了英国的有限援助，用来镇压分散在埃塞俄比亚帝国各地的国内政治阴谋集团。作为新政策的一部分，塞拉西在1942年1月与英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后来证实这又是一个在语言上存在争议的协议，因为该协议表明了一种新的不平等的国家关系。英国在埃塞俄比亚摆脱意大利统治的独立战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对战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塞拉西强调，埃塞俄比亚不想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埃塞俄比亚在1942年签订的协议中给予英国对其财政、行政、领土完整以很大的控制权，英国政府也确实从该协议中获得了外交特权，但这次是以作为“顾问”的角色来评判埃塞俄比亚主要行政部门的运行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对等关系，英军驻东非总司令也将接替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一些职责，其中包括空中管制权、对外宣战权和国家紧急状态宣布权。

在1944年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签订第二个英埃协议时，塞拉西皇帝是可以对第一个协议进行一定的修改，以便重新获得他的大部分权力的。两国间签署的这个新协议也保证埃塞俄比亚拥有委派其驻外代表的权力。与外交问题高度相关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有条件地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可以利用该铁路进行对外贸易以及用于国防的武器运输。按照新协议的规定，埃塞俄比亚军部同意其军队在英国驻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BMME）的监管之下，由该代表团负责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日常管理。英国政府也开始控制在厄立特里亚和欧加登的埃塞俄比亚领土。厄立特里亚则被分割开来，其低地地区与苏丹合并，因为这两个地区相连接，种族和宗教信仰都有相同之处，而以基督徒为主的高原地区则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至于欧加登，则将被附加到英属索马里兰和前意大利索马里兰地区，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大索马里。这些决定不仅使意大利占领期间所确立的行政划分永存性地保留下来，而且使埃塞俄比亚最终没有出海口，并且埋下了将来国内出现政治民族统一主义和种族冲突的种子。

86

英埃协议的批评家们认为，尽管英国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的

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英国寻求以更加复杂的殖民关系取代意大利。应该承认，1885—1939 年间在非洲东北部，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是现代非洲国家在所谓的欧洲殖民主义的“最高峰时期”（high noon）所面临的挑战与困惑的一个例证。

在二战期间发生的那些事件背景下，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以一个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该军队中以省为基准的旧式等级结构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新型军事原则和职业化现代部队。一个强大的国防军得以建立，这也是裁减各种游击队的目标之一，那些游击队都想利用社会和政治混乱局势来达到加强自我和扩张领土的目的，而在那些反叛的队伍中有许多人被合并到国防军。埃塞俄比亚还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英国在条约中保证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以训练和组织一支执行战后社会和政治重建的职业队伍。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 1941 年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结束以后，无论是从实际上看还是从理论上讲，埃塞俄比亚社会都失去了一些重建的机会。二战加快了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现代化如同提高迅速增长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一样，不但是传统社会的需要，也是该国家唯一的需求。然而，在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进程中，总是有一个重要的矛盾相伴随，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矛盾再次出现。在倡导批评与独立精神的埃塞俄比亚社会精英中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他们中的一些人承诺将以革命的方式转变人们的生活条件，而另一些人则是受过教育的贵族组成的集团。前者主要由具有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人所组成，多数人相当于独立派地主阶级；后者是由拥护塞拉西皇帝的人所组成，塞拉西更倾向于最低纲领主义者所提出的主张，即由中央集权的皇家王朝来改革埃塞俄比亚这个专制主义国家。受过西方教育的贵族后来由于没有承担起改革者的责任而遭到谴责。1935 年法西斯的入侵结束了改革者与仁慈的现代独裁皇族统治者之间的合作。也正是由于意大利的入侵，许多埃塞俄比亚的知识分子被杀害或者被流放。而对于那些得以活命的人来说，生存仅仅意味着要忠诚地服从政府的新规定和致力于为国家献身，而不是对社会和国家政治提出批评。然而，这些国内事件的发生与国际政治和

87

外交关系的演变也是密切相关的。

战后埃塞俄比亚：重建、调整与复兴

尽管法西斯在战争期间的暴行遭到一些组织的多方面谴责，但是国际联盟并不知道埃塞俄比亚广大平民遭到了镇压。只是1940年意大利参加二战之后，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暴行才成为国际法庭考虑的议题。在欧洲，许多当时支持埃塞俄比亚的人最后都屈服于现实政治，这种政治更加重视横贯大陆战略，按照其中某些人的看法，欧洲国家将要建立的种族主义联盟也包括意大利。人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二战后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政府的外交部长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作为后来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埃尔—贝克在成为工党议员后即刻停止了他为埃塞俄比亚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他赞同英国外交部的一些指示，这些指示都对意大利发动战争的罪行避而不谈。

正如前文所述，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成为国际主义者反殖民活动和争取国内民主权力以及在非洲、欧洲和美洲开展的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催化剂。历史学家约瑟夫·E. 哈里斯（Joseph E. Harris）认为，意大利的侵略导致国际上支持埃塞俄比亚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遍及美国、加勒比地区、欧洲和非洲，这些支持者拥有共同的身份，伴随着战后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发展，压在非洲人民肩上的种族和殖民压迫减轻了。侵占埃塞俄比亚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也使很多黑人知识分子对欧洲自由主义的承诺表示怀疑，尤其是欧洲共产党的那些誓言，当苏联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禁止各国与法西斯意大利进行战争物资贸易的法令时，这个问题就昭然若揭了。泛非主义者和黑人活动家，包括“全球黑人改善联盟”（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UNIA）领导人马尔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都认为欧洲对埃塞俄比亚所处困境的冷漠态度是现代种族歧视主义的产物。还有一些学者型活动家，比如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拉斯马康南、乔莫·肯

亚塔（Jomo Kenyatta）和 I. T. A. 华莱士·约翰逊（I. T. A Wallace Johnson），他们都对 1937 年“国际非洲服务署”（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rvice Bureau）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并且对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发挥了推动作用。他们认为，团结是全球民主化的一个必要前提。其他一些反殖民主义组织，例如马科斯·耶甘（Max Yergan）领导的“非洲事务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African Affairs），在一些社会活动家、艺术家和学者保罗（Paul）以及埃斯兰达·罗伯逊（Eslanda Robeson）的帮助下也对埃塞俄比亚自由运动呐喊助威。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不仅请求美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事务中更加积极，而且还强调了苏联的集体主义安全应用于现代黑人国家的虚伪性。作为埃塞俄比亚历史中有关非洲大离散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某些激进的黑人学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偏离了人类进步的轨道，而是西方文明进程本身的逻辑发展。他们的组织把法西斯看成与奴隶制、帝国主义和现代化初期就已经存在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血肉相连的产物。因此，他们号召建立一个国际的和种族内部的联盟来解决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某些并不很确切的矛盾。 88

在结束流亡生涯之后，海尔·塞拉西重新成为非洲之角的国家领导人，这主要依靠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因为他们视塞拉西为英国在非洲之角地区的战略伙伴，尽管这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伙伴。在意大利投降、墨索里尼死亡、法西斯在欧洲的统治结束之后，以英国为首的盟国接受了意大利加入盟国的请求，但对埃塞俄比亚要求赔偿的声明却充耳不闻。在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新成立的联合国建立了“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War Crimes Commission），但是埃塞俄比亚是唯一被排除在外的西方同盟国的成员。1946 年 7 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展了旨在要求意大利对其战争罪行进行赔偿的外交活动。这次活动以一封重要的外交通讯为开端，其目的是要人们注意欧洲并没有按照外交章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办事。

然后，埃塞俄比亚又呈递了一个条约草案，该草案的第37款要求，“意大利必须归还他们自1935年10月3日以后从埃塞俄比亚掠走的所有艺术作品、宗教物品和具有历史价值一切物品”。国际组织接受了这个条约，但是，国际组织只从总体原则上受理战争犯罪问题，对埃塞俄比亚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具体的说明。除此之外，有关战后埃塞俄比亚问题的条约仅仅局限在意大利、苏联、英国和美国这四国的大使之间进行商讨而没有埃塞俄比亚代表参加。

埃塞俄比亚列出了对这种情况多处不满的清单，随后将其通报给在纽约的联合国秘书长、在柏林的国际军事法庭和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英国公使。在美国顾问约翰·H. 斯潘塞（John H. Spencer）教授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要求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在1946年正在商讨有关与意大利签订和平条约文件时注重这样两点：1. 对埃塞俄比亚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那天开始的；2. 诸国接受“后限制”（postlimitium）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在1935年意大利发动侵略战争开始之前和开始之后，埃塞俄比亚始终对本国事务行使主权，这是条约所肯定的。那么根据这一原则，一旦敌国的占领结束，别国不应干涉该国的存在及事务。根据第二个要求，埃塞俄比亚努力寻求收回其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包括解除被意大利强加给埃塞俄比亚的和后来被英国及其盟国延续下来的一些法规和控制权。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游说活动中进行了一些相关问题的国际对话和谈论，根据这些国际探讨，对意大利的和平条约应该包括两项关于意大利侵略暴行的条款。但是，对埃塞俄比亚来说，新的障碍又出现了。

按照计划，1947年应该是签订条约的最后期限，埃塞俄比亚始终面临来自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列强的障碍，他们或者反对埃塞俄比亚的要求，或者是犹豫不决。而埃塞俄比亚在欧洲同盟国中有关战争犯罪处理的问题上只有少数的几个支持者，包括奥地利、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对相关案件的审查工作只给了五个月的时间，另外，审查委员会还不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暴行是种族灭绝的罪行，

他们认为用大量谋杀的罪名更合适。这种不同的说法一方面使意大利避开了多种罪名，另一方面给埃塞俄比亚外交和司法代表的活动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由于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在裁定准备期间只好从盟国调集了大量评审人员和团体，埃塞俄比亚政府也被迫只能提交有限的几项指控。最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委托其发言人男爵埃里克·雷尔琼胡福武德将军（Baron Eric Lerjonhufvud）对意大利提出了10项指控。经过讨价还价后终于签订一个条约。如果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提出的针对埃塞俄比亚公民的犯罪行为，则必须通过一个主要由欧洲法官组成的法庭来进行审判。在50名战争嫌疑犯中，有10名被正式以“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罪名提起控诉，他们是：

1. 皮耶罗·巴多格里奥元帅（Marshall Pietro Badoglio），侵略期间的意大利军队总司令

2. 罗多尔佛·格拉奇亚尼元帅（Marshall Rodolfo Graziani），意大利驻索马里部队指挥官，后来为意大利东非总督和埃塞俄比亚总督

3. 阿雷桑德罗·雷索纳（Alessandro Lessona），在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期间里为负责殖民地事务的意大利国务秘书

4. 吉迪·科特西（Guide Cortese），格拉奇亚尼大屠杀期间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国家法西斯党联合秘书

5. 古戈里耶尔莫·纳西将军（Guglielmo Nasi），意大利哈拉尔总督

6. 阿雷桑德罗·皮尔奇奥·比罗利将军（Alessandro Pirzio Biroli），曾任意大利阿姆哈拉总督

7. 卡尔罗·杰罗索将军（Carlo Geloso），加拉—西达莫总督

8. 塞巴斯提亚诺·加里纳将军（Sebastiano Gallina）

9. 鲁格罗·特拉奇亚将军（Ruggero Tracchia）

10. 恩里考·塞鲁利（Enrico Cerulli），意大利外交部东非事务政治办公室主任，政治事务处处长，意大利东非副总督　90

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公开出版了一个两卷本的文献汇编，名为《意大利法西斯的所谓文明》（*La civilization de l'italie Fasciste*），该文献汇

编的内容中有翻译成法文的一系列法西斯电报命令，这些命令足可以构成“战争犯罪”，其中包括：使用毒气；大规模屠杀战犯；枪杀“巫医”和“占卜者”；杀害德布雷里巴努斯修道院（Dabra Libanos）的埃塞俄比亚修士。该出版物的内容中还有战争受害者的口述证明、意大利处决埃塞俄比亚人时的照片等。

然而，以英国为首的盟国对埃塞俄比亚指控意大利案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在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殖民统治当局中官职等级复杂的情况下，要认定究竟是谁下令屠杀埃塞俄比亚人和袭击国际红十字会驻埃塞俄比亚工作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美国对意大利的侵略实行双重标准的政策，使得埃塞俄比亚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制订适应当时形势的新措施，因为目前的这种形式会影响对非欧洲人在现代国际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埃塞俄比亚同时受到来自英国的压力，英国是四大列强中唯一与埃塞俄比亚签订战争条约的国家。最后，埃塞俄比亚决定减少它所提出的战争赔偿要求，请罗马会议的四国代表代替他们处理相关事宜，但这也被以技术问题不好解决为借口所拒绝。留给埃塞俄比亚的只有一条路可选择了，那就是与意大利政府直接交涉。埃塞俄比亚不仅面临着西方列强舆论上双重标准的压力，同时还遭到意大利媒体的强烈反对。尽管埃塞俄比亚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所有目标，但是由于埃塞俄比亚的斗争，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被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冠以反人类罪的国家。有人指出，正是由于埃塞俄比亚采取这些行动才使盟国没有抛弃跟随欧洲的这个非洲伙伴，才使得人们认识到意大利于 1935 年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实施的暴行与 1939 年 9 月开始的欧洲大战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政治活动家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责怪埃塞俄比亚没有对英国在战争中对非欧洲人民犯下的少许罪行进行追究。

尽管巩固帝国主义政治统治的机会相当大，但在埃塞俄比亚退出二战时所面临的是意大利占领后留下的非常脆弱的行政结构。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些埃塞俄比亚人，包括提格雷首领古格萨（Gugsa）和古吉贾姆首领海鲁，他们都曾经与法西斯勾结在一起，此外，古格

萨还对没有成为提格雷王而心怀不满。这两个领导人都是海尔· 塞拉西离间政策的牺牲品，但这种离间政策并没有对其他一些集团实施，例如游牧部落（cattle raiders）拉亚（Raya）和阿泽波（Azebo）。因此，古格萨和海鲁在梅切乌（Mai Chew）袭击了皇帝正在撤退中的军队。在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斗争中，除了那些反抗组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还有许多民众进行游击战争，反对埃塞俄比亚在外国人统治之下。在古吉贾姆，抵抗力量由首领伊姆鲁、首领德斯塔、阿贝贝·阿雷盖（Abebe Arregai）和贝莱·塞雷克（Belai Zelleke）的军队组成；在贝戈赫米迪尔（Beghemidir）进行反抗斗争的则是的阿莫拉乌·武比内（Amoraw Wubineh），另外还有德加斯马特克·沃德沃森·卡塞（Dejazmatch Wondwossen Kassa）、德加斯马特克·阿斯法乌·沃森·卡萨（Dejazmatch Asfaw Wossen Kassa）、维罗的主教（Wello）、阿布内·佩特罗斯（Abune Petros）和一大批农民知识分子。由于这么多埃塞俄比亚人强烈反对外敌入侵，意大利从未完全控制这个仅35万平方公里的主权国家。

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牺牲的许多埃塞俄比亚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他们都是作为海尔·塞拉西的现代独裁政府的中坚力量而培养的。但是，塞拉西通过他在为战略撤退而流亡他乡之前积极参与了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斗争，从而维护了自己作为埃塞俄比亚还存在的象征这一政治形象。他还在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通过反对意大利入侵的一系列战役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声誉，然后，他又致力于反对欧洲列强企图肢解其祖国的斗争。其中，塞拉西的后一个成就更为显著，因为在非洲的绝大多数欧洲殖民官员和军官都怀疑，在那样一个帝国主义对非洲大陆虎视眈眈的时期，非洲怎么会出现一个独立非洲的声音。随着欧洲势力的衰落，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世界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

1943年，在美国军队解放意大利南部的时候，美国人曾经帮助那里建立了一个政府，该政府的首脑就是前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总督陆军元帅巴多格里奥（Field Marshall Badoglio）。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都是要将“自由世界”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正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使非洲离散者政治烟消云散。非洲离散者集团曾经扩大了埃塞俄比亚危机，使之摒弃了真正的和想象当中的地方主义和反对授权的观念，但是由于有了杜鲁门主义，埃塞俄比亚国内反对美国政策的主张受到了限制，或者不再进行了。另外，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主要延伸到欧洲的殖民国家，同样也忽视了非洲国家和跨国利益。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在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侵略战争中萌发出来的一些思想和情感后来成长壮大并对 1945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的泛非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那次峰会上，非洲离散者协会要求结束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而且还要求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实施经济重建计划。但是不久就形成了的冷战政治造成了新的裂痕，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上形成了新的联盟，埃塞俄比亚、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与冷战的某一个方面具有难以割断的联系。

1941 年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统治的结束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分离主义运动，那场运动以厄立特里亚统一会成员为先锋，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展起来。另一方面，争取厄立特里亚独立的运动也强有力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在穆斯林群众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按照 1952 年联合国的解决方案，厄立特里亚应该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这也是为了调节双方对立的一个折中办法。埃塞俄比亚在二战中的经验使海尔·塞拉西更加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全球政治领域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由于他对战争中英国控制埃塞俄比亚国家的行政和财政极为不满，因此这位皇帝后来转向了美国，试图以美国取代英国作为埃塞俄比亚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帮手。由于美国成为世界上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新霸权国家，英国逐渐放弃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控制。

1941 年和 1943 年，海尔·塞拉西分别与美国签订了两个租借法案，通过这两个法案，亚的斯亚贝巴在 1944 年引进了第一架运输用飞机；次年，埃塞俄比亚又与跨大陆西部航空公司（Transcontinental

92

Western Airline，TWA）签订了一份协议，成立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hiopian Air Lines，EAL）。在这个协议中，跨大陆西部航空公司承诺为埃塞俄比亚提供经理和管理人员，为期30年。但是埃塞俄比亚更感兴趣的是使飞机国产化，1971年，一个埃塞俄比亚人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国内航线的开辟不仅使全国成为一体，而且推动了农产品的运输。

1953年，埃塞俄比亚与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公约保证美国在为期20年的时间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2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时，印度、瑞典、以色列和苏联也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援助，军事援助不但可以使埃塞俄比亚保持独立，同时也可以使之镇压国内的叛乱。在海尔·塞拉西皇帝恢复统治之后，他继续推行早期提出的加强中央集权并削弱贵族权力的政策。但是，他为现代化进程所作的早期努力与其说具有积极影响还不如说具有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战后的改革提高了这个官僚帝国潜在的控制能力和防御能力。那些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巨大能量的“巨人”（big men），当地语言称之为特雷克萨瓦克（telek sawach），在这个时期都被大大削弱了，如果这种集团想继续生存下去，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在经济上做出让步。因此，他们当中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对大行会的控制权，放弃私人军队和地区自治权。

塞拉西在帝国行政部门结构中的改革主要是推行了三项措施：

第一，他建立了一支在他完全控制之下的由英国培训的常备军，从而使地方武装及其指挥官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

第二，他建立了一个由财政部直接管辖的财务系统，从而结束了教会向农民阶级，尤其是加布贝尔（gabber）征收的许多税种和劳工摊派，由那些领取工资的财政部公务员征收来税款以新流通货币直接进入国库，这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做法使政府官僚专业化了，并在理论上剥夺了地方行政官员可以从他们所管辖公民身上获取大量物资和服务的垄断权。行政官员不但能够依靠他们每个月的工资过活，而且还有些人靠他们的私人土地从佃户那里收缴的租金过活。

93

在1941年和1961年之间，埃塞俄比亚政府大规模修改了税收法，

想借此增加国家的农业收入并提高农业产量。但是人们认为，塞拉西试图进行的土地改革由于他当初削弱贵族阶级特权的失败而严重受挫。农民耕种的土地需要交税，但是贵族拥有土地却不用交税。结果，政府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国家征收土地税的能力上而不是如何发展生产上。在新的土地拥有权体制下，佃户成为牺牲品，被驱逐成为家常便饭。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最沉重的税收负担都加在农民身上，这种情况在南方表现得尤为严重，因为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农民。1945 年，按照政府的一项法令，无地者和失业者都可以从政府得到至少 20 公顷用于自己耕种的土地（但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可是，传统贵族继续控制着土地改革的进程，农民要么得不到任何补偿，要么由于缺乏资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随着农业商品化和外国资本的注入以及外国的技术支援，一些当地企业家，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或者是商人子女，他们年轻而且受过教育，有能力投入一定的资金来加入新的投机行业当中。

第三，对省级地方行政官员进行了重新组织，目的是削弱贵族的权力和限制当地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各级行政官员都进行了重新配置，并成为国家内政部的雇员，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按照工资高低不同而配备不同的助手，包括办事员和秘书。

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事件中，海尔·塞拉西为求得政治生存而过分依赖于国际联盟和欧洲军队。因此，这位皇帝自己登上了西方列强的列车，而到了冷战时期，他却又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国家自治。海尔·塞拉西曾经出访 7 次，1954 年第一次出访华盛顿，并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次访问期间，他以个人名义对美国给予埃塞俄比亚物资援助的数量不多表示遗憾，埃塞俄比亚从美国得到的主要是军事援助。在美国否认曾经许诺帮助建设尼罗河流域的埃及阿斯旺大坝（Nile-fed Aswan Dam of Egypt）后，埃塞俄比亚转向了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在这一过程中宣布很可能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政策。

94

有些学者把埃塞俄比亚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按意大利人侵前和入侵后两个时期分成两大类。其中早期知识分子把皇帝孟尼利克和塞拉

西看成是守护神和盟友，而后期的知识分子把特沃德罗斯皇帝看成是激进的现代主义先驱。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Bahru Zewde）认为，2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股势力：（1）他们希望组成有序政府，用当地语言说叫做塞尔阿特（ser'at），即通过法律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宪法来实现社会正义和平等；（2）他们想在埃塞俄比亚消灭贫困，其途径和手段是成为自己产品的拥有者和自己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他们要求税收制度公平合理，建议把土地还给农民，他们赞同后来革命者们提出的主张，认为加布贝尔和缴纳贡赋的农民是进步的主要障碍；（3）他们想在宗教和世俗社会都确保公正与平等。塞拉西的现代化规划始终建立在受教育的社会精英的培养上，在这些人中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占绝大多数。

在二战结束以后，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城镇和城市规划得到稳定发展，尽管只有亚的斯亚贝巴和红海沿岸的一些港口城市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有史以来一直是埃塞俄比亚主要经济活动的农业生产受到高度重视，因为政府决定大力提高国家的农业收入并鼓励农业商品化。但是，当地的企业家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极少数埃塞俄比亚人有能力在农业投资，他们都来自富有的贵族和皇室家族。国外的投资者也被邀请来埃塞俄比亚共同发展城镇工业。

到20世纪50年代，埃塞俄比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这些知识分子渴望现代化所带来的裨益，比如民主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虽然数量有限，但是与其先辈们不同是，这个受过教育的群体来自不同的种族，尽管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仍然占绝大多数。1957年，海尔·塞拉西皇帝以一系列的成就对他27年的统治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国家第一部宪法的颁布、第一次大选的实行、公民健康福利事业的开创以及教育规划的实施等。但是，埃塞俄比亚的下层商人和手工业者不仅在收入和地位上都低于受过教育的政府工作者，而且他们还占据人口的大多数。无论是下层商人还是小手工业者，对政府的影响都十分有限，在这个时期，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投资活动，关注外国人的投资。消灭陈旧的帝国主义社会秩序也不是件容

95 易事。大多数熟练手工业者都来自少数种族集团，有着不同种族背景的工人和非熟练劳动力总体上看还生活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

在此期间，塞拉西皇帝被指控在他改革政策中忽视了埃塞俄比亚特有的“国家问题”。埃塞俄比亚帝国从古以来就是由很多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别的不同种族集团组成的，在 19 世纪初期和 20 世纪中期的领土扩张中，这些不同的种族根本没有在政治上融入这个国家。尽管对埃塞俄比亚国家统一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阿姆哈拉文化集团的统治地位还是从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机会的差别中反映出来。

1960 年 12 月 13 日，在皇帝出访的情况下由帝国卫队司令官门格斯图·内韦（Mengistu Neway）领导发动政变，政变的参与者还有警察头目、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家庭都有行伍背景。这次政变一开始取得很大成功，叛军逮捕了皇室王子和 20 多个内阁大臣，还有其他一些政府领导人。他们发布了一个宣言，声称要建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将为大众改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政变的策划者与皇室王子阿斯法瓦桑（AsfaWassan）交好，据说该王子与他的父皇不和。政变政府要取得教会的承认，必须先获得皇室王子的支持。由叛军首领领导的帝国卫队先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的战略要地，包括全部交通中心。然后，由王子任命了新的首相，并通过广播宣布，这次政变仅仅是结束 3000 多年不平等、贫穷和无知的手段。他还承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并最终实现多党竞争制。然而，这次政变组织不力，叛军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战略优势，甚至没有控制整个首都。这种不利局面使叛军丧失了斗志并意识到厄运即将来临，于是，他们在枪杀了几名政府官员后逃进了山区。当塞拉西皇帝乘坐的专机在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Asmara）着陆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个地方由一个衷心宣布忠于皇室的军官所控制。但是，这次政治事件预示着更大挑战在等待着海尔·塞拉西皇帝，新的挑战将来自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和迅速增加的劳苦大众知识分子和迅速增长的广大贫苦人民。

有些学者曾经认为，由于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埃塞俄比

亚的知识分子遭受了很多痛苦。在战争期间，他们被法西斯大量杀害；在战后，由于政局不稳和社会的动荡，幸存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重视，按照学者梅塞·科贝德（Messay Kebede）的说法，到海尔·塞拉西从海外流亡回归并由英国支持重掌皇权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已经失去了它的自由和主权，尽管爱国者们对此表示怀疑。有人认为，在这个时候，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全球帝国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进入这个链条越快，取得真正现代化改革的机会就越少。还有的评论家认为，与埃塞俄比亚不同的是，塞拉西现在所依靠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很大灵活性，他们可以进行积极的改革，也更有利于社会精英人物的复兴活动，因此这些国家才得以存在下来。尽管其民众渴望建立现代政府并发展祖国的事业，而皇帝不但没有进行国家体制的相应改革，而且还在继续鼓吹其现代家长式独裁政府。由于埃塞俄比亚需要外国资本的支撑和帝国主义政权的支持，本国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进程最后都变成其次的了，进而导致更加落后。埃塞俄比亚的左派人士也认为，虽然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当地独裁统治模式还有很多缺憾，尽管那种自给自足的政策并不完美，但现在都被进口依赖和外国的经济援助所取代了。因此，战后时期本来为埃塞俄比亚呈现了一个大规模进步改革的时机，只可惜它瞬间就将其丢掉了。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的大批丧失导致其失去了进取和独立的精神，也失去了改变人们生存环境的革命责任，最终破坏了埃塞俄比亚现代化进程的潜在能力。在失去了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政治基础作为支撑的前提下，塞拉西在自己的任期内着手进行了改革。进取精神的缺乏成为其政权垮台的需要，对高层统治当局的赞扬导致了政府官员们的自鸣得意。除了社会精英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普通民众不满情绪的扩大，自然灾害的出现和民族统一者运动从事的暴力活动，所有这些都对平民百姓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皇室及其支持者的傲慢在那些有影响的规划和国际观光上明显地反映出来。所有的这些都为1960年开始的埃塞俄比亚人民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困境埋下了伏笔。

96

第五章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改革（1960—1974）

97　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集权化，在外交上讲究政策性，在军事上追求现代化，因此，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范围得以扩大并巩固。皇帝塞拉西为了确保其政治统治的稳固而玩起了平衡战术，一方面将自己的国家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又力图保持帝国官僚体制的保守特征。这种想当然的做法将会给皇家统治当局和埃塞俄比亚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后果。埃塞俄比亚还继续显示出在非洲大陆的一种崭新的、不断提高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主要是通过在二战及以后的军事和外交活动取得的。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海尔·塞拉西皇帝政治边缘政策而造成的固有矛盾和冲突使国内政局紧张起来。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商品化总会促使一些难于管束的新兴阶级产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对那些更加传统、保守阶级的严重威胁。此外，还在如亚的斯亚贝巴、阿斯马拉（Asmara）和德雷达瓦（Dire Dawa）等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播下了不满的种子。权力和现代设施使用的不平等加剧了种族认同以及种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等棘手问题。各种各样的势力集98　团在种族问题上总是奉行彼此相互排斥的路线，因而不断走向分裂。结果，二战后的许多变化进一步使国家事务复杂化，因为出现了新的

种族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导致一系列严重暴力冲突的发生。

在外交领域，美国成为埃塞俄比亚国际交往和外交关系中受益最多的大国。这种外交路线主要根源于埃塞俄比亚渴望得到美国在财政与科技上的援助来发展它的现代化工程，同时也是为了借此使帝国官僚政治得以继续存在。美国也愿意接受埃塞俄比亚的讨好，其目的是与英法相抗衡，当时，英国和法国继续保护它们在非洲之角的利益，以便延续自己在那里的殖民历史和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还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埃塞俄比亚40%的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虽然埃塞俄比亚提出了进一步刺激开矿活动的一揽子计划，但该国偏向于支持进口而反对出口。埃塞俄比亚的出口货物包括麝香、皮革、兽皮和蜡；但咖啡是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在埃塞俄比亚出口的咖啡中有70%进入美国市场。流散在国外的人控制着这项贸易，虽然偶有来自埃塞俄比亚本国国民的竞争，但其力量弱小，且大多数因财力不足而受到阻碍。一些企业家因直接接触皇室或从皇帝的支持者那里得到赞助，得以控制了包括纺织厂和酿酒工业在内的当地经济部门。

新兴的工业部门由外国资本掌控，其结果却是福祸兼备的事。本国的企业家缺少必要的资金来参与城市中工业部门的竞争，政府则通过农业税收来增加收入，但是这一努力收效甚微。于是，发展商品农业成为倍受欢迎的政策，相关项目集中在一些精选的区域，如绍阿、哈拉尔杰（Hararge）、奇拉罗（Chilalo）、沃拉莫胡梅拉（Wollamo Humera）和阿瓦什河谷地区（Awash Valley）。外国投资刺激了该河谷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文吉（Wonji），荷兰HVA公司得到了大片土地来种植甘蔗，开设糖厂。然而，在这一河谷的活动改变了这个地区一些文化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受负面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包括阿法尔、吉尔（Gile）、科雷域（Kereyu）和奥罗莫。这些地方的人，如农民和牧民，为了给商业企业让路，不得不背井离乡。河谷周围的半游牧居民也被驱赶出来，这使乡村贫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政府政策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土壤贫瘠，由于传统的牧场和环境缓冲地带转给

了商业企业，由此导致的大范围干旱和饥荒夺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99 埃塞俄比亚要在其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上努力实现工业化还面临另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都削弱了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然而，最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经济基础缺乏国家给予的一定数量的补贴资金，这种补贴资金会使埃塞俄比亚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外国投入资本和捐赠款项的前提都是要求埃塞俄比亚废除被众人称为古老的封建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埃塞俄比亚国家农业部门进入全球市场的的主要障碍。与大多数二战后非洲后殖民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特征主要是发展和维护政治统治，依靠外国贷款来弥补国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这个时期的埃塞俄比亚不但依赖外国资本，还面临着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其中包括外国势力在埃塞俄比亚国内社会、经济和国防等方面对本国计划的巨大影响。随着美国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债权人并在外交政策上对埃塞俄比亚具有决定性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外债数额也在不断攀升。

然而，埃塞俄比亚政府没能成功地对农业和社会经济关系进行改革，此外还存在其他障碍。埃塞俄比亚出口贸易具有贵族垄断性和排他性，这就造成了精英和其他公民之间的巨大差距。国内金融贷款政策既不鼓励小型工业，也不扶植颇具规模的本土商业阶级的成长。埃塞俄比亚很高的文盲率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也不利于实现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计划。虽然埃塞俄比亚在文字的使用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这一读写能力常常被埃塞俄比亚法庭的法官、教堂的神职人员以及官方编年史家所垄断。

农业结构变革的影响是渐进的，虽然对于精英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农民的影响则更为严重和紧迫。农业活动的商品化实际上如同有利于传统的统治者一样也有利于精英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经济上受益，但却失掉了政治自主权，在国内活动中其社会关系也受到了侵蚀。根据历史学家特沙尔·提贝布（Teshale Tibebu）的说法，由于农业土地毫无选择地私有化了，结果导致

农业迅速商品化，而农业的商品化又导致了家庭的非农业化。他认为，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国家发展计划成为腐败官员以开发大而无用的工程为借口聚敛钱财的途径。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新兴企业家。

农业商品化结束了传统经济关系，土地贫瘠导致了农民加速向城镇迁移。传统经济的破坏导致的人口分散给新的人口统计带来了压力，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混乱，从而引发了大范围的城市犯罪和卖淫活动。然而，埃塞俄比亚着手建立一些新机构来适应其发展计划。例如，政府建立的两个主要机构就是“埃塞俄比亚发展银行”（the Development ank of Ethiopia）和“埃塞俄比亚投资公司”（th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通过这两个新机构来使农业发展资本得以流动和监管。这两家机构后来合并成立了“农业和工业发展银行”（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nk）。该银行确保了埃塞俄比亚刚刚成长起来的资本家控制一些咖啡种植园。但是，这种做法的受益者是那些贵族家庭的子女或皇家土地受让人，后者过于满足现状，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基础。 100

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围绕发展一个强大的基础设施而设定，该计划注重加强运输、建筑和通讯设施的建设。从理论上讲，这些工程是为了使埃塞俄比亚城乡发展一体化，尤其是要开发那些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城以外的地区。由于国家把重点放在了建立一个由本国技术人员构成的干部队伍来管理新兴工业经济，这就必将使埃塞俄比亚受益以及对移居国外者依赖性的减少。然而，发展只局限于主要城市，而且仅限于开发当地的经济资源，其目的不是改善不同地区或者经济发展边缘地区人民的生活。第二个五年计划（1962—1967）的宗旨是启动一个为期 20 年的项目，这个项目将会使埃塞俄比亚主要由一个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这个计划包括生产多样化、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率。第三个五年计划（1968—1973）同样包括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固定目标，尤其是增

加农民的收益。这个发展计划的目标还有发展教育。

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扩大，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经历了多样化的变革，但是，商品化了的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常常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他们更容易得到贷款。此外，这些经济计划没能提高大部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生活。接近 4/5 的人口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农民。不仅如此，农民还被迫经常纳税、交租金、还债和行贿。农民可以靠努力获得一点收益的另一个领域是生产用来出口的皮革和兽皮。在这里，国家开发传统的畜牧业，使之成为第二大出口部门。但收益不是寥寥无几就是变化无常。有记录表明，从 1953 年到 1974 年，除了 1973 年[101]外，埃塞俄比亚的对外贸易每年都出现赤字。而没有出现赤字的 1973 年则是因为那一年油菜籽和豆类的销售帮助降低了经济上的压力。这种经济状况使埃塞俄比亚不得不寻求外国的捐赠和贷款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埃塞俄比亚上述那些发展计划还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副作用。虽然海尔·塞拉西皇帝已经把精英教育作为现代化政策的关键，但主要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福利设施都建在国家的中心，而且都由阿姆哈拉种族统治集团所控制。从总体看，其发展计划忽视了医疗、住房、卫生和用水方面的建设，这意味着当地没有安全可靠的措施来解决贫困、文盲和疾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起义到处发生，但这些起义通常既无良好的组织，又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还有一些零星的反抗运动，例如 1964 年在巴里地区和 1968 年在戈贾姆地区发生的著名的反对税收运动。

外来移民，如亚洲企业家和“美国和平军”（American Peace Corps）的志愿者，试图填补埃塞俄比亚一些社会服务的空缺。广泛的不公平促使在奥罗莫、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等的一些社会群体由于不断扩大的不公平待遇而对民族国家政策的内涵心怀不满。政府评论家辩称，国家的行动路线实际是通过不提供给居民经济和政治机会系统地将他们边缘化的策略。其他人则强调，生活在国家中心的那些人根本不关心也很少采取行动来解决各种下属群体的文化和历史生存。

这种国家发展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逐渐削弱而不是加强了海尔·塞拉西政权的权威。

尽管上文提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很严重，塞拉西皇帝仍然继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的、仁爱的独裁君主的形象。在政治改革，博爱政策和专制政治之间保持着危险的平衡，为了保护其政治权威免受侵蚀，他恩威并施，因而变得更加老练。由于他灵活机动地使用军队、政府机构的资源，任用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他还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帝国霸权思想价值体系。但是，在知识分子和日益壮大的激进学生中，反对皇帝及其政策的呼声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提到的社会群体中还包括一些更加年轻的贵族成员和由皇室资助的出国留学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英们由于不能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或者不能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来呼吁实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而垂头丧气。他们当中的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就是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加尔马梅·内韦（Garmame Neway），他在为平民服务过程中表现出了平民主义组织技巧和新颖进步的改革思想，深受知识分子拥戴。然而，现存政府却把内韦视为是一个威胁，并试图孤立他，进而在政治上挫败他。最终，加尔马梅求助于他的哥哥门格斯图·内韦（Margestu Neway）将军，时任皇家卫队的司令官。兄弟俩共同发动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 102

军事政变

1960年12月30日，在皇帝海尔·塞拉西对南美进行国事访问不在国内的情况下，谋划者发动了政变。他们发表声明谴责前政权给埃塞俄比亚带来的落后状态，尤其强调埃塞俄比亚比非洲后殖民国家还要落后，他们承诺扩大国家的工业和教育基础。他们还以增加士兵工资来争取军队的支持。政变者在首都首战告捷，逮捕了王储和20多位内阁大臣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命令王储通过广播宣读一份声明。声明说，虽然埃塞俄比亚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在农业、商业和工业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步。这个声明还为埃塞俄比亚广大民众的无知

以及他们低下的生活水平表示悲痛。这个声明使政变者取得了大学生们的支持，他们中许多人通过在亚的斯亚贝巴游行来表明他们支持政变的态度。

这次预期中的革命由于计划不周而内存纰漏。虽然政变者承诺要提高农民的社会福利，但他们也承认还将继续与皇家当局保持联系。此外，他们表示尊重所有此前存在的国际承诺。然而，对于政变者来说，最悲惨的后果是他们没有得到皇家卫队的支持。虽然军队是政变的主力，但政变者既没有得到陆军军官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空军主要成员的赞同。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忠于皇室的军队最终获得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为之所用并击败了叛军。加尔马梅将军在与保皇派的战斗中被杀。他的哥哥马尔杰斯图受伤后被捕，经过简短的审判后被处以绞刑。

虽然大学生们游行支持政变，但军队和空军的核心人物始终效忠于皇帝。教会也反对政变企图。当埃塞俄比亚教会主教给那些为维护保守秩序而战的保皇派祈祷时，他谴责叛乱者是反宗教的叛国者。教会还号召埃塞俄比亚市民要把效忠皇帝的传统责任作为荣誉。塞拉西 103 皇帝于 12 月 27 日返回首都，并在千万人的欢呼声中重登皇位。有人认为，塞拉西仍在广大平民中受到欢迎有其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把他当成民族主义英雄来崇拜，称他是二战前后两个时代的连接者，尤其是老一代人，他们把皇帝看作是传统秩序和国家现代主义雄心的象征。

虽然这次军事政变失败了，但却引发了人们越来越严重的政治不满，特别是有些人公开谴责那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所谓政治经济改革。此外，埃塞俄比亚的中产阶级和受过现代教育的阶级，尤其是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实现他们的独特抱负并向上发展的机会，对于传统贵族和拥有土地的绅士所造成的长期影响感到愤愤不平。许多人批判公共服务和其他国营机构中社会和经济上的停滞的状况。当他们把埃塞俄比亚的保守政策与战后民族主义者领导的非洲后殖民国家制订的更加雄心勃勃的政策相对比后，更感到羞

耻和痛苦。同样重要的是，普遍存在于学生中的新激进运动对于埃塞俄比亚虽加入由西方经济控制的“全球市场”但其地位却是外围成员甚为不满。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谴责这种殖民主义模式发展政策的设想，这些政策将埃塞俄比亚固定在未来全球经济关系中潜在的劳动阶级地位上。因为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咖啡的生产，作为农业地区主体居民的奥罗莫人体会到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急剧加强了。在1961年和1972年之间，出口到世界市场上的埃塞俄比亚咖啡由原来的75000吨增到111000吨，其中有50%以上的咖啡来自奥罗莫的两个主要省份卡法省和西达莫省。

由于定居者、投资商和投机者攫取销售的利润，而农民又要养家糊口，阿姆哈拉—提格雷定居者和奥罗莫佃户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对周围盛产咖啡的西达马和杰德奥（Gedeo）地区的吞并也导致了暴力反抗，其后还经常会受到政府的报复和惩罚。其他导致社会混乱和仇恨的力量包括埃塞俄比亚南北方之间在土地所有权地位上的不均衡。在北方，提格雷阿姆哈拉省是帝国权势赖以维持的基地，土地所有权只给予有血缘关系的集团。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一种叫做“里斯特”的制度的保护，但享受这种土地制度的国民需要交纳贡赋。此外，皇家土地只授予称为“古尔特”的贵族，而教会土地则从农民的贡金、产品、租金和服务方面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南方地区欢迎外来的地主（当地语言叫做内弗塔格纳，neftagna）或当地的酋长（当地语言叫做巴拉布巴特，balabbat），他们也具有使用土地的地主地位。除了利用胁迫和法律手段以外，宗教是这些不公平关系再产生的主要政治和思想机构。 104

土地私人占有权的发展导致农民的大量土地被剥夺，失去土地的农民大多数被迫成为佃农。在其他地区，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定居者的势力超过了占优势地位的穆斯林或万物有灵论者，这使农民更加具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从而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了。此外，由于实行大范围机械化种植，传统的社会文化关系就被强行打断了。例如，“1966年土地税（修正）公告”（The Land Tax〔Amendment〕Procla-

mation of 1966）废除了原来的古尔特土地所有权，但土地所有者把大部分土地变为了私有财产。王权对于土地赠与、庇护人关系（feature of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的特征与农业商品化的扩大政策相结合，共同加剧了乡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埃塞俄比亚政府又在1967年颁布了“收入所得税修订公告”（the 1967 Income Tax Amendment Proclamation），以此减轻农民缴税负担。这项法案取消了什一税，取而代之的是分等级的农业税，其中包括地租。然而，土地所有者公开反对这项变革，而且议会中的保守势力也被调动起来，致使该法案实际上无法生效。结果，随着城镇和乡村的反抗日益增强，对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日趋强烈。虽然20世纪50和60年代制造业出现了将近11%的年增长率，但城市工业经济部门的工人状况依然很悲惨。工业工人每日平均挣工资0.4到1.25美元，低报酬和城市失业问题一同威胁着帝国官僚体制的生存。当权者不顾日益增长的威胁继续实行他们的政策，而且还在不断采取扩大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的措施。政府的制裁政策经常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死亡。工会方面发起的抗议受到压制，如果有人表示不满，其财产便将遭到大规模毁坏，或者遭到国家采用的各种形式的暴力镇压。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促成了一个革命知识阶层的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引发了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

人们一直认为，埃塞俄比亚学生激进化的原因是国内外势力相结合的结果。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的学生们始终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其他人则表达了他们对自己家乡的社会和政治等级不满，并试图建立一个以“和平与和谐”为理念的埃塞俄比亚。对埃塞俄比亚学生带来影响的还有来自非洲其他一些国家和世界各地的享受奖学金资助的外国学生。一位叫做巴哈鲁·泽武德的作者对过渡中的埃塞俄比亚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历史评论。他强调说，尽管意大利入侵之前的知识分子想确保所有地区的平等和政教分离，但是他们的进步理论却极少伴有系统研究和方法论上的建树。另一方面，意大利入侵后的知识分子活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在很大程

105

度上受到消除阶级和种族统治和压迫这一理论愿望所支配。然而学生群体中的学者和活动家普遍存在的重要缺点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实践经验中缺少民主和批判意识。结果，破除迷信成为了当时的趋势，人们几乎不考虑细微差别或清晰的界限问题。泽武德总结说，尽管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尽然，但这两个知识群体还是承担了反对自恃高傲的官僚帝国乱用职权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作为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英雄而涌现出来。

学生反抗的出现是二战后埃塞俄比亚历史悖论的又一个例证，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亚中等和高等院校的增加。在“埃塞俄比亚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Ethiopia）的协助下，政府于1949年12月计划建立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基督教传教士和私人在公众和个人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也对大学建设做出了贡献。1950年，应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的要求，在加拿大耶稣会信徒吕西安·麦特博士（Lucien Matte）的帮助下，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建立。这所大学开始是一个两年制学院，被称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Addis Ababa，UCAA），而后在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工程学院和建筑学院。学校于1951年正式招生，1953年该大学开始与伦敦大学联合办学。经过与俄克拉荷马农业和机械学院（Oklahoma Agriculture and Mechanical College，OAMC）的学术合作而建立的农业学院也同样重要。农业和机械学校（the Jimma Agricultural and Technical School）于1952年10月成立，主要为埃塞俄比亚农业与机械技术皇家学院（the Imperial Ethiopia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Mechanical Arts，IEVAMA）输送人才，后来这所学院改名为阿雷马亚农业学院（Alemaya College of Agriculture，ACA）。在贡德尔还建立了一所公共卫生学院。1961年，从各种不同的学院中精选出一些合并成为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Haile Selassie I University）。尽管现在将重点放在扩大国内的教育设施上，并且入学登记的本地学生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是许多埃塞俄比亚年轻人继续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美国则成为最受该国学生欢迎的留学国家。海外留学生团体，比如北美埃塞俄比亚学生

联盟（the Ethiopian Student Union in North America，ESUNA）和欧洲埃塞俄比亚学生联盟（the Ethiopian Student Union in Europe，ESUE），这些学生组织后来都积极参与了他们祖国的政治活动。

106 在这个时期发起的另一重要计划是埃塞俄比亚大学服务社（the Ethiopian University Service，EUS）的成立。EUS 成立于 1964 年，它要求所有完成第三年大学课程学习的大学生到全国去，在他们各自研究的领域中服务一个学年。这个计划使学生们接触到农村的情况，他们通常担任中学老师，成功地将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观念介绍给更年轻的一代。然而，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志愿者的大学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大多数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这使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激进，增加了他们与现实社会对立的情绪。在社会上，政治出版物、社会评论和讽刺作品也增加了，这些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推动了诗歌朗诵和辩论集会活动的产生。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系统地进入学生运动当中。这种发展状况与学生运动骨干中产生的一个被称为“鳄鱼”的激进活动同步发生。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提供了一条抵制西方的原则道路，因为西方曾经支持海尔·塞拉西，批评家们说二战后埃塞俄比亚的落后就是西方造成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代表着埃塞俄比亚将走上一条在西方经济政治影响之外的现代物质享受之路。实现埃塞俄比亚马克思主义空想目标的历史诉求通常以俄国和中国革命作为历史转变的样板。但是，还有一些人主张通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政治自由和自决的渴望。埃塞俄比亚的其他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仅仅是跟在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战后年轻一代后随声附和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他们与非洲和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团结一致，强烈要求实现革命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一时期产生了阿姆哈拉文字的复兴和抽象艺术的繁荣。在戏剧上以曼杰斯图·拉马（Mangestu Lamma）和特萨加耶·加布拉—马登（Tsagaye Gabra-Madhen）为代表；小说创作中以贝尔哈努·塞里亨（Berhanu Zerihun）、巴阿鲁·杰尔马（Ba'alu Germa）和哈迪斯·阿拉马亚鲁（Haddis

Alamayahu）为代表；抽象艺术则以加尔巴—克雷斯托斯·达斯塔（Garba-Krestos Dasta）为代表。

越来越响亮马克思主义反资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和日益流行的词句是“言论自由”和“自主自决”，这些吸引人的话语成为政府遭受挫折的根源之一，而这个时候的埃塞俄比亚政府仍然在未遂军事政变的阴影中惊魂未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生联盟（the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of Addis Ababa USUAA）这个保护伞的形成证明，埃塞俄比亚左翼学生政治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对于学生的抗议，政府采取了开除学生和关闭学校的措施来应对。

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耕者有其田”这个口号不但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且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也成为反抗活动从改良主义过渡到革命时代的标志。同年，当议会开始讨论租赁条例时，这些学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用越来越严厉的言辞谴责了埃塞俄比亚王朝。一些学者指责学生们把革命手段与革命目的相混淆。哲学家梅塞·科贝德（Messe Kebede）认为，带有社会主义正统观念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思想虽然魅力无穷，但最终阻碍了埃塞俄比亚主体政治内部传承下来的发展的种子和潜力。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最适合个体企业扎根生存的南部更显得正确。他的结论是，这种为解放农民而斗争的粗俗革命产生的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是对个体企业和市场的完全不信任。另外一条可选择的通往进步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由于国家扩大了用于商业目的的私人土地面积而得到了加强。

107

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以他们所在的城镇为基地，特别是亚的斯亚贝巴，来开展反政府活动，农村也时有农民反对国家政策的暴动发生。当种族和文化集团公开反对权力过度集中在埃塞俄比亚皇室时，农村经济的不稳定因素、普遍的贫困问题和政治上不断发展的民族统一思想就汇合到了一起。帝国联邦式行政管理结构的失败也使经济上的不平等永久存在而不是减轻了这种不平等。作为二战后改革的一部分，将地方权力移交给国家的任命官员导致了地方事务的失控，事实上这一权力已经转移到亚的斯亚贝巴掌管中央权力的官员手中。尽管

一些文化和宗教社区对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国家的边缘角色和地位几乎没有什么抵抗，但是其他社区对诸如埃塞俄比亚正教对穆斯林和泛灵论者信仰的统治，以及阿姆哈拉人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中继续拥有特权地位还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有人认为，20 世纪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过分强调种族问题，应归咎于现代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个人消费和国家管理以及重新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在这一点上，与那些具有竞争机制的现代社会不同，在那些社会，经济活动是由新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竞争所决定的，而埃塞俄比亚经历的却是长期不发达状态，而在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又出现了暴力竞争的局面。在埃塞俄比亚，人口的增长和现代教育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比减轻资源匮乏和无序竞争更加严重。结果，控制资源的唯一途径是控制政权，并从国家及其同伙的角度出发实行各种名目的排斥政策。

二战后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

108

埃塞俄比亚在处理迫切的经济问题的同时，人们的各种利益和欲望都爆发了出来，这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社会组织。国内外地缘政治力量的结合促进了民族统一志向的形成。埃塞俄比亚在官方记事和出版文献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此外，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的发展项目和支持上也存在着不平等问题。二战时期地缘政治意识快速发展，但战前的一系列承诺在战后并没有兑现，比如英国政府就曾经答应，只要埃塞俄比亚的民族主义者起来反抗意大利殖民主义统治，英国政府就支持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但事实并非如此。

非洲之角历来被公认是拥有这样一个丰富历史的地区，那里各种不同的群体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其间夹杂着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却出现了新的强制性的政治要求，这种要求扭曲了这一地区互利互惠的地缘政治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埃塞俄比亚皇室因其强制地将各个文化群体当作边缘化的“臣民”或“属

民”加以安抚而不是保护，因而受到了指责。作为回应，许多集团在反对埃塞俄比亚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税收和土地评估方面变得更加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对以阿姆哈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埃塞俄比亚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级结构不满也促成了重新书写历史的新主题。现代历史编撰学经常把古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居民描述为生活在平行存在的多个文化群体中的居民，这一点由于双重认识论和摩尼教世界观点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突出。到了 20 世纪中叶，这些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在公共领域和国际舞台上，他们的言辞越发激烈，渲染着关于过去和未来民族光荣的莫衷一是的神话。在经济停滞和落后的大背景下，埃塞俄比亚的这种紧张状态更加恶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塞俄比亚已经显示出要收回厄立特里亚地区红海海岸线的愿望。但是，欧洲在非洲之角存在殖民地利益，特别是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厄立特里亚地区，又总是将埃塞俄比亚定位为现代内陆国家。在埃塞俄比亚强调他们这个古老王国与厄立特里亚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同时，厄立特里亚的民族主义者却说，他们除了与所罗门皇家世系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外，与其他所有政权的历史关系都是自治的。那里的民族主义坚持认为，意大利管制下的厄立特里亚从来没有在现代埃塞俄比亚的牢固控制之下。

在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后，厄立特里亚曾被英国管理。直到 1950 年，联合国决定将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领土结成联邦。联合国决议呼吁建立一个自治的厄立特里亚政府，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由于拥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内“联邦”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厄立特里亚在国内事务、国际事务、外贸、国防、通信等方面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此外，在过渡时期内成立的帝国联邦委员会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代表人数是对等的，而且在 1952 年 9 月过渡期结束前该委员会拥有联邦管理权和负责起草宪法的权力。“1952 年联邦法案”（the Federal Act of 1952）创建了厄立特里亚立法大会（the Eritrean Legislative Assembly），而且一些过去在底下活动的政治组织现在得以公开露面了。但是，这些社会团体不得不经常在一种特殊的政治框

109

架下运作，即首先要进行宗教信仰和家庭出身的认同，只有在二者同时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才能真正从事自己的活动。不同团体也成功地利用宗教和文化关联增加了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内的自治水平，或者为宣告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准备议事日程。此时，在厄立特里亚只出现了三个政党：一个叫做“联合主义者集团”（Unionist Bloc），主要成员是厄立特里亚的基督教徒；第二个是民主党，曾经以“独立集团”（Independence Bloc）的名义出现，其大多数成员是基督徒，也有一些人是穆斯林；第三个是“西省穆斯林联盟”（the Muslim League of the Western Province）。然而，选举结果证明，占有优势的政治团体之间达成了完全不同的妥协，大多数团体在厄立特里亚自治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1952 年，以“联合国蓝”为底色和以蓝色徽章为标志的厄立特里亚旗帜开始使用，直到 1959 年它被并入埃塞俄比亚为止。这时它又举起了“自由旗帜”，一直到 1933 年取得真正的独立。

1952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系统地摧毁厄立特里亚的自治体制。这一进程以终止宪法为开端。一年后又下令禁止工会活动。塞拉西皇帝强迫厄立特里亚当选行政长官辞职，用阿姆哈拉语代替阿拉伯语和提格雷语做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不许使用厄立特里亚旗，强加审查制度，让许多国营企业搬出厄立特里亚。到 1956 年，所有主要的政党活动均被禁止，国民大会暂时休会。除此以外，厄立特里亚旗和各种法规全部由埃塞俄比亚相应版本所代替。1960 年，联邦政治协议也被废除。帝国当局说服议会投票通过将政府的名字从厄立特里亚“政府”改为厄立特里亚“行政管理部门”。1962 年 11 月 14 日，该议会通过选举完成了过渡进程，将厄立特里亚合并为埃塞俄比亚的第 14 个省。这些活动使赞成那种建立一个更加自由的厄立特里亚的幻想破灭了。但激进的反抗运动还是在 1958 年以“厄立特里亚自由运动”（the Eritrean Liberation Movement, ELM）的形式出现了。该运动的参与者最初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和城市工薪阶级的劳动者，其政治目标已经超出了联邦自治的追求，现在他们所追求的是把厄立特里亚建立成一个独立实体。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开始在厄立特里亚普通民众中间培

养抵抗思想和民族意识。然而，由于埃塞俄比亚当局在1982年吞并了厄立特里亚，像厄立特里亚自由运动这样的反对运动就已经被釜底抽薪了。到1964年，厄立特里亚自由运动组织已经从内部遭到侵蚀，它的活动也基本上停止了，最后只能被其他的反抗组织所代替。“埃塞俄比亚自由阵线”（the 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ELF）是一个由流亡的穆斯林人，尤其是以中东地区为基地的穆斯林于1961年建立的。与厄立特里亚自由运动不同，该组织开始就以一个解放军的面目出现，并且拥有自己的纲领，宣称他们已经为民族解放进行长期战争做好了准备。一些现代激进的阿拉伯人国家，如叙利亚共和国，也把厄立特里亚看作穆斯林社区（当地语言叫做乌马 Umma），并已经做好了支持这个活动的准备。到1971年，厄立特里亚各个集团的游击队所发动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引起巨大危机的地步，皇帝被迫宣布对这一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埃塞俄比亚军队有一半被部署来钳制这场民族主义斗争。另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其中包括以佰卡（Barka）地区为基地的厄立特里亚解放军（the Eritrean Liberation Forces）、以红海地区为基地的人民解放军（the People's Liberation Forces）和厄立特里亚独立阵线（Front for Eritrean Independence），即从阿卡拉古扎伊地区（Akala Guzay）发起的厄立特里亚萨尔菲纳塞内特（Salfi Nasenet Eritrea）。1972年，这三支力量合为一股，叫做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民众解放阵线（the 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 and Popular Liberation Forces，ELF—PLF）。不久，这个联合体又重组成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军（the 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orces，EPLF）。厄立特里亚的那场武装斗争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

由于双方都优柔寡断，几次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武力争端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尤其是1974年革命以后，军事解决途径越来越成为双方的唯一选择，因为埃塞俄比亚军政权认为自己占有优势。而厄立特里亚游击队也认为自己不可战胜。在20世纪80年代末，军事拉锯战明显有利于厄立特里亚。1991年5月，“厄立特里亚民众解放阵线”成功地进入了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这预示着一个独立的阿斯马拉政

权即将诞生。

考虑到“厄立特里亚民众解放阵线”与同样控制埃塞俄比亚政权并且支持厄立特里亚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EPRDF）形成了联盟，于是这两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看上去能够和平共处，合作共事。从表面看，一切都相安无事，但引起麻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尤其是双方在边界问题、货币问题和几十万继续定居在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问题都为新一轮的冲突埋下了隐患。1998年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另一个被埃塞俄比亚现代地缘政治和经济野心引发的冲突出现1948年新边界的划分上。埃塞俄比亚绘制的一个新地图把一些索马里游牧部落置于自己的正式管辖之下。对于政治和民族主义者来说，埃111 塞俄比亚对欧加登的控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一地区发现了重要的资源，如水和石油。为了将索马里并入埃塞俄比亚，该国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carrot-and-stick）政策，即软硬兼施的政策。埃塞俄比亚提出两个实体之间在历史上就有宗教和亲缘关系，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索马里则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该地区的军事对抗。索马里在该地区与埃塞俄比亚当局的对抗可追溯到在1887年和1955年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埃塞俄比亚通过一系列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签订的条约获得了这些殖民国家对埃塞俄比亚占领欧加登的认可。埃塞俄比亚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得到了加强。同时，索马里进行抵抗的理由可追溯到古代的“民族”起源上。由于在语言、习俗、伊斯兰宗教和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上联系密切，在索马里共和国、吉布提、肯尼亚的东北部省份和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的索马里族人宣布他们有共同的命运。索马里的民族主义也得到了一些文化偶像遗产的滋养，比如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Mohammed Abdille Hassan）和传奇人物艾哈迈德·格兰（Ahmad Gran）。在摩加迪沙（Mogadishu）的“西部索马里解放阵线”（the Weste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成为比较重要的抵抗组织之一。与埃塞俄比亚不同的是索

马里人更多地认同伊斯兰教传统，在1960年索马里宣布独立时，西方列强在东非留下的势力范围划分就埋下了地区冲突的种子，并且越来越复杂化了。在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索马里族，比如达罗（Dallo）、瓦贝（Wabe）、埃尔科雷（El Kere）和加纳尔（Ganale）等，不仅坚持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而且还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国防军、警察和民兵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

另一个民族冲突的根源是提格雷省。在埃塞俄比亚，人数占优势的奥罗莫族形成了单一的最大种族群体（占人口总数的45%和50%之间）。奥罗莫族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农业最发达的南部地区。埃塞俄比亚帝国在历史上，尤其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该种族一直处于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社会边缘。奥罗莫民族主义者争辩说，阿姆哈拉人占统治地位的所罗门皇室曾经对他们被北方人统治的事实不理解、不重视并与外国联合维护这种状况的存在。他们强调指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埃塞俄比亚的盟友主要对增强大国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因此故意忽视埃塞俄比亚的内部矛盾。奥罗莫民族主义还基于一个共同的历史、一个被称为加达阿（Gadaa）的独特的行政体制，该行政体制以每八年为一个循环年龄段将社会分为不同层次，每一个年龄段又一代一代地从一个等级提升到另一个等级，经过40年循环之后到达鲁巴（Luba）水平，也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的投票资格。在每一个阶段，加达阿成员都要接受奥罗莫族历史、军事战略、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教育。尽管加达阿行政体制已经不再广泛适用了，但它仍然很有影响力。奥罗莫族被占优势的埃塞俄比亚正教系统地基督教化了，而当地原来的所有圣坛都被毁坏，取而代之的是埃塞俄比亚正教的绝对统治。现代历史上奥罗莫族人的抵抗主要有如下一些事件：1928—1930年的阿泽波—拉亚起义（Azebo-Raya）、1936年的奥罗莫独立运动、1964—1970年东南部地区的贝里起义、还有在南部省份西达摩的杰德罗（Gedero）和达拉萨起义（Darasa），以及东北部的戈贾姆地区的起义。1936年，来自哈拉杰、绍阿、季马和伊鲁巴波尔（Ilubabor）的奥罗莫族人在西奥罗莫联盟的名义下结成同盟。这个组织在1936年 112

向国际联盟提出自治请求。奥罗莫族反叛者还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主义者计划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奥罗莫族民族主义被梅查—图里马（Mecha-Tulema）所控制，这是一个由塔德塞·比鲁（Tadesse Biru）领导的、带有政治和文化特质的自立社团。该组织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活动在1966年海尔·塞拉西政府逮捕塔德塞·比鲁时达到了顶峰。塔德塞·比鲁被判死刑，后转为无期徒刑。在贝尔省，一个叫做瓦科·古图（Wako Gutu）的当地领导人，他的武装力量成为奥罗莫族从阿姆哈拉社会中获得自由而进行战斗的最重要的一支劲旅。他的武装抵抗开始于1940年，一直持续到他2006年过世为止。奥罗莫族的抵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但是随着1973年奥罗莫解放阵线（the Oromo Liberation Front，OLF）的建立，该运动又开始复苏。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奥罗莫和阿法尔等民族对埃塞俄比亚国家霸权的反抗一直在继续着。

孟尼利克二世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取得的成绩使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独立和民族自决典型国家的形象更加突出。作为政治领导人，他们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这样一个形象：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独立形成的统一民族国家，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埃塞俄比亚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中之一是在1966年表现出来的。那年，海尔·塞拉西皇帝访问了加勒比海国家，期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及海地做了停留。在牙买加的金斯顿（Kingston），他受到拉斯塔法里[①]民众的拥戴，这些人视海尔·塞拉西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然而，海尔·塞拉西后来的一些现代理想存在一系列的矛盾，比如，他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围；他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为满足出口经济的需要，他强制实行产品控制政策；他还错误地认为埃塞俄比亚民族国家的传统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现代化改革的结果无法预料，加上1972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干旱。对于这些，埃德蒙·J. 凯勒（Edmund J. Keller）给予了适当的描述，他说：

---

① Rastafarians，有关拉斯塔法里的问题见本书第四章。——译者注

> 处于生计边缘的农牧民不得不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然而，作为现代化进程和国家中央集权努力的结果，贫困农民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或是直接被地主和国家榨取，或者是兑换为现金用以交税。由于国家法规的限制，加上越来越发达的复杂而无情的市场经济的影响，他们运动的自由和要求获得土地的道路受到阻碍。传统的生存机制 113 或者被严重的削弱或者完全不起作用。农村居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极其依靠国家。而就国家而言，它比以前更关心经济增长和政治前途。

此外，快速的经济扩张也使旧法令和新出台的法令之间产生了矛盾，这让长期存在的、以种族和阶级区别为基础的不平等进一步复杂化了。

直到皇帝海尔·塞拉西统治已满40年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对权力个人化和君主制对政治异议者的限制表示不满。尽管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政策和自由改革是在由国家完全或部分控制的官僚机构下进行的，但是这些政策和改革使得世袭的、有影响力的贵族阶级占据了有利位置。因此，对皇室的忠诚通常比以功绩为基础的合同和任命更为重要。国家的这个特点造成了无能机构的普遍存在和经济增长的失败。虽然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和严格的社会分层已经构成了皇帝塞拉西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资本家指导的发展进程缺乏创见，世袭原则处于支配地位，土地和贸易改革和发展失败，致使这一代人理想受到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对霸权统治的策略而深得民心。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也造成了一个难以预见的后果，那就是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影响力和策略的主动性无形中受到了削弱。老态龙钟而又实行中央集权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将自己与其作为权力基础的贵族阶级和乡村完全隔离开来了。土地的私有化实际上意味着君主的绝对统治被剥夺、被替代和被削弱了，农民和地主之间那种庇护和被庇护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过去，这种关系被用来平息冲突，

但也暗中削弱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对于农民来说，由于过分强调农业商品化，加上单一的农作物种植政策失败，这就意味着充满期望的的社会流动被阻滞了。

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政策

1967 年，塞拉西出访美国，目的是请求军事援助，以对抗苏联支持的索马里。在这次长途旅行中，皇帝也在克里姆林宫做了暂短停留，在那里，他恳求莫斯科停止对索马里的支持。索马里形势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该国家正积极地追求一种把所有索马里人团结在一面旗帜下的政策。有些人把索马里人的情形描述为“一个生活在多个国家的民族”（one people under many states），而索马里的领土仍然处于被欧洲殖民当局所瓜分的状态。这些殖民当局船坚炮利，资金充足，依据这些优势，他们与殖民地当地的一些传统统治者建立了多层关系。索马里人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大索马里的追求铭刻在作为该国独立象征的五角星上（索马里国旗上五角星的 5 个角分别代表该国家的 5 个地区）。英国和意大利在索马里的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原来这两个国家的殖民地立刻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索马里，因此五角星中的两角代表着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已经收回了。但索马里人还是发现他们自己的同胞分散在邻近的国家中——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这三个地区被称为“被占领土”，其中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成为索马里民族统一主义者的主要政治目标。这导致两国在 1963 年发生小规模冲突，1977—1978 年升级为大规模的战争。不久，由于索马里军队战败瓦解，索马里西亚德·巴雷（Siyad Barre）的独裁政府行将结束。

在苏丹获得政治独立的一年前，该国家南北方之间爆发了内战。南方人害怕新的国家会被北方所控制，而英国主张南北分治的殖民政策更加反映了苏丹的这种南北分歧。苏丹的北部在历史上与埃及的联系更紧密，主要居住着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而苏丹的南部主要是黑人，还有信仰基督教和泛灵论的人。驻扎在赤道省（Equatoria）的苏丹南方军队联合起来于 1955 年制造了叛乱，并迅速发展成为第一次安亚—

恩亚运动（Anya-Nya）。由苏丹非洲民族联合阵线（the Sudan Africa National Union，SANU）所领导的南方武装斗争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南方人追求取得没有种族隔离、实行民族同化政策的自治地位。喀土穆的连续几届政府，不论军政府还是平民政府，都坚持执行这两种政策。因为逐步强大的北方毫不妥协，南方人也将赌注提高，即从追求自治上升到要求独立，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厄立特里亚有些类似，那里的目标是从要求恢复联邦转变为明确要求独立。

1972年2月签署的《亚的斯亚贝巴条约》（the Addis Ababa Agreement）承认苏丹种族多样化，从而结束了内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条约还允许南方区域自治、允许在喀土穆的国家委员会为其提供一定比例的代表位置以及认可英语为该地区的主要语言。尼迈里将军（Nimeiry）是第一个签署此条约的南方统治者。遗憾的是也正是他在1983年废除了这个条约。他在整个国家强制实施了伊斯兰沙里亚法（the Islamic sharia law），并把南部分成三个区域。在争夺油和水这两种重要资源的冲突中，南方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水的问题是由琼莱运河工程（Jonglei Canal project）所引起的，该工程的目的是要排除南方沼泽地的水，当时当地把那里叫做苏德（sudd）。

因此，内战的第二阶段以人们所说的第二次安亚—恩亚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是由苏丹人民解放军（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PLA）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所领导的，这两股势力一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另一个是政治势力的象征。苏丹内战的第二个阶段持续了20年，牵涉其中的主要国家是埃塞俄比亚，该国当时主要是保护苏丹难民。 115

埃塞俄比亚帝国秩序的最后瓦解以一系列的军事叛乱、游行示威和工业生产摇摆不定为标志。早在这些事件之前的1972年，该国的东北部遭受了一次大规模的旱灾。仅这一年之间，就有10—20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仅沃罗和提格雷地区就损失了大约20%的人口和90%的牲畜，而这两个地区为埃塞俄比亚提供的食品占其全部食品的40%。当旱灾的消息传遍整个国家时，学生们和其他有同情心的开明

市民进行了公共食品捐赠活动。然而，对维持政治秩序来说，更重要的是海尔·塞拉西大学的学生们在1973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园示威运动。这一运动导致政府采取了惩罚性政策，许多抗议者被逮捕或者被杀害。政府拘留学生领导者，许多人被驱逐出境。这也导致了许多社会活动家移居国外，其中主要是那些对农民状况不满的人。

埃塞俄比亚政府对旱灾的反映是既不积极应对也不制订解决计划。除了气候造成的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而外，由于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和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出口作物——咖啡的国际价格下降，埃塞俄比亚当时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1974年2月，出租车司机和运输工人举行了罢工，以抗议政府下令车费不许上涨，尽管石油价格已经上涨了三成。

埃塞俄比亚政府对于这些危机的处理基本上毫无效果，再加上官员形象不佳，加深了人们的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政府官员仍然生活在灾难之外，而大多数人却在受苦。对于政府官员中猖獗的腐败行为的指责已经遍布所有城镇地区，皇帝由于敛财数量惊人而受到指责，而且皇帝是以国家政策为幌子收敛钱财，这在事实上混淆了皇室财产与国家财产的界线。一些政府官员、教师、士兵、学生和知识分子还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学校教师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废除世界银行规定的“教育部门审查”的政策。由于高中生参加了政治化了的大学生运动，高中教师获准觐见皇帝，而这个时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一定在抗议者要求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声中惊魂未定。

116 1974年1月12号，驻扎在讷格莱（Negele）的国防军第四旅的士兵为抗议该部队的粮食和饮水条件差而发动叛乱，并把他们的指挥官扣为人质。多年来，埃塞俄比亚人一直在君主制政治统治之下，而这种君主政治中又派别林立，其中包括帝国卫队和国防军，这两股势力内又分成许多派别。还有一些其他派别，例如，那些都是毕业于哈拉尔军事学院（the Harer Military Academy）或者都是毕业于霍拉塔军事培训中心（the Holeta Military Training Center）的人就以其校友身份而团结在一起，在各个驻防地搞反叛。反叛的消息又传到了其他团队，乃至所有军队，包括驻扎在厄立特里亚的军队。

1974年2月至9月期间，即将爆发的埃塞俄比亚革命从抗议的方式转变为暴力的手段。1974年3月，在埃塞俄比亚工会联盟（the Confederation of Ethiopian Labor Unions，CELU）的协调下，各地工会都号召各产业部门开始行动，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人们纷纷用罢工、联合抵制和其他暴力的形式来响应革命的号召。这使得公共部门和公共设施陷入瘫痪，并因此加大了民众运动的压力。

农民们公开与地主和政府当局相对抗，同时，随着边缘化的出现，其他一些社区的反抗也相继出现。1974年4月，城市穆斯林举行示威，接近10万人的商人阶级也加入到改革的呐喊声中。他们要求结束对穆斯林的歧视，并要求与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西南方盛产咖啡的季马省，不受欢迎的总督达加兹马克·特萨哈伊·恩克瓦—塞拉塞（Dajjazmach Tsahayu Enqwa-Sellase）被罢免。

皇帝试图对各个集团做出让步。1974年2月28日，首相阿克里鲁·哈布特—沃尔德（Aklilu Habte-Wolde）辞职。当时在任的交通大臣雷吉·恩达尔卡特切乌（Lej Endalkatchew）领导组建了新内阁，他立刻答应进行土地和宪政改革。但是，示威仍在继续，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由皇帝塞拉西和帝国官僚政治所构成的统一而又有效的统治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大多数政治反抗行动主要发生在城镇和政府难以控制的地区，因此，事实上造成了在政府镇压的情况下还是有许多人胆大妄为。当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亚的斯亚贝巴扩展到其他省的一些城市以后，政府一面进行安抚，一面进行武力镇压。警察的行为更加恶劣，尤其是在科法省的季马（Jimma，Kefa）、伊鲁巴波尔省的梅图（Metu，Ilubabor）、阿鲁西省的阿塞拉（Asela，Arusi）和格穆戈法省的阿巴敏奇（Arba Minch，Gemu Gofa）。1974年9月12日，起义群众宣布废黜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神权国家的世袭皇权从此结束。根据马里纳·奥塔维的说法，塞拉西最开始被认为是具有开拓性的现代主义者和能领导国家进入新时代的进步皇帝，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许多市民，尤其是有文化的市民，断定他是埃塞俄比亚

117

落后的根源所在。似乎也是为了证明这点，在皇帝被废黜的初期，有迹象表明，一个自由的政治环境和一个比埃塞俄比亚现代历史中任何时候都更充满生机、前途广阔的氛围呈现在人们面前。各种文化集团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例如，在奥罗莫、索马里、阿法尔和厄立特里亚人中间，都有人更加大胆地对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作为反对古老政体的革命先锋，军队时而发动的反抗行动实际上形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渐变的过程，也正是军队填补了缺乏革命组织所造成的真空。这个过程的开始是一些有地位的精英试图在阿拉姆扎武德·塔萨马上校（Alamzawd Tasamma）所领导的军队中寻找同谋，阿拉姆扎武德·塔萨马上校是埃塞俄比亚空降兵旅指挥官，接下来，军队又瓦解了旧制度赖以存在的支柱，建立了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警察和国防军委员会”（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the Armed Forces, Police, and Territorial Army），即现在通常所说的“德尔格”[①]。伴随这一行为的还有一部分军队动员广大民众起来进行抗议活动和暴乱，埃塞俄比亚革命就此发生。这个反叛集团由一些年轻军官组成，他们之中最高军衔是少校，主要来自于陆军、空军、海军和警察中的主要团队。1974 年 9 月之后，该组织被称为“临时军事管理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Council, PMAC），或者简称为“军委会”。1974 年的政治事件导致延续了 1600 年之久的埃塞俄比亚皇家统治宣告瓦解，并立刻被称为临时军事管理委员会的军事集团所取代。“军委会”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国内市民社会日益放任自流，尤其是在像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样的城市中心，还有农村的广大农民日益政治化。因此，“军委会”开始为控制政府和国家政治而出谋划策并制订出一个自认为可行的蓝图，该蓝图最重要的就是否定即将灭亡的所罗门王朝的合法性和霸权统治。

① Derg，阿姆哈拉语中“委员会”或“会议”的意思，本书一律将该词翻译为“军委会”。——译者注

第六章　“非洲马克思主义”：埃塞俄比亚与全球正统化和革命的代价（1974—1991）

伴随着许多省的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和首都难以控制的市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于 1974 年 1 月开始了。学生、教师、公务员和士兵在各地纷纷举行反对海尔·塞拉西的帝国代表、封建贵族的支持者和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叛乱，这些反叛最初是从城镇开始出现的。这些民众运动和起义还伴随着要求政教分离，宗教信仰、区域、职业和经济集团之间的平等。 119

1974 年 6 月 21 号，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警察和国防军委员会”选举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少校（Mengistu Haile Maríam）为领导人，并选举阿特纳福·阿巴特少校（Atnafu Abate）为其副手。虽然新政权缺少明确的意识形态纲领，但它的成员非常清楚平民的基本心态，并决定按照既定方针办。更重要的是，“军委会”开始借用埃塞俄比亚激进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为了排斥激进分子们，“军委会”还借用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政治学家约翰·哈贝森（John Harbeson）将革命期间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74 年 12 月开始，“军委会”宣布支持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接下来宣布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吻合的经济政策。

120 他认为，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进行符合实际的判断、总体上的规划和进行比较温和的说服；第二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为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宣传，以便彻底根除旧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并调动大量城市和乡村的选民参加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启动新的“民主革命计划”（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Program），并加强基层管理委员会。所有革命行动的最后一步是使群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政治力量，并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军委会”特别需要在学生、市民和乡村居民中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一方面采用了人民党主义式的说教，例如“埃塞俄比亚高于一切”，但另一方面，却使用极端的暴力手段进行威胁。本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实验艺术业、娱乐业和唱片业都曾经得到蓬勃发展，但到了60年代所有这些都戛然而止，这是因为艺术家们都去关注革命职责和形象了。

“军委会”的核心成员及其同盟者开始制订一个集权统治的规划，如同现代主义者海尔·塞拉西皇帝一样，但与他不同的是没有过于依赖美国或者以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体制。相反，他们想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结构包含全社会的各个部门。按照马里纳·奥塔维的看法，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就是“不以那么突出的乌托邦眼光看待人类解放——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似的主题——而是以那些处于西欧之外的大量弱小、落后的民族获得统一、富有和国际尊敬为目标”。她认为，前者在本质上是“苏联模式，后者则是中国革命模式”。[①]因为在门格斯图政权的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被描绘成一种可以随便使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工具。门格斯图信奉国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原动力的最高纲领主义者观点，因此，政府开始对农业生产制度进行重组，把人口从过于集中、生态基本耗尽地区的居民重新安置到更加肥沃的地区。其他项目还有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和知识的传播等。

---

① 马里纳·奥塔维编：《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纽约：普拉格出版公司，1990年版。

1975年，“军委会”政府乘着革命的浪潮强制性地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同时对那些重要的经济地区实行国有化政策。在这次改革中，流行口号是“耕者有其田”，这次行动使得“军委会”政府取得了广大平民的信任。新政府公布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城市和乡村土地改革计划，他们调动了4万名多学生和教师去乡村解释革命的含义，这一行动在“塞梅查”（zemecha，阿姆哈拉语意为“运动”）的旗帜下进行的。1975年，作为最初土地改革的一部分，军政府发动了“合作促发展运动”（the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Campaign），这一运动强行调动大、中学生去向农民解释什么是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该项目还要改善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形成的文盲率很高的现状。

然而，“军委会”试图将社会主义者的辞令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相结合，有评论家说他们这是患了精神病，其结果也确实收效甚微。“军委会”的这种意在平衡各种势力的行动内容包括：谴责“对个人利益的无限崇拜”，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的浪费；承认生产机构既有国家控制的也有私人占有的两种形式并存；但反对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的那种半封建主义的体制，而是号召复兴埃塞俄比亚传统。从这一点上说，虽然那场革命给整个埃塞俄比亚国家带来荣耀和解放，但同时并没有给整个民族国家一个明确的定义。另一个矛盾是埃塞俄比亚正教问题，该教会曾经享受着来自于国家给予的1500多年的庇护，而在1975年3月的彻底土地国有化中，该教会已失去其重要地位和土地资产。尽管如此，“军委会”还是保证维持正教会对国民地位的区分，即反对种族间的平等。根据马里纳·奥塔维的看法，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革命举棋不定的态度，表明该政权一方面试图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吸取俄国革命的教训，从而防止埃塞俄比亚遭到威胁。她强调指出，这种威胁在1975—1976年间发生的种族问题的爆发过程中显得十分突出。在同一时期，政府对私有银行和保险公司实施国有化，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掌控之下的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都由政府统一控制和监管。在这个时期，埃塞俄比亚通货膨胀持续不衰，战争开支数额庞大，财政预算连年赤字，这证明埃塞

俄比亚基本上还是依赖外援。

“军委会”还组建了一个由50个成员组成的“平民顾问委员会”，阿姆哈拉语为 Yememakert Shengo，有关选举的一些事宜由该委员会进行磋商。该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高原则，阿姆哈拉语叫做 Hebrettesebawinet。这一原则就是强调平等、自立、尊重劳动、公共利益至上、埃塞俄比亚国家不可分割。“军委会”组建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寻求将国内外所有反对旧政权的势力联合在一起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在1974年和1987年之间，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强制性统治机构迅速扩大，同时，只要陈旧的传统统治方式一出现，“军委会”中的各级各类人物都自动承担起摧毁这种集权统治的任务。“军委会”及其盟友没收了社会精英们的汽车和财产，并拘捕了那些顽固地忠实于皇家当局的反动嫌疑分子。阿曼·迈克尔·安东姆将军（Aman Michael Andom）是一位战斗英雄，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兵，根据这一经历，虽然他并不是军委会的核心成员，却成为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兼国防部长。他出言谨慎，与一般军委会成员的看法相悖，这一点注定了他的归宿。他曾认为“军委会”由120名成员组成过于庞大，建议减少其人员，并提出与厄立特里亚叛乱组织和解。他还反对对前政府的文武官员执行死刑。在这个政局不稳、国家政体严重分裂的情况下，一些平民号召建立“人民的政府”，但是，甚至“军委会”内部都感到缺乏合作精神，他们也在大声疾呼寻找建立人民政府的支持者。

122

“军委会”中的激进派开始在其内部排除异己。阿曼受到孤立并被视为反对军政府的象征，于是阿曼下台，并寻求一位更高级别的军官的支持。1974年11月23日，阿曼·迈克尔·安东姆将军和军委会中另两位曾经支持他的成员被杀，理由是拒捕。在同一天晚上，59名前官员，其中大部分是阿姆哈拉族，也被处决，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六”。希瓦人特菲里·本蒂准将（Teferi Benti）被任命为临时军事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但实权掌握在第一副主席门格斯图少校手中，特菲里·本蒂准将只能以第二副主席的身份出现。

门格斯图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埃塞俄比亚开始准备对厄立特里亚发动新的军事进攻。1974 年 12 月 20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年，“军委会”宣布取消所有皇室头衔，并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1975 年 8 日海尔·塞拉西皇帝神秘亡故，埃塞俄比亚正教主教阿布纳·特沃弗罗斯（Abuna Tewoflos）被撤职，埃塞俄比亚传统君主制至此结束。

当广大平民百姓认识到革命的果实已经被军队所窃取，这些军人很快就接过了过去改革派的语言或口号，于是，公众选出的一些成员开始以非正式的反对党形式运作起来。尽管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了土地，但民众的福利仍没有得到改善，平民反对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开展自己的活动。曾经被政府招募来参与基层教育改革的学生们感到很失望，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为更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反对党仍然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相互矛盾的主张还是牵制了他们的许多注意力。

在这种情况下，“军委会”开始为自己树立有代表性的政治活动和民众参与的政治形象。“军委会”虽然不能容忍各种政党的存在，但却允许“军委会”政治局中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存在。在军委会政治局中有一些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其回国的目的是想帮助实现国家重建，而这些人后来组成了被称为 MEISON 的政治组织，即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All-Ethiopian Socialist Movement）和工人阶级联盟（Wez Ader, League of the Working Classes）。另一组织，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EPRP），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the 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EPRP）联合，后来又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he Tig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联合起来。其他一些政治团体也加入到了社会改革的讨论中，思考建立一个进步文明社会和共和体制的问题。由于工作关系的需要，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设立了“群众组织事务临时办事处”（the Provisional Office for Mass Organizational Affairs, POMOA）。后来，这两个主要政治组织之间出现了裂痕，这种分裂将是埃塞俄比亚后

123

革命时代历史形成的基本原因。

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主要由归国的大离散人员所控制，他们赞成“有限民主制”，这一点使其更容易与“军委会”合作，其领导人海尔·菲达（Haile Fida）是“军委会”的首席政治顾问。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则倾向于倡导“人民民主”，后来又成为“军委会”的主要批评者。该组织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商人和政府官僚建立起一个广泛的联盟，并发起了一场系统的不信任政府运动。

恐怖统治

由于处在边缘地位，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成员着手在城市中心开展诸多武装斗争，后来这些行动被称为“白色恐怖”。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残暴地滥杀无辜，包括对手的家庭成员也不能幸免。随着城市土地和资产阶级财产国有化，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获得了在全国各地任命干部的权力，并在城市中形成了“城市街坊联合会”，阿姆哈拉语叫做科贝尔（kebele）。马克思主义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项目中采用了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其目的是使人们感到他们的极权统治可以理解和接受。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增长，这种分歧在“军委会”中也出现了。由主席特菲里·本蒂将军率领的一派希望减少与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的牢固关系，加强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之间的和解。他们还呼吁暂停暴力活动，并在巩固新秩序和进步目标的基础上重建党派联盟。

在1976年年初，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上校开始新一轮的暴力活动，试图重新夺取政权。门格斯图一直对重组的“军委会”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因为“军委会”只让他负责礼仪方面的工作，而实权集中在秘书长阿拉马亚胡·海尔上校（Alalmayahu Hayle）手中。1976年7月，政治和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PMAC）主席西塞·哈布特少校（Sisay Habte）被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埃塞俄比亚驻厄立特里亚第二师的陆军指挥官戈塔切

124

乌·纳达乌准将（Getachew Nadaw）以及“军委会”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巴乌恰图·卡萨中尉（Bawqatu Kasa）和塞拉西·贝亚纳中尉（Selashi Bayyana）。1977 年 2 月 3 日，在“军委会”常务会议上，“军委会”主席特菲里·本蒂中将、阿拉尔马亚布上尉（Alalmayahu）、莫加斯上尉（Mogas）和阿斯拉特·达斯塔中校（Asrat Dasta）、“军委会”的新闻及公共关系委员会（Inform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被集体处决。随后，“军委会”内部的最后一场竞争就是门格斯图消灭阿特纳福了。

政变给门格斯图和他的左翼盟友创造镇压那些被视为革命敌人的人的机会，特别是杀害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成员的机会。在那个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成员和他们的朋友及家人都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身攻击乃至被处决。到 1978 年，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和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党都已失去与军事领导人的友好关系。学者约翰·哈比森在记录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时曾指出：

> 在这个铲除反对派和反革命阴谋者的革命过程中，“军委会”很可能就已经具有了被它所取而代之的那个政府的鲜明特点，这明显违背了它的初衷。“军委会”不得不使用武力，以确保革命成功。它力图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执行这一任务，而不是调动革命的选民去追求一种假定的革命目标。因此，“军委会”的主要工作很可能不可避免地，至少在外表看来，具有与前政权已经开始的改革措施十分相似的特征。①

几乎所有的平民反对派团体要么被摧毁，要么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在这种情况下，“军委会”除了实行改革计划已经别无选择。同

① 约翰·W. 哈贝森：《埃塞俄比亚的变革：对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质疑》，鲍德尔，CO. 西点出版社，1988 年版。

时，它还实行了旨在显示国内复杂的各种族要求平衡的对内政策、将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体面对世界的对外政策。

“军委会”、民族问题和埃塞俄比亚对外政策

塞拉西皇帝被推翻促使不同文化群体中产生了自决思想。当时，该国大部分地区爆发了无数次叛乱，绝大多数叛乱活动集中在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地区。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了最活跃的分离主义叛乱，这也是“军委会”决定增加其在厄立特里亚控制地区驻军的一个原因。1975 年，令人头痛的厄立特里亚领土突然爆发民族主义者发动的对阿斯马拉的进攻，起义被镇压，但这次起义却开启了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潘多拉魔盒。作为该事件的后果之一，美国在对埃塞俄比亚政策上发生变化。根据 1953 年签订的“相互防卫援助协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美国更有理由出售武器给埃塞俄比亚。上述冲突更加证实了非洲之角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这是一个不断发生危机的地区，但同时这里也是非洲乃至全世界经济、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由于埃塞俄比亚占有绝对人口优势，当时生活在非洲之角的人口中有 85% 是埃塞俄比亚人，因此，该国在非洲之角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非洲之角也被描述为非洲和中东以及通往波斯湾油田之间的桥梁，而且该区域对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都持宽容态度。基于上述因素，在该地区发生的事件作为冷战政治戏剧和冲突的结果，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25

到 1977 年，埃塞俄比亚全国所有 14 个行政区域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叛乱活动，叛乱者所控制的领土时刻面临着埃塞俄比亚军队的进攻。在提格雷地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he Tig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TPLF）相当活跃，而在贝里、阿尔西和西达莫以南地区，“奥罗莫解放阵线”（the Oromo Liberation Front，OLF）则比较活跃。活跃在欧加登的“西部索马里解放阵线”（the West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和“索马里阿波解放阵线”（the Somali Abo Liberation Front，SALF）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阿法尔解放阵线”（the Afar

Liberation Front，ALF）也开始与厄立特里亚的一些集团联合行动。

1977 年春天，索马里入侵埃塞俄比亚。这是迄今为止对革命政权最严重的外部挑战，但这次侵略反而有助于巩固“军委会”对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集权统治。索马里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政府试图通过向西部索马里解放阵线所在地区增加物资和后勤支持，从而吞并欧加登。该集团占领了从德雷达瓦地区以南到肯尼亚边境的大部分欧加登地区。索马里政府对西部索马里解放阵线的支持与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吉吉加（Jijiga）等地区的兵变相呼应，叛乱分子终于占领了该城，从而使叛乱达到顶峰。在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领导下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在绝望中向苏联求援，结果苏联抛开了先前支持的索马里，转而去支持更大、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埃塞俄比亚。在典型的冷战时代角色转换和权力调整中，苏联最终不再支持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索马里政府。接下来便是索马里驱逐苏联顾问和废除条约，长达 10 年之久的联盟结束了，莫斯科和摩加迪沙的友好合作关系走到了尽头。不管怎么样，埃塞俄比亚与美国的关系也处于转型期。据估计，从 1977 年到 1978 年，苏联给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达 10 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 1953 年到 1977 年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援助的总额。1953 年，埃塞俄比亚和美国之间制订的共同防御计划很快终止。杰米·卡特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奉行冷战政策，在这种政策原则下，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也在围剿范围之内，同时对其周围国家提供支持。因此，美国反过来也与埃塞俄比亚邻国建立了战略、军事和经济关系，主要有埃及、苏丹、肯尼亚、阿曼，当然还有索马里。 126

从 1977 年 11 月开始，苏联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大规模直接军事援助。1977—1990 年，苏联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估计高达 13 亿美元。此外，近 17 000 名古巴人抵达埃塞俄比亚，并与埃塞俄比亚军队联合抵御索马里部队的进攻，最终不但夺回了吉吉加，并且迫使索马里的部队退回到其原有边境之内。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巩固了其苏联和古巴军事代言人的新角色，该国家的军事顾问也来自苏联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如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波兰也时常派出

顾问到埃塞俄比亚。击败索马里的入侵者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继续采取行动，他想对南部厄立特里亚采取军事行动。结果埃塞俄比亚军队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的几个城镇，但未能攻占纳克法（Nakfa），在那里游击队和宣传活动持续了多年，而且由民族主义者守卫。在那几年，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不仅屡遭败绩，而且也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1982—1985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军委会”举行了多轮会谈，试图解决厄立特里亚冲突，但这种会谈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到1987年底，反叛分子已经控制了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近90%的区域。厄立特里亚的武装冲突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这长达30年的悲剧不仅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相互对立。埃塞俄比亚人认为，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厄立特里亚则着力将两国作为不同实体加以描述。当厄立特里亚加大了赌注的筹码，从要求恢复联邦到要求明确承认厄立特里亚独立，于是埃塞俄比亚政权便诉诸武力加以解决。

奥罗莫也变得更加具有暴力色彩，1973年，该地区建立了“奥罗莫解放阵线”，并且喊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从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中彻底解放整个奥罗莫”。在来自阿鲁西省的奥罗莫人领导下，该组织声称得到了其他奥罗莫群体的广泛支持。

历史上在非洲之角占统治地位的独裁政权的政策与实践一直是灾难性的。国际大国的介入也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西方扩张主义的民族政策常常将本国利益至上作为唯一的政策原则，也使该地区的冲突火上浇油。殖民地时代疆界划分留下的遗产、无能的政治当局、为争夺权力和资源而展开的无情竞争，所有这些都在该地区产生了可怕的后果。1982—1992年，战争和饥荒导致非洲之角200万人死亡，更多的人成为难民，这使得埃塞俄比亚及其邻国的社会与政治关系更加不稳定。冷战的实质后果是剥夺了非洲之角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该区域的一系列战争还破坏了对于自主决定其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以及追求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

127

“军委会”为了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也派使者到中东国家，如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1981 年，埃塞俄比亚与利比亚、南也门签定了三方协议。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也得到顺利发展。1984 年，接近一万名贝塔以色列人（Beta Israel，即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也叫做法拉沙）被秘密从埃塞俄比亚空运到以色列。1991 年 5 月，在门格斯图政权行将结束时，经过以色列、美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谈判，又有 15000 名贝塔以色列人被迁出埃塞俄比亚。

冷战对非洲的冲击使埃塞俄比亚局势出现了新的动向，这种局势导致民族主义狂热、农民骚动，部分国民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动乱不断发生。非洲大陆采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律令以后，引发了有关非洲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距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非洲马克思主义是非洲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指导性箴言，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应用到非洲的具体情境之中。虽然“军委会”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自我定义和公共政策分析术语，但是它并不愿与埃塞俄比亚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少数民族和非军事人员分享已定的权力。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盗用“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必要反对其正统原则，其中包括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机构，或者鼓励扩大作为政治先锋队基础的工人阶级队伍。他们所强调的重点通常是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至高无上的实用主义和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机器之上。有些学者们曾经提出建议将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与列宁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受到苏联模式的政府效率、权威和社会原则的吸引。他们还接受了自决原则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赞赏社会主义理论所承诺的自治和稳定。这些政权最重要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优先性与实行计划经济相结合，以确保生产、分配和交换。对于上述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还表明，在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时，个人最终难以被描述为真正的非洲人。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导致 100 多万公民死亡的严重饥荒。国外对埃塞俄比亚旱灾的大规模援助也无法应付农业和制造业收入的下降、外汇的匮乏以 128

及沉重的国防开支。政府试图采取一些保守的理财措施政策，如减少资本开支、提高对出口和进口以及消费者和奢侈品的税率、冻结政府高级官员的工资以及向国内借款等。但事实证明，这还不足以缓解其政府压力。变革之风在国际关系中也没能给埃塞俄比亚政权带来好运气。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态度发生变化，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均有下降。1988年，门格斯图访问苏联，但所获支持极其有限。相反，据说戈尔巴乔夫却希望埃塞俄比亚走上苏联模式的改革开放之路，包括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权力下放。1990年，苏联撤回其军事顾问，军事援助继续下降。到1991年军事援助协议正式到期后，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一切援助全都停止了。而恰在此时，埃塞俄比亚政府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缺乏资源和旱灾、由于重新安置居住地而导致的农村地区秩序的一系列混乱现象的出现，其中包括土地使用权问题、“村居化”问题和征收青年农民入伍等问题。门格斯图继续执行旨在改善农民状况的政策，为此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保证货物自由流通、取消价格控制、并确保土地的安全占有。1990年3月，总统门格斯图在一次讲话中向埃塞俄比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布，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已经失败，同时他还宣布一项政治集权制的新政策，但这时他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计划当中要重新建立起埃塞俄比亚与东德和朝鲜之间的财政和物质关系也没能如期实现。

“军委会”在埃塞俄比亚执政17年，最终在1991年5月被“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推翻。到“军委会”统治结束时，它在国内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后冷战时期不受欢迎的政权。对埃塞俄比亚非洲马克思主义的解析性分析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民们做出的贡献。而事实恰恰相反，农民、工人和被压迫的群体基本上没有对党的政策做出什么贡献。自从“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成立以后，所谓的埃塞俄比亚革命先锋队并没有出现。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成立于1984年，各级组织都由军人控制。“军委会”统治时期的农业生

产力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由“军委会”发动的土地改革已经被谴责为有违于现代人的心理动机，也不符合现代方法，这一发展状况破坏了社会精英延续的基础。此外，还有人认为，公社制度的实行扼杀了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的精神。尽管失败了，但“军委会”维护了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因而得到了赞许；尽管政权的前任领导们所留下的传统被严重削弱了，地位也不那么重要了，但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们还是成功地造成了外国利益集团彼此之间的矛盾，同时设法推进国内的政治目标。对“军委会”政权过渡到其继任者“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最好描述是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他指出：

> 埃塞俄比亚阶级剥削的阶级形式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子在埃塞俄比亚生根开花和结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温床。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勾画，为士兵们所盗用。后者比城市左派更聪明、更善于用计策，只是结果被乡村左派赶下了台。与此同时，乡村左派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适应“新的世界秩序”，起码在形式上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已经被放弃了。由于国际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马列主义，都未能在非洲的任何地方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点在索马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某一短暂的时间内也不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某一个地方暂时取得支配地位。即使我们抛开导致这种兴趣和支配地位的内部因素不谈，非洲也在定位自己与全球秩序的关系。这个秩序控制了它在过去的命运，也继续决定着它今天的命运。[①]

总之，埃塞俄比亚已被描述为一个背叛了最崇高的革命目标的典型例子。

---

① 巴哈鲁·泽武德：《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见《非洲观察》1981年10月第321期，“埃塞俄比亚：对过去的挑战，对未来的挑战”。

第七章　全球化和其他后现代结构形式：1991年以来的埃塞俄比亚国内外现状

131　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已经无法容忍帝制专权下的缓慢改革步伐。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们将世俗化与现代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将埃塞俄比亚的倒退落后与统治集团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因此开始了反抗所罗门王朝统治的活动。1974的革命提出了反霸权文化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想要脱离埃塞俄比亚正统的基督教。"军委会"承认这种革命的合法性，并将来自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科学权威理论据为已有。这一伎俩不仅仅架空了这些人的权力与影响力，而且"军委会"还采用马列主义思想来压制其内部可能出现的想通过各种方法过渡到世俗现代化的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政府应该关注改组民众基层政治结构这一激进目标。新政府还通过增加军事预算的办法来巩固其统治，而这笔预算原本是要用来镇压要求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人的。"军委会"还建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如农民协会、合作社、商品管理所、国家工人党、大规模教育计划等。

"军委会"还将城乡土地国有化，并且在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把132　这些土地分配给国民。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想要结束皇权专制并控制土地市场的形成，这种控制导致了强制性农产品时常剩余的实现。这一

土地政策也抑制了集体和个人的创造性，并且打消了成功农民的积极性。土地改革当中最为失败的就是彻底的集体化，也就是所谓的“村居化”（villagization）。农民们被强迫搬到既定的村庄里定居，这些村庄聚集在如水源、学校和医疗服务站这样的补给点附近。但是，计划的结果却背离了其善意的初衷，因为“村居化”扰乱了传统上的有机关系和固有的联系。有相当多所承诺的社会服务未能实现。除了食物产量迅速下滑外，“军委会”的统治还被指责利用饥荒作为武器来削弱反对派。“军委会”拒绝对一些地区进行食品援助，特别是对塔哥地区。因此，许多农民宁愿逃亡也不愿接受强制搬迁或者入伍。为了寻求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大批埃塞俄比亚人开始背井离乡，其数目比二战期间意大利入侵时的人数还要多。许多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为了能有更好的经济和事业前程也离开了这个国家。虽然“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当地阿姆哈拉语叫做“塞梅查计划”（Zemecha），作为 1975 年土地改革当中的核心内容在提高民众读写能力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全国联合普及教育战略”（the Nation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本来是用来保证革命成果的，统治阶级却利用各种知识途径（包括艺术和音乐）将该战略变成了他们推销其政治主张的工具，结果招致了学生和老师们的反对与抵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政府通过这一计划达到了对其民众进行监督的目的，并把其势力深入到了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家庭内部。

1984 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次重大饥荒，100 多万人死亡，连外国都知道那个吹嘘出来的土地改革彻底失败。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厄立特里亚中部、提格雷、沃罗（Wollo）以及贝杰姆贝尔（Begember）和波布（Bob）的部分地区。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激发起了波布杰尔多夫（Bob Geldof）和米德戈乌雷（Midge Ure）组织了现场救援活动，为救灾而赈济国际款项。尽管面临汹涌而来的财政危机和不断上升的道德腐败，国家还是发动其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官员作为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标签的证据，其实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这个

所谓的证据就是更有权力和影响的规划目标。按照这一规划，该政权在1984年创建了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并将其作为民众的“先锋队”。1986年出台的新宪法提出了建立国家议会的议案。1987年该议案被正式批准，这也宣告了埃塞俄比亚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由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任总统。

133

追思“军委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军委会”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与调整激发了埃塞俄比亚国内空前激烈的反抗情绪。而且国际援助，特别是来自东欧阵营的援助，正不断地侵蚀着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反对派，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游击战的人们，在此时看到了推翻这个不受欢迎政府的绝佳时机。反对派包括“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奥罗莫解放阵线”、“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PODO）、“埃塞俄比亚解放阵线”以及“埃塞俄比亚民主官员革命运动组织”（the Ethiopian Democratic Officers Revolutionary movement，EDURM）。还有四个主要的起义组织，分别是“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the Amhara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the South Ethiopian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这四个组织后来结盟形成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EPRDF）。这些政治活动者和游击队员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暂时抛开了个人利益而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军委会”的统治。新组织中的主要力量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和“奥罗莫解放阵线”。

随着军事行动的扩大，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马萨瓦、贡德尔、瓦罗和达布拉塔波尔（Dabra Tabor）这些港口取得了战略性胜利，并准备拿下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此时的“军委会”政府在意识到自己危险的处境后决定摆出和平姿态，同时寻求美国和

意大利以调停的方式进行援助。四面楚歌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举行了高层对话，结果却在谈判桌上留下了更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反叛军通过广泛的胜利已在民众当中拥有了很高的影响力，这已严重威胁到了"军委会"的统治。而且起义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默许，因为这些国家看到他们在该国的利益受到了来自东欧成员国的损害。

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逃亡国外。取得胜利的反叛军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并建立了过渡政府。在过渡时期，曾经是非洲大陆最庞大的军队之一的原埃塞俄比亚军队被解散，其主要的军职都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中出身提格雷的人所取代。过渡政府宣布从全国征兵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同时宣称要寻求国际援助，并追捕那些在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统治期间犯下人权罪的人。 134

政治转变与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到社会民主

作为新日程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领导的过渡政府举行了有20多个组织参加的全国会议，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管理体制。这个新建立的政府机构就是正规的"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Ethiopia，TGE)，最终由许多政治派别组成，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掌控大权，其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被选举为过渡政府的临时总统兼任过渡委员会的主席，任职期间从1991年到1995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集团里的三名主要成员在这一过渡期间控制着整个埃塞俄比亚，分别是总统梅莱斯·泽纳维、总理塔姆拉特·莱内（Tamrat Layne）和国防部长塞耶·阿布拉哈（Seeye Abraha），许多年人认为，泽纳维是战后埃塞俄比亚管理层中的重要知识分子。

新宪法根据人口数量要求从全国的选区选出550人作为人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的委员。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民众选举和立法上毫无经验，却有超过60个党派参加了1992年的

这次选举。那年的6月，来自该国人口最多地区的主要政党“奥罗莫解放阵线”退出了政治选举，该组织要么是放弃了政治选举权，要么是被迫退出了政治协议。接着，该组织还终止了停火协议并决定，如果不能通过和平商谈方式取得自治，就将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最终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奥罗莫国家。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认识到，作为联邦国家体制的埃塞俄比亚是多种族国家，国家承认每个种族都有无条件的自决和文化自治的权利，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享有的特权。在 1992 年到 1993 年间，政府开始起草新宪法，这个波及全国的问题不但在主要城市引起争论，也在广大乡村引发争议。

135

伴随着新闻自由和国内社会环境的改善，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民主成分不断增加，人权和政治活动也得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独裁统治结束后，出现了50多家新的杂志社和20多家私人报社。1994 年6 月，埃塞俄比亚第一次举行了一系列的地方政府官员选举。埃政府宣称，国家媒体将为不同的党派进行自由讨论提供时间和场所，而且为群众提供相关信息。不过该活动仅局限在选举期间，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刷品和电讯信息都必须按中央政府的政策行事。

按照 1994 年的新宪法，在 1995 年、2000 年和 2005 年分别举行了三次全国普选。虽然反对党被鼓励参加选举，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却是唯一的统治政党。1994 年 12 月新宪法规定，普选将在 1995 年 5 月份举行。新宪法还建立了新的联邦机制，允许埃塞俄比亚九个主要地区施行自治。种族联邦制的政策鼓励各自治政府制定新宪法和预算以及赋税政策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后“军委会”政府统治时期的反对派还指责了由政府任命的官员腐败和重用亲信等问题，特别是政府任命的提格雷地区的那些官员。但是，一些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注意到，尽管提格雷人掌握大权，但该区远比南部和奥罗莫地区贫困，尽管那些地区曾经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其边缘化的地区。为了维护其政策，埃政府宣布，埃塞俄比亚种族联邦制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建立在发展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政策的基础上的，这在历史上是一

种集权式的和剥夺性的，因此成为两败俱伤的争斗和内战的决定因素，并指责反对党领导人是反民主的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尽管处于矛盾境地，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统治使许多有经验的和初涉政治的人物离开了政治舞台。社会评论家和知识分子则认为，新的政治结构是分裂性的和反民主的，因为它打击了反对派。他们还认为，这一政策会束缚经济发展并使现代政治经济活动面临危险。而政府当局却辩解说，种族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变得不再重要，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体制也将随之而变得更加有效。尽管政府对这些政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团体表现了友好态度，但仍然被指责在民主态度上过于苛刻死板。泽纳维领导的政府认为，种族联邦制拥护各民族在认同自己文化、历史和身份的基础上实行自治。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通过重点介绍所罗门地区小学和中学教学大纲中关于地方文化和历史课程从而详细阐述了政府的这一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广播和电视都在使用该国主要的语言，同时电视也会播放丰富多彩的地方风俗和音乐节目。 136

由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领导的新政府所实施的第一个重要政治改革，是摒弃埃塞俄比亚在冷战时期所奉行的马列主义思想价值体系，转为施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采纳了先前的西方经济政策，政府把埃塞俄比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从 1974 —1991 年“军委会”统治时代的 2.8% 增长到了 1991—2003 年的 4.0%。另外，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991 年的 57% 下降到 2003 年的 42%。相反，服务行业则从 34% 上升到 47%。尽管如此，如同非洲其他众多国家一样，作为埃塞俄比亚潜在增长领域的工业和私企却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依旧不大。

1993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允许厄立特里亚独立，这使得埃塞俄比亚的领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埃塞俄比亚成了一个内陆国。埃政府和厄立特里亚签署了合作协议，埃塞俄比亚对外贸易额的 80% 将通过

厄立特里亚港口来实现，同时，埃塞俄比亚也是厄立特里亚80%的外贸出口国，两国还享有共同的经济体制，诸如同一货币比尔、共同拥有阿塞布港口（Assab）的炼油厂等。双方的合作协议还规定，当商品经由另一国时，应该被转运并免除海关税。一项转运协议还开辟了埃塞俄比亚到阿斯马拉的空中航线。另外，允许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在当地居住和工作，并给予在厄立特里亚的埃塞俄比亚人相同的待遇。埃塞俄比亚政府还承诺帮助重建厄立特里亚经济。政府及其支持者认为，这一解决办法有利于双边利益，但是不久便出现了反对双边协议的声音。因为厄立特里亚不公平地利用了其优势地位。他们还强调，埃塞俄比亚并未从协议里包含的产品进口免税政策上得到实惠，因为能够获得外汇的商品并不在其中。两国的发展战略也不相同，厄立特里亚被看作是外向型的和激进的，而埃塞俄比亚则被认为保守的。厄立特里亚还被指责从埃塞俄比亚购买咖啡和含油种子向外出口，并且向埃塞俄比亚贩卖未上税的商品，或驱逐自己市场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等。厄立特里亚则指责埃塞俄比亚在贸易中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歧视在埃塞俄比亚从事经济活动的厄立特里亚人。1997年11月，厄立特里亚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纳克法（nakfa），埃塞俄比亚随后就终止了与厄立特里亚在货币上的特殊关系，并选用美元制和信贷方式同其进行经济交往。埃塞俄比亚还拒绝接受与其票面等值的厄立特里亚货币。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对这一突发事件表示抗议，并在许多大学校园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但遭到了政府的严酷镇压，理由是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行动。有一个组织叫做大学教师联盟（the University Teacher's Association），该组织在皇家王朝和"军委会"专制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活动并成长起来。该组织意识到新的自由是需要代价的，结果真的是这样，许多学生和教师被赶出了校门，按照政府新制订的学校规范制度，学校的官员也被清理。

1998年5月，厄立特里亚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边境，之后便开始了两国的军事冲突，那场战争从1998年持续到2000年6月。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发动了空袭。厄立特里亚也派飞机轰

炸了埃塞俄比亚北部城市阿迪格拉特（Adigrat）和梅科雷。由于厄立特里亚积极支持奥罗莫解放阵线，该组织为寻求建立独立的奥罗莫国家而举行了暴动，两国之间的战争迅速升级，地面部队在三条战线上进行交战。为了购买新式武器，两国最后耗资达数亿美元。到 2000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占领了厄立特里亚 1/4 的领土，并在该国部署了 65 万人的军队。同时埃塞俄比亚还摧毁了厄立特里亚关键设施，驱逐了 77000 人。一些埃塞俄比亚籍的厄立特里亚人也遭到了同样待遇。在战争中，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基础设施损失超过了 20 多亿美元，埃塞俄比亚的货物在厄立特里亚港也被抢劫一空。厄立特里亚声称在那场冲突中有 19000 名厄立特里亚士兵丧生，埃塞俄比亚方面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由于旱灾和两国公民的迁移，非洲之角的难民问题雪上加霜。美国、卢旺达、非洲统一组织的外交调停努力未能奏效。战争进行了两年以后，两国终于在 2000 年 12 月在阿尔吉尔斯（Algiers）签署了停火协议。按照该协议，将在海牙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处理两国间的边界争端。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进驻两国有争议的地区。2001 年，即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结束一年以后，泽纳维开始面临国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动的反叛。中央委员会的高层人员反对总理的一些改革，很多人对他与厄立特里亚和解不满，战争还导致埃塞俄比亚应该用于公共建设的资金被转为军事用途。 138

全球化、现代化和政治认同

在社会主义面临国内和国际环境双重挑战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军委会”统治的失败，埃塞俄比亚新政府开始向知识化和政治化转变，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出现应运而生，虽然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势力后来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中占据核心地位，社会主义还是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但除了放弃其思想传统外，该政府已经别无选择。结果，埃塞俄比亚新政府开始将该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棘手问题——种族问题——作为自己政治统治的基础。但是，新政权不得不在其使命中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

特殊问题，因为当它试图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时所面对的是无数的障碍。如同非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的埃塞俄比亚经历了严重的外汇收入下滑，这是由于诸如农业产量极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政策、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所造成的。生态失衡、社会冲突、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竞争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了 1973—1974 年、1984 年和 1986 年的三次饥荒。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埃塞俄比亚的军事预算达到了顶峰，该项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在 1974—1975 年和 1989—1990 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滑到 2.3%，人均增长只有 0.4%。埃塞俄比亚财政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其外债已经达到将近 90 亿美元。

有学者提出，正是以上各种国内因素造成了埃塞俄比亚公众福利 139 事业的国际化，并成为当地和全球政治中的一个主要结果。在埃塞俄比亚，各种外部因素是该国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则不能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外部原因，因为它们已结合本国的力量形成了暂时的政治传统。在现代非洲历史故事中政治和社会改革相互交融的关键点上有两大主要思想流派：第一个流派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在历史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认为，正是欧洲殖民国家操纵了非洲之角事务，才使得孟尼利克皇帝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和巩固了阿姆哈拉贵族的统治地位。除了使畜牧和农民群体服从统治外，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还在这个地区强加给其他各种截然不同的族群。人们争辩说，这种欧—埃关系不仅标志着埃塞俄比亚的中央政权开始凌驾于地方族群之上，也标志着埃塞俄比亚将出口利益置于本国消费之上。因此，按照绝大多数人种学家的看法，这种国际化严重削弱了集体责任体制，而这种集体责任体制是埃塞俄比亚古老社会安全体制的传统形式，是一种可以通过权力转移和充分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而得到补偿的体制。泛民族主义学派也承认文化群体的历史积怨，但是他们通常指责种族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也反对知识分子们为美化精英政治去理想化地描写农民生活和古代传统从而重写历史。泛民族主义的理论家和信徒们认为，在为了争夺

市场和自然资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抱有偏见的世界里，有必要理解文化和种族差别。在埃塞俄比亚，这一学派批评了过去和现在的政府，包括古老的帝国政府、“军委会”政府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政府。他们也强调说，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独立为该国提供了一系列教训和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总之一句话，使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国家安全和统一。他们认为，由于数千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如内部通婚、贸易、移民和其他社会活动，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泛民族主义还是种族民族主义都承认，因为埃塞俄比亚有语言差别的种族群体就有 80 多个，所以这个国家的最大弱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种族间每年为争夺资源方面而发生的矛盾和竞争之中，政治领导权问题总是罪魁祸首。

泽纳维政权下放权力的政策，即当时按照不同种族国家而建立起来的种族联邦制，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家们认为，那是一个虚假的、极其危险的政策。他们指责国家保护提格雷种族的利益，因为这种做法就是由国家占有资源，然后再将资源分配给边缘地区。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南部地区对这种政策的指责更为突出，那里由讲阿姆哈拉语和奥罗莫语的人控制。还有人认为，宪法确认，任何种族群体都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经济活动而退出具有消极后果的体制，尤其是那些投资者，他们怀疑自己在这些远离他们种族“家乡”基地的地区所进行的投资是否会得到充分保护。同样，他们建议建立一个基于种族语言基础的管理框架是不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有人提出，宪法保护脱离联邦的行为很可能限制劳动力和资本跨种族流动。政府所处的地位是由中央对资源进行分配，这是必要的，因为大量的国家收入来源于进口税，这种税只有在不同地区通过农业和矿业经济收入才能获得税收。然而，埃塞俄比亚的各个群体和种族语言集团的衰落及其相互交往的瓦解展示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

140

在埃塞俄比亚，奥罗莫和阿姆哈拉这两个群体占埃塞俄比亚总人口的62%，其中前者占32%，后者占30%。另外四个种族语言族群占总人口的 19%，其中提格雷人占 6%、索马里人占 6%、古拉吉人

(Guragie) 占4%、沃拉伊塔人(Wolaita) 占3%。埃塞俄比亚61%的人口是基督徒，其中51%信奉埃塞俄比亚正教，10%信奉其他基督教派，穆斯林组成了另外33%的人口。总人口中有42%的人、城市中有81%的人讲阿姆哈拉语，他们要么把这种语言作为第一语言，要么作为第二语言。反叛和冲突的反复出现从表面看可能是种族问题造成的，但是统治和不平等通常以地区和阶级为基础。按照经济学家阿雷马耶胡·杰达(Alemayehu Geda) 的看法，两大主要历史因素造成这种古老的倾向。第一个因素是“王中王”制度，最强大的区域性皇帝变成了所有区域性皇帝的皇帝，且掌握中央集权。这个皇帝中的皇帝来自于一个地区族群，通过从不同的地区选择官员来维持他的权力，巩固这样的关系通常是子女联姻。第二个因素是，所有种族群体的农民被统治精英所控制。杰达认为，这个事实无法否认历史上北部高原地区的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对其他人的控制，但这一事实只是一个次要原因。他说，埃塞俄比亚所发生的冲突主要是通过暴力手段争夺权力带来的后果，这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且使得这个国家贫穷，且暴力盛行。他进而认为，内战是引起国家贫穷和落后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导致了阻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此外，“种族”标志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工具，这是精英们为保证其政治和经济权力安全而使用的工具。

现代埃塞俄比亚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那就是如何评估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经济改革的相互作用。曾经有人评价说，埃塞俄比亚是“市场基要主义”的牺牲品，按照这种观点，运作良好的市场要求必须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和其他商品和要素。但是，多种原因造成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武断地同时让许多国家使用同一个简单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主张实行的结构调节策略通常强调奉行鼓励国内节约和原材料出口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这对于那些有能力的非洲国家成功地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和福利通常是一剂良药。在这一点上，前世界银行的资深副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

141

斯蒂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曾在埃塞俄比亚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在他对埃塞俄比亚的描述中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认为，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在“权力政治和贫穷”之间挣扎的国家。他强调指出，跨国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设下了经济发展政策的陷阱。斯蒂格里兹高度赞扬了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在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这位领导人的政策是他对适合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原则深入理解的结果。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赞同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活动，并终止了对这个国家的补助贷款项目。这一举措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威胁了埃塞俄比亚在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主权。根据斯蒂格里兹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认可埃塞俄比亚在政治或宏观经济上的成功，包括缩减国家军事预算以缓解贫困项目所面临的资金困难，保持比较低的借贷利率，以避免把国际市场作为埃塞俄比亚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一个“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计划，该组织对这个计划的进一步解释是，埃塞俄比亚不应该将国际援助的资金投到学校、医疗机构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上，而应该以美国国债的方式将这些援助保存起来以应付不时之需。评论家指出，这一政策是福利事业国际化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民主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他们强调指出，这样以来，那些债务国就不能建立当地的福利机构，这就等于强迫这些落后国家去帮助建设那些富裕国家了。福利国家的新自由重建规划一方面试图刺激市场改革，另一方面重新配置安全网络以便将捐赠者与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用合同或项目协议联系在一起。

埃塞俄比亚最终能够制订出经济改革计划，尤其是它开放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的计划，以此来对抗由集权者所控制的前政府对一些私营部门的强制性政策。但是，现政府反对个别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私有化，因此，它实行了货币贬值政策，但是，为了满足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埃塞俄比亚在与告诫方进行磋商之后允许对进口燃料实

142 行补贴政策。在1990—1991年和1999—2000年之间，埃塞俄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分别增长了3.7%和0.7%，有人认为，倘若没有与厄立特里亚偶发的矛盾，这个数字本应该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自由化评论家曾经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生产厂商的强势竞争，埃塞俄比亚当地的食品、皮革和烟草工业都受到了消极影响，而那些发达国家的竞争者中有许多人接受了本国政府补贴和先进技术，因此，这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竞争。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出口货物也面临着输入国的高关税问题，这对于那些必须维持对外贸易的非洲生产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然而，为解决与经济改革和转变相关问题而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继续受到国内外专家的批评。例如，有人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了批评：在新宪法的约束下，埃塞俄比亚政府不允许土地私有，当时，埃塞俄比亚一直对与主要政治分歧相关的政策有争议，土地是唯一可以通过担保使用和长期租赁得到的活命工具。相反，一些经济学家则指出，如果有价值而又有生命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行之有效，必须先有一个活跃的土地市场。由于政府满足了农民获得土地和产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长期被系统地剥夺了，因而农民们对此记忆犹新，政府也就此维护了自己的政策。另外，根据政府的说法，这样的政策不仅是保持农民社会安全的唯一保障，而且是增长农业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政策还有许多争议，包括它的文化和国际援助的记录以及那些援助款项如何分配的问题等。埃塞俄比亚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和外国援助，后者是更稳定的收入。一些观察家把埃塞俄比亚归入由于腐败和错误方针导致的典型非洲欠发展模式。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经为缓解非洲地区的贫困，尤其是埃塞俄比亚的贫困问题而努力工作并受到好评，他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分析非洲事务和政策的视角。他认为，经济停滞引起了非洲文化的绝望和政治病变。萨克斯指出，非洲问题有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个是非洲评论家们所批评的腐蚀和错误方针问题；另一个是非洲评

论家们所指责的西方对非洲政治的干预问题。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自从奴隶贸易、非洲大陆殖民化时代开始以来，非洲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那以后则发生了参与冷战的国家对非洲的剥削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及其欧洲同伙的颠覆活动，这些人反对主张民族主义的非洲人，反对埃塞俄比亚寻求苏联的援助，也反对非洲人要求苏联给予比西方在非洲矿山和能源开发投资项目更优惠的项目条款。萨克斯认为，“然而，西方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非洲长期经济发展中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决策者决定美国不可能支持在非洲实行另一个马歇尔计划时，非洲的命运已经注定。即便这样，为长期经济增长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并没有停止。并不是美国官员拒绝调查分析——他们知道它是必须的——而是政治领导人不愿付钱”。[①]

以上描绘的情况是跨国金融机构的历史背景，那些金融构常常充当“走投无路时的借贷者”，它们握有通向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钥匙，逐步踏上非洲后殖民时代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了一些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因此曾经遭到许多指责，说这两个组织利用垄断权力维持着一个谜团，那就是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鲍勃·吉尔多夫（Bob Geldof）和博诺（Bono）等国际活动家特别关注埃塞俄比亚的贫苦，同时他们又带头发起宣传运动，呼吁世界上更多富国能在非洲反贫穷的全球性斗争中出更多的力气。非政府组织也批评那些富有国家对这一提议反应冷淡，奉献吝啬，这些富裕国家由于没有打破导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体制而受到指责。以上提到的这些国际活动家认为，民主应该高于选举，真正的民主包括自由机构的建立以及新闻自由等各种表现。他们认为，民主还必须纳入创造经济机会的议事日程，因为贫穷已经导致了文化

① 杰弗里·萨克斯：《贫困的结束：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性》，纽约：企鹅出版公司，2005年版。

上的绝望和政治上的病态。

还有一些学者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埃塞俄比亚经济长期蒙受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遭到软弱的政府机构和错误的公共政策的困扰，而且还要经受战争所带来的财产损害的风险。由于咖啡贸易占据埃塞俄比亚总贸易额的65%，这种依赖与单一出口贸易的经济也是导致该国家容易受到贸易波动中条款的变化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人提出，正是食品援助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农民患上这种依赖外援获得食物的综合症。评论家说，作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外国食品常年存在，这就制约了技术的革新和发明，从而逐渐削弱了国家的自尊。还有人说，捐赠者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的“牛津饥荒救援委员会”（Oxfam）等。非政府组织和国内社会组织还确定了帮助处于政府援助计划之外的埃塞俄比亚公民的途径。

在一个也许是对西方援助机构最为强烈的指责文件中，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重新审视了19世纪的所谓“白人的负担”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人道主义者的本能和真诚的友善在许多方面与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的利他动机和宣传动机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他说，殖民现代化规划的结果不那么富有成效，是因为它是由外部利益和需求所决定的，是由与“探寻者”相对立的“计划者”决定的。他说，上述活动家让世界注意非洲及世界其他贫困地区的情况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并不那么具有建设性，也不那么成功。伊斯特利注意到，这里所谓的探寻者和计划者的一个区别是，在援助人员中具有决定权的势力是计划者，相反者则是探寻者。当前者的期望值提高了但并不负责去满足这种期望时，后者就要对他们的行动负责。他给出的其他例子还有这样的事实：计划者决定供给什么，但探寻者找出什么是所需的，计划者着眼于全球，而探寻者只考虑当地的需要。他下结论说，可能最重要的是，计划者认为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他们认为贫穷是一定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探寻者则认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答案，且相信贫穷是政治、社会、历史、

144

制度和技术等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伊斯特利所从事的工作是帮助那些救助机构按照一个英国非政府组织的模式去进行救援工作，那个英国非政府组织叫做“水援助”（Water Aid），该组织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峡谷成功地开展了水利工程建设，该工程全部由埃塞俄比亚人进行建设，甚至有些村民代表参加了工程董事会。尽管有以上各种各样的方法，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在近期还是需要外国援助，且本国自己也必须寻找解决的途径。①

在最近几年，由于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府常常是暴动行动的产物，埃塞俄比亚政府一直面临着国内外强烈的批评。在2000年，40多个教授和讲师被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开除。在2001年，一场学生运动抗议政府当局过多地干预学术活动，10000多名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抗议学生赢得了来自全国其他大学和学院学生的支持，实质上导致整个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停止了运转。学生们要求警察从校园滚出去，给予他们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政府指责两个主要反对党的成员煽动了抗议行为，这两个组织分别是“全阿姆哈拉人民组织”（the All Amhara People's Organazation，AAPO）和“埃塞俄比亚民主党”（the Ethiopian Democratic Party，EDP）。但政府更关心的是普通大众对于学生要求取缔学校警察和表达自由权利呼声的同情。

尽管许多观察家最初对埃塞俄比亚在解决苏丹政治矛盾和平息社会混乱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较高评价，但是一些人权组织指责埃塞俄比亚人对在埃塞俄比亚领土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寻求避难的南方人进行了种族袭击，例如在阿努阿克文化社区（Aunak）就发生了类似事件。人权活动家指责埃赛俄比亚政府对难民进行了清理，指控他们预谋“占领”一个潜在的粮仓，西南地区的甘贝拉（Gambella）。其他人则宣称，这些社区居民遭受迫害的原因是由文化差异或他们更黑的肤色所致。政府对这些指控的回应则是，他们在该区域的军事活

145

① 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那么努力地援助而那些国家还是多灾多难且不见好转》，纽约：企鹅出版公司，2006年版。

动给那些农村地区带来了社会稳定，在那些地方发生的抢劫等暴力行为曾经对埃塞俄比亚居民的生活、交通和商业活动造成很大威胁。埃塞俄比亚南方居民已屈从于这些不公的行动，包括掠夺土地、军事和政治上的镇压等，甚至一些当选的政府官员和受益于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不平等制度的组织也萌发了正义感，追求正义的愤怒和为自由而战的情感无意间使他们有一种自己也跟着犯了罪的感觉。

2005年5月15日，埃塞俄比亚举行了国民议会和四个地方政府议会席位的大选。政府承诺，这次普选将是自由、公平的竞选，并欢迎来自欧盟和美国卡特中心（the U. S. -based Carter Center）的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政府还禁止在选举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并宣称这是和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当时，埃塞俄比亚政局并不稳定）。有计划地反对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政府的运动在城市地区最为强大。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聚集着许多埃塞俄比亚失业青年和成千上万从农村逃离到城市寻找生计但却毫无结果的人们，他们成为政治暴动潜在的力量。包括电视辩论在内的一些政治性表现都试图在埃塞俄比亚公众中制造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其中人们最为关切的是失业和饥饿等对城市地区居民生死攸关的问题。2005年5月16日清晨出来的最初统计结果显示，反对派赢得了国民议会中的大多数选票，但这个统计仅为总投票人数的1/3。当天傍晚，执政党发表声明称他们赢得的席位超过300个，而两个主要反对党——“团结与民主联盟”（the Coalition for Unity and Democracy，CUD）和“埃塞俄比亚联合民主力量”（the United Ethiopian Democratic Forces，UEDF）——随后宣布，埃塞俄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the National Election Board of Ethiopia，NEBE）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表明，在已经统计出来的200个议会席位选票中，他们的政党获得了185个，因此他们已经赢得这次选举。这一结果彻底打破了以前选举中的政治平衡。当晚，首相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禁止公众集会，并亲自担任安全部队的直接指挥官。最后一项指令是从精锐部队中调出联邦警察和特种兵来替换首都城市警察，埃塞俄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也停止选票统计工作将近一周的时间。政府当局的

这些行为激起了民众对选举出现的这些后果进行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反对党不仅通过选举增加了他们在议会的代表人数，而且包括“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the Ethiopian Democratic League）、“全埃塞俄比亚统一党”（the All Ethiopian United Party）、“埃塞俄比亚联合民主党—梅辛党”（the United Ethiopian Democratic Party-Mehin Party）、“彩虹埃塞俄比亚：民主与社会公平运动党”（Rainbow Ethiopia：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Sociao Justice）在内的“团结与民主联盟”，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赢得了所有的 23 张选票。由土木工程师海鲁·沙威尔（Hailu Shawil）领导的团结与民主联盟声称，这一结果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提供了一个自由的选择，而这种竞选结果的产生则是由于商业上的土地私有化或其他经济原因导致的。团结与民主联盟至少有四个小的派系，而相对较小的埃塞俄比亚联合民主力量也由多个派系组成，并且也在议会中获得了一些席位，尤其是来自奥罗米亚和南方地区的政党，其派系更加复杂。团结与民主联盟的支持者大部分是来自北方的阿姆哈拉人，据说，该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对提格雷人控制权力极为不满。该组织的领导人有作家兼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马拉拉·古蒂纳博士（Dr. Marara Gudina）和议会中反对派的领导议员贝耶内·彼得罗什博士（Dr. Beyene Petros）等。埃塞俄比亚联合民主力量的成员组织包括“奥罗莫国民议会”（the Oromo National Congress）、“埃塞俄比亚社会民主联邦党”（the Ethiopian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l Party）、“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联盟”（the Southern Ethiopia People's Democratic Coalition）、“全阿姆哈拉人民组织”（All-Amhara People's Organization）、“埃塞俄比亚民主统一党”（the Ethiopian Democratic Unity Party）。其他成员包括“阿法尔革命民主统一阵线”（the Afar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Unity Front，ARDUF）、“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the All Ethiopia Socialist Movement，MEISON）、“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联邦统一党”（the Ethiopian People Federal Democratic Unity Party）、“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Ethiopian People', Revolutionary Party，EPRP）“甘贝拉人民民主联合阵线”（the Gambella People's United Dem-

146

ocratic Front, GPUDF)、“奥罗莫人民解放组织”(the Oromo People's Liberation Organazation, OPLO—IBSO)、“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联盟”、“提格雷民主联盟”(the Tigr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TAND)。

由于国家将精力都投入到安抚广大农村地区上，因而这次埃塞俄比亚政治事件突出地反映出一种城乡分离的状态。在类似亚的斯亚贝巴这样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中，反对政府政策的势力相当强大。政府的一些政策，如拆除大型贫民窟的城市管理措施，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与城市的情况相比，政府选举的成功通常在农村地区得到巩固。评论家们认为，政府既是农村地区居民的地主，又是他们的捐助者。每逢饥荒和旱灾时，政府都要以借贷的方式向农村地区提供肥料和农具，还提供食物救助。然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继续受益于许多支持者对该组织的信任，这些支持者们仍然承认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有能力推翻“军委会”社会主义政权，并拯救过去几十年间建设的社会福利设施。

厄立特里亚还继续充当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避雷针角色，即它可以转移埃塞俄比亚反政府势力的注意力，不是一直有人在呼吁收回“埃塞俄比亚的红海领土”吗？这实质上就是指厄立特里亚。

2004年，梅莱斯·泽纳维被任命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大不列颠非洲事务委员会”(Great Britain's Commission for Africa)中的一员。该机构宣称加强治理和减少贫困为其目标。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埃塞俄比亚的学者和观察员们曾经试图理解一些人所说的正是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统治集团的做法造成了该国危机的恶性循环。有人认为，经过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保守主义、“军委会”的社会主义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自由主义，埃塞俄比亚已经发现现代化时代的“三位一体思想”并不能解决国家危机问题，这是因为上述政权中的政治领导人都受到各自意识形态的误导。

147

结束语：非洲现代性和埃塞俄比亚的世纪

《非洲的意识》序

驯顺地蜷缩在别致的木椅上
这精心制造的木椅本是时代的友好坐标
黑人的意识已经展翅飞翔
然而他却被囚禁其中
他向右顾盼
他向左张望
惟独忘却了审视自己
打碎枷锁回归以往
只有这一次机会
奢华与金项链闪着诱人的光芒
解放了躯体却奴役了思想
古老威严的太阳正吹出火热文明的气息
各部落强壮子孙那聪慧的心灵
以一种更加怪异的方式喘息着
令人窒息到几近死亡
他那崭新的自我意识
尽管部落患着疾病
还是渴望振作起曾经破碎的心房
他那以往与现实的主人们
带领着他们鬼魂大军
仍然在大地上出没游荡
钩住那隐秘的灵魂将它撕裂
非洲的意识还在痛苦中呻吟

依旧居无定所地四处漂荡

特塞加耶·加布雷—梅德欣（1936—2005）①

非洲人是人类历史上被迫迁移人数最多的受害者，具有非洲血统的人组成了所谓海外移民大军。对埃塞俄比亚而言，国内和地区战争导致的社会上、政治上的不稳定对公民造成了社会上、心理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创伤，其结果导致了居民的再迁移。这种奥德赛式的旅行也包括了跨越国界、文化以及时代的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旅程。其他的旅程则是追求经济机遇或逃离战争、饥荒、政治和文化压迫等社会动荡环境的必然选择。人们也许还会说，普通公民、穷人和弱势群体往往会为国际的权力之战、地方和全球力量的战略决策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后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埃塞俄比亚人占非洲人大离散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这一迁移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后半叶达到顶峰。伊丽莎白·哈尼（Elizabeth Harney）说，自从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权垮台以后，许多曾被迫流亡国外的艺术家重访或回到埃塞俄比亚定居。哈尼在非洲人大离散的历史中定义了从中世纪到现代、后现代的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和艺术及思想的表现或跨国经历。她指出，非洲历史始终是为移民史所限定的。高利润的资源贸易，加上非洲的大河流域和港口，共同塑造了非洲大陆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埃塞俄比亚商人、手工业者、艺术家、知识分子、宗教和政治领袖，对来自本地和外界的刺激做出了反应，并被迫重新考虑和协商家庭、自身及社区的关系问题。20世纪6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上层人士及他们的子女都去国外接受西方教育。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海尔·塞拉西政权的没落导致其政治统治集团的成员四处逃命，这些人也到海外寻求庇护。

埃塞俄比亚人和厄立特里亚人是定居在美国的受美国《1980年难

① 理查德·潘克赫斯特：《一位埃塞俄比亚英雄：特塞加耶·加布雷—梅德欣（1936—2005）》，见网站：Open Democracy，www.opendemocracy.net/xml/xhtml/articles/3347.html。（特塞加耶·加布雷—梅德欣是埃塞俄比亚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和艺术导演，上面的诗句应该选自他的诗作，但标题“《非洲的意识》序”的译法是否正确译者不敢肯定，原文为Prologue to African Conscience。——译者注）

民法》（the Refugee Act of 1980）庇护的最大的非洲群体。《1980 年难民法》是第一部针对来自非洲的寻求庇护者的法案。1981 年到 1984 年间，大约有 45000 名非洲人作为难民进入美国，而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非洲之角。20 世纪 80 年代末，干旱、饥荒、经济上的贫困、政治上的领土收复主义迫使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全球流动迁移大军之中。哈尼还指出，在 20 世纪下半叶，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的思想交流也大大增加。她总结道，在大离散中，携带着他们自己的历史和家庭梦想的几代移民以及为现代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埃塞俄比亚艺术家们，各自选择了居住在不同的埃塞俄比亚移民社区。

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家们在现代艺术先驱打下的地基上建设了埃塞俄比亚文化的高楼大厦，这些先驱有亚历山大·斯孔德尔·波格胡森（Alexander "Skunder" Boghossian）、戈布雷·科里斯托斯·德斯塔（Gebre Kristos Desta）和阿菲维尔克·特克雷（Afewerk Tekle）等。新一代的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秉承并利用大离散者普遍使用的方法展现埃塞俄比亚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清楚地表达出他们独一无二的现代感受。另外，人们必须注意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产品，那些产品也经过时间的考验，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独创性产品。由于集权性的政治宣传，也由于现代学者无力或不愿将其放在非洲艺术、思想、创造性以及主体性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共同理解和批判地欣赏，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文化产品被忽视了。我们有必要在埃塞俄比亚中大离散者的后现代主义结构与埃塞俄比亚国内各个不同群体对现代艺术作品的渴望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有人认为，如同绝大多数跨国的或者本地的非洲人一样，很多埃塞俄比亚人仍然带着现代的创伤，饱受无情的权力、具有破坏力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和物质产品带给他们的折磨。埃塞俄比亚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频繁的干旱和粮食短缺是发展的主要障碍。道路和通讯不畅同样也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国内和全球的埃塞俄比亚公民、学者及艺术家的呼声能够帮助减轻那些几乎仍然是展示国家病态的新闻和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个进步的游说团体来讲，应该以行动帮助改善埃塞俄比亚各个不

149

同社区那贫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在国内方面，恢复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并支持地方发展也能够促进埃塞俄比亚及非洲大陆未来的发展。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发展却是散居在美国、欧洲及中东的埃塞俄比亚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有 100 多万埃塞俄比亚人散居在海外，有 50 多万在北美。在北美洲的一些主要城市，有相当多的埃塞俄比亚移民人口。华盛顿地区拥有世界上最集中的非洲以外的埃塞俄比亚人，其中许多人由于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离开自己的国家。除华盛顿市区外，还有一些主要分布在旧金山海湾地区、亚特兰大、波士顿、纽约、休斯顿、达拉斯、洛杉矶、圣地亚哥、西雅图和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有一个概念叫做“小埃塞俄比亚”（Little Ethiopia），是指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费尔法克斯大道的卡塞区（the Carthay），位于奥林匹克和皮科大道之间。在那里，埃塞俄比亚人显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就，而且在专业创造中获得了成功。在美国，几乎在每一个大城市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黑人餐厅，埃塞俄比亚正教教堂也很常见。在有埃塞俄比亚人居住的大多数城市里，他们投资房地产和商业网点，这些实业面向独特的文化社区，也迎合了一般民众的需求。他们还投资建立了服务部门和文化中心。国外的埃塞俄比亚人对自己的祖国仍有深深的依恋。很多人向家里汇款，这些钱甚至不比埃塞俄比亚国家外贸出口获得的年收入少。该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咖啡，在 1999 年出口量为 105000 吨，赚得 2.67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还组织宣传活动和研讨会，旨在利用海外资源缩小本国经济发展与国外的差距。有消息指出，数千名移民已返回亚的斯亚贝巴，他们发起运动，以吸引更多提供税收优惠的进口产品以及修改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一些在华盛顿的使馆官员已前往美洲的埃塞俄比亚人社区，挨家挨户地游说一些爱国企业回国发展。2006 年 9 月，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宣布，埃塞俄比亚人的国外汇款已增至 37.1 亿美元，在过去 3 年里增加了近 60%。据称，如果按照非正式方法计算，这些实际收入的总数还会增加。

150

埃塞俄比亚社会在真实和虚拟的空间组织公民、文化和社会活动，

因而在这一稳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埃塞俄比亚的各种社团强调互助、福利、运动、艺术及康乐活动。“埃塞俄比亚美国理事会”（the Ethiopian American Council）及“北美洲埃塞俄比亚运动同盟”（the Ethiopian Sports Federation of North America）每年都在洛杉矶组织埃塞俄比亚人足球赛和文化节。但是，埃塞俄比亚人在以上各个国家的漂泊可以证明，他们并不缺乏良好的经历，比如与移民人口相关联的经历，这些人口有时候被限制在现代及后现代经济社会的边缘。如同很多生活在这些社区的埃塞俄比亚第一代移民一样，新移民在新居住地常常遭受歧视和职业方面的虐待。很多埃塞俄比亚企业也同样经常失去自己的地盘，在大离散过程中将独特的埃塞俄比亚艺术领地让给了后现代主义和中产阶级开发的项目。埃塞俄比亚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紧张局面也曾经出现过，这使得很多本地居民对于将生存之地让给新来的移民感到不快。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拥有高超的学术和职业素养，但却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的工作。由于这些散居人口的增长，可以乘从华盛顿和纽瓦克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班，直接到达埃塞俄比亚。但是，大离散人口对于埃美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尚未得到充分实现。

埃塞俄比亚文学、历史文献及国产电影批判了放纵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给埃塞俄比亚文化造成困境的西方化，还批判了埃塞俄比亚曾经历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戈尔马切乌·特克雷·哈瓦里亚特（Germachew Tekle Hawariat）号召通过将宗教精神与世俗精神分开的世俗化的方式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科贝德·米卡耶尔（Kebede Mikael）在其《什么是文明?》(*Silitane Mininech?*）中也将现代化的失败归咎于疏离 、不认同、道德水平的下降和显而易见的耗费。与积极因素相比，大离散人口所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少一些，人们发现，大离散的人也是冲突火焰的煽动者，埃塞俄比亚的离散人口也参与了一些冲突。据称，散居在外的埃塞俄比亚人抱怨长时间的经济冲突，他们为冲突提供资金援助，为暴动提供思想指导。散居在外的埃塞俄比亚人也渴望得到新居住地的合法身份，在那里，他们可以避免遭受暴

151

力和冲突的侵犯。

全球的、非洲大陆的以及区域性的发展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在21世纪初期，非洲之角又一次成为古老地缘政治的突出例证。这个地区的问题已经几乎成为全球政治和外交的核心议题，尤其是每年发生的涉及身份、资源和中东领土等方面的长期冲突，尽管一些时髦的历史故事总是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习惯强调当地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争斗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和秩序混乱。直到20世纪末，超越国界的宗教和政治激进主义的蔓延对新的解构性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发生于1993年的索马里游击队（忠实于军阀穆罕默德·法拉哈·艾迪德）与美国军队之间的摩加迪沙战役使这一地区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场冲突导致了一部名为《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的电影的产生，战争中1000—1500名索马里军民丧生，3000—4000人受伤。另外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73人受伤。

在冷战结束后，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战略位置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暴力冲突被认为是领土扩张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的冲突。在冷战时期那几十年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战争。冲突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社会经济组织遭到瓦解，经济活动遭到破坏。埃塞俄比亚后来与索马里总统阿卜杜拉希·尤素福（Abdullahi Yussuf）签下的长期结盟条约帮助他击退伊斯兰军的威胁。索马里后来进入无政府状态，几个大军阀瓜分了首都。埃塞尔比亚在索马里的利益也受到本国反对派存在的影响，它们是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the 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该组织最初是由索马里人发起建立的）。自从2001年9月以来，当美国与伊拉克阿尔凯达运动（Al-Queda）领导人领导的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发生冲突时，非洲之角又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时局的发展给类似于泽纳维领导的埃塞俄比亚这样的非洲世俗政治国家提供了战略价值。在其他的例子中，西方暗地里为虽然有些偏执却负责任的埃塞俄比亚宗教界精英人士提供支持。2006年7月，埃塞俄比亚军队穿越边界干涉邻国索马里的内

152

政。索马里的伊斯兰军队后来威胁说要发动一场对抗埃塞俄比亚的圣战。一些观察家曾经提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埃塞俄比亚国家存在已久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相互容忍不应该被日益增长的压力所破坏。他们强调，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美国可能对埃塞俄比亚拥有可行的社会基础和可维持的经济发展的现代主义愿望比对打击恐怖主义更感兴趣。或许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不希望好的政制管理和人权为了满足西方政治和经济势力而做出牺牲。一些人指望西方政府对埃塞俄比亚执政党施加一些限制。他们控诉泽纳维领导的独裁政府监禁社会和政治进步人士，而那些被监禁者所谓的“罪过”只不过是试图在埃塞俄比亚建立逐渐扩大的民主统治。

维持非洲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大不列颠非洲事务委员会”中的一员[①]，该委员会的目标旨在减少埃塞俄比亚的贫困，但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埃塞俄比亚是否会得到为了相互争斗的经济计划和为了权力和资源的政治冲突而提供的重大援助。如果二战后建立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行，那么西方会通过军事影响来关注扩张或者巩固它们的影响力，而不是提供发展手段和物质援助。但是，冷战后为了国际福利而进行的进步的跨国政治游说已经被市场、地缘军事理性主义以及政治腐败所破坏，因此选择军事行动在当时非常流行。2006 年 8 月，美国宣告说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都赞同成立一个非洲（军事）指挥部（African Command），强调一种预防的方法而不是保留一个二战遗留下来的防御的姿态。二战后的非洲重建计划没有像帮助欧洲复兴经济的马歇尔计划那样推动非洲经济的发展，它不仅使人们对非洲大陆濒于崩溃的印象更加深刻，而且现在又表明那里是一个容易产生激进和极端活动的大陆。在这种情况下，2005 年 3 月，美国将军约翰·阿比泽德（John Abizaid）在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明显强调了非洲之角的重要性、问

① 本书原文中对梅莱斯·泽纳维用的是 Menawi 一词，原文下面还有一处也使用了同一个词，原书作者是否用这个合成词来代替原来的名字不得而知，但我们认为这里应该属于印刷错误。——译者注

题及无休止的军事冲突，这位将军的陈述如下：

> 非洲之角是极易被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组织、恐怖组织和种族主义者所渗透的地区。阿尔凯达运动就曾经有在这一地区计划、培训并实施恐怖袭击的历史，例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就是证据。由于存在一系列危险的挑战性因素，包括极度贫穷、腐败、内部争斗、边界冲突、无法控制的边界与领土的水源问题、极其脆弱的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的能力、自然灾害、妇女问题、缺乏足够的水资源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地区的局势变化无常，而这些严峻的挑战形成的综合症为极端分子和犯罪组织从事活动创造了环境。①

153

除了上述情况而外，阿比泽德将军还说，吉布提军事基地“非洲之角统一行动武装力量”（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Horn of Africa，CJTF-HOA）的总指挥，曾经与美国大使馆进行过私人合作，但他却否认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区活动，这实质上是在该地区为恐怖主义做宣传。他继续说，因此，训练当地安全部队和国防军、低一级别的公民规划如挖井、建造学校和捐献图书、在偏僻遥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医疗诊所等活动就显得十分重要。

尽管阿比泽德将军以上所说的目标令人称赞，但是，使用军事干预与促进和平民主发展的社会工程相结合的纪录表明，这并不是当前最好的方案。那些努力已经导致了许多人所描述的多种形式的新式“托管国”，即自由帝国主义或后现代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当我们参照埃塞俄比亚的需求来描述文化极端主义和经常出现的不能公平的获得资源和权力这一问题时，上述国际问题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埃塞俄比亚总理泽纳维用简单化的、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就是明证。

---

① 美国将军约翰·阿比泽德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的演讲，2006年8月24日，《纽约时报》。

埃塞俄比亚各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对话和活动也经常充斥着激动的诽谤与责骂，上述因素都成为埃塞俄比亚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成熟发展的障碍。

对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同样重要的还有，政府有责任发展一种保护企业家活动的混合经济，同时还要发展由不同社会实体构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综合机制。在过去的40年中，埃塞俄比亚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6%，而在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率却在2.6%以上，这一事实足以证明问题的存在。同时，环境问题的挑战也开始出现，如环境污染和臭氧层变薄，也都在极大地破坏和威胁着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质量。

研究埃塞俄比亚历史的学者和学生们在回顾这个现代主义帝国政权的时候往往首先认识这个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然后是对获得政治稳定和较好生活方式的各种渴望而感到鼓舞。特沃德罗斯皇帝是第一个承认埃塞俄比亚发展滞后的人并因此受到赞誉。他通过统一埃塞俄比亚破裂的政体开始了他的现代化工程，使国家处于“有序政治统治”（阿姆哈拉语叫做Ser'at）的旗帜下，同时向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寻求技术上的援助。孟尼利克皇帝巩固了帝国统治当局，维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并且利用必要的基础设施开始创建和支持一个现代埃塞俄比亚教育精英群体。海尔·塞拉西皇帝也被认为在向埃塞俄比亚引进现代设施、基础结构和政府管理机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有一些严重的缺陷，但与20世纪最后时期几届政权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相比，帝国政权还是经历了相对的稳定时期。而且，帝国政权一直为现代公民和商业活动建立合法结构体制而努力，并因此而受到赞誉。有些学者认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些行业机构，如埃塞俄比亚航空业、服务业、国家银行和财政部，都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些现代行业机构将国家长期以来独特的历史与该国传统的政府机构和社会形态结合在一起，保护埃塞俄比亚没有被不稳的政治环境、通过暴力更迭政权和糟糕的管理所击垮。海尔·塞拉西皇帝去世25年以后才被重新埋葬在“神圣三位一体教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在亚的

154

斯亚贝巴参加他葬礼仪式的著名人物中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人，那就是著名雷盖乐偶像、歌手波布·马尔莱（Bob Marley）的遗孀利塔·马尔莱（Rita Marley），她不但表达了自己对海尔·塞拉西的尊敬，而且还代表数百万牙买加塔法里信徒前来表示他们的瞻仰之情，这些教徒中的大多数人仍旧把海尔·塞拉西看成是神圣上帝的体现，并且把他置于现代非洲社会和政治思想偶像的顶端。

对海尔·塞拉西的一个最高荣誉就是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在全球政治舞台中的重要地位可以通过波布·马尔莱的歌词“战争”体现出来。歌曲源于1963年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一次讲演。演讲中，海尔·塞拉西号召全世界人民在不分种族、阶级、国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与平等。马尔莱在歌曲中断定，只有实现平等的社会，才会消除战争。除了波布·马尔莱在歌曲中引用了皇帝那次讲话的一段内容外，塞拉西在1963年的那次讲演中还特别呼吁联合国官员和各国代表为消灭核武器和结束国际剥削而努力，特别是针对非洲的剥削。在那首歌曲中，波布·马尔莱赞颂了海尔·塞拉西一世，并呼吁行动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和国际上的不公平行为。

下面是马尔莱用在“战争”那首歌词中的海尔·塞拉西的那部分演讲：

> 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又上了一堂课：直到赞同民族优劣之别的哲学最终失去信誉且将永远被遗弃时，直到任何国家不再有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差别时，直到人类的肤色仅仅和眼睛的颜色一样不再重要时，直到人类基本的权利不分种族、平等地得到保障时，直到持久和平和世界公民意识以及国际道德规范的梦想得以保持，但又不断追求新的梦想且决不会最终停止追求时，直到控制我们的兄弟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卑微政权已经被瓦解和毁灭时，直到那种持偏见态度、恶意的、无人性的利己主义被理解、容忍和亲善

155

> 所取代时，直到所有的非洲人站起来说我们已经自由了，并在所有人的眼中是平等的人，就像他们在上苍的眼中一样时，直到非洲大陆不再谈论和平问题的那一天到来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非洲将战斗下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有着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自信。
>
> ——海尔·塞拉西①

传统埃塞俄比亚文化和本地正教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哲学家梅塞·科贝德（Messay Kebede）对于向埃塞俄比亚的知识分子灌输将世俗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西方理论的做法进行了谴责，他认为，在埃塞俄比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该国重新现代化就是现代经济和政治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除了宗教、艺术和文化产品方面的成就外，埃塞俄比亚的传统还能够肩负起使传统城市、农村乃至大离散群体保持其社会连续性的责任。例如，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货币市场和自助组织已经创建并保持了在变化的环境和已有的现状中实行的双重市场系统。有一种由一小批人建立的组织，叫做“伊奎布”（Iquib），它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会员提供持续不断的流转资金，帮助他们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有一种组织叫做“伊迪尔”（Idir），是由邻居或者工人们之间建立的一个互助社，目的是为他们聚集资金以应对急需，如成员的家人故去造成的窘境等。这两种社会经济传统组织广泛实行于埃塞俄比亚人之间，具有非正式性和自下而上的特点。这些机构虽是民族现象，但它们跨越埃塞俄比亚人的语言、宗教和种族背景。这些具有数世纪历史古老经济、社会和心理支持网络和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根基，几个世纪以来在国家福利和国际援助之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海尔·塞拉西皇帝已经建立了一种薪金机制，这种机

① 战争（波布·马尔莱的歌词），见维基百科全书网，http：//wikipedia. org/wiki/War (Bob Marley-song)。

制支撑着政府的公务，并且为建立地方工业、市场销路提供便利的渠道，公民社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的。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在20世纪60年代，塞拉西的经济计划被认为是作为皇室政权的三个发展计划中最有成效的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农场和食品加工厂的投资已经具有了将古老的封建贵族阶级转化为初期的企业家阶级的潜力。但是，尽管有这些进展，帝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统治本质上还是“封建”的，这种社会结构明显分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这个体制中，君主政权处于社会的最上层。封建社会将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少数人控制农民耕种土地得来的产品，进而使个人奋斗的思想难以产生。君主、地区首领以及皇家和首领手下的官员在教会的支持下主要关注如何巩固其军事、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大多数研究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的学者已经取得共识，他们一致认为，除非并且直到这个国家有一次真正的改革，经过改革后的政府对人民负责，否则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上将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和暴力。也有人认为，民主和政治的改革在经济萧条的条件下是难以成功的，因此，市场基要主义者只能有助于将非洲之角建设成为培育富有冒险精神、政治投机分子和激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温床。

156

但是，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对本质主义者表示了不满，因为他们经常在全球媒体中呈现埃塞俄比亚人无助的受害者形象。不满者认为，由于几乎没有或根本不对非洲大陆落后状态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进行分析，使得这些形象将非洲大陆病态化了。他们还指出，这种僵化的埃塞俄比亚消极形象在逻辑上完全是西方现代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排除在现代化之外，甚至仍旧将非洲大陆视为西方列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同样，还有一些人认为，那种形象是意识形态矛盾的组成部分，使全球经济中富国与穷国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体化了。

尽管其土地广阔，其人力和物力资源还没有得到开发，因而具有增长潜力，但埃塞俄比亚的既定目标就是争取外援，并以此作为反对外国投资的手段。尽管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政治改革，并且经济部门实

行了自由化政策，但外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直接投资被认为还是微不足道的。需要强调的是，对埃塞俄比亚经济的重大外国投资活动是通过穆罕默德国际发展研究组织公司（Mohamme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 & Companies，MIDROC）来进行的，这家公司的拥有者是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尔阿穆迪酋长（Mohammed Hussein Al-Amoudi），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后来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大亨。这家公司投资工业、服务业、农业产品加工业，使阿尔阿穆迪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富有的资本家。该公司在埃塞俄比亚许多相对孤立的社区和荒凉地带进行很多投资，这些地区曾经是实现经济成功特别是建立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有人认为，经济活动的不安全性弥漫在埃塞俄比亚整个法律体系当中，例如法律条款、合同的强制执行、财产权的安全性等，这种情况是建立在不稳定的政治基础之上的。但是，该国并不考虑这些漏洞的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原材料，例如咖啡等，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从农村地区直接进入全球市场，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国家。

用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的话来说，从总体方面看，埃塞俄比亚的未来是与非洲的未来不可分割的，而从具体的方面来说，又是与非洲之角联系在一起。他在其论文中强调说，那些居住在所属区域内 157 人民之间的种族联系，例如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索马里兰都有阿法尔人；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都有讲提格雷语的人。在这一背景下，泽武德主张在更大的区域内放宽殖民边界。泽武德预计，在未来，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物力和人力资源可能是分区联盟（国家）的核心。他继续说，这就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必须复兴其政治文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它还必须发展私有经济并保护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劳动力向更有利的地理、经济或专业的环境流动，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埃塞俄比亚成熟的知识分子和熟练技术工人的流失。

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基本特点造成了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失败，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外国经济侵入非洲之角区域，其中包括在资源和市场驱动下欧洲列强的扩张，与他们的扩张活动相伴的地缘政

治和宗教扩张主义等。在 1868 年和 1896 年之间，对埃塞俄比亚的外来干预有三次来自埃及人，四次来自穆斯林，五次来自意大利，一次来自英国。旷日持久的冲突加剧了国内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埃塞俄比亚政治文化的军事化。这些冲突也对埃塞俄比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许多欧洲官员认为，非洲国家国内的奴隶制度构成了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政治介入的理由，但有证据表明，在非洲之角的殖民企业在欧洲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控制之下，而这种欧洲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又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进而经常与国际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潜移默化地勾结在一起，贬低非洲文化、思想和福利利益。我们还必须看到那些旅居国外的宗教和世俗人士的贡献，即使是在这个时代，他们仍然具有良好的动机通过物质和道义支持帮助埃塞俄比亚的穷人和弱势群体。他们是当今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或个人活动家，他们的活动代表埃塞俄比亚及其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另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具有我们熟悉的种种倾向。

在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沿革中，本书探索了两个重要的全球化时代，这两个时代都未能解决普通非洲人的问题。用哲学家奥鲁菲米·泰沃（Olufemi Taiwo）的话说，学者和决策者们以牺牲主体驱动全球化（subjectivity-driven globalization）为代价，过分强调了结构驱动全球化（structure-driven globalization）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要想再次正确认识全球化，就必须承诺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大量资源，使非 158 洲人不仅作为人类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更多的精力去实现共同生存和建立可以从事正常的商业及自由的政治活动的繁荣社会。关于研究埃塞俄比亚的现代性的相关分析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在上述将埃塞俄比亚兴衰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存在作为背景进行叙述的同时，最近又有人号召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不要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分开。在重新界定自由、身份和历史这些概念中，有人认为，埃塞俄比亚应作为一个主题，它具有独特的基础，而不是作为一个必须根

据外部模式进行改造的社会。在这方面，我强调了如下四个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最近的职业生涯，他们已经成功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埃塞俄比亚文化，同时也展示了非洲文化。斯孔德尔·波格胡西安（Skunder Boghossian）出生于1937年，现代非洲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人物。1955年，他首次短暂逗留西方，而后移民英国，在政府奖学金的支持下在此学习。穆拉图·阿斯塔特切（Mulatu Astatqe），一位音乐家和作曲家，被誉为“埃塞俄比亚爵士乐之父”。1943年他出生于埃塞俄比亚西部城市季马，在伦敦、纽约和波士顿接受过训练。海尔·戈里马（Haile Gerima），一位导演、制片人、音乐家和大学教授，1968年来到美国。阿斯特尔·阿维克（Aster Aweke），1961年出生于贡德尔的成功音乐家，亚的斯亚贝巴的海格菲基尔剧院（Hager Fikir Theatre）的创始人，该剧院被认为是非洲最好的也最古老的剧院。

斯孔德尔·波格胡西安于2005年去世，他所从事的职业使他得以周游世界，在此期间他与非洲艺术家和黑人文化传统运动知识分子切磋。他还批判性地参与了法国超现实主义和非洲裔美国爵士乐艺术家的工作。在此背景下，斯孔德尔娴熟地把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文化遗产运用在他的作品中。有人认为，他的技巧来自于其有洞察力的风格，这种风格使他能够再现广阔视觉的图案、神话和各种书法方式。据说，他已经将它们转变成了有质感的世界，这个世界纯粹属于他自己，但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可以体验到。

穆拉图·阿斯塔特切是埃塞俄比亚杰出的当代作曲家、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家。他成功地把黑人音乐与他在国外学习时见到的多种因素的影响相融合。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国务院组织了一次全球之旅，其中一站就是埃塞俄比亚，以便听取传奇爵士乐音乐家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音乐。结果显示，根据彭尼·冯·埃申（Penny Von Eschen）的记述，这是艾灵顿和阿斯塔特切之间的一次音乐协作，是美国官员所记录的最成功的巡回演出。冯·埃申引用一个“美国信息服务处”（U. S. Information Service）新闻稿中的话说：“萨克斯管、小号、长号与埃塞俄比亚的马欣孔（masinko）和瓦申特（wash-

int）等传统乐器同台合作演奏，艾灵顿乐队的一名成员说：‘音乐从此再也不那么千篇一律了。’”

海尔·戈里马制作了广受欢迎的电影，包括拍摄于1993年的虚构电影“桑孔法”（Sankofa），摄于1975年的“丰收3000年”（Mirt sost shoamet）以及摄于2000年的纪录片“阿杜瓦：一个非洲人的胜利”（Adwa：an African Victory）。从这些电影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埃塞俄比亚首要电影制片人之一。通过电影和文化的生产，他主要探索埃塞俄比亚人和非洲移民的历史、主体性和身份认同问题。

159

阿斯特尔·阿维克的职业歌唱生涯开始于亚的斯亚贝巴的俱乐部和酒店，当时她刚刚步入青春时代。她供职的乐队有大陆乐队、非洲酒店乐队、舍贝尔乐队和野山羊乐队。后来她开始独唱生涯，但家乡缺乏政治和艺术的自由，她感觉无法施展自已的才华。1981年，阿维克移民美国，定居在华盛顿特区。她在当地埃塞俄比亚餐馆重新开始职业表演，在这一过程中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础。1985年，她在欧洲和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现在，她在埃塞俄比亚的国外移民社区中非常受欢迎。她被描述为她的人民的心声，她也许是埃塞俄比亚最有名的女歌手。

当流行的历史叙事将非洲排除在现代性之外，或者将非洲大陆置于苍白的普通人性之中，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和文明便构成了宝贵的反历史叙事的故事。上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文化产品代表了某种现代层面上的埃塞俄比亚复兴。也许这种精神的缩影就是特塞加耶·加布雷—梅德欣，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最伟大的剧作家和最受欢迎的桂冠诗人。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潘克赫斯特记载，特塞加耶是埃塞俄比亚悠久的独立历史的骄傲，也是埃塞俄比亚独特文化遗产的骄傲。他还利用剧院让人们了解埃塞俄比亚过去的英雄故事。他在晚年非常关注和平、人权和人类尊严等问题。特塞加耶一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无论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他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围绕收回埃塞俄比亚那些被侵略者掠夺走的珍宝而进行的斗争。同在埃塞俄比亚和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包括潘克赫斯特）一道，特塞

加耶帮助激发民众，支持埃塞俄比亚要求归还在1937年被意大利法西斯份子墨索里尼下令抢劫走的阿克苏姆方尖石碑。阿克苏姆方尖石碑具有1700年的历史，用整块石料雕成，高24米（78英尺），重160吨，60年来一直矗立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广场。2005年4月，该石碑被运回到祖国埃塞俄比亚。古老的纪念碑与一个牧师代表团、国家官员和欢快的公民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见面了。要求英国归还的有，英国人在1868年从特沃德罗斯皇帝的莫达拉城堡中夺走的手稿、十字架、帐篷和其他一些历史文物，这些问题目前仍悬而未决，其中的一些文物仍在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以及温莎城堡英国皇家图书馆里存放，其中有六部十分精美的埃塞俄比亚图解手稿。有一些埃塞俄比亚运动员，例如阿贝贝·比基拉（Abebe Bikila）、穆鲁斯·耶弗特尔（Muruse Yefter）、马穆·沃尔德（Mamo Wolde）、阿迪斯·阿贝贝（Addis Abebe）、德拉尔图·图鲁（Derartu Tulu）、海尔·戈布尔塞拉西（Haile Gebrselassie）和法图玛·罗巴（Fatuma Roba）都是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拜。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现代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史等方面，本书还包括对全球化的自由发展和各种现代福利制度的评价。新世纪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讨论提供了具有竞争性的范例。南南合作和非洲内部合作的新思想正在取得的共识，与二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这些新主张不是植根于种族的或所谓的正统经济思想，而是植根于相互交流和互利互惠的国家利益。例如，2006年是中国与非洲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一次非洲首脑高峰会议上，非洲各国首脑济济一堂庆祝这个壮举。这个首脑会议的宣言呼吁富裕国家为非洲提供更多的援助从而消除贫困，制止荒漠化，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阅读这部分首脑会议总结的宣言时宣称，中国和非洲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一致利益，这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前景。同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非洲人能够极大地受益于中国的成功经验。 160

许多贸易专家，包括世界银行也都表示，中国和印度与非洲贸易的增长仍有巨大潜力。2006 年，非洲出口货物中有 27% 输出到亚洲，这个数字相当于 1990 数额的 3 倍。亚洲向非洲的出口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即以每年 18% 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超过了全球任何其他区域。

但是，西方和非洲的部分官员们也都表示了对中国在非洲的角色预示着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危险，但据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恩戈齐·奥康乔·伊维阿拉（Ngozi Okonjo Iweala）的看法，中非关系比人们见到的还要多。她承认，非洲国家必须提防旧的奴役陷阱不要被带有闪着光泽的新陷阱所替代。同时，她补充说，当涉及经济增长和转变的时候，中国可以提供许多当今非洲所需要的东西。奥康乔·伊维阿拉继续说，中国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并已形成一个成功地创造财富的公式，那就是愿意同非洲国家分享财富。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协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应这一要求，估计中国在未来 10 年间将在非洲投资 20 亿美元。有人曾经认为，非洲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范式似乎已经陷入了外国援助的泥潭，在外国在非洲经济投资不多的情况下，随着非洲的发展，中国似乎愿意在非洲铁路、公路、港口和农村电信等建设项目上进行投资，以实现其进入非洲资源开发的目标。基于上述理由，奥康乔·伊维阿总结说，中国必将单独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而西方国家需要的则很简单，那就必须学会与之竞争（BBC 新闻，2006 年 10 月 24 日）。

161 但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关系目前与平衡还相去甚远。2004 年，中国出口到埃塞俄比亚的商品超过两个国家双边贸易额的 93% 。然而，在 2005 年上半年，中国从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索马里兰）采购的货物则微不足道。这种不平衡最终很可能使这些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疏远。人们常常强调，同西方国家的企业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相比，中国企业少一些“道德约束”。然而，这个信条不能完全信以为真，因为非洲与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最多只是不谐调而已。研究表明，有些国家为了取得建立在目前非洲“国家利益”之上的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而往往宁可牺牲现代自由主

义中固有的进步思想，因为这一目标更诱人。在这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作为非洲生存和发展必要手段的一部分，人权、民主、自由和经济增长这些相关问题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这方面，西方非政府组织能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可以代表非洲年轻的民主国家，如埃塞俄比亚，进行教育和游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向非洲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内合作伙伴强调指出，不应该为了经济发展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和社区的需求。在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缺乏有利的职业环境、缺少创造渠道和应有的地位安排的情况下，神权政治或其他革命的政治形式选择难免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表达主流意识的现代传媒已经因其不屑于批判性地评价落后国家特别是非洲问题的发展而受到指责。2006 年中非首脑峰会结束后，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塞尤姆·梅斯芬（Seyoum Mesfin）宣布说，令人感到失望的是西方媒体对与会领导人进行了带有“侮辱性”（tainted）的报道，这种报道对这次峰会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次非洲独裁者的聚会，他们找到了新家园和新朋友，以此逃避西方的压力，逃避责任和对人权的尊重。”（《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2006 年 11 月 6 日）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介绍，一些学者强调应该加强理论建设，增加专门报道非洲的媒体，由于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相结合的新一代已经出发，埃塞俄比亚就属于这类国家，非洲之角未来的 10 年必将是和平的年代。因此，埃塞俄比亚正在受益于其旅游业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旅游地有北部的历史路线，包括巴赫达尔（Bahir Dar）、贡德尔、阿克苏姆、马卡雷（Makealle）和拉利贝拉（Lalibela）等地。重要的经济和行政中心亚的斯亚贝巴理所当然也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地。此外，埃塞俄比亚已经与世界各国建立了联系。2006 年，埃塞俄比亚主动提出从尼日利亚雇佣 600 名教授到埃塞俄比亚新创建的 12 所大学教书。埃塞俄比亚之所以对尼日利亚感兴趣，是因为尼日利亚在埃塞俄比亚的“技术援助队”（the Technical Aid Corps，TAC）表现得很出色，这个队伍是 1987 年由尼日利亚政府创建的一个国际志愿服务队，目的是以实际行动体现南南合作。

162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塞俄比亚人已为文明的理念和现代性做出了牺牲，他们拥抱新思想，同时多方面抵制外来强加的、具有等级意识且具有排外倾向的现代标准。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体会到非洲人的主体意识、民族国家这个“容器”的复杂性、全球化现象变化的戏剧性，以及在现代性普遍历史故事应用中历史和文化独特发展原则的相关性。

埃塞俄比亚历史名人录

阿布拉哈，西耶（Abraha，Seeye），20世纪最后25年里埃塞俄比亚 163
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提格雷民族解放阵线（TPLF）战时的领袖，90年代成为新总统梅莱斯·泽纳维的国防大臣（部长），并且成为埃塞俄比亚民族革命民主阵线（EPRDF）领导集团3名核心人物之一，这一组织曾在1991—1995年间统治埃塞俄比亚，直到通过选举方式在埃塞俄比亚确立起新的民主制度为止。

阿法沃尔克，贾布拉·伊亚苏斯（Afawarq，Gabra Iyasus，1868—1947），作为埃塞俄比亚作家，很可能是埃塞俄比亚第一位小说家，因此而声望显赫。他是第一批在国外接受艺术方面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中的一个。19世纪初他在位于恩托托的玛利亚教会工作，后被孟尼利克皇帝派往意大利，跟随埃塞俄比亚驻意大利大使安托尼里伯爵学习。阿法沃尔克先在意大利都灵市的阿尔贝蒂诺学院学习艺术，但是很快放弃艺术学习而改攻文学和政治学。因为他在第二次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中发表的言论，阿法沃尔克又是一位倍受争议的人，他的那些言论证明，他不反对法西斯政权现代主义者的一些使命观。

阿费沃克，特克里（Afewerk，Tekle，1932—），埃塞俄比亚最受颂扬的艺术家之一，尤其以他的有关非洲和基督教题材的绘画和着色玻璃

制品而著名。他出生在安科柏，成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意大利占领大部分地区和被战争摧残的埃塞俄比亚。二战以后，他在1947年决心帮助重建埃塞俄比亚，并被选取到英国学习矿业工程学。动身前，阿费沃克和其他海外留学人员听取了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演讲。阿费沃克回忆说，皇帝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努力学习，当你们从国外回来时不要告诉我你们在欧洲看见了多高的建筑，或者他们有多宽的街道，只要保证你们是满载着能够重建埃塞俄比亚的技术和坚定意志而归。"

164

阿梅德，马穆德（Ahmed，Mahmoud），巧妙地混合发展了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音乐30多年，尤其是将原来作为爵士乐风格特色的5音符模式混合为复杂的循环急速拍打声韵律，从而使音乐带有明显的受到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影响的痕迹。从阿梅德录制唱片开始，几乎马上就成为了歌星。阿梅德凭借融合过去与现在的音乐风格而赢得荣誉。

阿里，耶什梅贝特（Ali，Yeshimebel），武伊泽罗（后来称伊马—霍伊 Ima-hoi）·武莱特·吉奥尔吉斯和阿拉·阿布巴·吉法尔的女儿，拉斯·马康南的妻子，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母亲。她在皇帝的幼年就过世了。她的母亲和姐姐，武伊泽罗·马米特帮助照顾她年幼的儿子一直到他长大成人。

阿姆达—塞永一世皇帝（Amda-Seyon I，1313—1344），在沿海低地地区穆斯林各王国重建埃塞俄比亚封建王国的统治者。根据爱德华·乌尔兰朵夫的著述："阿姆达—塞永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帝之一，14世纪卓越的非洲之角统治者。"埃塞俄比亚早期的一些文学作品就完成于阿姆达—塞永的统治时期。在那些著作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列王传奇》，该书在厄立特里亚统治者亚耶比卡·埃格兹的要求下被人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有：德卜勒戈尔的耶莎克创作的《天地奥秘》[1]；还有《亚历山大大帝史》

① 该书原文名为 Mashafa Mestira Samay Wamedr，但无法翻译为汉语，根据原书这个书名我们查找了维基百科网，发现《埃塞俄比亚史》书中此段文字与该网站完全一样，我们无法断定谁从谁那里引来的，根据括号中的英文 The Book of the Mysteries of Heaven and Earth，我们将这本书翻译为《天地奥秘》，下面的内容也与此网站内容一样。——译者注

（Zena Eskender，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这是一本讲述亚历山大大帝成长为基督教圣徒经历的传奇故事。此外，还有四首用阿姆哈拉语写的军队战曲，这是最早的阿姆哈拉语歌曲，这些歌曲都编写于阿姆达—塞永统治时期。

阿姆拉克，耶库诺皇帝（Amlak，Yekuno），该皇帝的皇室姓氏是塔斯法·伊亚苏斯，是埃塞俄比亚的“王中王”[1]（吉兹语为 negusä nägäst，英语为 King of Kings，1270—1285 年在位），他是所罗门王朝的建立者，也有人说他是所罗门王朝的复国者。他沿着先祖的路前进，由他父亲塔斯法·伊亚苏斯到阿克苏姆最后一个国王迪尔·纳奥德。据传说，耶库诺·阿姆拉克被扎格维国王扎—伊尔马库恩（该国王被认为是“鲜为人知、没有相关记载的人”）监禁在马罗特，但是他成功的逃脱了。耶库诺·阿姆拉克在阿姆哈拉人省份集聚力量，在绍阿用一支军队击败了扎格维国王。耶库诺·阿姆拉克下令在拉利比拉附近建造了圣母大教堂，那里保存着埃塞俄比亚最早带有日期的壁画。

165

阿斯法乌，梅南皇后（Asfaw，Menen），她的教名为沃莱特·吉尤尔吉斯（1889—1962），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皇后和助手。梅南是阿斯法乌的女儿，皇帝莱布纳·登格尔的直系后代。梅南皇后积极推进埃塞俄比亚妇女问题的发展，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及埃塞俄比亚妇女慈善组织的资助人。1961 年去世以后，这位皇后被葬在神圣三位一体大教堂地下室中，安放在她儿子的墓边。

阿绍纳菲，塞纳伊特（Ashenafi，Senait，1966—），埃塞俄比亚籍女演员，1994—1998 年间在美国出演肥皂剧《总医院》中的基莎·沃尔德这一角色。她同时还从事舞蹈、歌曲和模特等事业。她出生在亚的斯亚贝巴，后跟随自己的父母移居美国，并且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她卷入了有关激进主义和埃塞俄比亚裔海外离散者问题。

---

[1] 《非洲通史近代卷》翻译为“万王之王”。——译者注

阿斯塔特切，穆拉图（Astatke，Mulatu，1943—），埃塞俄比亚音乐家和指挥家。1943年出生在埃塞俄比亚西部季马城，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爵士乐之父"。他音乐方面的训练主要是在伦敦、纽约和波士顿完成的，并使他成为伯克利学院音乐系第一个非洲裔学生。后来他又将爵士乐、南美音乐与埃塞俄比亚传统音乐融合在一起。2005年，他的作品被选作美国著名导演吉姆·贾木许导演的电影《破碎的花朵》的主题歌。

阿维克，阿斯特尔（Aweke，Aster，1961—），出生在塔拉湖附近的一座名为甘多尔的小城。她是埃塞俄比亚人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作为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高级文官的女儿，阿维克在亚的斯亚贝巴长大，十几岁时在教堂和饭店开始了职业歌手生涯。她经常与大陆乐队、非洲酒店乐队和伊贝克斯乐队等乐队合作。后来她开始尝试独唱，但常常因为自己的祖国缺乏政治和艺术自由而感到压抑。1981年阿维克前往美国，定居在华盛顿特区。通过在埃塞俄比亚饭店里演出，阿维克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并开始着手培养继承人。1985年她游览了欧洲和美国。阿维克现在已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她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人的喉舌，也可以说她是埃塞俄比亚最受欢迎的女演员。

巴伊亚纳，阿拉马瓦尔克（Bayyana，Alamawarq），一位曾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兽医，黑狮组织的领袖，该组织曾经在1935年发起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抵抗运动。阿拉马瓦尔克是一位更倾向埃塞俄比亚政治改良路线的人。埃塞俄比亚解放后不久，阿拉马瓦尔克去世。

贝达索，阿拉加武（Bedaso，Aragaw，1934—），埃塞俄比亚长时期以来的传统歌手，以演唱古拉格人歌曲而获得广泛赞誉。他所演唱的最流行的歌曲是"阿莱曼比雷"[①]。阿拉加武从1957年开始从事演唱，直到今天仍然活跃在埃塞俄比亚音乐界中。

166

① 原文为Alem Bire，译者无从找到应该翻译过来的资料，只好将其音译在此。——译者注

本蒂，塔法里（Benti，Tafari，1921—1977），埃塞俄比亚前总统（1974 年 11 月 28 日—1977 年 2 月 3 日期间在任）。他与阿曼·米卡耶尔·安多姆和门吉斯图·修伊尔·马里亚姆一起领导了 1974 年 9 月 12 日的军事政变，这次政变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政变两个月后安多姆死去，门吉斯图接着统治了 10 天，然后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落在本蒂手中。最后，门吉斯图领导暗杀了本蒂，并从他手中接过统治权，并将埃塞俄比亚转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这一军委会统治直到 1991 年才结束。

贝图尔，塔伊图皇后（Betul，Taytu，1918 年 2 月 11 日去世），塔伊图先是嫁给了希瓦国王萨哈尔·马尔亚姆，后来又嫁给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无论是在 1889 年她和丈夫成为皇后和皇帝以前还是以后，塔伊图都以孟尼利克的妻子而握有重要的政治权力。在埃塞俄比亚朝廷中，塔伊图领导的保守派集团坚决反对那些要求埃塞俄比亚走西方发展道路和将现代化带到埃塞俄比亚的现代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出于对欧洲国家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深深忧虑，塔伊图在拒绝与意大利签订《乌查里协定》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协定的意大利版本的意思是说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的保护国。皇后始终坚定的反对意大利对于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当和谈最终破裂后，意大利便从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皇后跟随自己的丈夫带领皇家军队向北进发，1894 年 3 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阿杜瓦战役中指挥炮兵使意大利侵略者遭受了可耻的失败。据说塔伊图参与了 1916 年推翻伊亚苏五世皇帝的阴谋活动，并以其继女扎乌迪图取而代之。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恩图图玛利亚教堂度过的，在她死后，尸体被安葬在亚的斯亚贝的巴塔耶卡—纳耶卡—巴耶塔玛利亚修道院其丈夫的墓葬旁边。

比基拉，阿贝贝（Bikila，Abebe，1932—1973 年 10 月），出生在距离亚的斯亚贝巴 130 公里的名叫贾托的小城。根据埃塞俄比亚人的传说，他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牧童和学生。12 岁时他完成了传统

的“品质”教育。当时，阿贝贝已经展示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杰纳”[1]选手。1952年他受雇于帝国卫队（Imperial Bodyguard），在那里，他与卫队中的其他人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和“杰纳”竞技。在帝国卫队几年以后，阿贝贝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由于受到那些代表埃塞俄比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启发，阿贝贝下定决心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56年，24岁的阿贝贝轻松地在全国武装部队锦标赛上获得他的第一个主要田径项目冠军。此后，他继续先后打破由其他埃塞俄比亚人保持的5000米和10000米纪录。如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一样神奇，阿贝贝在罗马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中证明了自己，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中第一个获得奖牌的非洲人。4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上，阿贝贝在治愈了阑尾炎和仅仅做完外科手术6周后，仍然获得冠军。尽管阿贝贝训练准备参加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但终因健康原因，在马拉松比赛中仅跑完15公里就退出了比赛。他的同胞马莫·沃尔德最终取得了冠军。阿贝贝在他辉煌的运动生涯中曾经参加了超过26次的马拉松比赛，其中，获得的1960年和1962年两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更是值得注意。1968年发生在距离亚的斯亚贝巴70公里的希诺城的车祸使他腰部以下全部瘫痪。接下来的9个月，阿贝贝在国内国外到处接受治疗。即使在轮椅上，看到自己祖国的国旗高高升起的那份荣耀使阿贝贝的竞争精神和愿望永不凋谢，这使他参加并赢得了一些赛事。1970年，阿贝贝参加了在挪威举办的25公里跨国雪橇比赛，并且获得金牌。在同样的雪橇锦标赛中，他夺得10公里冠军，并被奖励一个特别的奖牌。当阿贝贝去世时，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塞拉西和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尸体被安放在圣约瑟夫教堂的墓地里。

波格胡西安，亚历山大·斯孔尔德（Boghossian，Alexander Skunder，1937—2003），埃塞俄比亚土著人（画家），1955年第一次在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下留学英国。后来他又移居巴黎9年。在巴黎期

---

① 原文为gena，该词无从查证，只好按音翻译在此。——译者注

间，波格胡西安与一些非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保持交往，这些人都是黑人运动的成员，并接触到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品。对波格胡西安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家有保罗·克勒、罗伯托·马塔和非洲裔古巴艺术家维尔弗雷多·拉曼。1972年，波格胡西安受聘于华盛顿特区的哈佛大学。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赞美黑人独特的永不凋谢的花朵”，这些作品在全世界到处展出，其中包括“史密森学会的非洲艺术民族博物馆”（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rt）。波格胡西安去世后，史密森学会的非洲艺术民族博物馆馆长沙伦·F. 佩顿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以述说他的贡献，“就在几天前，波格胡西安还和我们在一起，在艺术家同事们、哈佛大学学生们、埃塞俄比亚社区的成员们和非洲艺术民族博物馆的朋友们的簇拥下，一起庆祝他的新作‘埃塞俄比亚的变迁：海外人之间的对话’展出，波格胡西安能够参加这次展出活动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作为现代非洲艺术的重要代表，波格胡西安为后人打开了一条道路，并且留下了‘埃塞俄比亚的变迁：海外人之间的对话’这部作品。他献身艺术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博物馆中。”

168

巴里，姆鲁格塔（Buli，Mulugeta），霍拉塔军事学校总教官，1941—1955年间为帝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是1960年军事政变最先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的著名军官，政变失败后被这次政变的领导者门格斯图·内韦准将杀害。

乔尔，伊谢图（Chole，Eshetu，1945—1998），去世前一直是埃塞俄比亚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内容范围极广，其中包括农业，工业，社会的发展，财政政策，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的人类发展等问题。伊谢图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讷格尔布雷纳·伊谢图，并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毕业于亚的斯亚贝巴的温盖特高中总校，后又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后改名为海尔·塞拉西大学，现在叫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经济学院学习，1966年获得了第一个经济学学位，并且获得该学校校长颁发的艺术学院金质勋章。后来，他受雇于他父母所在院系，相继于1968年在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香宾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于1973年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一次为纪念伊谢图·乔尔而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埃塞俄比亚首相梅莱斯·泽纳维称伊谢图·乔尔博士为“天才的学科带头人和学者”，是一位具有“伟大思想成就”的人。这位首相还补充说，“尽管我们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不同意他的看法，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对他智慧和所取得的成就的认可与欣赏。”除了经济学家的身份外，伊谢图还是一位为社会公平和民主斗争的战士。还有人指出，伊谢图投身与发展埃塞俄比亚社会经济的事业，是埃塞俄比亚与贫困斗争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一个，一位激进主义者，一位教授和一位培养大量经济人才的学者。

达姆塔武，德斯塔武，首领（Damtaw，Dastaw，Ras），德斯塔武首领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女婿，阿迪斯格贵族家庭的杰出成员，曾被任命为锡达莫省省长。德斯塔武首领与特纳格沃尔克公主生有两个儿子，他们是阿姆哈王子和伊斯金德尔·德斯塔王子（后来成为海军少将），还生有四个女儿，她们是爱达公主、塞布尔公主、索菲亚公主和海鲁特公主。德斯塔武首领曾经被任命为卡发省长和利莫省长，后又被任命为锡达莫省省长。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整个埃塞俄比亚皇室被迫逃亡，德斯塔武首领①却留下来指挥埃塞俄比亚皇家军队在该国南部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经过英勇的战斗，德斯塔武首领最后被俘并被法西斯就地处决。

安德拉德，安托尼奥（d'Andrade，Antonio），其父亲是葡萄牙人，其母亲为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塞俄比亚研究所”（Ethiopian Studies）建立之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在梵蒂冈的一个规模较小的埃塞俄比亚教士和学术团体中成员之一。安德拉德和其他一些埃塞俄比亚信息的提供者，如从阿姆哈拉的梅卡内四拉塞被流放的天主教神甫阿布巴·戈尔戈尔尤斯，协助一些德国东方学家，如海奥布·鲁道夫（《1681年以来的埃塞俄比亚》一书的作者，*Historia Aethiopica of 1681*）等，写作出

169

① Ras在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中为首领的意思。——译者注

版了许多著作，那些著作成为现代人种学研究的先驱之作。他们为后来的学者更加深入、独立地研究宗教文献奠定了基础，如达布特拉·克夫尔·吉奥尔吉斯、阿布巴·阿布拉哈姆、奥内西莫斯·内西布等。

登尼尔，萨尔萨（Dengel，Sarsa 阿姆哈拉语的意思为“圣母显现”，在位时的名字为马拉克·萨加德一世，1550—1597 年 10 月 15 日），是埃塞俄比亚皇帝（1563—1597）[①]，所罗门王朝家族成员之一。他是梅纳斯的儿子，他是第一位抵抗奥罗莫人入侵的埃塞俄比亚皇帝，这个奥罗莫人击败了索马里的努尔伊布穆加西德，又在回家的路上杀死了自己的叔叔吉拉武德沃耶。1573 年，他在位的第十年，萨尔萨·登尼尔在兹韦湖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击败了这个奥罗莫人。他还在 1578 年和 1588 年与之再次战斗。他又先后在 1580 年和 1585 年与塞米恩地区的法拉沙作战，并在 1581 年和 1585 年面对阿加武人的入侵。他于 1590 年发动了对定居在科曼沼泽地区西部的加姆博人的战争。1588 年，为了报复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的骚扰，他对奥斯曼土耳其进行了远征，1586 年和 1597 年对厄立特里亚进行了同样的征讨。

德斯塔，戈布雷·克里斯托斯（Desta，Gebre Kristos，1932—1981），创造出一种不仅有其独特技术和形式成就，而且有其独特的象征和哲学内涵的绘画艺术。他处于对埃塞俄比亚政治的压抑而采取了象征的表现手法。他被认为是将非定形和抽象艺术传入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如“母亲与孩子”、“此处离大使剧院不远”、“耶稣蒙难像”、“耀眼男孩的铁蹄”和黑人音乐等，将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全都纳入其中，同时，他的作品还反映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气候。在海尔·塞拉西皇帝被推翻后的军事政权统治的 1979 年他逃离埃塞俄比亚。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定居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不到两年以后在那里去世。

丁萨莫，贝莱内（Dinsamo，Belayneh，1965—），因其 1988 年 4 月

---

① 阿姆哈拉语 negusä nägäst 即英语 King of Kings，意思是王中之王，这是由于早年埃塞俄比亚有许多人在各地称王，王中王的意思就是要使其他王都服从自己，后来，拥有这种地位的人被称为皇帝。——译者注

17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创造新的马拉松纪录而在国际上出名。他保持的纪录是2小时6分50秒，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1998年才被打破。

埃吉加维乌，示巴巴乌，或者叫吉吉（Ejigavehu Shibabaw，Gigi），她以一名当代埃塞俄比亚歌手而为世人所知。从埃塞俄比亚教会中传统的歌曲开始，她将埃塞俄比亚音乐带入更高的发展轨道，并将其与多种其他模式的歌曲相融合。近年来，吉吉和其丈夫，作曲家比尔·拉斯维尔与美国爵士高手合作演出，其中包括赫尔耶·汉考克、韦内·肖特尔和法罗阿·桑德斯等。

170 **恩达尔卡切武，马康南·里吉**（Endalkachew，Makonnen Lij，1927年—1974年11月24日），埃塞俄比亚政治家。恩达尔卡切武出生在亚的斯亚贝巴，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首相。恩达尔卡切武是阿迪斯戈贵族家庭成员，该家族在晚期埃塞俄比亚皇室具有重大影响。他应该是由海尔·塞拉西皇帝任命的最后一个埃塞俄比亚首相。恩达尔卡切武本人在1974年2月28日到1974年7月22日之间担任埃塞俄比亚首相。在此期间，埃塞俄比亚学生和罢工工人要求调查政府高层腐败、实行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政府感到压力很大。恩达尔卡切武试图改革埃塞俄比亚的君主政体以满足人民的要求。在他的呼吁下，埃塞俄比亚实行了时间不长的新闻自由。但是，就在将要实行宪法改革之前，军事委员会调查了政府的腐败问题，1974年7月22日，军委会逮捕了首相，理由是恩达尔卡切武曾经是前首相阿克里鲁·哈皮特—沃尔德的内阁成员。然后，“军委会”请里吉·米卡耶尔·伊米鲁接替了恩达尔卡切武的首相职务。1974年9月，“军委会”发动政变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包括恩达尔卡切武在内的61名前政府官员在1974年11月23日被处决。

恩达尔卡切武，贝特沃德·马康南，首领（Endalkachew，Betwoded Makonne，Ras，1890—1963），海尔·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的贵族和高官。他是有权势的阿迪斯戈贵族家庭的首领。马康南在1924年4月16日至1924年9月4日皇帝巡视期间一直陪在海尔·塞拉西皇帝身边。1936年他坚决反对意大利队埃塞俄比亚的侵略。1936—1941年

间一直被流放在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解放以后，他随同海尔·塞拉西皇帝一起回国。他是埃塞俄比亚第一任首相，开始于海尔·塞拉西皇帝赶走意大利侵略军以后不久的 1942 年，并一直延续到 1957 年 11 月 1 日退休。他带领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参加了在旧金山举办的为建立联合国而召开的高峰会议。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和小说题材作品的作家。

埃沙特，哈基姆·瓦尔切纳（Eshate，Hakim Warqenah），以查理·马丁博士（Charles Martin）而闻名，是一位外科医生，教育家，省长，1935 年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爆发后，任埃塞俄比亚驻伦敦大使。哈基姆·瓦尔切纳·埃沙特是一位社会和政治进步主义者，1924 年他授命主持废除封建奴隶制的改革。

埃谢特，阿雷马耶胡（Eshete，Alemayehu），生于亚的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第一位用乙烯基材料在埃塞俄比亚发行音乐的歌手之一。作为一个年经人，他的才华使他成为著名歌手，获得了“阿雷马耶胡埃尔维斯”（Alemayehu Elvis）的昵称。从 1961 年开始，阿雷马耶胡组建了许多现代乐队，并在埃塞俄比亚各著名俱乐部和酒店演出。他发行的歌曲唱片既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也有反对地方和全球歧视的政治含义的歌曲。他的音乐在现代埃塞俄比亚保持强有力的和流行的态势。1984 年，阿雷马耶胡赢得德国德累斯顿国际音乐节柴可夫斯基作曲奖。

171

法西拉达斯（巴西里德斯）皇帝（Fasilidas or Basilides，1603—1667 年 10 月 18 日），出生在希瓦的马加扎兹，是埃塞俄比亚皇帝（1632—1667 年 10 月 18 日），所罗门王朝家族成员之一，西西尼奥斯和公主苏尔塔马·莫加萨的儿子，1624 年 6 月 14 日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1630 年在塞萨·克雷斯托斯领导暴动过程中被宣布为皇帝，但他直到父亲 1632 年退位时才真正继承王位。继位以后，法西拉达斯立即着手恢复埃塞俄比亚传统正教教会的权力。他没收丹卡斯和帝国其他一些地方天主教耶稣会的土地，然后将其重新分配给弗雷莫纳镇的居民。1636 年他建立了贡德尔，后来这里变成一座城市并成为首都。

法西拉达斯在距离贡德尔城以南5英里的阿扎佐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位于塔加湖的达加岛上的圣斯蒂芬修道院。

弗雷姆纳托斯（又称为泰尔的弗鲁门提秀斯，Fremnatos 或 Frumentius of Tyre，383年去世?），埃塞俄比亚最著名的基督教信徒。作为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教会的建立者和阿克苏姆第一任主教，他被认为是将基督教引进埃塞俄比亚的人。根据4世纪历史学家鲁芬努斯的说法，弗鲁门提秀斯和埃德西尤斯跟随他们的叔叔梅特罗皮尤斯航海抵达埃塞俄比亚。当船在红海附近的一个港口停下时，附近的土著人将船上的所有人都杀害了，只留下了弗鲁门提秀斯和埃德西尤斯这两个小男孩，这两个孩子被当作奴隶献给阿克苏姆国王。但是，这两个小孩很快博得了国王的喜爱，国王甚至对他们很信任，在国王死去以前，他们取得了人身自由。但是，寡妇皇后说服他们继续留在宫中任职，协助她教育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并在王子年纪小时负责管理国家。于是，弗鲁门提秀斯和埃德西尤斯留了下来，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传播基督教，在这一过程中，弗鲁门提秀斯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鼓励在埃塞俄比亚经商的基督教徒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后来又使一些土著社区皈依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将每年10月27日定为弗鲁门提秀斯节，东正教的弗鲁门提秀斯节为每年的11月30日，科普特教会的弗鲁门提秀斯节为每年12月18日。按照埃塞俄比亚传统，弗鲁门提秀斯是第一个将《圣经·新约》翻译为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的人。

加布拉—马登，特萨加耶（Gabre-Medhin，Tsegaye，1936—2005），埃塞俄比亚最优秀的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艺术家。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阿姆波附近的波达。1959年，特萨加耶毕业于芝加哥的黑石法律学校，但1960年又在伦敦的皇家大剧院和巴黎的法国戏剧院学习实验戏剧。1961—1971年间，特萨加耶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剧院作艺术指导。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创建了艺术系。但在70年代，他在军事委员会统治期间被捕入狱，并被禁止写作。特萨加耶创作了许多诗歌、戏剧、散文和歌曲。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将他视为埃塞俄比亚的莎士比亚。特萨加耶翻译了欧洲许多著名作家的作

172

品，其中最主要的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莫里哀的《伪君子》、《无病呻吟》，布莱希特的《勇敢的母亲》等。1998年，特萨加耶移居曼哈顿接受肾脏疾病的治疗，并在那里去世。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亚的斯亚贝巴国家大教堂，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遗体也安放在那里。

杰布鲁，塞内杜（Gebru，Senedu），埃塞俄比亚学者，曾留学瑞士，在意大利法西斯占领埃塞俄比亚时期，她被扣押在意大利一段时间。她是埃塞俄比亚西部妇女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成员之一。塞内杜和其他女性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上都有红十字标记，作为"临时红十字团"为反侵略战争中的埃塞俄比亚人服务。她们不但救治战场上的受伤军人，而且解救那些被子弹，大火和毒气伤害的平民。她的著作在亚的斯亚贝巴印刷，在1949—1950年出版，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人第一部重要的开创性著作，内容是有关自身经历的。

戈里马，海尔（Gerima，Haile，出生于1946年3月4日），一位埃塞俄比亚电影制作人，1968年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黑人电影制作人中，他是一名重要的成员。从1975年开始，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哈佛大学影视系任教授。1993年上演的他最著名的电影《桑科法》是一部以奴隶制为题材的电影。

耶杰朱的古格萨（Gugsa of Yejju，1825年5月23日去世），从1798年到去世，一直为贝戈姆德尔（成为首府后改为贡德尔）的首领，埃塞俄比亚皇帝的摄政王。他是梅尔苏·巴伦图和科菲耶的儿子，后者是拉斯·阿里加斯的姐姐。他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德加斯马克梅鲁的一个芬加家庭；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德加斯马克·海尔·马尔亚姆。担任摄政王以后，他先从贝戈姆德尔下手，通过剥夺埃塞俄比亚地方贵族的权力重新加强帝国的中央集权，尽管皇帝此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1800年，他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土地制度将从私人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掌握在皇帝手中，从而实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一开始，农民们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平均主义性质的方法中从地主的损失中获益，因此表示欢迎这一政策的施行。但是，当首领古

格萨每年以不同的名义剥夺那些大家族的土地以后，农民们也失去了最后的土地保护者。古格萨去世后被葬在德布雷塔波尔的伊亚苏斯教堂。

173

古图，瓦科（Gutu，Waqo，1924—2006），埃塞俄比亚起义领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奥罗米阿南部的巴尔地区作为“奥罗米阿联合解放军”（the United Liberation Forces of Oromia）的军事将领和领导人。2000年，他被选为“奥罗米阿联合解放军”主席。1963—1970年间，他将巴尔地区从帝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但是，为了保护他属下的人民不被海尔·塞拉西的军队杀害，依据奥罗莫记载，古图向帝国军队投降。在1975—1991年间，他的游击队曾经控制了奥罗莫的好几个城镇。他还访问过一些国家，其中包括索马里，出访的目的是寻求资金和武器支持以继续反抗斗争。1989年，他建立“奥罗莫联合人民解放战线”（the United Oromo People Liberation Front），并加入到反对被免职的领导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斗争当中。后来，他又加入到取得胜利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中，该组织是由前首相梅莱斯·泽纳维领导建立的，正是这个组织解除了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领导人职务。但是，1992年，他又重新返回丛林，并列出新统治者们种种欺骗行为。古图在西内罗毕医院去世。

戈万古尔，阿布巴·塞苏（Gwangul，Abba Seru，1778年去世），埃塞俄比亚耶杰朱奥罗莫部落的酋长。他声称自己是一位名叫奥马尔的阿拉伯人的后代，奥马尔曾经在阿马德·戈兰军队中服役。在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1770年埃塞俄比亚旅行的记录中提到，戈万古尔曾经与该探险家见面，并向其提供了相关信息。

哈布特—沃尔德，阿克里鲁（Habte-Wold，Aklilu，1912—1974），海尔·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家。他曾于1947到1958年期间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部长），从1961年开始到去世前不久一直担任首相一职。他与自己的兄弟马康内·哈布特—沃尔德和阿卡雷沃尔克·哈布特—沃尔德都是海尔·塞拉西皇帝施惠的受益者，皇帝曾让

他们在国内和国外接受教育以使他的国家拥有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阿克里鲁·哈布特—沃尔德是在法国接受教育。在第二次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战争中，阿克里鲁·哈布特—沃尔德是海尔·塞拉西皇帝流亡期间伴随其左右的臣僚之一。他为处于困境的流亡海外的团体和国内的抵抗运动提供资金。1958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任命他为“文书大臣（部长）”（the minister of the Pen），赐予他“特塞哈菲·塔耶扎斯”头衔[①]。1973 年，由于石油禁运引起的学生运动、兵变和经济衰退导致一场广泛的反政府抗议运动的发生，人们要求解除文书大臣（部长）阿克里鲁的职务。1974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统治被马克思主义者军事政变推翻，他们在以后的 20 年中统治着埃塞俄比亚。文书大臣（部长）阿克里鲁·哈布特—沃尔德和他的兄弟阿卡雷沃尔克·哈布特—沃尔德以及其他 60 多个前政府官员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于 1974 年被处决。

海曼奥特，阿布内·塔克拉（Haymanot，Abune Takla），埃塞俄比亚正教特瓦西多教会第 3 任大主教。1977 年马克思主义者“军委会”统治时期强制将前大主教阿布内·特武菲罗武斯罢黜时，阿布内·塔克拉登上大主教的位置。前主教被捕以后，“军委会”命令教会的牧师、信徒和神圣宗教会议选举一名新的大主教以代替被捕的阿布内·特武菲罗武斯。所有的牧师都因与前大主教关系过密而失去选举资格。宗教会议被命令选举一名叫阿布巴·梅拉库的隐士担任埃塞俄比亚正教的大主教。

174

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且基本上不涉足政界的阿布巴·梅拉库将生命中大部分时间花在洞穴里祈祷和为沃尔莱塔地区的人民布道上。据说，“军委会”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比较容易控制。在他被任命为大主教的一年内，他被要求任命 14 名新教士以取代那些被认为与海尔·

① Tsehafi Taezaz，在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中的意思就是英语中的 the minister of the Pen，我们把它翻译为“文书大臣（部长）”是因为这一官职的权力在于，所有的政府文献，包括政府法令、决定、声明和计划等等，均由该大臣（部长）办公室安排并由该大臣（部长）签署发表和执行。——译者注

塞拉西皇帝政府关系密切的教士。“军委会”通过任命教会主教而将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军委会”最后处死了阿布内·特武菲罗武斯，但是科普特教会拒绝承认这种变化并宣称，只要埃及认可，该教会就只承认前主教为埃塞俄比亚最高大主教。

阿布内·塔克拉·海曼奥特主持教会时正值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骚乱时期。在埃塞俄比亚处于“军委会”的残暴统治下并遭受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阿布内·塔克拉·海曼奥特体现了教会的虔诚和尊严，并因此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受欢迎的大主教。在他担任主教期间，他拒绝穿传统上代表埃塞俄比亚正教中高级别教士身份的黑色长袍，而是穿浅黄色的长袍，这是埃塞俄比亚传统上代表隐士生活和表示忏悔和受苦的颜色。事实上，这位大主教在整整 11 年的在位期间几乎一直坚持忏悔。他不停的祈祷，除去最简单的煮熟和烤熟的豆子和谷物外，拒绝吃任何东西，直接睡在光光的地上，穿最简单的便鞋，一直保持禁欲。他用自己的津贴资助一群饥荒中的孤儿接受教育，这群孩子是他本人在教区供养的。尽管由于怕共产主义政府增加对人民的屠杀而从来没有与政府对抗，阿布内·塔克拉·海曼奥特全身心地向他的人民布道，祝愿使他们变得坚强。有材料显示，后来他曾经对“军委会”的暴力政策表示过抗议。

由于长时间的禁食和忏悔，这位主教的身体状况很差。他只参加在教堂中举行的弥撒，除此以外停止了公开露面。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沃尔拉伊塔的一座新教堂的建成仪式上，当时他还重访了自己曾经住过的那个洞穴。他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后马上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但还是于 1988 年 5 月末在该医院去世。政府命令为阿布内·塔克拉·海曼奥特举行国葬，包括军队护卫，鸣枪，并在埃塞俄比亚全国降半旗致哀。棺椁被前皇家葬礼曾经用过的灵车从该教区的圣玛丽教堂运到神圣三位一体大教堂。这位大主教头戴主教冠、身穿工作袍躺在自己的棺木里，身上盖着埃塞俄比亚国旗。

175

赫鲁伊，埃马伊拉夫（Heruy，Emailaf），20 世纪初埃塞俄比亚艺术家，最早使用摄影来获得更逼真肖像的人之一。按照埃塞俄比亚传

统的方式，他是在帮助自己的父亲过程中开始学习绘画的，他的父亲在恩托托的玛利亚教堂非常著名。随后，他负责装饰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塞拉西教堂和吉尤尔吉斯教堂、阿萨波特的塞拉西教堂以及孟尼利克宫殿和 1931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揭幕的国会大厦。他在这些建筑物上的绘画作品有 19 世纪主要时期和 20 世纪早期埃塞俄比亚的主要统治者的肖像，还有海尔·塞拉西皇帝在朝臣和官员们簇拥下的场面等。

伊姆鲁，海尔·塞拉西，首领（Imru，Haile Selassie，Ras，1892—1980），海尔·塞拉西皇帝的表弟，1916 年被任命为哈拉尔省省长。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海尔·塞拉西皇帝与家人在 1936 年 5 月 2 日逃亡吉布提，皇帝指定首领伊姆鲁·海尔·塞拉西在此期间行使王子摄政权，首领伊姆鲁在沃尔加西部组建了一个地下政府。后来，他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驻美国大使。

伊姆鲁，尤迪特（Imru，Yodit，1943—），在海尔·塞拉西皇帝统治的最后阶段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使其成为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她的父亲首领伊姆鲁克西安此前是埃塞俄比亚驻美大使。尤迪特·伊姆鲁是首领米歇尔·伊姆鲁的姐姐，米歇尔·伊姆鲁曾经担任埃塞俄比亚首相。由于她参加了反对过时的帝国统治方式的运动，因此被认为推动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当军方将她和她的两个妹妹羁押起来后，遭到了国际上的一些谴责。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叫希鲁特·伊姆鲁，曾经是大学文学讲师；另一个叫玛姆米耶·伊姆鲁，是一名建筑师。

伊亚苏五世（Iyasu V）也被称为里吉·伊亚苏（Lij Iyasu，1887 年 2 月 4 日—1935 年 11 月 25 日），埃塞俄比亚被指定但未登基的皇帝（1913—1916）。他的教名是基弗尔·亚库布。里吉的意思是有皇室血统。伊亚苏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的孙子，孟尼利克的女儿谢瓦雷戈加的儿子，谢瓦雷戈加是孟尼利克长女扎乌迪图同父异母的妹妹。正因为他从没有登基，所以通常被称为"里吉·伊亚苏"，也就是有皇帝血统的伊亚苏。他没有被公开称为伊亚苏五世，是因为他被埃塞俄比亚特瓦西多正教会开除了教籍。他的名字有时被写作埃亚

176

苏，还有一份阿姆哈拉—吉兹语版本的圣经人名中说他的名字是约书亚。1909年，他被宣布为王位继承人。1916年被女皇扎乌迪图废黜，后曾进行武装反抗。1921年伊亚苏被俘，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受到意大利的扶植。意大利空军散发传单号召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海尔·塞拉西而支持“真正的皇帝伊亚苏五世”，而历史学家们曾经说伊亚苏的统治给人留下了深刻影响，这与历史事实似乎是矛盾的。他出身皇室的母亲使他可以宣布自己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代；又由于他有那样一个父亲，他可以声称自己是先知默罕默德的后代。他的伊斯兰情节使许多原本跟随他的人转而支持他的对立面，并为那些反对伊亚苏的人提供武器装备。这些人认为，伊亚苏背叛了埃塞俄比亚和科普特的基督教信仰。一些历史学家高度评价伊亚苏的改革精神，他统治期间曾被看做是孟尼利克时代埃塞俄比亚现代化政策的继续。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如组建亚的斯亚贝巴第一支警察部队和允许穆斯林信徒定居埃塞俄比亚，更被看作是认同埃塞俄比亚文化多元化的先驱之作。

拉里贝拉皇帝（Lalibela），13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君主。他以修建拉斯塔大教堂（the great monolithic churches of Lasta）而闻名，该教堂现在叫做拉里贝拉大教堂。拉里贝拉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①]和扎戈武王朝的成员。他也被埃塞俄比亚教会认为是圣徒。有关这些教堂建筑的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在一本名为《加德拉拉里贝拉》的《国王圣徒录》中记载：他所修建的那些教堂完全是在天使的帮助下完成的石刻建筑。

拉马，曼杰斯图（Lamma，Mangistu），埃塞俄比亚编剧，以其所写的《亚拉克查加布比克查》（Yalaccha Gabbiccha），即《不平等的婚姻》（Marriage of Unequa）而知名。

鲁卡，吉尔马·沃尔德·乔治斯（Lucha，Girma Wolde-Giorgis，1924年12月—），埃塞俄比亚总统。2001年10月8日在埃塞俄比亚国会以绝对多数选表当选为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统是6年一届的无实

---

① 原文用的是negus，经过查证该词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尊称。——译者注

权之职。他曾在海尔·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在军队服役，并是一名政治家，当时他先是国会议员，后成为下议院发言人。1974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统治被推翻以后，他在“军委会”统治时期主要在厄立特里亚工作，当时是当地的红十字会代表。1991 年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被驱逐以后，他成为一名商人，后来又重新回到国会。

马康南，首领（Makonnen，Ras，1852 年 5 月 8 日—1906 年 3 月 21 日），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将军，哈拉尔省省长。他是塔法里·马康南的父亲，塔法里·马康南就是后来的海尔·塞拉西皇帝。首领马康南的父亲是菲塔武拉里·沃尔德米卡耶尔·古德萨，从他母亲特纳戈内沃尔克·萨哈尔·塞拉西的谱系来看，他是绍阿国王萨哈里·塞拉西的外孙。这样看来，他就应该是孟尼利克二世皇帝的堂兄，所罗门王朝的成员。在哈拉尔被其堂兄并入埃塞俄比亚帝国统治以后，他被任命为该省的省长。后来，首领马康南还担当了其他一些职务，如：在发动叛乱的首领门格萨·约翰尼斯被驱逐之后担任提格雷省的代理省长；在第一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许多军事行动中担任将军；还担任做外交官和外交大臣（部长）等职。此外，他还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之间著名的阿杜瓦战役中担任要职。

177

马里亚姆，门格斯图·海尔（Mariam，Mengistu Haile Lt. Col (1937—)，1977 至 1991 年间担任国家元首。他于 1977 年正式成为国家元首和“军委会”主席。尽管在此之前从 1974 年发动政变开始他就一直在幕后拥有实权。权力的交接导致门格斯图前任的两位国家元首被处决。门格斯图统治期间埃塞俄比亚得到来自苏联，华约组织其他成员国和古巴的援助。1977 年到 1978 年初，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反对新政府的叛乱，最后叛乱被镇压，导致许多人员伤亡。作为对反门格斯图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游击队的回应，门格斯图宣称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早已经开始了“白色恐怖”战役。但是，反门格斯图的势力则控诉门格斯图的工人党正在实施“红色恐怖”战役。1987 年 9 月 10 日，按照新宪法，门格斯图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文职总统，国家被重新命名为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门格

斯图的政府面临一系列困境：干旱，大范围的饥荒（特别是1984—198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叛乱（尤其是在北部的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地区）等等。1989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其他以种族为基础的反对力量联合成立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向亚的斯亚贝巴进军，门格斯图政府垮台。门格斯图将此失败归罪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使苏联解体，因此停止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然后门格斯图和50名家人及一些"军委会"成员一起逃离埃塞俄比亚来到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将其作为官方客人予以庇护。门格斯图外逃以后，他手下没有逃离的原有"军委会"组织和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绝大多数成员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逮捕判刑。尽管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多次提出将其引渡回国进行审判，但都没有实现，因此，现在门格斯图仍然生活在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新政府已经将一些逃离的前"军委会"成员缺席判处死刑，而对门格斯图的审判从1994年就开始了，到本书出版的2006年仍在进行中。

麦特，吕西安（Matte，Lucien s. j.，1907—1975），1907年出生在魁北克。他曾就学于蒙特利尔大学和拉瓦尔大学，在那里，他获得了哲学，自然科学，神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学位。1930年，他加入了耶稣会（Jesuit Order），并于1938年被任命为牧师。1962年，麦特神甫来到萨德伯里，并被任命为萨德伯里大学校长。他是劳伦森大学萨德伯里师范学院建立的主要推动者。在他的一生中，教育占有重要地位。1945年，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任命麦特重建埃塞俄比亚教学系统。亚海尔·塞拉西皇帝要求他的教学系统以加拿大教学系统为模式。麦特神甫重建了小学和中学教学系统，1954年建立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该学校在1961年更名为海尔·塞拉西大学。鉴于麦特神甫对于自己国家的贡献，海尔·塞拉西皇帝决定向萨德伯里大学建筑基金捐献一万美元。

178

门纳斯皇帝（Menas），在位时称号为阿德马斯·萨加德一世，埃塞俄比亚皇帝（1559—1563年2月1日）和所罗门王朝成员。他是戈

拉武德沃斯的弟弟。在艾哈迈德·伊布恩·伊布里西姆 阿尔—格哈兹入侵埃塞俄比亚期间，门纳斯曾被俘虏，但被看成为有价值的囚犯而受到较好的对待。艾哈迈德·伊布恩·伊布里西姆 阿尔—格哈兹是索马里伊斯兰教长，曾多次击败埃塞俄比亚皇帝并对埃塞俄比亚造成较大破坏。他也被称为艾哈迈德·戈兰，或者艾哈迈德·古雷耶、左撇子艾哈迈德。1542 年，门纳斯遭到不幸，当伊玛姆对其穆斯林的援助感到绝望的时候，伊玛姆将包括门纳斯在内的许多特殊礼物送给也门苏丹。但是伊玛姆艾哈迈德的儿子在随后的瓦伊纳达加战役中被俘，戈拉武德沃斯用自己的俘虏交换回自己的弟弟。被提升以后，门纳斯在塞米恩尔发动了反对法拉沙的斗争。他将基督教主教安德烈·达·奥维耶多和他的同事放逐到阿克苏姆和阿多瓦之间的一个叫做马伊格加的村庄，耶稣会高兴地将那个村庄重新命名为弗雷莫纳，这个名字取自传教士弗鲁门提尤斯。在他统治的第一年，巴哈尔皇帝耶沙克在提格雷发动起义，并宣布皇帝门纳斯的弟弟亚克布之子塔兹卡罗为皇帝。这次起义使门纳斯在余下的统治时间里不得不投入极大的精力。最后，当他试图重新组织人马镇压巴哈尔内加什起义的时候，却死去了。

孟尼利克一世皇帝（Menelik I），传统上认为他是古代以色列所罗门国王和希瓦女王马克达的儿子。埃塞俄比亚传说他出生在厄立特里亚的哈马塞恩省。传统上认为孟尼利克一世在成年以后去耶路撒冷见他的父亲，回来时将约柜（the Ark of Covenant）引入埃塞俄比亚，由此长大成人。按照《列王传奇》的记载，所罗门王曾从每位贵族和教士家中派遣一个儿子跟随孟尼利克回到其母国埃塞俄比亚。据说，孟尼利克为他们每人复制了一个约柜并叫他们带回埃塞俄比亚，但是，高级神甫扎多克的儿子用一个假的约柜偷换了真品，并将其带人埃塞俄比亚。据说，这个假的约柜现在还在阿克苏姆古城里。在马克达女王去世后，孟尼利克宣布以新的称号继承埃塞俄比亚王位。因此，是他建立了埃塞俄比亚的所罗门王朝，这一王朝在几乎没有中断的情况下统治着埃塞俄比亚，一直到 1974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被推翻结束，

179

历时近3000年，共有225代统治者曾经执政。

孟尼利克二世皇帝（Menelik II，1844—1913），被认为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开创者。他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皇帝的儿子，正如《列王传奇》所说的那样，也被看作阿克苏姆帝国的建立者。约翰尼斯四世在1884年去世以前将自己的儿子，首领门戈萨·约翰尼斯，立为皇储。尽管首领阿鲁拉领导的一些提格雷贵族试图支持这一决定，但是，许多已经去世贵族的亲戚，无论来自恩德尔塔家族还是特姆比恩家族，都反对这样做，并且公开发动叛乱反对门戈萨。由于皇帝家庭中出现反对门戈萨当皇帝的叛乱不断发生，提格雷也被搞得四分五裂。希瓦的孟尼利克利用提格雷的混乱处于有利地位，在让意大利占领哈马西恩、塞拉伊和阿卡尔古扎伊等效忠约翰尼斯四世的地方以后，他被宣布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称为孟尼利克二世。

门特瓦布皇后（Mentewab），1706年出生在克瓦拉，1773年6月27日死于贡德尔附近的丘斯克瓦姆皇宫。她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巴卡法的助手，伊亚苏二世的母亲，伊尤阿斯一世的祖母。她更以官方性的教名维雷特·吉尤尔吉斯而闻名，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圣乔治的女儿"。门特瓦布皇后在其儿子和孙子统治期间拥有相当显赫的权势。她在贡德尔修建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包括帝国辖区内她自己拥有的城堡和一个规模巨大的宴会厅。更为重要的是，她在贡德尔城外的山中修建了一座教堂，叫做"丘斯库阿姆圣母玛利亚教堂"（the Virgin Mary at Qusquam）。该教堂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她们流亡埃及期间曾经住在一个叫做这个名字的地方。1730年，门特瓦布皇后加冕皇帝，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统治埃塞俄比亚，这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性拥有无上的权力。后来，她将自己的权力一直传下去达200年之久。1755年，她在自己儿子去世以后试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结果与武比特（即维雷特·贝尔塞比）发生冲突，后者是其儿子的遗孀，该遗孀认为她要完全取代自己的儿子而独揽大权。

内加，贝尔哈努（Nega，Berhanu，1958—），2005年埃塞俄比亚大选中被选为亚的斯亚贝巴市长。他是埃塞俄比亚彩虹党（Rainbow

Ethiopian）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意在追求民主与社会公平运动的政党。贝尔哈努还是统一与民主联盟（Coalition for Unity and Democracy）的副主席，并且成为竞选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他在作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反对“军委会”政府的运动。1977 年，政府镇压政治上有异见者，贝尔哈努与其他几个激进学生逃往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西姆巴山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分裂以后，贝尔哈努因公开指责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刺杀而被拘留。几个月以后，逮捕他的人释放了他，并被赶回他的家乡苏丹，直到两年以后他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才取得自由。1994 年，他重新以企业家和学者的身份回到埃塞俄比亚，并在 1996—2000 年间担任埃塞俄比亚经济协会首脑，并且担任由他帮助建立的非赢利性机构“埃塞俄比亚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领导。贝尔哈努还是联合国经济委员会非洲分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的顾问。在 2005 年大选中，贝尔哈努博士投身于反对梅莱斯·泽纳维的运动中，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在选举前与执政党的辩论。尽管选举以后政治上出现了僵局，统一与民主联盟在 8 月 20 日召开会议，选举贝尔哈努博士为亚的斯亚贝巴市市长。在同次会议上，还选举阿德马苏·戈比耶胡博士为副市长，阿泽法·哈布特沃尔德为市议会发言人。如果统一与民主联盟决定接过亚的斯亚贝巴的统治权，那么这些人就应该说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次由选举产生的公众行政管理者。

180

内韦，加尔马梅（Neway，Garmame），门吉斯图的弟弟，在美国接受的教育，1960 年政变的激进知识分子领导者。他曾从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被广泛认为是超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进步改革家，他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国家问题的态度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人们普遍认为是他鼓动自己的兄弟参加试图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政变。最后，他在与取得胜利的皇家武装军队的战斗中死于非命。

内韦，门格斯图（Neway，Mangestu），皇家卫队指挥官，与自己

的兄弟加尔马梅·内韦一道领导了1960年不成功的旨在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政变。在政变期间他受伤被俘，最后被处以绞刑。

潘克赫斯特，理查德（Pankhurst，Richard，1927—），生于伦敦。他是20世纪20—30年代欧洲最有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尔维亚·E.潘克赫斯特的儿子。西尔维亚的反法西斯行动促使他关注埃塞俄比亚。潘克赫斯特博士生活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他作为一个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达50年之久。凭借持续的对埃塞俄比亚问题的研究，潘克赫斯特博士获得来自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际的尊重和认可。同时，作为“埃塞俄比亚归还阿克苏姆方尖石碑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turn of the Axum Obelisk）的成员，他积极进行活动。潘克赫斯特博士目前被选入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财宝索要委员会，这批财宝是1868年英国探险队从马格达拉解救英国被俘人员时劫去的。

潘克赫斯特，西尔维亚·埃斯特尔（Pankhurst，Sylvia Estelle，181 1882年5月5日—1960年9月27日），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成员和著名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她出生在英格兰的曼彻斯特，父亲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博士，母亲是埃米林·潘克赫斯特，他们都是热心于女权运动的独立工党成员。她的姐姐克里斯塔贝尔也是一名激进主义者。从1906年开始她与母亲，姐姐一起全身心投入到“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工作当中。但与她们不同的是她仍然关注工人运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潘克赫斯特从热心共产主义政治转向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她为了反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在1936年将“工人无畏战舰报”（Workers Dreadnought）改名为“新时代和埃塞俄比亚新闻”，并且成为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支持者。潘克赫斯特出钱资助埃塞俄比亚第一所教学医院并大量出版有关埃塞俄比亚艺术与文化的著作。她的研究最后被整理命名为《埃塞俄比亚——一部文化史》（Ethiopia，a Cultural History），该书于1955年在伦敦由拉里贝拉出版社出版。1956年，她和与其丈夫同名的儿子理查德·潘克赫斯特一起移居埃塞俄比亚，并且创办了名为《埃塞俄比亚观察家》的月刊，这是一部主要介绍埃塞

俄比亚人生活和发展的杂志。她去世后被埋在亚的斯亚贝巴的神圣三位一体大教堂。

保罗斯，阿布内（Paulos，Abune），1935 年出生在戈布雷·伊格兹阿比赫·沃尔德·约翰尼斯，自 1992 年以来一直担任埃塞俄比亚正教特瓦赫多教堂大主教。他的头衔全称为“阿布内·保罗斯宗座，埃塞俄比亚正教第五大主教，圣特克尔·海伊曼奥特守护人的大主教，阿克苏姆大主教”（His Holiness Abune Paulos, Fifth Patriarch and Catholicos（re-ese Liqane Papasat）of Ethiopia, Echege of the See of St. Tekle Haymanot, and Archbishop of Axum）。阿布内·保罗斯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省的阿德瓦。他的家族与城区附近的阿布内戈里马修道院长久以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就进入修道院充当见习生，最后接受了修道院戒律并被任命为牧师。阿布内得益于阿布内·特沃菲罗斯大主教的资助，在亚的斯亚贝巴的神圣三位一体神学院继续深造。后来，他被派往美国的圣弗拉基米尔正教学院学习，并有幸加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博士培养计划。1974 年，由于阿布内·特沃菲罗斯主教召唤他回去而打断他的学习进程，在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革命发生后不久，阿布内回到亚的斯亚贝巴。他和另外四个人一起被任命为主教，并授予新的称号叫阿布内·保罗斯，大主教又让他负责该教区的事务。但是，由于大主教任命的这些主教没有得到新成立的“军委会”政权的批准，他们五个人都被捕入狱，大主教最后惨遭杀害。阿布内·保罗斯和其他主教直到 1983 年才被释放。阿布内·保罗斯于 1984 年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攻读博士，并开始流放生涯。1986 年，还在流放期间的阿布内·保罗斯被阿布内·塔克拉·海伊曼奥特大主教授予大主教头衔。2006 年 3 月，在巴西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首脑会议上，阿布内·保罗斯被选为会议的七位领导人之一。

罗巴，法图玛（Roba，Fatuma，1973—），一位在 1996 年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这一荣誉使她在埃塞俄比亚人民心目中难以忘怀。她在阿尔西地区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田径运动，那里也是另外两名奥运会冠军德拉尔图·图鲁和海尔·戈不布雷·塞 182

拉西的家乡。罗巴在1996年夏季奥运会上获得马拉松金牌。1997年，他成为第一位在波士顿马拉松项目中获得冠军的非洲女运动员，其后又在1998年、1999年两次获此荣誉。最后，她在冲击第四枚金牌时失败，以亚军告别了自己的运动生涯。但是，她还是不失为成千上万名田径运动员心目中的榜样。

萨佛，德加斯马特克·巴尔查（Saffo，Dejazmatch Balcha，Abba-Nefso）是孟尼利克忠诚的将军，被任命为哈拉尔的长官后来成为富有的西达莫省的长官。他因被海尔·塞拉西皇帝囚禁而成为海尔·塞拉西皇帝死敌，皇帝在意大利入侵时释放了萨佛。萨佛组织了游击队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一直到他被杀为止。他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英雄。

所罗门二世（Salomon II，or Soloman II），埃塞俄比亚皇帝，1777年4月13日—1779年7月20日在位，是阿贝托·阿迪戈的儿子。旅行家亨利·萨尔特曾经列出了埃塞俄比亚皇帝人名表，他认为，所罗门二世是他在1809—1810年间访问时埃塞俄比亚时在世的皇帝之一。首领古绍和瓦恩德·贝武森在废黜特克尔·海曼奥特二世以后拥立所罗门皇帝。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将贡德尔的克德杜斯·法西里德斯（圣法西里德斯）教堂修建的功绩归于所罗门。

塞贝斯特亚诺斯（Sebestyanos，1703—1719年3月6日），希瓦的统治者，也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阿姆哈拉贵族之一。他是内加西·克雷斯托斯的一个儿子。塞贝斯特亚诺斯在多恰奇特建立了自己的首都，1719年3月6日被杀害。

塞戈德，沃森（Seged，Wossen，1808—1813年），希瓦的统治者，也是埃塞俄比亚重要的王子之一。他是阿斯法·沃森的长子，是阿斯法·沃森与所罗门王朝的一个女性所生。他最先是希瓦的统治者，并且声称拥有比贵族（Meridazmach）更高的称号，称自己为首领（Ras）。在沃森·塞戈德统治时期，有关希瓦历史的年表相对连续。在亨利·塞尔特在1809—1810年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的记录中，说沃森统治伊法特，即现在的希瓦，当时应该是贵族称号而不是首领。由

于阿斯法·沃森与他的第二个来自门兹贵族之家的妻子生下许多儿子，沃森·塞戈德担心阿斯法·沃森宠爱他的后母弟弟们，因此他发动叛乱反对自己的父亲。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沃森·塞戈德被打败并遭囚禁。但年老的阿斯法·沃森还是与自己的儿子和解，不但继续任命他为希瓦北部的安提佐基亚的统治者，而且指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阿比尔提及一个传说：在与耶杰朱奥罗莫的一次战斗中，他被古杰基的首领俘虏，后来被希瓦教会首领赎回，他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伊斯兰教教长的模样偷偷进入耶杰朱领土。在重新获得希瓦统治权以后，沃森·塞戈德与提格雷的首领沃尔德·塞拉西结成联盟，并入侵首领古格萨统治的耶杰朱疆域。沃森·塞戈德开始一项教堂修建计划，重新修建了德布雷的三位一体教堂、德布雷里巴诺斯的圣母教堂，并在塞拉哈迪加耶建立了一所新教堂。尽管做了这些，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仍因其对伊斯兰教的宗教宽容政策而不满。

183

塞拉西，阿姆哈（Selassie，Amha，1916—1997），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在其父海尔·塞拉西被废黜之时拥立为皇帝。1975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王朝制度被废除，他自己的统治也就此结束并开始了流放生涯。1916 年 8 月，阿姆哈·塞拉西出生在高墙环绕的哈拉尔城阿斯法乌·沃森·塔法里，从政后开始担任哈拉尔省长，最后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他的妻子是门内恩·阿斯法乌。1930 年 11 月 2 日，当阿姆哈·塞拉西的父亲登上王位时被立为埃塞俄比亚皇储。1960 年当皇帝访问巴西时，皇家卫队发动政变并掌握政权。皇储在政变领导人的强迫下被迫宣读了由他继承王位并在政府中进行改革的声明。但是正规军和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拒绝承认新政府，教会领导人、大主教阿布内·巴斯里奥斯将所有与政变者合作的人革出教门。皇帝回国后军队占领了皇宫并囚禁了政变政府的成员。1973 年，皇储阿斯法武·沃森遇刺，后到瑞士接受治疗。他是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去的。1989 年 4 月，皇储阿斯法武·沃森被宣布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当时他还在流放中，住在伦敦。他即位时称为阿姆哈·塞拉西一世。从 1973 年遇刺以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1997 年 2 月 17 日，80 岁的

阿姆哈·塞拉西因长期患病而在美国弗吉尼亚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埃塞俄比亚安放在皇家墓地。

塞拉西，海尔·戈布雷（Selassie，Haile Gebre，1973—），人们广泛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长跑运动员。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中部的阿尔西省，受到阿贝贝·比利拉和米鲁特斯·伊弗特尔等运动员的影响。据说，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每天都跑着上学和回家，就是说每天跑20公里。16岁的时候，海尔在没有任何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马拉松，取得了2小时42分的成绩。1992年，海尔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获得5000米和10000米冠军。1993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他夺得10000米金牌和5000米银牌。1996年，在5000米和10000米比赛中打破萨伊德·奥伊塔保持6年的世界纪录，创造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纪录。1995年是海尔成为无与伦比的长跑运动员的一年，在那一年里，他先是在2000米竞赛中打破了莫塞斯·基普坦努伊保持的世界纪录，仅仅一个星期以后，他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他在世界锦标赛中再次获得10000米冠军，并在瑞士的苏黎士创造了自己的第4个世界纪录。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在10000米比赛中创造了世界纪录并获得金牌。1997年2月，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他又创造了1500米比赛的世界新纪录。戈布雷·塞拉西的第7个世界纪录创造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1997年的一场比赛中，他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1997年在挪威的奥斯陆他在10000米比赛中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一个月他再次创造了10000米比赛的世界冠军，1997年8月13日，再次创造了新的5000米比赛世界纪录，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提高了3秒。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他获得自己的第二块10000米比赛金牌。2004年，戈布雷·塞拉西抱着第3次夺得10000米金牌的心愿参加了奥运会，但他仅获得了第5名，金牌被他的同胞科内尼萨·贝克勒获得。

184

塞拉西，萨哈尔（Selassie，Sahle，1795—1847年10月22日），希瓦贵族，后来成为皇帝（1813—1847），也是埃塞俄比亚一位重要的阿姆哈拉贵族之一。他是沃森·塞戈德的小儿子。

塞拉西，萨哈尔（Selassie，Sahle，1936—），埃塞俄比亚作家，他至少创作了四本专著。1969 年出版的《阿菲尔萨塔》（The Afersata）在“非洲作家系列丛书”中是最知名的作品。

塞拉西，塞拉·雅克布·阿姆巴（Selassie，Zera Yacob Amha），被指定为埃塞俄比亚皇储，他是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孙子，埃塞俄比亚流亡皇帝阿姆哈·塞拉西的儿子。1974 年革命以后，他流亡英国，并进入学校学习，期间也曾暂住美国。现在他生活在亚的斯亚贝巴，并被认为是现在埃塞俄比亚前皇室的领导者。

塞拉西一世，海尔（SelassieI，Haile，1892—1975），出生在里吉塔法里马康南，1930—1974 年期间为埃塞俄比亚皇帝。他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而著名。在拉斯塔法里运动中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化身。

沙乌尔，海鲁（Shawul，Hailu，也拼为 Shawel，Shawil），生于 1936 年，埃塞俄比亚的工程师和统一与民主联盟的主席。他出生在希瓦北部。由于 2005 年 5 月大选中的反政府行为，海鲁·沙乌尔被政府监禁在家中一段时间。当 10 月统一与民主联盟发动了和平示威以后，他和统一与民主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入狱。

185

示巴女王（Sheba），示巴的统治者。示巴是一个古老的王国，现代考古学家认为示巴坐落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或者也门境内。她也被称为马克达，伊斯兰教的传统说法称为比尔奇斯（Bilqis），还有人称她为尼卡乌尔特（Nikault，Nicaula）。在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讲述的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中说，女王是一个名为马克达的埃塞俄比亚最高统治者，在她从所罗门统治的耶路撒冷回来时已经怀有身孕，后来生下了国王的儿子戴维（大卫），戴维（大卫）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位国王，在位时称为孟尼利克一世。马克达的事迹被记载在埃塞俄比亚非常古老的书《列王传奇》中。

西西尼奥斯皇帝（Sissinios），在位时称为马拉克·萨加德三世，1572 年出生，埃塞俄比亚皇帝（1607—1632 年 9 月 7 日）。他的父亲是希瓦的法西里德斯王子，爷爷是达维特二世。尽管一些学者将其列

为所罗门王朝的成员，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贡德尔王朝的建立者。

所罗门国王（约公元前1000年），圣经时代一位有智慧的帝国统治者。所罗门王朝的忠诚度和辉煌是无与伦比的。所罗门以其智慧和格言而著名。包括示巴女王马克达在内的许多人都慕名前来目睹所罗门的智慧。根据埃塞俄比亚传说，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生的儿子孟尼利克一世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位皇帝。

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Tewodros II，or Theodore II，1818—1868），埃塞俄比亚皇帝（1855—1868）。他出生时的名字是卡萨·海尔·吉奥尔吉斯，但人们他更多地称他为卡萨·海鲁。他统治时期经常被成为古代分权王子统治时期的结束和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开始。他将帝国的首都从贡德尔迁移到德布雷塔波尔，后来又迁移到马格达拉。特沃德罗斯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由地方军阀和王子统治的两个世纪的历史，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他以武力的方式将格杰加姆、希瓦和沃尔罗这些曾经是王子和军阀统治的地区收到帝国中央政府统治之下。特沃德罗斯出于对北方势力的担忧而写信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寻求英国在该地区予以援助。但特沃德罗斯等了两年还是没有收到英方的答复，于是囚禁了几个英国臣民以求引起维多利亚女王的注意，结果导致英国军队在罗伯特·纳皮尔的领导下入侵埃塞俄比亚，这一入侵得到了那些曾经遭到特沃德罗斯终生与之战斗的军阀的支持，埃塞俄比亚军队最后战败。1868年4月13日，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

186

图鲁，德拉尔图（Tulu，Derartu，1972—），埃塞俄比亚长跑、公路跑和马拉松运动员。她出生在阿尔西省的波康吉，那里也是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男田径运动员科内尼萨·贝克勒的故乡。她不但是埃塞俄比亚而且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第一个在奥运会夺得奖牌的女人。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她因获得10000米比赛冠军而声名鹊起。1998、1999年两年，她因为生孩子而没有参加比赛。但是在2000年她以恢复到最佳状态回到比赛中，并第二次夺得10000米比赛的奥运金牌，成为唯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到如此状态的人。她总共获得6枚世界和奥运会金牌，此外，她还在2004年奥运会中获得一枚铜

牌，并在其他国际性比赛中夺得许多奖牌。她是奥林匹克运动具有象征意义的人，许多人对 1992 年她以绝对优势战胜南非白人选手埃拉娜·梅耶尔夺得冠军的场面记忆犹新，那次胜利不仅标志着非洲在田径项目中无缘奖牌历史的结束，同时也表明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束。

瓦尔斯，古格萨，首领（Wales，Gugsa，Ras，1877 年 4 月—1930），出生在亚杰朱的马尔托，贝加梅德尔省省长（1916—1928）和亚杰朱省省长（1928—1930）。古格萨·瓦尔斯是塔伊图皇后的外甥，塔伊图是扎乌迪图摄政王的妻子。后来，他反对海尔·塞拉西继承王位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1930 年在安切姆战役中被效忠于皇帝的军队击败并被杀死。

沃尔德，马穆（Wolde，Mamo，1931—2002 年 5 月 26 日），出生在距离亚的斯亚贝巴 60 公里的亚的斯亚贝巴 A 区的德雷德尔村。他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德雷德尔村度过的，并在那里进入“问题”（qes）学校学习。1951 年他进入皇家卫队。在这样一个享有声望的武装部队里使他得以继续学习。1953 年，他转入皇家卫队第二营并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往韩国。在韩国的两年里他表现出色。从韩国服役回来后他结了婚，并开始追求自己的运动理想。在 1962 年墨尔本奥运会上，马穆作为埃塞俄比亚国家队运动员参加比赛，并获得 1500 米田径比赛第 4 名，从而成为国家队中表现最出色的运动员。1968 年，马穆在 10000 米比赛中与肯尼亚运动员基普·科诺和拿佛塔里·特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那次比赛中，他获得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奥运会银牌，并战胜了来自 44 个国家的运动员，为自己的祖国赢得第 3 块马拉松金牌。1972 年，39 岁的马穆在慕尼黑奥运会中夺得 10000 米比赛铜牌。他总共参加了 62 次国际比赛。

沃尔德马里亚姆，梅斯芬（Woldemariam，Mesfin，也称为 Mesfin Wolde Mariam），生于 1930 年，埃塞俄比亚和平主义者，主要活动在梅莱斯·泽纳维时期。他是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the Ethiopia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埃塞俄比亚彩虹党的创始人，该党以争取民主与社会公平运动而著名。梅斯芬出生在亚的斯亚贝巴。1955

187 年，梅斯芬在印度昌迪加尔的普恩加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7 年在美国的克拉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梅斯芬是海尔·塞拉西大学（现在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地理系教授并曾担任系主任一职。1971、1986 和 1987 年曾三次成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2005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政府以违宪为由将梅斯芬与其他几位统一与民主联盟领导人拘捕。

沃尔库，阿斯纳克克（Worku，Asnakech，1935—），埃塞俄比亚受人爱戴的歌手。她的标志是克拉尔（krar），这是一种类似七弦琴的弦乐器。2003 年，布达音乐唱片公司（Buda Musique）发行了“埃塞俄比亚音乐（16）：以克拉尔伴唱的女郎”（Ethiopiques16：Lady with the Krar），这是一张收录有她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所有歌曲的唱片。

沃森，阿斯法（Wossen，Asfa，1770—1808），希瓦贵族，也是一名重要的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贵族。在他统治期间，希瓦对格希、安特兹奥卡、埃佛拉塔尔、莫雷特和马尔拉比耶特等地区的控制明显加强。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他推崇“苏斯特里德特教义”[①]，这种教义认为基督有三次诞生，第一次是上帝创造，第二次是圣母玛利亚所生，第三次是圣灵受洗。据说，他还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和富有才华的统治者，其政绩包括税收改革和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亚雷德（Yared），15 世纪埃塞俄比亚作曲家，创作有德格古阿（the Deggua）和教会礼拜乐曲。

耶格加朱，穆鲁戈塔，首领（Yeggazu，Mulugeta，Ras），孟尼利克皇帝手下主管财政的官员。后来成为主管军队的官员，并于意大利入侵时掌管皇家部队。1936 年，首领穆鲁戈塔在反抗意大利入侵的抵抗战争中被杀害。

伊非拉希瓦，吉尔马（Yifrashewa，Girma），1967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第一位钢琴家，曾在非洲许多国家演出，还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地方演出过。他与妻子、儿子共同生

① the Sost Lidet doctrine，该教义是埃塞俄比亚正教信条，在希瓦地区流行。——译者注

活在亚的斯亚贝巴。

伊非特尔，米鲁特斯（Yifter，Mirutes（1938—），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的阿迪格拉特。他年轻时曾作为客车司机在多个工厂工作。他作为长跑运动员的天分是通过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斯马拉的1500米、5000米和10000米比赛中的出色成绩表现出来的。据民间传说，米鲁特斯看见埃塞俄比亚空军的田径运动员在街道上比赛，就请求田径队的队长允许自己参加比赛，最后他在比赛中获得第3名的成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要求下，他得以进入备战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国家队。米鲁特斯与来自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的运动员竞争，在5000米和10000米比赛中获得出众的成绩。 188 他的标志性特点是能在最后200米时从运动员队伍中脱颖而出。这种不寻常的能力使他赢得了许多胜利并为他赢得了“米鲁特斯旋风”（Mirutes the Shifter）的称号。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在10000米比赛中获得铜牌，但是在5000米比赛中没有获得奖牌。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米鲁特斯为埃塞俄比亚赢得两枚金牌。这两次胜利为米鲁特斯在他的祖国赢得了尊重与荣誉，被认为是继阿贝贝·比基拉和马莫·沃尔德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人物。本来，米鲁特斯很有可能在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获得一枚金牌，但是由于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国家抗议主办方允许南非参赛而抵制该项赛事，因此没有实现。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米鲁特斯参加了252场以上的比赛，获得了221枚金牌。出于对米鲁特斯出色的职业生涯的认可，世界运动记者协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赠予他“金鞋”（Golden Shoe）一双。

约翰尼斯，门戈沙（Yohannes，Mengesha，1868—1906），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尼斯四世的儿子，提格雷的首领，被授予王子称号并被立为皇储。在他的父亲约翰尼斯四世在梅特姆马战役中死去后，他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但是，由于去世皇帝的亲戚之间为争夺皇位发生矛盾，结果使门戈沙无法继承王位，最后王位被希瓦的孟尼利克获得。首领门戈沙拒绝服从孟尼利克，甚至不以为然地站在意大利一边，希望以此获得意大利对于他反抗孟尼利克的支持。但是意大利对于他的家乡提格雷的

侵略以及先前意大利人对待他父亲的敌对态度，促使他最后接受孟尼利克二世的领导，并在阿杜瓦战役中站在反对意大利的一边。

约翰尼斯四世皇帝（Yohannes IV，1831—1889年3月10日），又被称为约翰内斯四世（Johannes IV）或约翰四世（John IV），出生时叫做德加兹马克·卡塞（Dejazmach Kassai 或 Kassa），1872—1889年间是埃塞俄比亚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一个死敌，并在1868年给予击败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英国军队以后勤和政治上的支持。出于对这种支持的感谢，英国人在取得马格达拉战役胜利以后，在撤退时将大量现代武器装备送给德加兹马克·卡塞。这一帮助令他控制了提格雷并成为埃塞俄比亚最有权势的三个王子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拉斯塔瓦格和瓦格的瓦格枢姆·戈比斯，后来当了皇帝，即特克尔·吉尤尔吉斯二世；希瓦的萨哈尔·马尔亚姆国王，后来也当了皇帝，即孟尼利克二世，他们都想成为埃塞俄比亚唯一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所罗门诸王的后代。1889年3月9日，在马赫迪·爱哈迈德的继承者阿卜达尔拉希·马赫迪入侵时的梅特姆马战役中，约翰尼斯被杀。

189

扎拉哈一雅科布皇帝（Zar'a-Ya'qob，1434—1468）是一位因其出色的统治和坚定的宗教信仰而闻名的埃塞俄比亚统治者。埃塞俄比亚文献中对其统治期间给予很高评价。

扎乌迪图女皇（Zauditu，也作 Zawditu 或 Zewditu，1876年4月29日—1930年4月2日），1916—1930年间为埃塞俄比亚女皇。她以反对塔法里·马康南（即后来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改革和坚定的宗教信仰而闻名。

泽纳维，雷戈西，"梅莱斯"（Zenawi，Legesse，"Meles"，1955—），埃塞俄比亚首相。生于提格雷省的阿德瓦，母亲是厄立特里亚人，父亲是提格雷人。由于反对党采取抵制政策，他领导的政党取得议会所有席位。从1991年5月28日到1995年8月22日，他还是埃塞俄比亚过渡总统，并于1995年6月至1996年6月期间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他也是非洲全球联合会（Global Coalition for Africa）的

主席并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1] 平息苏丹和索马里的冲突以及在非洲人寻求摆脱布隆迪危机的过程中表现积极。1995 年梅莱斯从“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获得头等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并于 2004 年在荷兰的埃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泽武德，巴哈鲁（Zewde，Bahru），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于 1970 年在海尔·塞拉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6 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先后曾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纳香宾分校和德国的汉堡大学任教。他曾担任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为《埃塞俄比亚研究杂志》、《东非社会科学研究评论》和《非洲著作评论》等书的编辑。他也是埃塞俄比亚历史学会会长，《非洲历史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东部和南部非洲社会科学组织（OSSREA）常务副主席，非洲历史学会第一副主席。当前，巴哈鲁·泽武德担任《埃塞俄比亚社会研究论坛》执行主任，非洲托拉斯董事会成员（Trust Africa）。另外，他还写了许多有影响的专著，其中包括：《现代埃塞俄比亚史，1855—2001》，《埃塞俄比亚变革的开拓者：20 世纪初期改革派知识分子》。他还在 2002 年编辑出版了《大白鲨与鬣狗之间的较量：埃塞俄比亚外交史，1876—1896》，与其他人合作编辑出版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民主挑战》，并在 1998 年编辑出版了《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简史》，同时，他还写了 30 多篇论文，并参编了一些书籍。

---

[1]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缩写 IGAD，中文简称伊加特。——译者注

参考文献

第一章

Adera, Tadesse, and Ali Jimale Ahmed, eds. *Silence is Not Golden :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Ethiopian Literature.*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4.

Boll, Verena, Kaplan Steven, and Andreu Martinez D'Alos-Moner, eds. *Ethiopia and the Missions : histroy and Anthropological lnsights.* Germany: Lit Verlag, 2005.

Brooks, Miguel F. , ed. *Kebra Nagast (The Glory of Kings): The True Ark of the Covenant.*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5.

Chaillot, Christine. *Ethiopian Orthodox Tewahedo Clutrch Tradition : A Brief lntroduction to lts Life and Spirituality.* Paris: Inter-Orthodox Dialogue, 2002.

Chojnacki, Stanislaw, and Carolyn Gossage. *Ethiopian lcons :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Italy: Addis Abada University, 2000.

Hancock, Graham, Mohamed Amin, and Dyncan Willetts, eds. *The Beauty of Addis Ababa : A Photographic Guie to Addis Ababa Highlighting the City's Architectural Heritage , Its Colurful Market Places and Historical*

Buildings. Ethiopia: 1997.

Hancock, Graham, Richard Pankhurst, and Duncan Willetts. *Under Ethiopian Skies, A Photographic Guide Introduction to Ethiopia Describing Aspects of its Religions Architecture, Natural World, and Its People.* Kenya: Camerapix, 1997.

Henze, Paul.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UK: Hurst&Co., 2000.

Kiros, Teodros, and Zara Yacob. *Rationality of the Human Heart.*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2005.

Lipsky, George A. *Ethiopia: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New Haven, CT: Hraf Press, 1962.

Marcus, Harold G. *A History of Ethiop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Markakis, John.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Mathew, David. *Ethiopia: The Study of a Polity, 1540—193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47.

Munro-llay, Stuart, *Ethiopia, The Unknown Land: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uide.* London: I B Turst, 2002.

Pankhurst, Alula, and Dena Freeman, eds. *Peripheral People: The Excluded Minorities of Ethiopia.* UK: Hurst, 2003.

Pankhurst, Richard. *The Ethiopi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Pankhurst, Richard, David Northrup, and Frederic A. Sharf. *Abyssinia, 1867—1868: Arists on Campaign.* CA; Tsehai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003.

Trimingham, J. *Spencer Islam in Ethiopia.* UK: Cass, Frank, 1976.

Wendorf, Fred. *A Middle Stone Age Sequence from the Central Rift Valley.* Ethiopia, 1974.

第二章

Adejumobi, Saheed A. "Ethiopia." In *Africa Volume 1: African History Before 1885*, ed. *Toyin Falola*, *231—242.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0.

Baum, James E. *Savage Abyssinia.* London: Cassell, 1928.

Bredin, Miles. *Pale Abyssinia: The Life of James Bruce, African Explorer and Adventurer.* UK: Harper Collions Publishers, 2000.

Caulk, Richard, ed. *Between the Jaws of Hyena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thiopia (1876—1896).*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

Crummey, Donald. "Initiatives and Objectives in Ethio-European Relations, 1827—1862."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5, no. 3 (1974).

—— "Soc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olitics of Christian Ethiopia during the Zamana Masaf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Studies* 8, no. 2 (1975).

—— "Socity, State and Nationality in the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Ethiopi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1, no. 1 (1990): 103—19.

—— "Tewodros as Reformer and Modernizer."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0, no. 3 (1969).

Harrington, Peter, Richard Pankhurst, and Frederic A. Sharf, eds. *Diary of a Journey to Abyssinia, 1868. With the Expedition of Sir Robert Napier, K. C. S. I. The diary and Observation of William Simpson.* CA: Tsehai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002.

Lepsius, Richard. *Letters from Egypt, Ethiopia, and to Peninsula of Sinai.* London: H. G. Bohn, 1853.

Lewis, Herbert S. "Historical Problems in Ethiopia and the Horn of Africa."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96, art. 2, 505.

Marcus, H. G. "The Black Men Who Turned White: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Ethiopians, 1850—1900." *Archiv. Orientalni.* No. 39 (1971).

Pankhurst, Richard. *The Ethiopia Borderlands: Essays in Regional Hi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7.

——. "Ethiopian Emperor Menelik II Repulsed Italian Invasion, 1895." *The Africa Reader: Colonial Africa.*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s by Wilfred Cartey and Martin Kil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 The Ethiopians: *A History.* UK: Blackwell, 2001.

——. "The Independence of Ethiopia and Her Import of Ar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esence Africaine* nos. 32/33 (1964).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Lalibela House: 1961.

Ramos, Manuel Joao, and Isobel Boavida, eds. *The Indigenous and the Foreign in Christian Ethiopian Art: On Portuguese Ethiopian Contacts in the 16th 17th Centuries.* UK: Ashgate Publishers, 2004.

Rubenson, Sven, ed. *Correspondence and Treaties: 1800—1851.* Evanston, IL: Nro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7.

Taiwo, Olufemi. "Prophets Without Honor: African Apostles of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est Africa Review* 3, No. 1 (2002).

第三章

Adejumobi, Saheed A. "Northeast Africa." *In Africa: Volume 3: Colonial Africa 1885—1939*, ed. Toyin Falola, 397—411.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2.

Araia, Ghelawdewos. *Ethiop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Bulcha, Mekuria. *Making of the Oromo Diaspora: A History Sociology of Forced Migration.* Minneapolis, MN: Kirk House Publishers, 2002.

Caulk, R. A. "Armies as Predators: Ethiopia c. 1850—1935."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XI, no. 3 (1978): 472—78.

Donham, Donald L. , and Wendy James , eds. *The Southern Marches of Imperial Ethiopia : Essays in 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UK: James Currey Publishers, 2002.

Erlich, Haggai. *Ras Alula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 A Political Biography.*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6.

Greenfield, Richard. *Ethiopia :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5.

Hanchard, Michael. " Afro-Modernity: Tenporality, Politics,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 " Public Culture 11 (1999): 245—268.

Hansberry, Leo. *Pillars in Ethiopian History : The William Leo Hansberry Notebook* , ed. Jodeph E. Harris. Vol. 1. Washington, D. C. :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Hayford, Casely J. E. Ethiopia Unbound: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 London: Cass, 1969.

Jalata, Asafa. Oromia and Ethiopia: *State Formation and Ethmonationl Conflict , 1868 —2004.*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2005.

Marcus, Harold G. *Haile Selassie , : The Formative Years , 1892 — 1936.* NJ: Red Seas Press, 1995.

McCann, Jam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Rebellion in Ethiopia: Northern Resistance to Imperial Expansion, 1925—1935.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18, no. 4 (1985) .

McClellan, Charles W. "Articulating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t the Periphery: Addis Ababa and Sidamo's Provincial Centers. " *African Studies Review* 33, no. 1 (April 1990) .

Norbeg, Viveca. Halldin*Swedes in Haile Selassie's Ethiopia , 1924 — 1952 : A Study in Earl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Uppsala: Uniwersity of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distr. , 1977.

Schaefer, Charles. "The Politics of Banking: The Bank of Abyssinia, 1905—1935.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5,

no. 2 (1992) .

Taiwo, Olufemi. "Reading the Colonizer's Mind: Lord Lugard 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Colonialism." In Susan E. Babbitt and Sue Campbell, eds., *Racism and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Tibebu, Teshale. "Ethiopia: The 'Anomaly' and 'Paradox' of Africa." *Journal of Back Studies* 26, no. 4 (March 1996): 414—30.

Time Magazine, August 9, 1926.

Time Magazine, November 3, 1930.

Time Magazine, November 10, 1930.

Waugh, Evelyn. *Waugh Abroad: Collected Travel Writing/Evelyn Waugh.* Introduction by Nicholas Shakespeare. New York: Everyman's Library, 2003.

Zewde, Bahru. *Pioneers of Change in Ethiopia: The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K: James Currey Publishers, 2002.

第四章

Ben-Ghiat, Ruth. *Fascist Modernities: Italy, 1922—1945.*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Ben-Ghiat, Ruth, and Mia Fuller. *Italian Colonialism.* NY: Palgrave McMillan, 2005.

Clapham, Christopher. *Haile-Selassie's Government.* Foreword by Dame Margery Perham. New York: Praeger, 1969.

Davis, Mary Sylvia Pankhurst. *A Life in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Del Boca, Angelo. *The Ethiopian War, 1935—194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Diggins, John P.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DuBois, W. E. B. "Inter-ra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Ethiopian Crisis: A

Negro View." *Foreign Affairs* 4, no. 1 (October 1935): 85—86.

Esedebe, Olisanwu. *Pan-Africanism: The Idea and Movement, 1776—1963.*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Falola, Toyin. *Nationalism and African Intellectuals.*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1.

Gaines, Kevin K. *Black Expatriates and the Civil Rights Era: American Africans in Ghana*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Gallo, Patrick J. *Old Bread, New Wine: A Portrait of the Italian-Americans.* Chicago: Nelson-Hall, 1981.

Gebrekidan, Fikru Negash. *Bond Without Blood: A History of Ethiopian & New World Black Relations, 1896—1991.* NJ. Africa World Press, 2005.

Goldberg, David Theo. *The Racial Stat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Goodman, Madeline Jane. "The Evolution of Ethnicity: Fascism and Anti-Fascism in the Italian-American Community." Ph. D. dissertation,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1933.

Harris, Joseph E. *African-American Reactions to War in Ethiopia, 1936—194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ckson, John G. *Ethiopia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A: Black Classic Press, 197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9.

Kelley, Robin. *Freedom Dreams: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MA: Beacon Press, 2002.

Larebo, Haile. *The Building of an Empire: Italian Lan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Ethiopia.* NJ: Africa World Press, 2006.

Magubane, Bernard Makhosezwe. "The Significance of Ethiopia in Afro-American Consciousness." In *The Ties That Bind: African-American Consciousness of Africa*, ed. Magubane. Africa World Press, Inc., 1987.

Moses, Wilson J. "The Poetics of Ethiopianism: W. E. B. DuBois

and Literary Black Nationalism." *American Literature* 47, no. 3 (November 1975).

Pankhurst, Richard "Italian Fascist War Crimes in Ethiopia: A History of Their Discussion,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1936—1949)."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 6, no. 1—2 (1999).

——. *Sylvia Pankhurst: Counsel for Ethiopia.* CA: Tseha, 2003.

Rankin, Nicholas. *Telegram from Guernica: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George Steer, War Correspondent.* UK: Faber, 2003.

Rogers, J. A. *The Real Facts about Ethiopia.* Black Classic Press,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6.

Sbacchi, Alberto. *Legacy of Bitterness: Ethiopia and Fascist Italy, 1935—1941.* Lawrenceville, NJ: The Red Sea Press, 1997.

Scott, William R. "Black Nationalism and the Italo-Ethiopian Conflict, 1934—1936."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63, no. 2 (April 1978).

Shack, William A. "Ethiopia and Afro-Americans: Some Historical Notes, 1920—1970." *Phylon* 35, no. 2 (1974).

Time Magazine, October 28, 1935.

Ventresco, Fiorello B. "Italian Americans and the Ethiopian Crisis." *Italian Americana* 6, no. 1 (summer 1980): 4—27.

Von Eschen, Penny M.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Zewde, Bahru. "The Ethiopian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talo-Ethiopian War, 1935—1941."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6, no. 2 (1993).

第五章

Agyeman-Duah, Baffou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thiopia :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the*

Quest for Security, 1953—1993.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Bahrey, Almeida, Huntingford, and Beckingham. *History of the Galla (Oromo) of Ethiopia : With Ethnology and History of South West Ethiopia.* CA: African Sun Publishing, 1993.

Clapham, Christopher. "The Ethiopian Coup d'Etat of December 1960."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6, no. 4 (1968): 495—507.

——. "Imperial Leadership in Ethiopia." *African Affairs* 68, no. 271 (April 1969).

Gudina, Merera. *Ethiopia : Competing Ethnic Nationalisms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cy, 1960—2000.* Maastricht, Holland: N. P Shaker Publishing, 2003.

Iyob, Ruth. *The Eritrean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 Domination, Resistance, Nationalism, 1941—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egional Hegemony: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31, no. 29 (1993).

Kapuscinski, Ryzard. *The Emperor : Downfall of an Autocrat.* New York: Vintage, 1983.

Lefebvre, Jeffrey A. "The United States, Ethiopia and the 1963 Somali-Soviet Arms Deal: Containment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Dilemma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6, no. 4 (December 1998).

Schwab, Peter. "Cold War on the Horn of Africa." *Africa Affairs*77,

no. 306 (January 1978) .

Sellassie, Haile. *My Life and Ethiopia's Progress : The Autobiography of Emperor Haile Sellassie.* Translated from Amharic by Edward Ullendorff. 2 vols. New York: Frontline Books, 1999.

Tibebu, Teshale. *The Making of Modern Ethiopia : 1896—1974.*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5.

Zewde, Bahru. *A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 1855—1991.* 2nd ed.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 "Intellectuals and Soldiers: The Socialist Experiment in the Horn of Africa." Paper prepared for CODESRIA 3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Dakar, December8—11, 2003.

第六章

Brind, Harry. "Soviet Policy in the Horn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60, no. 1 (Winter 1983—1984) .

Chege, Michael.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Ethiopia, 1974—79."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7, no. 3 (1979): 395—80.

Donham, Donald L. *History , Power , Ideology : Central Issues in Marxism and Anthropolog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Marxist Modern : An Ethnographic History of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Revolution and Modernity in Maale: Ethiopia, 1974 to 1987."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4, no. 1 (January 1992): 28—57.

——. *Work and Power in Maale , Ethiopia.* U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Harbeson, John W. "Socialism, Tra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XI, no. 2 (1977): 217—34.

James, Wendy, Donald L. Donham, Eisei Kurimoto, and Alessandro

Triulzi, eds. *Remapping Ethiopia : Socialism & After.* UK: James Currey Publishers, 2002.

Kebbede, Girma.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Ethiopia.*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2.

Keller, Edmond J. "Ethiopia: Revolution, Clas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frican Affairs 80 (1981).

Keller, Edmond J.,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Afro-Marxist Regimes : Ideology and Public Polic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Marcus, Harold G. *History of Ethiopia.*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Ottaway, Marin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thiopia.* New York: Praeger, 1990.

Pankhurst, Helen. *Gender,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 An Ethiopian Study.* London: Zed Books, 1992.

Pausewang, Siegfried, Kjetil Tronvoll, and Lovise Aalen, eds. *Ethiopia Since the Derg : A Decade of Democratic Pretensions and Performance.* London: Zed Books, 2002.

Tibebu, Teshale. *The Making of Modern Ethiopia, 1896—1974.*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5.

Yong, John. *Peasant Revolution in Ethiopia : The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197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七章

Abraham, Kinfe. *Ethiopia : From Bullets to the Ballot Box : The Bumpy Road to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4.

Adejumobi, Saheed A. "Af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Contradictions in the African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In *Intellectual News :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no. 11 (Winter/Spring 2004): 38—55.

Africa Insight: Ethiopia: Challenges from the past,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no. 321 (October 1981): 519—49.

Chole, Eshetu. *Underdevelopment in Ethiopia.*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asterly, William.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Geda, Alemayehu. "Does Conflict Explain Ethiopia's Backwardness? Yes and Significantly." Paper presented at Making Peace Work Conference at WIDER, Helsinka, Finland, June 2004.

——.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Post-Reform Ethiopia." *Journal of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 8 no. 1 (2005): 159—58.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in Ethiopia." *Cambride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forthcoming).

Gidron, B., P. Q. Ufford, and A. B. Kello. "NGOs dealing with refugee in Amsterdam." NIRP Research for Policy Series 12.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 2003.

Hammond, Jenny. *Fire from the Ashes: A Chronicle of the Revolution in Tigray, Ethiopia, 1975—1991.*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9.

Harbeson, John W. *The Ethiopian Transformation: The Quest for the Post-Imperial 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Harney, Elizabeth. *Ethiopian Passages: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 Diaspo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1, no. 2 (winter/spring 2004).

Kebede, Messay. *Survival and Modernization: Ethiopia's Enigmatic*

Present: A Philo-

Sophical Discourse.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9.

Lata, Leenco. *The Ethiopian State at the Crossroads: Decolo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r Disintegration?*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9.

Levine, Donald N. *Greater Ethiopia: Evolution of a Multiethnic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engisteab, Kidane. "New Approaches to State Building in Africa: The Case of Ethiopia's Ethnic-Based Federalism." *African Studies Review* 40, no. 3 (December 1997).

Pankhurst, Richard. "An Ethiopian Hero: Tsegaye Gabre-Medhin (1936—2005)." Open Democrary: Free Thinking for the World. http://www. open democracy. net/xml/xhtml/articles/3347. html.

Parker, Ben, and Abraham Woldegiorgis. *Ethiopia.* UK: Oxfam Publications, 2003.

Pausewang, Siegfried, Kjetil Tronvoll, and Lovise Aalen, eds. *Ethiopia Since the Derg: A Decade of Democratic Pretension and Performance.* London: Zed Books, 2002.

Poluha, Eva. *The Power of Continuity: Ethiopia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Children.* Sweden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4.

Sachs, Jeffrey.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Sorenson, John. *Imagining Ethiopia: Struggles f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Stiglits, Joseph 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Co., 2002.

Taiwo, Olufemi. "Colonialism and its Aftermath: The Crisi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allaloo* 16, No. 3 (1993).

Taiwo, Olufemi. "Globalization: Doing It Right this Time Around."

Forthcoming.

Turton, David, ed. *Ethnic Federalism: The Ethiopian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

www. Wikipedia. com. Ethiopian people stubs is a popular resource for capsule information on select Ethiopian historical figures.

Von Eschen, Penny M. *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 Jazz Ambassadors Play the Cold War.*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Zewde, Bahru. "What did we dream? What did we achieve? And where are we heading?" *Africa Insight: Ethiopia: Challenges form the Past,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no. 321 (October 1981).

Zewde, Bahru, and Siegfried Pausewang, eds. *Ethiopia: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From Below, Alternative Voices.* Sweden: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2.

索　引

（索引中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

① 原文为*Grammatica linguae amharicae on the history*（ludolf），但原书中却是*Grammatica linguae amharicae*，而*on the history* 在原书中属于上一句话中的*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因此，译者认为这里面很可能是原书在排版是出现了问题。——译者注